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XUE SHI



# 中共党史史学史

周一平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党史

中共党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道路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  
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理论分析

# 中共党史学史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XUE SHI

周一平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新田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徐晋林

ISBN 7-226-02432-2



9 787226 024324 >

ISBN 7-226-02432-2  
D·216 定价：49.00元

# 中共党史学史



周一平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XUE SHI



\*200112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 - 226 - 02432 - 2

I. 中... II. 周...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学史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3871 号

责任编辑:刘新田

责任校对:曹小强

**中共党史史学史**

周一平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8 插页 6 字数 436 千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50

ISBN 7 - 226 - 02432 - 2/D·216 定价:49.00 元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XUE SHI

中共党史史学史



作者简介

周一平，1949年11月生，浙江嵊州市人。华东师大法政学院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中共党史文献学》、《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的学术成就》等十余种。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XUE SHI

中共党史学史



献给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

第一章 中共党史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

- ..... (1)
- 一、研究对象、内容 ..... (1)
- 二、研究目的、任务 ..... (3)
- 三、研究作用、意义 ..... (3)
- 四、学科性质、特点 ..... (3)
- 五、学科体系 ..... (4)
- 六、分期 ..... (4)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1921—1949.9)

- ..... (7)
- 一、概说 ..... (7)
- 二、开端 ..... (21)
- 三、中共党史研究 ..... (31)
  - 1.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 (31)
  - 2. 李立三《党史报告》 ..... (44)
  - 3.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 ..... (52)
- 附：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 (61)
- 四、中国革命史研究 ..... (69)
  - 1.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 (71)
  - 2. 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 ..... (78)
  - 3.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 (93)

第三章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曲折道路(1949.10—1978.12)



# 目 录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XUE SHI





# 目 录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XUE  
SHI

.....	(118)
一、概说 .....	(118)
二、中共党史研究 .....	(122)
1.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	(122)
2. 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 .....	(141)
三、中国革命史研究 .....	(153)
1.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 .....	(153)
2.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 .....	(165)
3.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	(184)
<b>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 党史研究的大发展(1978.12 - )</b> .....	(220)
一、概说 .....	(220)
二、中共党史研究 .....	(224)
1. 郑德荣等《中共党史教程》 .....	(224)
2. 胡绳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	(241)
3. 沙健孙等《中国共产党通史》 .....	(260)
三、中国革命史研究 .....	(274)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	(274)
<b>第五章 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理论 分析 .....</b>	(300)
一、中共党史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 和基本原因 .....	(300)

1. 产生的历史条件 .....	(300)
2. 产生、发展的基本原因 .....	(302)
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	(309)
1. 资料问题 .....	(310)
2. 减少、避免重复劳动 .....	(330)
3. 政治与学术关系 .....	(342)
4. 加强理论研究 .....	(344)
5. 培养后继人才 .....	(346)
6. 发展国内外交流 .....	(348)
附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党史研究简目 (1949.10—2000) .....	(350)
二、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大事记 (1921—2000) .....	(387)
后 记 .....	(436)



# 目 录

ZHONG GONG DANG SHI SHI XUE SHI

## 第一章 中共党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

### 一、研究对象、内容

中共党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中国现代史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它是中共党史学科的自我反思学科，是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的基础理论学科。

中共党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这个“全过程”，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一切方面。其具体内容是：

#### 1. 史家，即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所谓史家，就和政治家、思想家不同。有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如著作等，就可以称之为中共党史学家，是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反之，就不是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有些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没有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就不是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有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如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等，那么他们可以成为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所谓史家，就和文学家不同。文学家及其作品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的文学作品及其作者，不是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党史学史研究的史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不是其他史家，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史家，不是世界史研究的史家。至于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史家，其成果与中共党史有密切关系，可以成为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可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也可以研究一个阶段的历史；可以研究某一事件，也可以研究某一人物，某一项工作。只要从事中共党史范围内的研究，有成就的学者，就可以成为党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中共党史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的一门热门学科。中国国内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世界各国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国内的或者国外的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无论持有何种立场观点的这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是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 2. 史著，即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

史著与政治理论著作不同，政治理论著作不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史著与文学作品不同，文学作品不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史著一般应是史学著作，即党史研究的著作，而不应是资料书、资料集、文献集。资料书是史料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也有区别，史学著作包含的质与量，与史学论文包含的质与量，是不同的。史学史一般以史学著作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以史学论文为研究对象。只有那些特别有影响的论文，史学史可以进行附带的研究，可以将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进行比较研究。

党史著作日益增多，且种类多，形式多，中国大陆很多，香港、台湾地区也很多，国外也很多，这些著作不论立场、观点如何，都可以研究。优秀的、进步的党史著作可以研究，落后的、反动的党史著作也可以研究，可以把不同的党史著作作比较研究，研究其中的斗争，探讨发展规律。在大量的党史著作中，一般选择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著作进行研究。

## 3. 史学团体、机构、流派，即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团体、机构、流派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各省市的党史研究室，是党史研究机构；如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等是党史研究的团体；如中共党史研究中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派别、流派，这些都是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对团体、机构、流派的研究，是对史家群体的研究，也是对党史研究组织工作的一种研究，党史研究组织工作也可以成为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 4. 史学思潮，即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些思潮

如“文革”时期个人崇拜思潮影响下的中共党史研究，如改革开放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等，都是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

## 5. 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即中共党史研究中运用的思想、理论、方法

研究史家、史著，研究史学团体、机构、流派、史学思潮，怎么研究呢？首先就是研究他们的思想、理论、方法，思想、理论、方法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是史学研究成败的根本所在，是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的结晶，只有首先把这些研究清楚，才能对史家、史著等作出深刻、准确的评价，才能对中共党史研究有导向作用，有指导意义。

## 二、研究目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目的、任务主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探讨其中的发展规律和方向，以指导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同时，也为建设一个科学的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而努力。

## 三、研究作用、意义

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作用、意义与中共党史学概论研究的作用、意义有某些相同之处。如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全面建设指明正确的努力方向，总结中共党史研究的经验教训，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检阅新成果、新领域，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发展、新突破，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才培养等，中共党史学概论有这些作用、意义，中共党史史学史也有这些作用、意义，可以相互参见。总之，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可以促使中共党史研究的研究者、工作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发展规律，明确前进方向，少走弯路，提高研究水平，取得更多且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可以推动中共党史理论研究、资料研究的发展，推动研究方法的发展，对中共党史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四、学科性质、特点

中共党史史学史是史学史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史学史如果视为一级学科，那么中国史学史是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三级学科。中共党史史学史属于历史学科是无疑的。

中共党史史学史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研究中共党

史研究的历史，总结中共党史研究的经验教训，探讨其发展规律，它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基础理论学科。如果中共党史学概论是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第一位重要的学科，那么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仅次于中共党史学概论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中第二位重要的学科。

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政治性、现实性、科学性等特点，这与中共党史学概论学科的特点是相同的，可以相互参见。从总结经验教训来看，中共党史史学史与中共党史学概论的角度也有相同之处，这使中共党史史学史与中共党史学概论也一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不同的是，中共党史学概论基本是宏观的理论研究，而中共党史史学史既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研究，也从事党史学家、党史著作的某些微观研究，这种微观研究的性质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微观研究基本相同，只是研究的内容不同。中共党史史学史是理论与史实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学科。

## 五、学科体系

中共党史史学史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两大部分。历史研究部分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

第一部分理论研究，主要研究、论述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目的、任务、作用、意义，学科的性质、特点，中共党史史学史的历史分期，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这一部分可以作为导论。

第二部分历史研究可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下编论述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两大时期中可以分若干历史阶段，以历史阶段为章，研究各阶段中有代表性的党史学家、党史著作。

作为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著作，书末可编制一些附录，如中共党史研究主要书目、中共党史研究大事记等。

## 六、分期

中共党史研究自 1921 年产生以来，至今已有 80 年的历史。这 80 年

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9）

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初创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野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镇压，又处在战争环境，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共党史研究处于半公开和地下状态，中共党内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数不多，研究的规模也不大，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著作往往不能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大多为中共党内的领导人。研究中共党史大多密切配合政治斗争，政治色彩浓厚。资料无法全面搜集、整理，很多理论问题尚无暇探讨，尚未完全走上学术研究的轨道。

### 2.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49.10—1978.12）

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走了曲折的道路，政治上的曲折道路给予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极大的影响。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1966年5月至1978年12月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从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中共党史研究、教学队伍迅速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开始探讨，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建设逐渐展开，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特别是讲义大量出版，论文大量发表。这一阶段的中共党史研究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政治色彩、宣传色彩仍然较浓厚，学术研究的色彩较淡薄。特别是50年代末期，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使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受到一些“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尚未成熟。1966年5月至1978年12月，是“文革”及受“文革”影响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遭受极大破坏，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受到极大破坏，中共党史研究一度成为林彪、“四人帮”为“文革”服务的工具。以至出现伪造党史的现象。讲真话受排挤、打击，讲假话成风。毛泽东史、路线斗争史、大批判史代替了中共党史。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初两年，毛泽东史、路线斗争史、大批判史仍是中共党史主线。

### 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12— )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科学化,走向成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端正了思想路线,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政治健康向上,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很快拨乱反正,清除“文革”邪风恶习,健康发展。“文革”时期停顿的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建设重新规模化发展。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发展起来,国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投入日益增加。这些都推动了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空前繁荣。以往研究中不敢碰的“禁区”一个一个被突破,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开始重新探讨,中共党史学科组成体系中的诸学科建设逐个上马,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价值高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陆续问世。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

### 研究的产生、发展

(1921—1949.9)

#### 一、概 说

1921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中,谈到了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6月,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更深入地论及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论述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这些都是最早的中共党史研究文字,表明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共党史研究在1921年已经萌芽。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党。此后,由于汇报、交流,教育党员、干部的需要,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文字日益增多,并且有一些篇幅不大的专著(小册子)、专论问世。如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可以视为无产阶级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的著作;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可以视为无产阶级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的专史;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亦是极有价值的中共党史研究的论文。30年代的论著有: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1月至2月)、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6—1938),以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华岗、张闻天的著作篇幅已比较大,资料工作、理论研究也有一定水平,对以后中共党史研究有较大影响。

40年代,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回顾、总结党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干部、党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很多高级领导人写出了党史论著、党史回忆录。如周恩来写出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等,刘少奇有《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等,王若飞有《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等,陆定一有《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等,毛泽东也有《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动全

党回顾总结党史、研究党史，毛泽东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1942年3月30日），这成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篇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专论，在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和地位。这篇专论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其贡献是：

（一）阐明了党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专论开头就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把党的路线政策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sup>①</sup>以史为鉴，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任务。毛泽东强调了党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今天的路线政策，同时有利于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项实际工作。毛泽东关于党史研究目的、意义的阐述，已比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李立三《党史报告》中的论述更深刻、更具体。这样的阐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二）论述了党史研究的对象。专论谈到：“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就是说要把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不只是研究哪一步、哪一个阶段、哪一件事。研究党史就是要对党的全部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系统地去考虑”。此外，毛泽东把研究路线和政策放到了党史研究的重要地位，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政治任务所决定的。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中共高级干部、各级干部研究党史首先就是要解决政

<sup>①</sup>《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9-40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治路线、政策的是非问题,以及和政治路线关系密切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问题,一些细小的事情、“个别细节”则不必研究。专论还谈到: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这里提到的要研究的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显然都是和路线、政策密切联系的重大问题。在论述党史研究对象时,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了要系统地研究党的全部历史,另一方面又把研究的重点对象放在路线政策上,这反映了当时党内对党史研究对象的认识水平,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可以看到,当时的党史研究是一场政治运动,是一场解决党内历史上政治路线是非的大斗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甚至有火药味,而不是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要求来看,党史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党的组织发展史,党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等等,而研究党的组织发展史等在当时不是当务之急,自然就没有强调的必要了。史学研究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党史研究更是如此。从毛泽东对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对象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毛泽东对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尚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能把“党史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这是党史研究中理论问题研究的进步,蔡和森、李立三等人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对于40年代及以后的党史研究是有很大影响的。

(三)指出了党史研究的立场。专论说:“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国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里谈的是立场问题,指出了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而不能站在外国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不要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研究历史,往往决定了对历史的某些认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同一事件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 and 解说。可以想像,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

史,和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会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论述。如果只按照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来研究中共党史,以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句句是真理,而不考虑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结果如何,那么甚至会把中共党史上的一些政治路线是非搞混淆了。“搬外国的东西”,“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实际上也是强调了要站在中共党内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路线的立场上,站在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上。这个立场问题的强调,显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因为当时研究党史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彻底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要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就非站在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不可。立场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强调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正是政治斗争的反映。立场问题,本来首先是阶级立场的问题,然后才是路线立场,因为当时延安解放区中共党内研究党史,阶级立场不是首要的、突出的,而路线立场是首要的、突出的,所以毛泽东没有强调阶级立场,而强调了路线立场。毛泽东讲以中国做中心还是以外国做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国家立场问题,实质是路线立场问题。毛泽东关于党史研究立场问题的论述,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四)分析了党史研究的观点。专论谈到:“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这里分析、强调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要用科学的观点,不要用主观主义,来研究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毛泽东强调了历史不是少数人创造的,研究历史事件要研究它的客观原因,它的实质。既要研究历史现象的真相,更要研究历史本质的真相。毛泽东已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意到了领袖作用的问题,既指出历史不是少数人创造的,又指出了“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毛泽东还注意到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专论谈到陈独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

讲一讲他的功劳。”陈独秀虽然组织“托派”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但毛泽东还是肯定了他做出过的功绩，认为写党史应该写出陈独秀的功劳。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强调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党史，这是惟一科学的观点。这在当时与毛泽东领导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党史、开展整风运动是一致的。毛泽东在专论中强调的党史研究的观点，仍然是我们今天党史研究中应该遵循的。

(五)总结了党史研究的方法。专论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里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对以往党史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总结，首先强调研究党史必须用马列主义的方法、马列经典作家教导的方法，其次论述了两个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一是全面的历史方法，二是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全面的历史方法，简单说就是历史分析方法，就是对历史问题进行历史的全面研究，给予历史的客观评价。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过程中去研究，而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即不能用后来的历史条件、后来的人们的认识来研究以前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既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历史的分析研究，也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即进行一分为二的研究，而不要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具体地说，就是要全面地占有资料，进行历史的辩证法的分析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说的“古今中外法”，有历史方法的内容，而主要的是指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即中、外的对比研究。毛泽东讲的“中”、“外”，不只是指中国和外国，实际上是指“己方和彼方”。专论中谈到：“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

‘古今’，还有一个‘中外’。”为了有利于“中外”的比较研究，毛泽东还提出：“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详尽，“中外”研究就是对比研究。研究中共党史，只研究中共党内的材料还不行，还要研究国民党的，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材料才行；把两方面的材料对照起来研究，才能全面，也才能科学。资料全面是研究全面、科学的基础。在谈到抗战时，专论说：“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这里的比较研究又深入一层，即不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研究，就是国民党内部国民党的文件也要比较研究。真正做到了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就能全面、科学了。历史比较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用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已被视为是间接的实验方法。历史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进行实验研究，但进行两方面、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就可以达到全面研究的层次，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所以比较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组成部分。这种方法是当今史学界重视、盛行的方法，毛泽东在40年代便于党史研究中大力倡导，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对党史研究方法深入具体的总结、论述，使无产阶级的党史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有了大的发展。蔡和森等人已经注意到了历史分析方法，但还没有注意到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尽管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蔡和森已经进行了一些历史比较研究，但对历史比较研究还没有理性的认识，还没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而毛泽东不仅深入论述了历史分析方法的具体内容，而且深入论述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具体内容，这自然是对党史研究方法的一大推进和贡献，至今仍有巨大现实意义。

(六)探讨了中共党史分期。中共党史的分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专论将中共党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大革命准备阶段（1911—1924）、大革命时期（1925—1927）、内战时期（1928—1937）、抗日时期（1937—1945）。接着从革命任务、

革命手段等方面分析了大革命、内战、抗日三个阶段的特点。指出：从革命任务看，“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阶段的直接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从革命手段和群众的联合看，第一阶段是联合全国各民主阶级，实行国共合作；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阶段是恢复国共合作形式，全民族抗日。从党的路线看，第一阶段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阶段是狭小的统一战线；第三阶段又是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是合乎事实，都说得通”。专论又提到大革命准备阶段：“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这样看来，毛泽东说的大革命准备阶段，内涵是1921年至1924年，外延则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所以大革命的准备可以是1911年至1924年。毛泽东的这个分期及其命名，有独到之处，特别是把1911年至1924年作为大革命的准备时期，是有创见的。这种分期的明显特点，就是从中国革命史的发展来分期，而不是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来分期。从中国革命的发展来看，大革命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把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前的一段作为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也是合乎事理的。这样的分期和命名不愧是一种卓识。毛泽东强调了研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即强调了要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背景来研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也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强调了这一点，也不愧是一种卓识。毛泽东的党史分期，比起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分期来，概括得多，理论色彩浓厚得多。毛泽东的党史分期，贡献最大的是在大革命准备时期，这一时期的概括是高度的复杂的概括，而后三个时期的概括是简单的概括，而且“大革命时期”的命名蔡和森等人已经注意到了。毛泽东把中共党史研究的上限推到辛亥革命，这个观点以后被一些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者所采纳。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分期法，以后也被很多的党史、革命史研究者所采纳，可见毛泽东分期说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了。

毛泽东谈自己的分期说时又讲：“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的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申明了他的分期说是一家之说，不是定论，是可以讨论的。这反映了毛泽东的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以及对党史研究的民主作风、平等地位、严谨态度。也说明毛泽东很重视党史分期这个理论问题，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研究这个问题。以后，“大革命准备时期”的说法，有些党史研究者就没有采用，而用建党时期等说法。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背景追溯到辛亥革命的观点，有些党史研究者也没有完全接受，一般还是把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追溯到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国情，从而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尽管如此，把党史分期作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是毛泽东对党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而且毛泽东党史分期说的提出，也是中共党史宏观研究的一大进步，是党史研究中分期问题的一个突破。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共党史研究有了比较系统的理性认识，开始把中共党史研究提高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来了，并且为把中共党史研究导向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科学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

整风运动中回顾党史、总结党史、总结经验教训的集大成成果是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党史的经典之作，在中共党史



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

《决议》的成就和意义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

(一)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sup>①</sup>“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决议》最后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肯定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思想，这在当时是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因为当时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全中国人民需要确立一位人民领袖，需要形成新的凝聚力中心，需要有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支柱。因此《决议》在这方面的努力必须充分肯定，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二)全面清算了党内的错误路线，澄清了党内历史是非。《决议》指出，大革命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这是错误路线，并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决议》指出，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党内出现了第一次“左”倾路线。“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使“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这是错误路线。《决议》指出：“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而且“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

<sup>①</sup>《决议》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2-9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也是错误路线。《决议》特别指出了“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指出陈绍禹《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等方面的极大危害,其在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直到遵义会议才得到纠正。此外还指出了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张国焘的分裂党、叛党行为是“反革命行为”。并且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这使得建党以来至抗战时期以前的党内的路线是非、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得到全面的澄清,从而使全党对历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统一的认识,更有利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周围。

(三)深刻总结了20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决议》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危害最大的王明路线给革命造成损失的教训都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决议》不仅总结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更注意了总结思想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决议》指出:“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决议》指出:王明路线“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它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决议》又指出:“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

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决议》号召全党:“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决议》能从思想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务必把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这使经验教训的总结有了深度。在此以前的党史研究中,尽管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但是,都往往没有能深入到思想路线方面来总结。蔡和森在党史的研究中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还没有提高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经验主义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也没有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这样一比较,可见《决议》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刻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高多了。《决议》在分析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时,不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政治错误上、一般的思想方法上,而且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高度来分析,指出他们都是把“片面的相对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真理”。这也表明了《决议》在总结思想路线的教训时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可以说《决议》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已经反映了经过整风运动,经过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已经空前提高了。正因为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空前提高,所以对历史上错误路线带来的教训的总结也就极为深刻。《决议》对思想路线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意义极其重大,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有重大的作用。

《决议》是政治决议,也是党的历史决议,它在党史研究上也卓有成就。《决议》在党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了历史

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评价，即在党史研究政治理论方面的贡献，而不是文献资料方面的贡献。《决议》把政治路线上的是非彻底澄清，政治问题解决了，历史事件的评价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决议》在分析评价“八七”会议时说：“‘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

“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里对“八七”会议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并分清了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八七”会议的成绩是主要的，同时又有缺点。

《决议》在分析中共六大时说：“一九二八年七月间（按：六大是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这里只说“七月”，不够准确）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在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

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这里对党的六大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肯定了它的主要方面，批评了存在的一些缺点。

《决议》在分析评价六届四中全会时说：“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这里给了六届四中全会全面否定的评价，这次会议是王明路线上台的会，自然是应该否定的。

《决议》分析评价六届五中全会时说：“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这里对六届五中全会根本否定，因为它是王明路线发展的“顶点”。

《决议》在分析评价遵义会议时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

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这里对遵义会议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指出了它在党的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证明了它的意义。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决议》也给予了简要而肯定的评价，指出：“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这个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

《决议》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会议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评价，体现了党史研究中的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决议》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作了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在肯定时，则要分析它正确的所在；在否定时，且要分析它错误之处，从而使政治和历史的是非得到全面的澄清。这些分析评价的结论，至今看来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不仅《决议》刚形成以后的党史研究者承认它的正确性，以此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就是今天的党史研究者，也仍然承认它的基本正确性，以此指导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研究。

《决议》在政治上、党史研究上的贡献是主要的，积极影响、作用是主要的，同时在今天看来，《决议》因为后来被过分地“神”化，反过来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决议》在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时，没有注意突出集体领导的作用；在突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时，没有注意突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疏忽，在当时还看不到它的危害，而当党内的个人崇拜在《决议》的助长下慢慢滋长开来，这个时候它的危害性就显露出来。《决议》对党史问题的定论，对党史研究起了指导作用，然而当有些党史研究者把《决议》当成僵死的教条，不敢创新，这样它的束缚党史研究的消极影响也就出现了。《决议》在统一全党思想，统一党史研究者的思想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决议》对党史问题的定论有它的政治性、权威性和科学性，我们今天研究党史，还应该掌握其基本

精神,但更应把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放在第一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放在第一位。《决议》是对历史的历史决议,有它的历史性,不妨把它作为历史文献看,可能对今天的党史研究比较有利。中共党史研究是要发展的,总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这大概是党史研究者的共同心愿,也是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端正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使中共党史研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共党内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队伍开始发展,这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来的一个新气象。学者队伍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中共的社科研究机构、学校教学机构在延安有了长足发展。如中央研究院(前身是马列主义学院)、抗大、陕北公学、华北联大等的历史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有了一定规模的建设。其中涌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如何干之、胡华等。加之整风运动中领导干部回顾、总结党史的成果成为珍贵的党史资料,《六大以来》(1941年12月)、《六大以后》(1942年10月)相继编印,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决议》问世以后,宣传《决议》精神,以《决议》精神研究、宣传党史及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自然成为党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中共党内学者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起来。如何干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讲义,胡华有《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等。以及李致工《中国共产党史略》(1940年)、陶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1948年)、杨弃《领导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1949年6月)、方且《中国共产党史纲》(1949年7月)等。

## 二、开 端

中共党史研究何时开始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文献资料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之所以是理论问题就是说应该界定“中共党史研究”的内涵,即明确什么样的研究可以视为“中共党史研究”。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有基础去解决“何时开始”的问题。什么是“中共党史研究”呢?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研究党成立以后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研究”,那么研究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是不是“中共党史研究”呢?这就必须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个筹备阶段,1920年中国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有的共产主义小组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或“中国共产党筹

备组”，研究中共创建史就离不开研究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显然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历史也应视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础，一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现在研究中共党史离不开研究这两个“基础”。而这两个“基础”在五四运动以后有了质的变化，所以研究中共党史又离不开研究五四运动。那么是否研究五四运动的文字就可以视为“中共党史研究”呢？这大概不行。单纯研究五四运动的文字不能视为“中共党史研究”，只有把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联系起来研究，才能视为“中共党史研究”。至于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工人运动发展，这基本上可以纳入“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总的说来，至少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文字，研究“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字，应视为“中共党史研究”。这就是说，“中共党史研究”并非一定开始于1921年7月以后，而可以始于1921年7月之前。

什么是中共党史研究解决了，下面就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谈谈最早的几篇中共党史研究文字，以便确定中共党史研究开端于何时。

### 1. 1921年1月瞿秋白《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

这是瞿秋白写给俄国共产党的一封信，约5000字，研究和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信中谈到中国工人阶级时说：“在中国，只有大城市以及为外国商业开放的港口有工厂。即使在那些工厂里，工人人数也不多。大多数工人是手工业者。仅仅在前些年，受西方文明和欧美及日本工商业的影响，工厂的数目才日益增多，工人人数也逐步增加。中国工人遭受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本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人，比起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来，觉悟程度高得多。可以预期，在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首领。”同时还谈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接着，又以上海、唐山两地的工人状况为典型，进行剖析，具体分析了工人人数、工资、工作时间、劳动待遇，谈到“唐山矿工和其他工人的生活条件，比上海的坏得多”。又指出：“中国因为是‘特殊国家’，同国际工人代表会议通过的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是不相干的。不但如此，在中国没有任何调整劳资关系的法令，因此，中国的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干



涉。”此外,还分析了中国手工业工人的状况,指出:“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无有限度的,一般每天工作十三小时以上……这些工人的生活是暗无天日的。”这里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史、数量、质量等进行了概要的研究。

谈到中国工人运动时说:“上海工人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行会,其作用是无足轻重的。不久前,上海组织了一个电业工会,该工会将会逐渐成为强大的工人组织,因为电工的知识水平比其他工人高。”这里所说的“电业工会”,可能是指1920年11月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又谈到唐山曾出现过“工人党”,以后改组为唐山工人互济会,后来解散。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唐山组织了几个工会:京奉铁路的工场有机械工人工会,矿山有矿山工会”。以上既论述了自发的工人运动,也论述了在共产党筹备组领导下的工人运动。

谈到“五四”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则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动的中国学生运动,多少唤起了中国的精神力量。现代中国青年知道,新思潮已经波及到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青年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建立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例如,在北京组织了仁社、互助社和改造社,在天津有觉悟社。现代中国的报纸杂志都在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这种报刊的数目正在日益增加。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晨报》、《时事新报》、《青年》报以及《解放与改造》和《人道》等杂志。这些报刊很注意工人问题,很同情中国工人农民的处境。上述出版物向俄共(布)党表示衷心的敬意。”又谈到:“不久以前,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党,虽然成员人数不多,但这个党的组成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sup>①</sup>这里提到的《青年》报,即《新青年》;社会主义青年党,即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里提到的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或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更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活动。

瞿秋白的这封信,已经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活动,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也有一定的研究,完全可以作为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字。

<sup>①</sup>《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167-17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2. 1921年6月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

这篇文章约5000字，原文为俄文打印稿，署名瞿秋白、李宗武，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现已译成中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文集》编者注：“这是为出席一九二一年六、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写的一份材料。”<sup>①</sup>说明文章写成于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三大开幕之前。这篇文章对中国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史、中国共产党筹建史的研究，已比半年前《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有很大的进步。

《期望》一文对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研究不多，而这篇文章作了较多的研究，特别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后的工人罢工斗争。如论述了香港机器工人、五金工人的罢工，指出罢工“获得了彻底胜利”，“工人们表现出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论述了南京丝纺织业工人的“政治性罢工”。瞿秋白正是在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不断觉醒后，进而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这是瞿秋白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工运史研究进步的反映。

文章在论述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史时，开始区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强调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开始研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接着又分别论述了当时的三个非马克思主义派别：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农业公社（新村）鼓吹者。

文章对“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具体的叙述。指出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已经翻译出版。“现在正准备出版一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丛书，其中有许多书已经付印，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将首先出版。”又谈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这类学会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对象。”

文章对中共筹建史也有了更具体的论述。首先论述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和发展。指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

<sup>①</sup>《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小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当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的1920年3月成立,上海的1920年5月成立。1920年5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筹备组)正式成立。又谈到:“共产党员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根据这个说法,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前,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1921年3月开过一个会议。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大概是中共一大的筹备会议。瞿秋白在1920年10月离开中国前,可能已经知道1921年3月要开会,并且就把这次会议当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统一大会或成立大会。所以他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3月召开一大的,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也这么说。当然,1921年3月的会,他并没有参加过,此说是否准确还值得研究。其次,文章论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各项活动,谈到了共产主义小组已有宣传部、组织部、出版部等分工。如:“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由共产党员组织或领导的”。“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了一系列周刊和报纸。这个部还为工人印行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友对话》、《工会》、《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等”。“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杂志,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中文”。又谈到:“中国共产党把下列各书译成了中文:布哈林的《当代苏俄》、《共产党纲领》和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其中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里谈到的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中不少人把1920年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视为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等人都是如此),肯定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绩,同时也指出:“迄今为止,共产党人所做的还只是准备性质的工作。”说明“共产党人”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进一步开展。再次,文章论述了共产主义小组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指出:“在许多地方,共产党员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工作。但是,在这些共同组织中,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同志来监督和领导他们,并把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确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共同工作

毕竟是不可能的。”<sup>①</sup>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合分过程,看到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而占上风的是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完全是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而且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共党史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这篇文章与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有雷同之处。究竟瞿文在前还是张文在前,详下。

### 3. 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这篇文章约两万字,是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报告的全文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为俄文本。中译本发表于《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

这篇文章分九个部分:(1)中国的政治形势;(2)经济状况;(3)知识分子;(4)社会主义运动;(5)妇女运动;(6)中国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7)中国的工人运动;(8)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9)我们的前景。其中第四、七、八部分,把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内容基本都囊括在内,而且更准确、更丰富。如瞿文说:“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上海法租界的电车工人举行了罢工”;“在差不多一年以前,唐山煤矿发生了一次工人斗争也是值得注意的”。张文说:“几个月以前,上海法租界的电车工人举行了罢工”;“不久前,唐山煤矿还发生一次值得注意的工人运动”。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在1921年,唐山煤矿工人罢工在1920年冬,显然张文的表述更准确。把张文与瞿文比较,可以看到以下的特征:(1)张文比瞿文篇幅大、内容多;(2)张文比瞿文更准确;(3)张文以第一人称谈共产党活动,瞿文以第三人称谈共产党活动。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原因很简单,瞿秋白1920年10月16日离开北京,12月10日离开哈尔滨,12月16日进入俄境,当时还没有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而张太雷1921年2月以后离开中国,可能3、4月份离开,5月初以前到达俄伊尔库茨克(“春天到达”),当时已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并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派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的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代表中共发言,尽管当时中共一大尚未召开。所以张太雷对

<sup>①</sup>《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293~299页。

中共筹建活动的了解显然比瞿秋白更清楚。那么瞿文与张文的很多雷同是怎么回事?是瞿抄张还是张抄瞿,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瞿概括、节录了张文。另一种意见认为先由瞿起草了一份材料,然后由张加工、补充、改定。这两种意见孰是孰非尚未定论,只得在此存疑。但有一点应该肯定,瞿、张两文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都是有价值的,而张文价值更高<sup>①</sup>。张文比瞿文价值更高,首先表现在张文对中共创建的社会背景、基础作了专门探讨、研究。瞿文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只用一、二句话作了概括,而张文则分别用专节研究分析。张文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说:“自从1911年第一次革命以来,中国还丝毫没有实现民族独立”。“现在统治中国的已经不是一个专制君主,而是一批专横统治者——军阀”。分析当时的经济状况时说道:“中国是个农业国,因此其经济主要建立在小农土地所有制上。手工业生产是全国的主要工业。在中国,除了主要集中在港埠大城市的少数工厂外,所谓的现代工业企业是很少的。”通过分析,便阐述了当时共产党人(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主张,说:“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分析,阐述了这些问题,并作出了如下回答:要振兴国家经济和使中国人民摆脱外国剥削,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没收为世界掠夺者效劳的虚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资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并把它们转交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以便发展中国的工业。”以上这些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论述有不够成熟之处,然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进行探讨的最早文字之一,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认识的最早文字之一。

张文比瞿文价值更高,其次表现在张文专门论述了中国妇女运动,并把妇女运动作为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是瞿文中所没有的。张文谈到:妇女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男同学。这次运动可以称之为第一次妇女解放(资产阶级意义的)运动”。“她们已经开始参加我

<sup>①</sup>关于瞿文、张文的关系,可参见叶孟魁《〈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一篇重要文献》(《瞿秋白研究》第2辑,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沈海波《张太雷与中共党史研究》(《烈士与纪念馆研究》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沈海波文认为瞿文是辑录张文而成,但根据并不充分。因为瞿文、张文的成文时间孰先孰后,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说明,谁抄谁,就难以定论。其次,如果认为瞿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信息只能来自于张,这是不妥当的。因为瞿秋白《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于俄国的期望》一文已涉及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说明瞿的信息自有来源,并非来自张。沈海波文强调张文是第一份中共党史文献,而否认瞿秋白《期望》一文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价值,也是不妥当的。

们的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坚强的革命者”。此外还在分析中国工人状况、工人运动时谈到了女工的斗争。这些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最早文字之一，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妇运史研究的最早文字之一。

张文比瞿文的价值更高，第三表现在对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具体情况作了论述，这是瞿文所没有的。张文谈到：“截至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然后分别介绍了它们的情况，如：“北京组织，其主要成员最初是青年学生，近来已开始大量吸收京汉铁路修配厂的铁路工人。这个组织现在有一所工人模范学校，学员150名，教师是两名工人共产党员和两名来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员”。“上海组织，它有三个分部，它在工作中不仅像初期那样依靠青年学生，而且还依靠不久前建立的工会”。“目前这个工会已有近500名会员”。等等。文中谈到的七个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共一大召开时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小组略有不同。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已有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张文没提，可能尚未了解到情况。国内的济南小组、长沙小组未提，而提到的天津小组、南京小组、香港小组却没有代表参加中共一大，这说明张太雷在离开中国时，还没有了解到济南、长沙小组的情况，一方面可能信息不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济南、长沙小组成立稍晚了一点（现在一般认为济南小组是1921年春，至迟在4月间建立，长沙小组是1920年11月底至12月间成立）；至于天津、南京、香港小组，可能曾经建立过，后来合并到别的小组，或后来不存在了。张文的这些论述，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具体情况的最早研究文字之一，史料价值极高，为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发展、变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张文又谈到，“中国共产党至今所做的只是准备性的工作，它极力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现在它已建立了一大批共产主义组织，拥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工作干部”。即指出了当时的共产党组织仍在筹建阶段。

张太雷的报告对中共产生的社会背景、基础，对五四运动以后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具体情况均作了具体论述、研究，成为略有体系、较全面的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文字之一，其研究水平、成就在当时是极高的。

#### 4. 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这个报告约 6000 字,以俄文本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这个报告分三部分,首先谈北京的政治、经济情况,即介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产生的社会背景、基础;其次介绍北京小组“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再次介绍北京小组“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实质是北京小组在中共一大上的工作报告。在谈到北京的政治状况时总结说:“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很不稳定;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个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谈到北京的经济状况,指出:“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在论述北京的社会状况基础上,谈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状况,说:“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副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接着谈了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很成功。此外,“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发生的罢工事件”。出版工作,“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工人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散发得相当广泛。”最后谈了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报告不仅论述了北京小组产生、活动的社会背景及各项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不足,而且总结了经验教训。报告在总结工运工作经验时说:“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

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报告又谈到：“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sup>①</sup>这使“史”的研究又加深了一个层次，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在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时，能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这是此前的中共党史研究文字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

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区筹建史研究的第一篇文字，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地方党史研究的最早专论之一。

## 5. 1921年7月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这个报告约3000字，以俄文本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这个报告分三部分：(1)去年；(2)现状；(3)今后意见。介绍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开展工作的情况。谈到：“去年年底……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和别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拒绝加入这个小组”。“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编者注：‘可能是《广东群报》之误。’)。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把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激烈斗争中诞生、成长的情况写了出来。谈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时说：“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有八十余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律系的学生，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的人是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还谈到了“对农民的宣传工作”，说：“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同志，为了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新农村》”。<sup>②</sup>开展对农民的工作，这大概是广州共产主

①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15~22、23~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义小组的特色,也是这个报告研究中共筹建史的一个特色,这在此前的中共党史研究文字中是没有的。

这个报告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比较起来,一是篇幅小,内容少;二是没有注意社会背景的研究;三是没有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这样,这个报告在理论上,在研究体系上都缺乏应有的深度,成就和价值自然也就比不上北京小组的报告了。但是,这个报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广州地区筹建史研究的第一篇文字,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地方党史研究最早的专论之一。

除了以上提到的北京、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报告外,上海、长沙、武汉、济南的共产党组织也应有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指出:“听取了关于各个地方小组的活动及其总的情况的报告。这一共占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里都提到了以下三点:党员很缺少,必须增加党员,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sup>①</sup>说明上海等其他四个小组也有报告,遗憾的是现在看不到了。

瞿秋白、张太雷的文章都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以前的成果。北京、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报告,是中共一大上作的,其撰写也当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所以上述的一些成果都可以视为中共正式诞生以前的成果。这表明,中共正式诞生以前,在筹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就产生了。中共一大以后,佚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约1921年下半年)、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刘仁静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等,是较早的中共党史研究文字。这些文字研究的内容、研究水平又有了发展、提高。

### 三、中共党史研究

#### 1.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1919年至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就提出了组织中国共产党。1921年冬回国,由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陈独秀留在

<sup>①</sup>《“一大”前后》(一)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央工作。1922年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中共二大以后即为中共中央委员。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早期中共重要领导人，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

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到莫斯科3周余，即应邀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中共党史报告。以后便由向警予等人根据笔记加以整理，并油印成册，在中共党内流行。这就是中共党内最早的党史研究专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以下简称《党史的发展》)。书中《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谈到中国的产业发展：“到现在一九二五年工厂的数目为八十三个。”可见，作这个报告始于1925年底。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说，当时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全过程约两个星期”(详见《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72页)。假使行程以两星期计，这样蔡和森如果是10月初离沪去莫斯科，那么他作这个党史报告当在五星期余以后，即11月中下旬开始。如果是10月底离沪，作这个报告当在12月上中旬开始。这个报告无疑是分很多次才讲完的。报告的第二部分第12节论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此会是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则此报告必延续到1926年1月19日以后。又报告中谈到“虽然国民军退守南口，但革命势力不会因之消灭”。<sup>①</sup>查“国民军退守南口”事，发生在1926年4月15日(详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2辑第68页)。则此报告当延续到1926年4月15日以后才结束。报告中“国民军退守南口”以下的的内容不多了，从文字篇幅来看，仅3000字左右，估计讲一二次就可讲完，所以估计4月底大概可以讲完。在这期间，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开会，蔡和森要出席会议，可能在这段会议期间，他没有作党史报告，而要等到会议结束以后再继续作报告。总之，蔡和森大概是断断续续分很多次才作完这个党史报告的，作报告的时间约在1925年末至1926年4月底。

蔡和森在报告中谈倒：“今日报告的题目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而油印本的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并有副标题《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大概“提纲”二字及副标题，是整理者所加的。这里姑从成俗之义，以油印本即今通行本的标题为准。

<sup>①</sup>《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7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党史的发展》，国内较流行的有两个公开出版的版本：一是《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本，此本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据该书的《编后记》说：“是个记录稿”，曾与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件核对过”。说明是以一个记录稿为主刊印的。这个版本已将错讹之处改正，文句欠通之处也顺通了，修改的痕迹较多，和报告的原貌尚有一定的距离。二是《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本，此本为中共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据该书的《编后记》说：“原件为油印的小册子，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发现的。从内容判断，是蔡和森同志于一九二六年所作报告的记录稿，文字未经整理。”说明是依据当时的油印本刊印的。这个版本较忠实于油印本。原件看不清的字、缺字用“□”表示；或注明缺几字、几句。原件的讹误，仍其原样，只是随后加“[]”，注明正确的字。

这两个版本，除了小部分文字有歧异外，语意上基本相同。只是在章节的编排上略不同，前者第二部分为十二节，后者第二部分为十三节。实际上，前者漏略了《党的第二次大会》这一节的标题，致使第二部分只有十二节，内容并没有缺。从两个版本的比较来看，后者版本为优。

以下将此书的史学思想、史学成就、史学方法略作分析。

### （一）史学思想

蔡和森作这个报告的目的，即他的史学思想主要是：

#### （1）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

《党史的发展》科学地阐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sup>①</sup>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作这样全面科学的概括，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资料，这是第一次。然后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sup>②</sup>强调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党史的发展》还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是党的中心政策，是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我们要把各阶级的民众甚至于军队中的力量团结起来，“引导全国民众作反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革

①②《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命”。<sup>①</sup>这里的提法，已和毛泽东 1939 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概括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相差不多。

### (2) 批判中共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

在论述中共建党史过程中，蔡和森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指出它的要害是不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了以李汉俊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出它的要害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批判了戴季陶主义，指出它的要害是企图把“劳动运动变成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之工具”，叫嚷“三民主义适合各阶级的，故中国现在无须乎有共产党”，企图根本“拆散中国共产党。”<sup>②</sup>对于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观点，及“左”倾观点也进行了批判。

### (3) 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

《党史的发展》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时，不仅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武装斗争等具体经验教训作了总结，而且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应当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sup>③</sup>这就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必须防止马列主义教条化，必须防止盲目搬用别国共产党的经验，把外国的经验神圣化。蔡和森在大革命运动的初期就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教训，很是难能可贵，不能不说是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

## (二) 史学成就

### (1) 初步建立早期中共党史研究体系

#### ① 强调了必须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共党史研究

《党史的发展》强调：“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问题是解决不了的”。<sup>④</sup>既对中国革命而言，也对中共党史研究而言。

《党史的发展》开篇就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

<sup>①②③④</sup>《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75~76、26~32、24、8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sup>①</sup>就是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中共党史，而不能受唯心史观的影响，只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归结为少数人思想观念的产物。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与共产党产生的关系时又说：“同志们已研究过列宁论党，就明了先进分子与党的产生及其阶级的关系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列宁主义者，不是少数派、经济派或空想家，故坚定地承认要有主观条件。”<sup>②</sup>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须有客观条件，也须有主观条件，即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的出现。列宁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时就强调了领袖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蔡和森就是指出要用列宁的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的作用。这些都说明，蔡和森是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这就使中共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端正了方向。

#### ②阐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

《党史的发展》把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了解党的斗争经验，即总结经验教训。二是了解党的发展道路、发展前途，即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三是一个合格的好党员要明白自己的历史责任，就必须了解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四是为了粉碎军阀走狗及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进行的攻击，为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必须研究党史。这些都强调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中国革命斗争服务的。<sup>③</sup>

《党史的发展》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发展阶段、发展道路、经验教训等。具体地说，党的产生、发展的条件、环境，党的工作情况，党的组织发展情况，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党内生活，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地位等等，都是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把党内生活也作为党史研究的对象，是蔡和森党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为以后党史研究者所不及。

《党史的发展》中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目的、任务、对象的认识具有一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3、6、2~3页。

定的科学性，初步解决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 ③奠定了以中国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

《党史的发展》研究中共党史，不是从1921年党成立开始，也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而是追溯到鸦片战争。

蔡和森认为：“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就首先“要明白八十余年前的客观环境各阶级的势力的关系”，然后还要“明白五四以后的倾向——新的力量都起来了”。<sup>①</sup>即要明白中国近代社会的革命运动是怎样从旧阶段向新阶段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产生，就必须了解近代社会的变化。所以，《党史的发展》略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大变化。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中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日益激化，于是产生了旧阶段的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而旧阶级的革命都没有成功，因为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而只有无产阶级可领导这革命”。<sup>②</sup>随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革命发展到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便应运而生。正因为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的社会、阶级变化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背景来研究，所以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等作出科学的说明，从而使中共党史研究有深度和广度。蔡和森以近代社会为背景的中共党史研究模式是科学的，被以后中共党史研究者所接受。

### ④理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

第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影响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科学论断。

《党史的发展》首先强调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指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由战前的80万至100万左右，发展到战后的200万至250万。于是，罢工运动也发展了。1920年至1921年工人罢工达47次，人数达76000人。罢工中，工人阶级已产生了自己的组织，1919年广东就有26个工会组织。“这个现象就是本党产生背景中主要的现象”<sup>③</sup>。

其次，说明十月革命的影响。《党史的发展》指出：在十月革命以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9、16、4~5页。

前，中国的思想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实验主义等占统治地位。而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很快就使中国人打破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幻想。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开始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都赶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于是中国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就产生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主观条件。<sup>①</sup>“总拘一话，吾党是一个什么产物呢？这小孩为什么会产生的呢？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后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sup>②</sup>所谓“十月革命影响”，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影响。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影响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论断，就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的论断。这是中共党史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作出的科学概括和说明，解决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个科学论断有力地批驳了中共产生的“野心家论”、“凭空想象论”、“外因论”等，否定了共产党无存在必要的谬论；肯定了中国共产诞生必然性、合理性，肯定了中国共产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领导地位，在当时革命斗争中有重要意义。

第二，肯定了五四运动开创了革命新纪元，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党史的发展》指出：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路上来了”，所以，五四运动“在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史上及对于党的产生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工人阶级自动地走到政治斗争即必须有政党的领导。”这说明五四运动为中共的成立创造了“客观条件”。<sup>③</sup>五四运动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开始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这说明五四运动为中共的成立创造了“主观条件”、组织上的条件。

《党史的发展》强调：“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在政治意义上是很重大的。”“自有此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的政治斗争遂开新纪元，故此次运动对于各方面是很有关系的。”<sup>④</sup>正因为认定五四运动开创了革命的新纪元，所以蔡和森又以五四运动为界，把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革命运动划分为旧阶段和新阶段两个不同的时期，而以五四运动作为“新阶段

①②③④《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7~8、11、5~6、5页。

的革命运动”的开端。这实际上就是以五四运动划分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两个阶段。这不仅解决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第三，初步理出了中共一大至四大的发展线索。

《党史的发展》在论述中共一大以后党的发展时指出：中共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青年团，成立上海机器工会，组织反基督教运动，发行《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等刊物，成立人民出版社，召开第一次劳动大会等等。同时，“还领导了思想文化的争斗，新思想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并使中国知识阶级起了一大的分化”。<sup>①</sup>另一方面也指出，中共一大“只有宣传和党纲的规定。这证明，只能说是宣传机关，而说不上政党，因为对政治问题没有政策的决议”。<sup>②</sup>到中共二大提出了“继续辛亥革命，联合各阶级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就有了具体的政治纲领，党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共三大指出了解决国共合作的问题，但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是其缺点。中共三大还解决了党团关系问题。中共四大解决了一些民族革命的理论问题，同时党开始向群众组织发展。中共四大以后的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又进一步提出了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策略，共产党完全走上了领导地位，并已经成为群众性的党了。

《党史的发展》论述党史至第二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止，对这一段早期中共党史勾画了一个轮廓，见表 2-1。

这个轮廓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有一定的研究深度。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者接受了这样一条线索，而研究的深度往往不及蔡和森。

## (2) 全面研究了早期中共党史

### ①多侧面、多层次研究了中共党史

《党史的发展》，不仅研究中共思想路线、组织工作、重要会议等，而且对于党内生活、党内精神面貌等也作了研究。可以看到这样的小标题：“精神方面”、“党的内部精神状况”、“党的内部生活”等。其中坦率地谈到：共产党刚成立时，无政府主义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等均进入了共产党，思想境界不同，自然就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如中共一

①②《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22-23、35 页。



表 2—1

会 议	思想理论状况	组 织 状 况
一大	明确了主义,有了党纲,还没有具体政治纲领。	主要是宣传机关,还不完全是政党。
二大	提出了民族革命的政治主张,有了行动纲领。	组织工作开始健全。
三大	决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	明确了党团关系。
四大	解决了民族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建立了群众性党组织的基础,有 1000 名党员。
第二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	进一步完善了民族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	开始成为群众性的党,党已成为国民革命领导,有 3000 名党员。

大会上发生了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争席位的事。结果李汉俊没争到席位,便消极起来。沈玄庐也因没争到席位而消极起来。最后,李、陈、沈均退出共产党。还谈到当时党内存在着有些人“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的现象。<sup>①</sup>指出:“因党最初组织理论和训练的基础都很幼稚,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都很浓厚。”<sup>②</sup>所以,“政党能够成为同质的先进分子,非有长期的争斗以训练不可。”<sup>③</sup>这些研究显然是对党的发展又一个侧面、层次的研究。

对于党的会议,也不只是停留在地点、人物、时间、决议等的概要介绍,而涉及了更多的方面、更深的层次。如论述中共三大,就如实介绍了当时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时,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以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在讨论是否保留对工人的领导时,马林、陈独秀等认为不保留,蔡和森等认为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41-43、44、25 页。

应保留……后来是右倾的意见占了上风。<sup>①</sup>会议的内部讨论，是会议的最深层次，可谓“内幕”，涉及到这个层次，会议的全貌才得到了真正的反映。同时，也使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得到了更深的反映，更突出了党是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前进的。

#### ②将工运史、农运史、青运史等和中共党史结合起来研究

中国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党史的发展》用了很多篇幅来专门论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从而反映党的发展情况。不仅在论述共产党成立的背景时，专门研究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工人运动的兴起，在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专节论述工人运动的发展。如论述中共一大以后的情况，专门设立一节《党的政治生活与劳动运动之进展》，论述二大以后的情况，也先写一节《职工运动》。又有《二七与第三次大会》一节。论述中共四大，专门设一节《工人运动的情形》。接着，又有《五卅运动的情形》等节。其中既论述了工人运动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不足之处。通过对工人运动的深入研究，使党的发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得到了更深入、全面的反映。

农民运动是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党史的发展》通过论述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重要性；通过论述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农民运动，说明共产党工作的成绩和不足。如论述中共第一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时就谈到，当时讨论了农民问题，但“经验很少，唯一决定了许多口号（如组织农民自卫军、反对苛税杂役、反对预征钱粮、反对土豪劣绅及苛租等）。以后的农民运动都是在这些口号之下去做的”<sup>②</sup>。写中共四大时，专门论述了广东的农民运动发展。在《总结论》中对广东、湖南、河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进行了总结，强调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问题。<sup>③</sup>

青年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青年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也是党的重要工作。《党史的发展》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趋势，论述了青年团工作及共产党与青年团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确立，推动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8、53、75页。

中共党史和工运史、农运史、青运史等结合起来研究，使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 ③将国民党史等和中共党史结合起来研究

国共合作是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要研究深透，势必要对国民党的历史及发展状况作深入的研究。《党史的发展》就对国民党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论述中共产生的背景时，就设《国民党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比较》一节。论述中共三大，设《国民党之改组》一节。论述中共四大，设《南方、广东的政治情形》一节，对国民党广东政府在国共合作以后做出的一些成绩给予肯定。《党史的发展》的最后两章是《广东政府的成功》、《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成书在“三二〇”事件以前，这两章都比较简单，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二大基本上是肯定的。国民党为什么会进步，会取得一些革命成绩，是由于共产党的推动。所以研究国民党史，就突出了共产党的成绩及思想路线的发展。

他还注意把军阀史和中共党史结合起来研究。研究了军阀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与军阀的关系及其对军阀政策的发展变化等。肯定我党利用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是有成效的；指出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政府恢复中俄邦交是受中共和全国革命高潮的推动。

这些研究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和发展得到了更全面的反映。

《党史的发展》，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是多线性、多侧面、多层次的，是整体性的，指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 （三）史学方法

蔡和森提出用历史方法进行研究。他说的历史方法主要是两部分：历史分析方法和实事求是方法。

#### （1）历史分析方法

历史分析方法就是把人和事放到当时当地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研究，而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不能以后来的社会环境、后来的思想观点来研究以前历史上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党史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背景的分析研究，这是历史分析方法的体现。

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就用《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的责任》两章，来分析研究其产生的

历史、社会背景，既分析研究国内背景，也注意研究国际背景。论述中共二大，就设《职工运动》、《各国政治状况》等节分析国内外背景。论述中共四大，首先也是作“关于当时一般政治情形之分析”，设《南方、广东的政治情形》、《北方的政治情形》、《工人运动的情形》等节来论述当时的政治背景。论述中共第二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也首先强调：“我们要知道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情形就要先知道这时的一般情形。”接着就分析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论述国民党一大反帝纲领的确立，也把它放到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影响中去研究。这样的背景研究，就是把人和事放到当时当地历史、社会环境中去研究，从而使研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这个方法虽然不是蔡和森创造的，但用之于中共党史研究中，蔡和森是第一人，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础。

### (2)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蔡和森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发扬光大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党史的发展》，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既肯定成绩、进步，也指出缺点、不足。如中共一大至四大的成绩，书中都一一肯定。在《总结论》一章中又有《自党成立到现在的成功》一节，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由经济斗争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并取得了领导地位。西欧工人运动二百年才达到的水平，中国工人运动六年就达到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六年的工作已经超过了西欧几百年革命经验了”。<sup>①</sup>对党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共一大“只有宣传和党纲的规定”，党还只是“宣传机关”。中共三大在决定国共合作方针的同时，也“发生了不好的趋向”，“于工人运动之决议案多是保守”，直到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才纠正了这些错误。在《总结论》中也指出：统一战线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当有许多觉悟和正在革命化的分子，未团结在我们战线来……”<sup>②</sup>

《党史的发展》，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事。

①②《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74、75-76页。

对于陈独秀，《党史的发展》批判了他在中共三大以来的右倾观点，同时也肯定了他做过的一些好事。如提到《新青年》杂志“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使“新青年社变为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的团结机关”，是陈独秀倾向社会主义以后的功劳。谈到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在上海小沙渡设立工人补习学校，1920年在上海创立共产主义小组等。<sup>①</sup>

蔡和森作《党史的发展》报告时，戴季陶已成为国民党右派，李汉俊已另组织社会民主党，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就是对这些已经成为对立面的人，蔡和森也不抹杀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他指出“五四后学生起来革命化了，是需要新思想的，戴季陶、陈仲甫(独秀)都是很重要的”<sup>②</sup>。在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除了《新青年》杂志外，《星期评论》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星期评论社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他们以前都是我们的同志，但现在完全反对我们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首领或反革命派了。应工人阶级之兴起，社会主义思想传来，戴等受此影响而宣传社会主义，办了《星期评论》刊，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的欢迎，并结合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如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以前亦为我们的同志，但不久退出了)、施存统、吴明等”<sup>③</sup>。“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当的意义的。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是怀疑的”，“有许多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观点”<sup>④</sup>。他还指出戴季陶参加过共产党，但后来退出了，“我们与戴季陶合作了这一短时期内是有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很快的，因为他们都有社会地位。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了，互相争斗起来了。”<sup>⑤</sup>在对戴季陶这类人的评价中，蔡和森常说“过去是我们的同志，现在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看来很普通，却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方法的生动体现。

蔡和森实事求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是党史研究的正确方法，值得发扬光大。历史唯心主义的因人改史、因风改史的恶习必须杜绝！

除了《党史的发展》以外，蔡和森还有《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等，也是很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的中共党史研究论著。对这

①②③④⑤《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8-11、28、9、28、32页。

两种论著的分析，可参见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第五章和第六章（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4年版）。

## 2. 李立三《党史报告》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1919年至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接受共产主义，1921年冬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湖南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1924年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五卅运动时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5年1月参加中共四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接替蔡和森，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中宣部长。因为新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理论水平较低，李立三起了中央主要领导者的作用。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带领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开始推行。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不久李立三便离开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

李立三的《党史报告》，现存的是周恩来、冯菊坡的记录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这个记录稿现已残缺，《盲动主义时期》一节仅剩开头两句话，以下应有《盲动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第六次大会》三部分，现已缺失。这个《党史报告》现收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因根据记录稿印，所以仍然是残缺的。这个报告的最后两部分记录稿题：“冯菊坡记，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说明最后一部分报告作于1930年2月1日。前半部分是周恩来笔迹，未题年月日，当是1930年2月1日以前所作的报告，大概是在1930年1月。中央档案馆保存一份油印的《中国党史纲要大纲》，即《党史报告》的大纲。此大纲中共中央档案收文戳记为1930年1月8日，亦可证明李立三在1930年开始作这个报告。《党史报告》可定在1930年1月至2月1日所作。

1930年初前后是李立三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时期，也是他的“左”倾冒险路线形成的时期。他开始写出一系列宣传“左”倾冒险主义

的文章，并在3月至5月陆续发表，提出了“左”倾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改变了党的六大的一些正确政策，发展了六大的一些缺点。他这一时期作的《党史报告》，一方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某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左”倾思想。

《党史报告》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共一大纲领“主张中国可以做直接无产阶级革命，以为不要经过民主革命阶段，这在列宁主义上说来是错误的”。<sup>①</sup>而“二七”运动以后，党实现了“大的转变”，“决定做民权运动”，开始走上了正确道路。<sup>②</sup>至1925年中共四大决定“做农民运动”，是有伟大意义的。在总结“三二〇”事件教训时指出：“党当时不坚决进攻而采取让步的政策，以致发生三月二十号的反动胜利的事变……我们在学习这一革命的教训时，一方面要了解三月二十号的教训，同时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党的进攻和退守策略的运用。”<sup>③</sup>又谈到，在“三二〇”事件及党务整理案事件过程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执行了错误路线，而中共广东省委的路线则是正确的，但广东省委的路线为什么不能实行呢？他指出：“广东当时有一缺点，就是专门和蒋介石办秘密交涉，而不向广大群众公布指出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企图，宣布我们北伐的政纲……”<sup>④</sup>即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发动群众和党内机会主义及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对于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组织路线的错误，李立三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党内情形完全是家长制度，并且一般政治水平很低，党又采取了愚民政策，国际决议不公开。所以，党内对于严重的政治斗争总以为是个人争领袖无原则的纠纷，这完全是离开党的生活。”<sup>⑤</sup>即这是不正常的党内生活，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度，这是党内机会主义能够得逞、大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同时对党内出现的“惩办主义”倾向也进行了批评，认为从开除谭平山起，党内“开始了惩办制度的精神”，这是组织路线的“缺点”。<sup>⑥</sup>此外对于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忽视武装斗争、军事工作，也进行了批评，<sup>⑦</sup>以上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左”倾思想的反映，但也有合理之处。

《党史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不少地方流露出了“左”倾思想。

①②③④⑤⑥⑦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12、217、232、234、249、270、247页。

如谈到中共五大的决议时说：“五大”职工运动决议“是一个好的决议。……但在职工决议上，则没收一切资本工厂。因为武汉当时资本家已息工捣乱经济，所以要没收。这一点比较正确”<sup>①</sup>。认为20年代即主张“没收一切资本工厂”，包括没收民族资本家的工厂，是“正确”的。显然，这是过“左”了。谈到“八七”会议，肯定它“把党由机会主义的泥坑挽救出来”，同时又指出它的缺点是：一是没有放弃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指出唯一出路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对暴动没有很明确的解释”<sup>②</sup>。这实际上认为“八七”会议仍有右倾，显然是以“左”倾观点来评价“八七”会议了。事实上，“八七”会议的缺点是没有防止“左”倾思潮的发展。在总结广州起义的教训时，认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还未能采取进攻政策，很快取退守政策。‘退守是暴动的死亡’，‘进攻，进攻，继续进攻’是马克思对我们的指示。暴动要每天每小时都有胜利，然后能使参加群众扩大”<sup>③</sup>。这也是从“左”倾立场批评了广州起义，事实上，广州起义的缺点是没有及时退却转入农村，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味进攻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他在《结论》中，对“八七”会议以后党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说：“八七会议以后，许多党内斗争表现机会主义之复活，不但是取消派，在党内仍是有右倾的危险。客观环境有右倾的基础。党内根源亦为右倾基础。”“不但现在，即在将来对机会主义斗争是很严重的，一天不能停止对机会主义之斗争。”<sup>④</sup>这里所谓的“机会主义”，即指“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所以强调“右倾危险”，正是他“左”倾思想观点的反映，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反右倾”思想的反映。他在《结论》中强调“右倾危险”的一个理论根据就是：“党内机会主义之发展在任何国党内都是严重的问题。俄国党也有这种右倾发展。”<sup>⑤</sup>这表明李立三“左”倾路线是受到共产国际路线的影响的。

《党史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政策没有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而是全盘肯定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政策。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代表的某些错误指导，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一点，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有较多的披露、批评。

①②③④⑤《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51、266、273、277、276页。



而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则给了共产国际路线政策以全面的肯定，只是略微批评了鲍罗廷、罗易，迎合了斯大林等认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完全没有责任的观点。李立三在报告中说：“五次大会的中央可以说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中央，中央的路线完全和国际相违反。现在陈独秀等无耻的要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说他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如果忠实执行国际路线，中国革命决不会失败。”<sup>①</sup>又李立三在《结论》中强调：中国党的“产生与发展都在国际领导之下”，“有了这个指导中国党才可以有中心的路线”<sup>②</sup>。即中国党必须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导。对共产国际盲从、迷信，这是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在报告中所以全盘肯定共产国际的原因。李立三的党史研究说明，政治思想对党史研究有重要影响。

《党史报告》在史学思想上是有缺点的，那么在史学研究上是否有成就呢？应该说还是有的。

#### （1）肯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

《党史报告》一开头就说：“党史对于目前政治路线和革命前途有绝大关系。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sup>③</sup>这里既指出了党的历史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前途的关系，也肯定了研究党的历史，对于了解和决定党的政治路线，明确党的发展前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只有了解党的历史，研究党在发展过程中、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了解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才能认清党的发展前途。李立三对党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和论述，比蔡和森更进一步。李立三又说到：“可是党并没有党史的编辑，所以只能凭脑中所记的报告。”还提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sup>④</sup>，“第二次大会决议宣言和大会情况我同样不知道，不过只知道有一个政治决议案，一个组织决议案，一个宣言，可以作为历史的材料。”<sup>⑤</sup>这里实际上对党史资料缺乏保管整理，对党史研究不重视，提出了批评，并希望能对党史资料的保管整理、党史研究引起重视。

#### （2）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基础和历史必然性

《党史报告》在报告党的历史时首先就说：“党的组织发生于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决不是几个人

①②③④⑤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258、276、204、214、205 页。

的关系,他的发生,一定有他的客观上社会经济基础,一定有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到某一时期才发生共产党,决不是几个人的(事)。”<sup>①</sup>接着,李立三分别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基础。他首先指出:“客观社会基础”,“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十月革命后,已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性革命,他也成为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使“中国思想界起了绝大的波动,发生一部分思想倾向于俄国,即社会主义思想”,使中国“发生了马克思主义派别”。此外,它又增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觉,增加了工人斗争的勇气。<sup>②</sup>其次,他指出:“十月革命仅仅是中国党的催生药,决不能说中国党是由于十月革命所产生,中国党的产生是在于中国本身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上。”<sup>③</sup>接着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近代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无产阶级自发罢工斗争的发展。第三,指出共产主义思想运动的发展,使很多文化团体“倾向社会主义,于是就有组党的思想”<sup>④</sup>。即先进知识分子的形成,促使了党的产生。李立三对于建党客观性、必然性的分析不如蔡和森深刻。李立三特别强调了“十月革命的影响”重要。虽然他也说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发展是中共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更强调:“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第一个原因是十月革命的影响”<sup>⑤</sup>。这样的认识,是把外因看成第一性了,显然有些本末倒置。当然,从他全盘肯定共产国际的需要出发,这样论述是必要的。总的来说,李立三对中共产生的客观基础、必然性是肯定的,这在当时对取消派及其理论是一个批判。李立三指出,中国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取消派所不了解的”,历史证明,取消派是错误的。<sup>⑥</sup>

### (3) 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线索

《党史报告》论述了1921年至1930年初中共的发展史,在谈到党的发展线索和阶段时说:“党从一次大会到‘二七’运动是一个段落,这一时期中党的政治口号是社会革命万岁,主张直接无产阶级革命,这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时期。虽然在斗争策略上是和列宁主义殖民地策略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的策略不相合的,但是在组党历史上,这一共产主义思想运动是组党的前提。”<sup>⑦</sup>“‘二七’以后,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即西湖会议,决定做民权运动,出版《向导》,当时主要是两个口号:1. 打倒

①②③④⑤⑥⑦《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5~206、206、211、207、209、216页。

帝国主义；2. 打倒军阀。”<sup>①</sup>又说：“第一次大会到第二次大会是共产主义思想运动阶段。第三次大会到‘八七’会议是国民革命运动阶段。‘八七’会议以后是新的阶段开始，一切路线是反国民党的路线。”<sup>②</sup>在《结论》中专论“党的发展阶段”时说：“从党的发生到‘二七’运动是共产主义思想运动时期，这时党的主要斗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派，反对轻视职工运动观念。从西湖会议开始，党走向正确道路，直到‘八七’会议，主要领导是国际，中国党本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八七’会议至六大大会纠正机会主义，但又发生了盲动主义的危险。六大大会开(始)了新的阶段，给予我们以新的生命，是党历史上所未有的，对于中国整个问题都有正确的解答。”<sup>③</sup>李立三没有参加过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加之资料缺乏，仅凭记忆作报告，所以在探讨党的历史发展线索时，略有相互矛盾之处。他一面说中共一大到三大为一段落，一面又说中共一大到西湖会议为一段落。从他以“二七”事件为划分标志看，应该是以一大到三大为一段落，因为西湖会议是1922年8月开的，在“二七”事件之前；中共三大1923年6月召开，则在“二七”事件之后。西湖会议初步讨论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党的政策、策略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国共合作方针政策的决定是在中共三大上，中共三大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是对的。李立三划分的中共党史阶段是：

- ① 1921年7月一大至1923年6月三大；
- ② 1923年6月三大至1927年8月“八七”会议；
- ③ 1927年8月“八七”会议至1928年6月六大；
- ④ 1928年6月六大至1930年1月。

李立三以党的政治口号变化、方针政策策略的变化来划分中共党史发展阶段，这反映了某些历史真实，但还是不十分准确的。李立三认为从中共一大到“二七”事件，是共产主义思想运动时期，直到三大才决定做“民权运动”，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中共二大就制定了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蔡和森研究中共党史，指出了一大与二大的变化，显然比李立三准确得多。李立三认为三大到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17、267、276页。

“八七”会议是“国民革命运动阶段”，这是可以的。但又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党本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统治时期”，这虽然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但没有全面的分析，而把这时期的党的工作全部否定了。事实上，如蔡和森所指出的，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中，党的路线、方针还是正确的，党内正确路线还是和错误路线作了斗争的，直到1926年“三二〇”事件以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才在实践中全面推行。蔡和森在论述这段历史时，首先肯定了党的成绩，这就比李立三高明。李立三认为“八七”会议以后，开始了“反国民党的路线”，“纠正机会主义”，“但又发生了盲动主义的危险”，这反映了历史事实。李立三认为六大以后完全正确了，这是不准确的。六大仍有“左”倾情绪，对于应由城市退往农村进行长期斗争缺乏认识。李立三的评价正反映了他的“左”倾思想。李立三对中共党史发展线索的探讨比起蔡和森是稍逊一筹，准确性、科学性方面，都比不上蔡和森。

《党史报告》在研究方法上对于历史人物坚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评价。报告中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此时陈独秀已被开除党籍，并公开反党，但报告中对于陈独秀曾经作出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谈到新青年社中陈独秀和胡适的斗争时说：“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俩人的思想走到明显的不同。胡适之的思想是实验主义，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学说。陈独秀是一天天走向马克思主义，一天天倾向社会主义。”<sup>①</sup>又谈到：“在《共产党》上不仅有独秀的文章，并且有周佛海的文章，那时是做了许多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开始把共产主义思想介绍过来，并且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sup>②</sup>在论述建党初期陈独秀和李汉俊的斗争时说：“李汉俊的思想相当于俄国的经济派，他以为工人只能作经济斗争，党目前只可作学生运动……在组织上主张地方分治，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有集权的中央。当时陈独秀反对他，他比较李汉俊是正确的，他主张党的基础应在无产阶级这一思想上斗争，当时没有人了解他的伟大意义，以为这是陈、李两人争书记地位，而不了解如果党不把李汉俊思想打下去则职工运动就不会发展，而党也要分裂起来。这一斗争大家赞成陈独秀的意见，李汉俊思想是失败了。”<sup>③</sup>这里给予了陈独秀早期的贡献以充分的肯定。瞿秋白因为犯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9、212~213、214页。

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当时已遭到批判，《党史报告》中批判的“盲动主义”，就是批判瞿秋白的错误。同时报告对瞿秋白作出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谈到1927年1月底当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到达后，瞿秋白和彭述之发生了争论。瞿秋白赞成国际的意见，彭述之则阳奉阴违。报告指出：“当时秋白同志的意见是比较正确”。但因为陈独秀仍掌握着领导权，没有采纳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当时就感觉反机会主义的重要，就在病中花了一礼拜功夫，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这一小册子内容对于彭述之主义批评得体无完肤，非常正确，特别是在当时反对机会主义上非常有力，固然对于中国革命的阶级分析上还有些问题，但在主要的路线上是正确的”<sup>①</sup>。以上说明李立三在研究党史时，并不因为某人犯过错误，就把他的功劳也抹去了，并不因人废事。

作为当事人研究当时史，《党史报告》也有史料价值。中共一大、二大、三大，李立三没有参加，报告中叙述这些会议都很简略且有误差。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起，因为李立三参加了中央各次会议，成为中央领导人，叙述就比较详细。如谈到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党内状况，他说：“叛党状况开始发生。首先叛党的就是施存统，他是叛党开始的第一个人。他是历史上很早的一个人。这个人叛党对党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他在报上公开发表他的言论，在此形势之下，武汉许多同志公开宣布脱党，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这时可见党的崩坏非常之快，因为这时党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脱离党的事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上海工人群众在武汉叛变后摇动非常之大。”又谈到：“当时毛泽东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为国民党已经死了，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党——就是工农的党，但当时很少注意这个意见。蔡和森同志主张中央坚决整顿全国的党。其他同志全部在恐慌状态。”“这时党的崩坏状态非常严重，假使这时没有‘八七’会议，则党的崩坏不只到这个程度”。<sup>②</sup>这里披露的一些事情是很多文献资料中所没有的，对于研究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党内状况，研究毛泽东、蔡和森的思想与实践，都是很宝贵的资料。

因为记忆的误差，《党史报告》的资料在某些地方也有不准确之处。

<sup>①②</sup>《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39、262-264页。

如谈到：“苏联十月革命虽在一九一七年，而影响到中国是在一九二一年，然而这影响到了中国，就在中国思想界起了绝大的波动，发生一部分思想倾向于俄国，即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思想上极大的斗争，即所谓美国思想和俄国思想的斗争。”<sup>①</sup>这里一会儿说十月革命的影响 1921 年才到中国，一会儿又说五四运动时已有美国思想和俄国思想的斗争，似乎五四运动是在 1921 年爆发的。事实上十月革命的影响 1919 年前已经到中国。又如谈到：“中国党第一、二次大会都只有最高纲领即社会革命政纲”<sup>②</sup>，三大才“确定了党的民主革命政纲”<sup>③</sup>。这显然是失实的。事实上中共二大已经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已经确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又如李立三总认为西湖会议在“二七”事件之后，这也是失误。这些误差是记忆失误、资料缺乏所致。1925 年以前，李立三多在地方工作，对中央全局的事了解的少；或者如李立三在报告中所批评的，中央的事往往不让地方知道，这大概也是李立三研究早期党史出现一些失误的一个原因。

### 3.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17 年到北京求学，想入北大文学系，因无人资助，不成。后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除学俄语之外，还自修英语、法语，研究哲学、文学等。1918 年就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 年五四运动中成为俄专学生会负责人，以俄专代表身份参加北京学联，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0 年 10 月，俄专未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和上海时事新报馆的聘请，与李宗武、俞颂华以特派员身份，由北京启程经哈尔滨赴莫斯科考察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在苏俄两年，写了大量通讯，向中国国内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赞美苏维埃政府。1921 年 9 月，他还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的俄文课，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萧劲光等人均在听课学习。1922 年 2 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 12 月，陈独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遂回国。他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理论宣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205、216、219-220 页。

传工作。1923年初夏，中共中央决定把机关刊物《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任主编，同时，他还参加《向导》、《前锋》的编辑工作。

《国际歌》的中文译文，最早就是由瞿秋白译定发表在《新青年》上。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经陈独秀修改后通过。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开始当选为中央委员。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瞿秋白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为五人主席团（中央常委会）成员。1925年6月4日，中共中央主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报》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瞿秋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任政治局常委兼农民部长。1927年初，瞿秋白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组织公开出版。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他主持召开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沪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他参与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该决议案错误估计了中国形势，认为“革命运动仍在不断高涨”，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这标志着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至1928年4月，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得到纠正。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参加了会议，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直到1930年7月下旬接受了共产国际委托，回中国纠正李立三“左”倾路线。在莫斯科期间，瞿秋白曾在列宁学院和中国劳动大学讲中共党史，留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大纲。瞿秋白在1921年就写下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文章，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文字之一。当然那时的研究还是局部的、小规模、不自觉的。1928年6月1日，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出版，约12万字，全面总结了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这是他对中共党史的规模较大的研究，但偏重于大革命时期。而《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则是瞿秋白研究中共党史全面化、体系化的反映。1931年莫斯科出版了瞿秋白编的《中国职工运动资料集》，这无疑为他稍有规模研究中共党史打好了资料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现在留存的是一份详细的大纲，为瞿秋白

手稿，原件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现已收入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这个大纲的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十二讲大纲，并标了讲演日期，现抄录如下：

第一讲 中国共产党历史之意义——绪言

辛亥革命的略论

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

中国同盟会及国民党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党”

第三讲 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阶级

一、中国共产党以前的革命组织的结论 (十二月十八日)

二、中国问题与帝国主义时代 (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四讲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年底)

一、一九二〇年的五一运动和初期社会主义运动 (一月八日)

二、国民革命问题及国民党问题

——中国党第一、二次大会；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远东革命会议

第五讲 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一九二三年初至一九二四年初)

(二月二十八日)

一、“二七”前后的工人运动

二、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杭州会议，第三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

第六讲 革命高潮之前夜(一九二四年初至一九二五年初)

(三月八日)

一、工人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

二、国民党的改组和北京政变

——上海会议，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

第七讲 “五卅”时期——广州时期(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

(三月十八日)

一、“五卅”总同盟罢工和初期的农民运动 (三月二十八)

二、民族改良主义问题和共产党

——北京九月会议，北京二月会议；国际执委第六次会议

第八讲 革命的战争和工人阶级(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初)



- (四月八日)
- 一、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权 (四月十八日)
- 二、北伐和武装暴动的问题  
——中国的汉口会议;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
- 第九讲 武汉时期和上海暴动(一九二七,一月到八月)(四月二十八日)
- 一、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和南方的土地革命 (五月八日)
- 二、三个营垒的问题  
——第五次大会;国际执委第八次会议
- 第十讲 “八七”会议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五月十三日)
- 一、武汉反动和游击战争 (五月十八日)
- 二、南昌至广州暴动  
——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国际第九次会议
- 第十一讲 广州暴动之后(一九二八年初到一九二八年六月) (五月二十三日)
- 一、革命失败后的工人运动 (五月二十八日)
- 二、农民战争和军阀战争的问题(盲动主义)  
——第六次大会,国际第六次大会
- 第十二讲 (一九二八年七月到一九二九年底)
- 一、革命新高潮的问题与取消主义 (六月三日)
- 二、国民党的军阀统治 (六月八日)
- 第二次中央全会;国际的四封信<sup>①</sup>

从这样一个大纲,我们可以看到瞿秋白的党史研究体系,也可以知道,瞿秋白讲中共党史从1929年12月18日开始,至1930年6月8日结束,共讲了12讲,分17次讲完。

现在遗憾的是,瞿秋白这样一个系列讲座的记录稿,尚未发现,此外,现存的12讲的详细大纲也不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按照共产国际档案中保存的瞿秋白手稿印出来的详细大纲,只有12讲中的第三讲至第九讲,而第一、二、十、十一、十二讲的详细大纲漏缺了。目前看到的只是一份残缺的大

①《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51-154页。

纲。尽管如此,由于12讲的简要大纲反映了瞿秋白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因为第三至第九讲的大纲较详细,以至观点、资料都列了出来,所以,还是能从这个大纲中,看到瞿秋白研究中共党史的特点、贡献等。

《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反映什么样的史学思想,从大纲中还不能十分清楚地看出来。比如《概论》的完成,正是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形成时期,《概论》对“左”倾路线如何认识,其中的第十二讲第一节《革命新高潮的问题与取消主义》,是谈这方面认识的。然现在只看这个标题还不能判断瞿秋白是赞同“左”倾路线还是反对。只是有一点在大纲中是很突出的,就是从第四讲到第十二讲,每讲都论述共产国际的会议、指示,说明很注意突出共产国际的地位,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占《概论》的很大比重。瞿秋白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曾受到米夫等人的打击。1929年秋,苏共发动全国性的清党运动,反对托派、布哈林分子,米夫、王明等人就乘机诬陷、打击瞿秋白,以致于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当时在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失踪,从此下落不明。至1930年6月,共产国际撤销了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职务。瞿秋白正是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讲中共党史的,在讲演中他究竟是对共产国际全盘肯定,还是一分为二、有所批评,现在也不能臆断了。

《概论》的史学成就,还可以从大纲中略微看到:

#### (1) 发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

“概论”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瞿秋白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系统性。把《概论》的12讲大纲和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相比较,可以看到《概论》更有系统性了。《概论》首先谈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接着论中共诞生的背景和客观条件。其中分析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变化及社会阶级的变化发展;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然后再谈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历史,则理出这样的发展线索:

- 一、1921—1922年底(诞生时期)
- 二、1923年初—1924年初(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形成时期)
- 三、1924年初—1925年初(革命高潮之前夜)
- 四、1925年—1926年3月20日(五卅运动、省港罢工时期)
- 五、1926年—1927年初(北伐时期)

六、1927年1月至8月(武汉国民政府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期)

七、1927年8月至12月(南昌起义至广州起义)

八、1928年初—1928年6月(广州起义至中共六大,盲动主义被克服)

九、1928年7月—1929年底(六大以后)

把1921年至1929年底的中共历史分成这样九段,基本上抓住了党在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特点。如一大、二大为一个阶段,正是党的初建阶段;1923年初至1924年初为一个阶段,正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国共合作实现的阶段。又如在1925年至1926年3月20日一段中,谈到的是“机会主义之第一阶段”<sup>①</sup>;1926年至1927年初一段中,谈到的是“机会主义之第二阶段”<sup>②</sup>,也是阶段的划分,有一定道理。在每一个阶段的论述中,总是先论述革命形势、工农运动,再论述党的会议、方针政策。如第七讲五卅运动,先讲背景,再谈经过,然后谈经验教训,这些都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体系。《概论》表明,瞿秋白的中共党史研究已更有系统性,体系更加完整了。

#### (2)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客观条件、历史必然性的研究更全面

从大纲和第三、第四讲的详细大纲中,可以看到瞿秋白论述党的诞生,不仅注意到了近代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还特别注意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组织和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远东革命会议”等。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发展、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以后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形成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条件,党的产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产物,也不是共产国际强加的。在论述中国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发展时,可以看到已经引用了很多资料。如第三讲中已指出中国的工业工人为275万,非工业工人(大城市)为1216万。第五讲中专门设一节谈“罢工潮流”,列出1918年至1924年历年的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并画出了指数图表。又谈到1922年中“91次罢工有50次的加薪要求,组织工会四次。而杨铨之统计:1922年9月至十二月罢工四十一,工资三七,反对管理规十五,承认工会十一,休假十,养老恤金六,反对同业五,同情罢工五,减时三。”<sup>③</sup>这些资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95、196、173页。

料的引用,是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的体现。

### (3) 注意研究党内的组织、生活状况

从《概论》的大纲中可以看到,他不仅注意了重大事件、会议、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也注意了党的组织状况、生活状况的研究,并且搜集、整理了一些十分具体详细的资料。如建党初期的党员人数,列出:“一次大会”时 50 余人。到 1922 年 6 月时,“上海 50,长沙 30,广州 32,湖北 20,北京 20,山东 9,浙江 8,法国 2,四川 3,俄国 8,日本 4,德国 8,美国 1”。共 195 人,“其中妇女 4 人,工人 21 人”<sup>①</sup>。在论述中共三大时,专门谈了“党务状况”,指出:“三次大会时党员总数 420(44 人在国外,164 工人,19 妇女,110 人在狱中)。一、二次大会至三次大会之间新加入 200 人,其中 130 为工人。地域:广东、上海、北京、长沙、安源、长辛店、唐山、济南、浦口、杭州、汉口、莫斯科。”<sup>②</sup>至 1924 年上半年党员为 650 人,40% 为工人。中共四大时发展到 990 人。五卅运动中,发展到 3000 人。在谈到中共三大中央委员的选举时,还详细列出了当选的人名及得票数等:“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sup>③</sup>在论述中共三大的过程中,把会议讨论“国民革命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也一一列举,如——指出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意见<sup>④</sup>,反映了党内的思想斗争。这些都表明,瞿秋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是多侧面、多层次的,而不是只停留于事件、会议而且很多资料是第一次被引用。

### (4) 搜集和保存了很多宝贵的党史资料

《概论》第三至第九讲详细大纲中列出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很宝贵的党史资料。如论述中共一大时,就概括了一大通过的决议和纲领的要点。其中决议的要点是:

1. 工人运动——二百人以上则组工会,改组行会,谨防外奸。
2. 宣传——中央监督出版物,党员不准出版违反共产主义的东西。
3. 工人学校——“交通工人准备学校”、“纱厂工人”——管理归工人,教

①②③④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161、173、176、173-174 页。

员可出席,应为党的中心。

4. 工人运动研究机关——理论国际及中国工人运动之研究及出版。
5. 对于其他政党之关系——完全独立,不与其他政党发生任何关系。
6. 加入第三国际——每月报告,有必要派人到伊尔库茨克。<sup>①</sup>

这里的六条要点,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俄文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的内容完全相同。这个决议六个部分的标题原文是:

- 一、工人组织
- 二、宣传
- 三、工人学校
- 四、工会研究机构
- 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
- 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sup>②</sup>

瞿秋白概括的要点的标题,除第六部分外,与原文基本相同,而第六个标题则是反映了第六部分的实质内容。

其中概括的纲领的要点是:

1. 2. 宗旨(定名): A. 以革命军及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阶级的政权——到无阶级的社会; B. 承认无产独裁; C. 消灭私产,没收生产工具、土地、机器等等。

3. 以社会革命为目的。

4. 有一人介绍且承认党纲政策者不论男女国别皆得为党员,但须与其他政党脱离。

5. 候补视察期二月,由地委通过或批准。

6. 严守秘密。

7. 五人以上之地方得举地委。

8. 移居须由书记派出。

9. 十人以下者有一书记,十人以上则四人为委员会(书记、会计、组织、宣传),三十人以上为执委。

10. 人数多数可派往别区作工,但受执委之指挥监督。

11. 条缺。

①《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61页。

②《一大前后》(一)第12-14页。

12. 财政问题。
13. 500 以上或五组以上要开会而组织执委。
14. 不能做官做议员(须得党的许可),兵警职员不在此例。
15. 三分之二以上之大会代表同意得变更此党纲。<sup>①</sup>

这里概括的一大党纲的要点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大纲领俄文本原文是完全相同的。原文第十一条缺,这里也是第十一条缺(详见《一大前后》(一)第6~8页)。以上这些有关中共一大的文献资料,当是瞿秋白在莫斯科时查阅的。他当时是中国代表团团长,查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资料是有方便条件的。《概论》引用中共一大的文献资料,是党内中共党史研究史上中共一大资料的首次被引用,这些资料在蔡和森、李立三的党史研究中还没有引用过,他们可能也没有看到过(从李立三批评一大党史资料的缺乏,可以证明他没有看到过这些资料),所以,《概论》引用这些资料,不仅是十分宝贵的,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资料上的一个突破。

此外,《概论》对中共二大的宣言要点,中共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议决案的要点,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要点,中共第二次时局主张(1923年7月)的要点,中共四大各项决议案的要点等都作了叙述。还有1924年5月上海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1925年9月(瞿作十月)北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1926年7月上海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等,也作了叙述。

《概论》还引述了一些共产国际方面的文献资料。如1921年12月远东革命会议上萨福洛夫的演说要点、1922年7月季诺维也夫信的要点,1922年7月马林报告的要点、1922年8月马林指令的要点、1923年5月布哈林训令的要点等都有叙述。

这不仅说明瞿秋白研究中共党史时占有了大量的资料,也表明他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如果他的讲演有记录稿保存,那么一定是一部资料翔实的中共党史研究的专著。

《概论》中引用了大量党的历次会议的文献资料,这可以从研究方法上

<sup>①</sup>《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61-162页。

看到瞿秋白的严谨扎实，也可以从史学思想上看到他是在全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论述中共三大的有关文献精神，就强调：“无产阶级为唯一彻底力量——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农民不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农民不参与，也很难成功。”<sup>①</sup>论述中共四大的有关文献精神，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指出：“使中派（反右）离开右派从事不协调的斗争”；“固然要助国民党，然亦不可忘在国民党中的斗争”。<sup>②</sup>论述1924年5月上海扩大会议、1925年9月北京扩大会议的精神时，都强调了：“扩大共产党”、“争取工农”、“非必要时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sup>③</sup>。从这些可以看出，瞿秋白在论述党的会议精神时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和国民党右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对中国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 附：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192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广州，与同学谭平山等创办了《广东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企图搞广东党组织的独立，对抗中央，并拒绝中共中央要求他去莫斯科学习的调令，自行去美国留学。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处决。

陈公博1923年2月28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开始学习经济学。1923年底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篇论文，1924年1月31日得到弗拉基米尔·塞姆科维奇教授的承认，2月22日获得通过，陈公博获硕士学位。此后这篇论文一直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陈公博也再没有提起过它。1960年，这篇论文被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C·Martin Wilbur)发现。韦慕庭研究了这篇论文并将研究结果连同这篇论文合为一册出版。这就是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出版的，陈公博著、韦慕庭编的《共产主义

①②③《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6、186~187、194页。

运动在中国》。这是最早公开出版的英文本。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海将1960年的英文本译成中文，并据纽约奥克特贡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作了校订；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就是第一个中文版，也是现在中国国内流行的本子。这个本子，基本保持了1960年英文版的原貌，只是删去了附录三、附录六，因为这两个附录的文件“早已为人们所知，故从略”。

陈公博的论文分正文、附录两部分，正文约2.8万字，章节为：

绪言 中国经济的基本变化

第一章 中国辛亥革命的真正原因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

第五章 国民党的新计划及其最近的趋向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结论

附录为：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次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陈公博的这篇论文，是一篇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虽然正式完成于1924年初，但它不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文字，最早的文字应是瞿秋白、张太雷等的文章，即《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等。它也不是专著，只是论文，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早专著，应推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它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研究中共党史的成果，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共党史的成果。因为陈公博写作这篇论文时，他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是从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来写作这篇论文的。

陈公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活动，但在他刚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已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生怀疑，认为很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解



决。在中共二大前后,他已在政治路线上,与中共中央持反对意见,并且最后公开宣布和共产党脱离一切关系,到美国去学习西方的思想了。

赴美前,他在日本滞留3个月,与廖仲恺多次来往,开始信仰三民主义,并有加入国民党之意。到美学习后,他自然而然全盘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如他在论文的《绪言》中说:“正如赛利格曼教授所指出的,‘那些应用经济解释问题最成功的作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但经济力量的深刻影响,正如赛姆科维奇教授(按:此人是陈公博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所说,没有一个才智之士愿意否定,而且它已教导我们对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的研究。我们完全准备承认它,并以此种观点出发研究问题。”<sup>①</sup>可见他对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已加以否定,已完全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并以此指导论文的写作。陈公博在写作这篇论文时,虽然还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的立场、观点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他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观察问题、研究历史,所以他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在某些地方反映了一些历史现象的真相,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

论文中反映的陈公博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分析一下。陈公博在论文中谈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而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采取与俄国不同的另一种形式”。<sup>②</sup>又说:“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sup>③</sup>这里陈公博似乎认为共产主义将在中国胜利,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但陈公博在当时的形势和思想状况下,是否真心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呢?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给这个可能性附加了一个条件——“如果压迫不停止”。如果“压迫”停止、减小,那又是另一种情形。仔细品味,似乎有一种向美帝国主义等列强进行说教的味道,即希望他们注意中国的发展趋势,希望他们适当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其次,陈公博所说的“共产主义”、“激进主义”,是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个问题。论文的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把“新潮社”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

①②③《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80、85、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先驱。实际上“新潮社”是受杜威实验主义、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团体。还说杜威、罗素的思想方法已经影响了共产党<sup>①</sup>，这一方面说明陈公博论中共的起源不完全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谓的“共产主义”、“激进主义”并不一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论文又谈到：“近代社会主义是工业制度的结果，工业制度在西方历史上起重要作用已达两个世纪之久。在其他国家几百年所发生的经济变化，在中国只有几年。民主主义所以在中国失败，是因为它成熟过早。如果共产主义也进行过速，它也会失败。”<sup>②</sup>这里陈公博对中国能否实行共产主义的看法就比较明朗一些，即认为中国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辛亥革命是一个“过于早熟的果子”，所以失败了，更不用说进行共产主义的革命了。陈公博甚至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如果爆发社会革命，究竟对列强有利还是对中国人有利，仍是一个问题”<sup>③</sup>。这实际上就是警告说，不要进行社会革命，否则对中国人不利。中国没有工业经济的基础，这是事实，但如果因此认为辛亥革命过早，共产主义运动没必要，这就错误了。辛亥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性、软弱性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是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必然产物。而陈公博否认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只承认有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完全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也说明他不是真心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而是真心希望中国不要进行共产主义的运动。这是论文中反映的一个重要思想。

以下就论文对中共党史具体问题的一些认识作一分析。

#### (1) 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

这个问题，论文基本上是回避的。论文的《绪言》谈到了中国革命受俄国革命的影响，但论述中国共产党产生，却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第三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论共产党产生，说影响共产党人的思想，第一是“自1918年以来延续下来的内战，给人民造成了不堪忍受的苦难。第二，由于巴黎和会闭幕，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更加清楚地表明，弱国是不可能逃避列强控制的，被压迫国家人民求解放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第三，虽然中国代表已拒绝在凡尔赛和

①②③《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95-96、84、85页。

约上签字，但山东问题仍未解决……第四，在这种受压迫的情况下，不仅对于激进派，而且对于温和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把中国从国内外压迫中，解放出来，除了直接的社会革命之外，别无他途”。<sup>①</sup>这里不仅不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也不谈“十月革命”对共产党人思想的影响，甚至丝毫不谈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完全回避、否认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这种回避、否认，不是偶然的，因为陈公博否认中国有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基础，自然也就不承认共产党有产生的客观基础。这种回避、否认是为当时一股取消共产党的思潮服务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等研究中共党史，就首先阐明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从而肯定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肯定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详见《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陈公博和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的不同研究，正是不同阶级立场、观点的反映。

### (2) 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应从五四运动开始追溯

论文在论述中共的起源时批判了中国古代起源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外国和中国的作者都不甚了解。虽然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表达的思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但这些思想还不能认为就是近来这种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sup>②</sup>还批判了辛亥革命起源说。陈公博认为：“我们在追溯共产党的起源时，对我们来说比较实际的还是描绘 1919 年的五四运动。”<sup>③</sup>把共产党起源放在五四运动，还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不过有些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起源，应从十月革命开始追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起源、政治背景、社会背景则应追溯到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社会主义先进分子的形成及其组织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起源确实从五四运动开始。陈公博的中共起源说，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当然，他又把“新潮社”等作为中共“起源团体”，这是不可取的。

### (3) 关于中共一大、二大的评价

论文认为中共一大采取了不妥协政策，即主张独立斗争、进行直接的社会革命。这反映了某些事实。中共一大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从这个问题着手，就可以看到陈公博对中共一大进行的是否定的叙

①②③《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 98、92、93 页。

述。他没有肯定中共一大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出现了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相反，却在中共一大的不妥协政策上大做文章，以嘲笑奚落的口吻，大谈共产党对其他一切政党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大谈共产党禁止党员做政府官吏、议员，甚至认为学校校长也是政府任命的官吏；大谈共产党主张“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等等。<sup>①</sup>企图说明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幼稚的。

论文对中共二大，没有肯定其对中共一大的发展，而是抓住改变不妥协政策大做文章，说一大和二大的方针政策已经“相反”，并借“或许有人批评”的口吻说：“在中国流行的不是共产主义，只不过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而已。”<sup>②</sup>企图说明共产党已放弃了共产主义，采取了“温和社会主义”甚至“民主主义”的观点。这就抹杀了共产党既规定了最低纲领，还规定了最高纲领；抹杀了共产党实行最低纲领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是对中共二大及其方针政策的歪曲。

不谈共产党的成绩，只谈共产党的缺点，这是陈公博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做法，目的显然是要否定共产党。这种极片面的手法和不良用心，正是他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表现。

#### (4) 国共分裂问题

论文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结论》中大谈国共合作是暂时的，迟早要分裂。说：“共产党已阐明，他们所以与国民党联合只是为了获得暂时的利益；他们最终是要分裂的。”<sup>③</sup>国共分裂是必然的，但究竟谁要分裂？分裂的责任在谁？在陈公博的笔下，似乎是共产党在制造分裂，分裂的责任在共产党。陈公博大谈中共二大决定要在国民党势力下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取领袖地位”<sup>④</sup>。企图说明共产党并无合作的诚意。大谈中共三大发表了一个“对国民党不甚满意的宣言，并指责了国民党所已采取的某些步骤。”<sup>⑤</sup>企图说明共产党总是攻击国民党，制造分裂。陈公博不仅抹杀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坚持国共合作的诚意，而且对中共二大、

①②③④⑤《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98-100、103、120、120-121、119页。

三大的方针政策进行断章取义的歪曲。陈公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刚刚实现的时候，不谈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制造分裂，却大谈共产党无合作诚意，这和当时国民党右派的宣传调子是一致的，立场是一致的。以后陈公博加入了国民党，他在《寒风集》的《我与共产党》中表白，他从来就反对国共合作，因为“共产党要加入国民党实在要吸收国民党分子，和假着国民党招牌来扩展共产党活动的阴谋”。这种对共产党的攻击，完全反映了国民党右派的立场、观点。而他写作此论文的立场、观点，显然和他以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立场、观点是完全相同的。

这篇论文的史料价值还是有的，特别是附录。所附录的6种中国共产党早期文件中，有4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是在我国长期散失，未公布于世的。特别是前两种中共一大的文件，至今无中文原件，尽管论文的附录是英文本，但也是珍贵的。

1957年，苏共中央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国，这部分档案第九卷中有俄文本中共一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和陈公博论文附录的英文本中共一大的两个文件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这说明陈公博附录的文件是可信的。而且将英文本、俄文本相比较，英文本的文字略有长处。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二条第一款，俄文本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sup>①</sup>英文本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sup>②</sup>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条《工人组织》第一句话，俄文本为：“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sup>③</sup>英文本为：“我党主要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sup>④</sup>从英、俄文本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英文本在文字上似乎比较符合当时党的思想理

①《“一大”前后》（一）第6页。以下俄文本均见《“一大”前后》（一）。

②《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126页。

③《“一大”前后》（一）第12页。

④《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128页。陈公博记载的这两个文件的中译本，以《“一大”前后》（一）所载为佳。

论状况和中国人书写的习惯。

这篇论文的本身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陈公博参加了中共一大,谈到一大开会日期是1921年7月20日,持续了两周。这为确定一大召开和闭幕的日期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和线索。他提到:“大会代表十二人,代表七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天津、汉口以及在日本的中国同志。”这为出席一大的人数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和线索。还提到:一大召开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sup>①</sup>这对中共一大会议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是一种说明。谈到一大会议上争论的问题及情况,如关于禁止党员做“官吏”的争论,关于对孙中山态度的争论,都为研究一大会议及早期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谈到一大会议有一个宣言,因为有不同意见,最后没有公布,这也为研究一大会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一大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南湖的船上开的,而陈公博到杭州度“蜜月”去了,未参加,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叙述就失实了。他说:“大会在警察管辖范围之外的一个著名的湖中央的船上举行,在这条被宁静动人的景色所环绕的优美的船上,作出了许多激愤的激进的决议,欢快恬静的湖水和美丽的月色都没有缓和代表们激烈的感情。”<sup>②</sup>而据当时的天气预报,7月末8月初,南湖地区是风雨天,不可能看见月亮。周佛海《往矣集》提到:在雨雾中在湖上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则是真实的。

中共二大,陈公博没有参加,论文叙述二大是根据他所见到的会议材料,所以开会的具体经过、争论,写不出,只是叙述了二大的纲领、方针、政策。提到:“1921年底在莫斯科曾召开过一次革命者国际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变动,无疑就是由于那次会议。”<sup>③</sup>这倒是与二大有关的有用的参考资料。

中共三大召开时,陈公博已在美国学经济,他只能根据新闻报道叙述三大。论文说三大是1923年7月在广州召开的,显然错了,应是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他叙述那些没有亲身参加的事,自然就不准

①《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102页。

②③《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第102、110页。

确,当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 四、中国革命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及其经验教训为主的,所以可以视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之前,应该说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开始的,而是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先开始研究的。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封建王朝以后。如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二册,1912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同时还有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12册出版。1914年出版的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也属于这类中国革命史的著作。1923年孙中山写了《中国革命史》,约八千字。以后以“中国革命史”为名的书陆续出版。如贝华的《中国革命史》(1926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广州新新书局编印的《中国革命史》(1927年出版)、印维廉《中国革命史》(1928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夏含华《中国革命史》(1928年国民党广西党部印行)等等。这些中国革命史的著作的显著特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为研究对象,以英雄史观、民生史观等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以及三民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而对于工农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或者只字不提,或者进行不正确的、歪曲的论述和评价,甚至进行恶毒的污蔑攻击。如贝华的《中国革命史》在《例言》中就公开声明:“本书内容,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后凡四十年。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叶,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本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完全当作孙中山一个人的历史。如刘克谦《中国革命史》在《革命之主义》一章中,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时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观总理(按:指孙中山)之言,则共产主义似是而非之理论不攻自破……为吾人所不解者,第三国际将共产主义在俄国行之不通,复强演之于土耳其,失败之后,又以中国为试验场,自欺欺人,又告失败,故共产主义四面撞壁已随处不通

矣。”所以,这种主义“非吾人所需要之革命主义,吾人需要之革命主义为何?三民主义是也”。<sup>①</sup>可见资产阶级、国民党学者,就是通过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来宣扬他们信奉的三民主义,同时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先开始,但他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只是等无产阶级走进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领域,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向科学化发展,才有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而当无产阶级占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阵地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便激烈起来,激烈的两军对战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中共党史研究及中国革命史研究,就是在斗争中前进、发展的。矛盾斗争是事物的生命,是发展的动力。

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如果就研究具体事件讲,如研究辛亥革命等,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了;如果就系统研究讲,就出版专著论,还稍稍晚一点,目前发现的比较早的研究专著是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年出版)。其后有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出版)、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8年出版)、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训练部编印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1940年)、大连中苏友好协会《中国革命运动简史》(1946年)、陶官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话》(1948年)等等。

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相比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公开出版、体系完整、规模大、影响大。如以上提到的一些中国革命史研究著作都是公开出版的。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将近30万字,就中国的大革命史能写出30万字的篇幅可见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了。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抗日战争时期不仅在解放区广泛流行,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广泛流行,在全国人民群众中宣传了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影响极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业绩是在中共党史研究之上的。当然这也有其客观原因,在战争环境里,特别是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时期,中共党史的公开研究、出版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共党史的研究涉及到党内的机密,也是不宜公开出版的,所以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一般都是以党内的党史报告的形式出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成果只在党内流行,甚至是在党内的很小范围内流行。

<sup>①</sup>《中国革命史》第6~9页,国民党陆军工兵学校1935年7月印行。



这样,影响自然不会很大,研究规模自然也会受到限制。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虽然是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但一般不涉及党内机密,宜于公开出版;再者以“中国革命史”的名义公开出版,也易于突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易于广泛传播,被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很重视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迅速占领并紧紧守住这块研究阵地,扩大它,充实它,把它作为向全国人民作宣传的前沿阵地、对外窗口。社会环境、政治形势决定了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的公开性、规模大、影响大。此外,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所以影响大,所以被全国人民所接受、欢迎,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的革命性、科学性。无产阶级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总结,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科学的论述评价,引导人们沿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自然就比那些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研究进步,从而受到人们的欢迎,有着广泛的影响。

以下将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作一探讨研究。

### 1.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18年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即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成为湖北学生运动的领导者。1920年2月,创办利群书社,经销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等书及《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同年秋,受陈独秀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出版。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8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上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主管宣传工作。10月,《中国青年》创刊,任主编。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参加了领导工作。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工作。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同年,还在李富春主办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主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五卅运动》,在邓中夏任院长的劳动学院中主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年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印行。此书的第七讲《五卅运动》,也由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印行单

行本。《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3月由广州国光书店出版单行本，6月即第二次印刷，至1929年仍在翻印出版。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恽代英文集》下卷收入此书，个别地方略有删节。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共有《由反清复明运动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及其影响》、《由太平天国运动至康梁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前后的国民党》、《五卅运动》七讲，约4万字。其中第五讲《辛亥革命》中谈到：“现在北伐军已打到武汉了。”<sup>①</sup>由此可以推断，讲这一讲时，约在1926年9月初，因为北伐军是9月6日占领汉阳，7日占领汉口，讲演时，汉阳、汉口当尚未攻下。如果第五讲讲于1926年9月初，那么第一至第四讲大概在8月，第六和第七讲大概在9月内讲完。而其中第七讲《五卅运动》，则在1926年5月就于国民党的政治讲习班上作过讲演。由此可知，这本讲稿的形成，约在1926年5月至9月间。这个时期是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同时也是国共两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的时期。1926年，“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相继发生，给国共两党的关系蒙上了阴影。所以恽代英在进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和讲演时，注意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理论，提醒革命党人，包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明确自己的革命责任，看清革命前途，要和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引导大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恽代英在第六讲结束时指出：“我希望各位注意，就是我们要懂得，中国革命运动成功，须注意这七八十年的经验。在这七八十年革命运动之经过，许多领袖摸黑路得着了许多的好的教训……”<sup>②</sup>七八十年的中国革命有哪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呢？恽代英首先强调：革命运动要由革命的党领导才能取得成功。在论述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指出：“革命欲达到成功，必要有好的政党去夺取政权，肃清一切反革命派，若如同盟会会员一样，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始终要被反革命派打倒的。”<sup>③</sup>这里所说的“好的政党”，即指“革命的政党”、“先进的政党”。而同盟会并不算“好的政党”。恽代英指出：国民党自民国成立以来的13年也是“腐败”的，只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中山决意把国民党改组，仿俄共产党的

①②③《恽代英文集》下卷第949、956、94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组织”，即改组以后，采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以后，才有了起色。

“自国民党改组后，虽不能算顶好，然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sup>①</sup>这就告诫国民党及广大干部党员，必须坚持改组精神，坚持进步，“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国民党才能成为“好的政党”，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革命也才能够胜利，否则“要被反革命派打倒的”。当时中国的革命党为谁？恽代英没有直截了当地讲，实际上他指出，只有共产党是最革命的党。他说：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领袖，好像摸黑路一样，他们摸不着正当的路径，亦是无足怪的。到了民国十年（按：应为民国6年，1917年）以后，俄国革命成功，全俄统一，俄国革命思潮逐渐输入中国，陈独秀先生，首先接受了这种思潮，开始宣传，组织共产党，并领导青年努力做工人运动。”从此，中国革命“新辟一个途径”，“工人运动兴起便收着颇大的效果……”<sup>②</sup>这里恽代英强调了是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光明，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起色。恽代英讲演的对象不只是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人，所以他不直截了当说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但实际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政党，强调了国共合作，共同领导中国革命是必须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中国革命不会成功。

其次，恽代英指出：革命运动必须有彻底的革命纲领和目标才能成功。他说：太平天国革命所以失败，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革命“主义”。太平天国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可是感情是靠不住的，没有主义的人，一有误会，便找不到感情这个东西了！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满清乘机进攻，遂打破了南京城”。<sup>③</sup>恽代英对太平天国失败教训的总结是独特的，这是当时革命形势需要的反映。恽代英在讲演中对戊戌变法改良主义有所批判，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改良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他说：“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论办一件什么事情，是逃不脱各种压迫，国家先不能救，却想先改良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事！”<sup>④</sup>对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也批判道：“同盟会党纲第六条，还要说要求列强帮助中国革命这样不通的话。辛亥时亦最注意保护外国人，尊重外国人条约，简直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差不多！”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这就是一个原因。直到“国民党改

①②③④《恽代英文集》下卷第962、955、932-933、954-955页。

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才有了彻底的革命纲领,革命也就前进了。“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sup>①</sup>恽代英对五卅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右的空想也进行了批判,指出“和平解决说”、“法律解决说”、“外交手段解决说”、“联络帝国主义打倒司法解决帝国主义说”、“经济绝交说”等是右派的空想;“暗杀外人说”、“练学生军说”、“对英宣战说”等则是“左”的空想。而这些空想,“于革命运动的影响甚大,若非很好的宣传工作,随时打破这种空想”,每每使“这种运动走入错误的道路,以至于失败”。<sup>②</sup>这些都是强调要有彻底的革命纲领、革命目标,要反对妥协、软弱、不彻底,才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第三,恽代英强调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只有依靠工农群众,发动工农群众,才能取得成功。恽代英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兴起显示了“颇大的效果”,“后来虽不幸引起了‘二七’的惨案事件,然而工人运动的重要,已为人人所公认的事了。”<sup>③</sup>特别在五卅运动中,各阶级的阶级特性进一步表现出来,恽代英说:“工人是比较学生好些的,我不是说工人道德和知识比学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所以他们自然要起来革命,虽然亦有少数人,和学生犯有同样的毛病,但大多数工人都是诚实的,直率的,很守纪律的。在五卅运动中,开始有许多学生,到后来各种游行运动,满目所见都是工人,可见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sup>④</sup>这就如他在1925年3月写的《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一文所指出的:“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sup>⑤</sup>辛亥革命时,武汉开始是被革命党占领的,“后来卒归于反革命派之手”,这是为什么?恽代英指出:“就是因为当时革命不彻底,不能将反革命派打倒,不能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来与反革命派奋斗到底的缘故。”<sup>⑥</sup>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孙中山为什么不能打倒袁世凯,恽代英指出:“因为没有注意农工运动,培植民众的革命势力,只图利用土匪,运动军队去打倒袁氏,不知利用土匪军队,是不中用的。”<sup>⑦</sup>“没有工农势力,因而只有吃亏的事。”<sup>⑧</sup>五四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工农群众行动起来了,恽代英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后来全国学生罢课,汉口、

①②③④⑤⑥⑦ 《恽代英文集》下卷第968、970-972、955、973、636、949-950、951页。

上海、广州各处学生罢课，商民罢市，上海并有工人罢工，……这是人民向统治阶级第一回的战胜”。<sup>①</sup>五卅运动所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也是因为工农群众组织起来了，所以“民众组织的发展，亦是五卅运动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sup>②</sup>因此，恽代英强调：“我们的真正的工作，在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sup>③</sup>这就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提醒共产党人、革命党人，只有依靠工农群众、发动工农群众，革命才能完全胜利，否则“只有吃亏的事”。

第四，恽代英强调了必须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他指出：国共合作建立，“中国革命运动，因此得了很大的进步，农工的组织，亦日益发达了起来”。但是，在国共合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想造谣中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感情，甚至谓国民党被共产党拿过去了！”这种造谣中伤就是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企图使革命失败。<sup>④</sup>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为了挫败右派分子的破坏阴谋，恽代英提出：“一定要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是亦要尽力与大商人、大学者结成联合战线；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楚种力量是靠得住的，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尽力使他们帮助革命，不要妨碍破坏革命。”<sup>⑤</sup>

恽代英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同时宣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清楚地说明，恽代英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是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是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战线的组成部分；说明恽代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指导来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是代表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说话的。这就是恽代英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思想性、革命性。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最主要的成就是为无产阶级打进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领域，它是无产阶级有系统地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开始。因为是初创，所以在研究体系上还不成熟。

这本书从鸦片战争，依次论述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五卅运动，初步具有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规模、体系。

①②③④⑤《恽代英文集》下卷第953、961、972、956、974页。

但因为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民族革命运动，因而把鸦片战争以前的反清复明运动，也作为研究对象，即在分期上把革命史的上限推到了清初。从研究对象上讲，把革命史的研究侧重在民族革命运动，是无可非议的，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大众和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反帝，所以，“民族革命”，即反帝，正是中国革命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中国革命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反封建，恽代英也涉及了。然从分期上讲，把民族革命运动上限推到清初，把鸦片战争以前的反清复明运动，也作为民族革命运动来研究，是不太妥当的。当然，恽代英把鸦片战争前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也作了明确的性质的区分，并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主要是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他说：“现在所讲的是八十年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并不是由今日起，也不是由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日起，自从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跟着即有民族革命运动。若再说远些，满洲入关以后，已有了民族革命运动；不过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却只是八十余年来的民族革命运动罢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即是几十年来民族革命运动的事实，且说明民族革命运动的进化。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和从前不同；从前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封建社会的革命运动；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与世界上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以与帝国主义抗战的革命运动。”<sup>①</sup>这里所说的着重研究“八十余年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即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革命运动。1840年至1926年正是80多年。恽代英指出了鸦片战争以前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封建社会的革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革命运动则是世界反帝运动的组成部分。这种性质的区分，有正确的一面，把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革命运动视为世界反帝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正确的。同时，这种划分也有不妥当的一面，把鸦片战争以前的反清复明运动，作为封建社会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不太妥当的。反清复明是中华民族内部民族矛盾的反映，是一种民族斗争，但这只是封建社会内部的民族斗争，甚至是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民族斗争，即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把这样的矛盾和斗争视为“民族革命”，显然是不妥当的。研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研究比较好，从清初开始研究是不妥当的。

①《恽代英文集》下卷第923页。

这本书在研究和评价鸦片战争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上,有一些独到之处,也有一些不够妥当之处。在评价五四运动时,他指出:五四运动是“近年来革命运动的第一幕,值得我们注意”。<sup>①</sup>注意到了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地位,这是正确的,突破了资产阶级学者不重视五四运动的观点。恽代英参加了五卅运动,所以对五卅运动的研究分析是有深度的。谈到五卅运动的原因时,他指出,表面原因是日本纱厂的风潮和工部局的三条提案,而根本原因是四个:(1)“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为其根本原因之一”;(2)“革命宣传渐普及,亦是一种根本原因”;(3)“民众组织的发展,亦是五卅运动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4)“革命党的发展,更是五卅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五卅运动主动活动的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党的同志”。<sup>②</sup>谈到“五卅”运动的成果时,他强调:(1)“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智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已有八十多年,中国人受压迫惯了。”“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2)“使民众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商人亦渐知引他们的组织来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学联合组织,这种民众的力量影响政治方面的运动,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想站在民众方面得着民众的赞助。”“五卅运动后,民众已在政治上成功了一部分的力量了。”<sup>③</sup>恽代英对五卅运动原因、成果的分析,抓住了要害,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了实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他对于五卅以后反帝潮流高涨、民众力量大增的分析,当是实事求是的,不是主观臆断的。这是当事人在当时评论当时事,当时史,当然,这也是当时人理论知识的反映。

恽代英在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是有成就的,特别是在对于某些历史问题的分析上有独特的理论见解。从资料功夫来讲,“五卅”运动一讲中,资料比较多,提供、保存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因为他是当事人。其他部分的资料就没有五卅运动详尽。恽代英是作系列的讲座,每讲有时间的限制,自然也不可能广征博引。讲演的首要任务是把问题、理论讲清楚,是为了让听讲者有

①②③《恽代英文集》下卷第952、960-961、968-969页。

现实的启示,所以注重经验教训的总结较多,其他则比较简略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篇幅不大,资料不多,自然是讲演的形式决定的,这是应该得到谅解的。

## 2. 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

华岗(1903—1972),浙江龙游(现衢县)人。学名华延年。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活动的生涯。大革命时期,从事江浙等地方的团领导工作。1928年10月至1929年3月,在上海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29年12月至1932年3月,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长,开始从事党的领导工作。1932年9月,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特委书记,在赴任途中,因护送的交通员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与交通员一起在青岛被捕。至1937年10月,抗战开始后,由董必武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他才获释出狱。出狱后即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他任总编辑,10月,带领报社班子西迁重庆。因不满意当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的霸道作风,1939年秋,被王明撤销《新华日报》总编辑职务。1943年初至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并以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身份,在昆明从事统战工作。1945年10月回重庆,任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又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上海,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1947年3月,国民党封闭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遂撤往延安。1948年春,又被秘密派往香港做宣传、统战工作。1949年9月,应中央电召由港北上,因为交通和健康原因,暂留青岛养病。后即留山东工作,任山东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55年8月,被诬陷入狱。在狱中他一直坚持自己无罪,说:“我无罪可服,宁肯把牢底坐穿!”1972年5月17日含冤病逝。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为华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华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著名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他的近30万字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就出版了,1940年又完成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4年出版),1946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历史的翻案》,1949年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战史》、《五四运动史》、《中国近代史》(上册)。华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中国大革命史》。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以下简称《大革命史》),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开始搜集资料写作的。华岗在书的《自序》中说: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觉得大革命“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所以着手写了中国大革命史的大纲,同时开始搜集材料。即1927年底到1928年初,已着手搜集材料,编写大纲,开始写作。1928年5月,华岗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便把搜集的材料、稿子寄放在一个同志家中。然而1928年秋他回国后,这个同志已经被捕,材料、稿子“完全丧失”,不知下落。华岗并不因这个挫折而灰心,“企图完成这一任务的意思始终没有取消,所以便又重新着手搜集材料”。半年过去,收集到的材料还非常少,而且忙于实际工作,无暇写作。1929年秋,托陈取消派“不但不愿正确的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训,而且还想一手推翻历史的事实”。这时华岗觉得“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于是,鼓起了编写大革命史的勇气,开始动笔写作。虽然,因为工作繁忙,时写时辍,断断续续,但还是在1930年3月底脱稿。1930年冬至1931年初,又进行了修改。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公开出版。出版后受到欢迎,多次重印。30年代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华岗被诬陷入狱,此书长期没有重印。直到1980年华岗平反昭雪以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5月据1931年上海春耕书店的版本,订正了个别错字以后,重新出版。

### (一)史学思想

华岗是在参加中共六大以后写《大革命史》的。写作时,一方面是陈独秀组织了托陈取消派向党进攻,另一方面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形成、发展、终结,王明的“左”倾路线开始上台。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当然,这种总结和批判,是以当时中共中央的文件及精神作基础的。

第一,端正对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认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

《大革命史》首先设专章论述《中国大革命的特性与造因》,在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时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中国大革命的最主要特

性也就是半殖民地革命。这种半殖民地革命的客观任务：第一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取消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彻底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以统一中国；第二就是要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根本摧毁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第三，这一革命如果彻底胜利，应该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胜利，建立工农民权独裁政权，以准备转变到将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些任务在客观上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的阶段，因为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两件事都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且客观上正是扫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向前发展的条件。”<sup>①</sup>并反复论证和强调：“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前面，中国政治经济也并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超过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的阶段，已经进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显然是莫大的错误。”<sup>②</sup>华岗在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强调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不能放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不但不是对立而且还是相成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正在他不能了解这种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中国革命只有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内部阶级斗争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展扩大，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力争并取得革命领导权，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联合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起来作革命的斗争。”<sup>③</sup>这些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和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中共六大的精神的反映。

书中很多部分对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在北伐的过程中固然没有准备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在蒋介石叛迹已露，上海的三次暴动，还是采取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在武汉时期则不只是没有积极去领导土地革命的深入，而且跟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实际上也就是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咒骂工农运动‘过火’。不只是没有积极去武装工农，而且自动的解散工人纠察队，禁止湖南农民以暴动来反抗马日事变的屠杀和叛变革命的将军……”这一切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sup>④</sup>

<sup>①②③④</sup>《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5、7-9、50-51、35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书中对“八七”会议以后产生的“左”倾盲动主义也作了分析批判。指出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某些人误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继续高涨”、“一直高涨”，“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使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损失。指出：“盲动主义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不认识革命的转变，不承认革命的失败而发生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量，盲动主义的表现是脱离群众，不顾群众，而以少数的先锋作拼命的牺牲。党在这样盲动的策略之下，又受到了可怕的损失，如果继续的是这样发展下去，将不可避免的要使党走到灭亡的道路。所以盲动主义是与机会主义一样的可以损害党的生存的危險。”<sup>①</sup>这甲所批判的“左”倾盲动主义，实际上既包括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包括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但还没有批判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从《大革命史》的序中，可以看到华岗对王明路线有附和，说明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有局限性。

## 第二，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华岗在谈写作《大革命史》的目的时说：“中国大革命给予革命阶级与革命政党的教训也特别重要。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更须仔细研究过去在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这便是我在百忙中编著本书的主要用意。”<sup>②</sup>华岗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研究大革命史的重要任务。他在书中对大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比较全面的，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和土地革命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等的经验教训都作了专门的论述，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每一个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都进行了总结。在总结的经验教训中，华岗和蔡和森等人一样，很重视组织路线的教训，指出：“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也非常厉害。”“共产党中央完全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内完全被一种家长制度支配着，陈独秀便是施行这种家长制度的典型。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前，……根本没有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组织上另一个重要弱点，便是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生活，支部仅仅成了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很

<sup>①②</sup>《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369-370、4页。

少健全的党的生活，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健全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sup>①</sup>正因为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便造成了党内的机会主义不能及时克服，而且长时期里得不到克服。这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极大的教训。此外，华岗还谈到：“正确的政策，需要对于环境有正确的估计，这也是过去大革命教训中重要的一点，不能严格的冷静的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切实估计革命形势某一时期的特点，便不能提出切合实际生活的革命口号，定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策略与战术。”<sup>②</sup>这里提出的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正确认识国情的问題，已有要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意思，但表达还不明确，这方面还不如蔡和森。同时华岗在书中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政策是全盘肯定的，还未能认识到国际路线也有一个与中国实际合不合的问题。他的政治理论水平比起蔡和森来是略逊一筹的。蔡和森已明确提出了马列主义理论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要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政策。华岗最后提出：“我们应该认真的精密的学习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从过去大革命的血泊中找出真正的革命道路，得出许多斗争的实际结论，这些经验与教训乃是我们往后取得胜利的起点。”“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应该便是将来中国‘十月’之预演”。<sup>③</sup>他希望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吸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希望他们能从《大革命史》中得到这方面的启迪。

《大革命史》出版不久，1932年五卷一期《布尔塞维克》发表了范亢《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一文，对《大革命史》进行了全盘否定的批判。认为《大革命史》“几十次证明中国革命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这完全“陷落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说华岗没有系统批评机会主义，“犯了腐化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甚至偷运机会主义的私货”。还说《大革命史》是用“庸俗的新闻记者的笔调”写的，“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史’”。<sup>④</sup>范亢，是瞿秋白的化名。瞿秋白对《大革命史》的如此批判，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没有系统批判机会主义，就是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基本上是王明路线的言论。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的：“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中央怎样说，

①②③《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353、376页。

④《布尔什维克》第五卷一期第143-169页，1932年7月出版。

我就依着怎样说。”<sup>①</sup>瞿秋白似乎是站在王明路线的立场上来批判《大革命史》。《大革命史》虽有附和王明路线的地方,但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批判,与王明路线并不合拍,所以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党刊上受到批判,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革命史》的思想性。

《大革命史》的史学成就也应该肯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规模巨大,体系较完整的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专著之一。也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专著。华岗是大革命的过来人,而且经过了两三年的研究,才写成此书。他不是因为讲演的需要研究大革命史的,他摆脱了讲演的时间限制、篇幅限制,让思想和研究充分展开,从而形成了较大的规模、较完整的体系,比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大大前进了一步,使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大革命史》的主要史学成就有:

#### (1) 用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建立了大革命史研究体系

华岗写作《大革命史》是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的。这从他《自序》中所说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华岗用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研究大革命史,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恰当地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分析和说明历史问题。如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就引用了列宁“一切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运动”。<sup>②</sup>在论述帝国主义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侵略,论述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时,都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谈到工人阶级的任务时,就引用《共产党宣言》中“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sup>③</sup>在论述义和团运动时,引用了列宁《中国之战争》中所说的“中国人所仇恨的乃是欧洲的资本家和代表欧洲资本家的政府”。<sup>④</sup>又引用了恩格斯“凡属群众的运动,起初必然是混沌的……”<sup>⑤</sup>在论述国共两党的关系时,引用了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演说》,说明中共应该与国民党的倒退进行坚决的斗争。<sup>⑥</sup>华岗这样来分析中国的历史问题并不是“贴标签”,而是恰当地给予历史问题以理论的分析、理论的提炼,反映了华岗的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在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史研究初创时期,以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史研究,往往难免要引用一些马列主义经典,尽管会多少反映出一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第70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③④⑤⑥《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6、49、61、63、311页。

些教条主义的风气,但这对于创立马列主义的革命史研究体系是需要的,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地方,华岗并没有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分析问题,但也充满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如论述“中国大革命中的各社会阶级”时,指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一方面“参加民族革命,同时又时时选择机会以便掉转头来限制束缚以至于破坏工农运动”;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力量”,但它会动摇,“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坚定的政策,小资产阶级就更容易跟着资产阶级走”;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但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便不能看见自己的真正出路——实行土地革命;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是“主力军”,是领导阶级。<sup>①</sup>这些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论述,显然都是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作指导,并且吸收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华岗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大革命史研究的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建立起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体系。他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完全改变了资产阶级学者只叙述大革命经过的做法,而注意了大革命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准备阶段、经验教训等各个纵横方面的研究,对大革命史从历史现象的真相到历史本质的真相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严谨的研究体系。华岗的大革命史研究体系可以从《大革命史》的章节安排中清楚地体现出来:

#### 第一章 绪言(谈大革命史研究的目的、意义)

#### 第二章 中国大革命的性质与成因

##### 第一节 中国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 第二节 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论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性质、阶级矛盾、革命性质、任务的变化)

这一章的设立,就把中国大革命史放到了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背景中进行研究了。

#### 第三章 中国大革命的预演

##### 第一节 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暴动

##### 第二节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 第三节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sup>①</sup>《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268-292页。

#### 第四节 香港海员罢工与二七流血

#### 第五节 国民党改组与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 第六节 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这一章的设立就把大革命史放到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和背景中进行研究。当然把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作为大革命的“预演”，是否妥当，这值得商讨，但把这些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作为大革命的历史基础来研究，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 第四章 中国大革命的经过

#### 第一节 “五卅”运动开辟了中国大革命高潮

#### 第二节 由五卅事变到北京惨杀

#### 第三节 三月二十号事变与广东北伐

#### 第四节 由广东北伐到汉口九江租界之夺取

#### 第五节 上海三次暴动与蒋介石叛变

#### 第六节 土地革命与武汉反动时期

#### 第七节 八一南昌革命与秋收农民暴动

#### 第八节 广州暴动

这一章论述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对大革命运动中的各个重要事件及其相互联系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 第五章 中国大革命中的各社会阶级

这一章开始对大革命进行总结，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大革命中的表现、作用进行研究分析，进一步阐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 第六章 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的估计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与参加革命政府问题

#### 第六节 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武装问题

#### 第七节 党的生活与对国际的关系问题

#### 第八节 反机会主义斗争与盲动主义

这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各个方面的工作及路线方针政策进行

了全面的总结,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 第七章 结论

这一章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经验教训、意义等进行了全面总结。

从全书的章节安排可以看到,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体系是相当完整、严谨的,而且也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特别是第五、六、七章的设立,更体现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政党理论、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指导,从而使大革命历史的研究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度,更清晰更全面地反映大革命历史的本质真相,反映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大革命史》不仅总体结构严谨、科学,对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研究的个别体系的结构也很严谨。如论述五卅运动,就先论述五卅运动前的形势、背景,如《五卅前夜的罢工浪潮》、《五卅准备时期中国农民运动发展的形势》等小节就是探讨五卅运动的背景、形势的。然后论述五卅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对各地的影响,最后论述“五卅事变的历史意义”。

华岗建立了一个严谨的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体系,这和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分不开,也和他是大革命的当事人有关。正是基于感性经验和理性提炼的交构,才创造了这样一个规模宏伟、结构严谨的体系。

#### (2) 搜集、研究、保存了大量的资料

为了写作《大革命史》,华岗1927年底就开始收集资料,遗失后,1928年秋又重新开始搜集。大概第二次搜集到的资料已不如第一次多了,所以他在《自序》中说:“只是‘利用我仅有的一些材料和我自己参加实际运动的回忆’进行写作,并且声明:‘各种参考书籍杂志刊物等,则因生活流动的关系,大都东遗西散,所以引用参考时不能一一注明其出处。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并非有意剽窃,合并声明。’”尽管如此,由于他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开始搜集资料,所以,在今天看来,他还是占有了不少珍贵的材料。同时,他自己亲历亲见的事,自然也是十分宝贵的材料。所以,《大革命史》资料翔实,既在扎实的资料研究基础上建设了严谨的研究体系,也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供后来者享用。毛泽东曾称赞《大革命史》:“这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sup>①</sup>,诚不虚言。

<sup>①</sup>谈滨若《华岗传略》。《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第98页。也有人认为《大革命史》有严重的抄袭,详见王学勤《读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之我见》,载《革命春秋》1990年第3期。



《大革命史》研究引用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资料都有研究、引用。其中引用的正面资料有：在论述国民会议运动时，引用了1924年中共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的最低限度要求的十三条全文。在论述五卅运动时，引用了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先决条件、正式条件全文。在论述省港罢工结束后上海罢工发展的情况时，引用了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的罢工命令全文和内外棉厂罢工时提出的五项条件全文。在论述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时，引用了上海总工会号召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全文。在论述秋收起义时，引用了1927年9月30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6期刊载的湖南报告。在论述广州起义时，引用了张太雷写的《广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载1927年10月3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杨殷《斗争中的回忆》（载《红旗》报第3期，1928年12月4日出版）。在论述国共合作问题时，引用了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为了说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引用了1927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的主要内容。为了说明陈独秀等人对于中国革命前途、性质的错误估计，引用了中共二大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为了说明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于武装斗争的忽视，引用了俄国同志写的《武装暴动》小册子、中共“八七”紧急会议告同志书。为了说明中共对土地革命的认识等，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在论述中共对于武汉政府、马日事变、土地革命等态度时，还引用了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其中有：在论述中国工业的发展时，引用了中国对外贸易入超减少资料、进口机械增长资料、《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年华商棉织工厂发展表》、《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五年中地毯输出比较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九年商办工业发展比较表》。在论述中国农民的贫困时，引用了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的《中国年鉴》刊载的1914年至1918年中国农村荒地增加表、1912年至1925年粮食进出口情形表。在论述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时，引用了《中国劳动年鉴》1912年至1920年中国工厂、工人情况表、《机械工厂劳动者人数表》、《普通劳动者人数表》。论述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发展，引用了《申报》馆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记载的“劳动潮流”。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情况，引用了1894年至1898年清政府借外债

表。关于五卅运动以后的工人罢工情况,引用了《向导》周报发表的1926年1月1日至4月1日的上海罢工统计表、《总统计表》、《罢工企业与厂数》、《罢工时间》、《罢工条件分析》、《罢工胜利条件》、《罢工失败条件》诸表及上海总工会所属工会、会员数表。关于省港罢工以后上海罢工情况,引用了《向导》周报的《总统计表》、《罢工企业类别与总数》、《罢工原因分析》、《罢工胜利条件》、《罢工条件分析》、《罢工时间分析》诸表及1926年8月《上海罢工统计表》……

书中引用的其他书刊资料有: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利用传教侵略中国,引用了《清朝全史》第四册中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利用传教侵略中国的事实。在论述四川保路运动时,引用了一个参加保路运动的文学家写的回忆资料。在论述辛亥革命时,引用了武昌军政府对外发布的一通照会全文。为了说明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面貌大为改变,引用了《中国六十年大事记》的记载。论述孙中山组织讨伐商团的经过,引用了香港《循环日报》的报道。论述五卅运动时,引用了唐海《中国劳动问题》的资料、《申报》的报道等。论述“三二〇”事件时,引用了上海新闻报通信。论述北伐时,引用了《民国日报》的报道。论述万县惨案,引用了上海《时事新报》的报道。论述汉口“一·三”惨案,也引用了上海《时事新报》的报道……

书中引用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有:为了说明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引用了张继等的护党宣言及当时张继等人所办的《护党特刊》、《民权旬刊》等的言论。论述“三二〇”事件时,引用了蒋介石当时给军事委员会的呈文。为了说明国民党反对土地革命,引用了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13期刊载的刘芦隐的《革命与反革命》……

书中引用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料有:在论述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时,引用了英国牧师 Hswith 所著《China in Convulsion》中的资料,在论述义和团运动时,也引用了此书资料。在论述义和团运动时,还多处引用了瓦德西《拳乱笔记》中的资料。在论述香港海员罢工时,引用了 Elinor Burns 《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及1922年香港殖民地报告。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引用了《字林西报》的言论。为了说明万县惨案情况,引用了京津《太晤士报》的论述。论述汉口事件时,引用了《字林西报》的社论。论述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引用了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报纸《大陆报》、《太晤士报》及《字林西报》等的言论,为了说明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引用了美国《NATION》周报的言论……

这些正反各个方面的资料的引用、研究,显然为历史事件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这一步华岗已努力做到了,成为他之所以在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取得很大成功的原因。华岗的大革命史研究,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注意资料性研究建设的中国革命史研究道路。同时,因为他在资料方面的努力工作,为以后的大革命史研究者研究大革命史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战争环境中搜集资料相当困难,华岗的《大革命史》,不仅为无产阶级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部专著,同时也提供了一部资料集(当然不能和今天的资料集相比)。如张闻天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有些资料就和《大革命史》的资料是相同的,当是张闻天借用了《大革命史》中的资料。可以想见,能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搜集到的资料,在30年代、40年代就不一定搜集得到,在30年代、40年代研究大革命史采用《大革命史》中的资料,是不奇怪的。

### (3) 这是一部很好的中国革命史著作

《大革命史》既是一部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专著,也是一部很好的中国革命史专著,因为它不仅仅是论述了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史,实际上也论述了鸦片战争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史,并对鸦片战争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评价。

《大革命史》的第二章有《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回溯》、《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等几小节,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侵略的扩张和争夺中国殖民地的历史;论述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的历史;论述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也论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等。华岗在论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之后指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宰割了美非澳诸洲及亚洲西部和中部后,中国便成了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最肥壮的对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侵略其他殖民地一样,首先就是挟着商品来找市场,……于是接着而来的便是武装炮舰的袭击,造成历次侵略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等,结果强迫中国开放商埠,打破了中国封建的国有贸易,于是帝国主义商品如潮涌进……文化侵略相继而来,中国也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国际的殖民地’。”<sup>①</sup>这是从理论上的高度

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9-10页。

概括,指出了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指出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战争的性质。关于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矛头必然指向中国的分析,已比恽代英研究鸦片战争前进了一步。华岗对历次战争还作了具体的分析研究,并且注意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质的变化。他指出:“中日战争以后,正是十九世纪末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极盛时期。”<sup>①</sup>并谈到:“辛丑条约之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进到更高的形式,已经由争夺市场、搜刮原料更进而向中国移殖资本。”华岗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发展,这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中是一个进步,也比恽代英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当然华岗还没有明确指出中日战争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也还没有注意到《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华开设工厂成为帝国主义输入资本的起点。《大革命史》在论述辛亥革命时指出:“辛亥革命的主要基础原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开始,就表现出他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并没有提出资产阶级的鲜明革命的政纲,并且根本没有认清革命的主要对象,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只有简单的‘排满’,不但不敢反抗那站在满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反而满口尊重外人在华条件权利,……不但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的辛亥革命不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反示好于帝国主义,而且当时的革命首领亦完全与袁世凯妥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只造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共和国”。“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封建势力乃是辛亥革命的客观任务,可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sup>②</sup>这里清楚地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从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妥协性,来说明他们没有提出彻底革命纲领,没有完成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强调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这个分析是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深度的,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样的分析也比恽代英有理论深度。

《大革命史》设专节论述了五四运动。他指出:“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进于实际运动,开辟了中国的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它的社会势力”,五四

①②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12、67~68页。

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跃登历史舞台”。<sup>①</sup>这些高度概括的理论分析，把五四运动的背景、基础、意义、历史地位都一一说明了，指出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对当时历史的本质的概括和说明，是十分精辟的。这个概括是华岗的创造，是对无产阶级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一个贡献。蔡和森指出五四运动是“新阶段的革命运动”，李立三指出了五四运动中工人表现了力量，华岗的这个提法达到了很高水平。

《大革命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分析评价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认为：“香港海员罢工可以算得中国工人运动有史以来第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二七斗争毕竟是中国工人阶级由日常斗争到政治斗争的空前伟大的运动”，“是开辟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先声”。谈到五卅运动时，他指出：“五卅运动不仅是上海无产阶级的发动，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动。”“五卅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客观上已经在争取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拿阶级斗争去领导国民革命，没有这种领导，中国革命运动是不能如此蓬勃发展的”。<sup>②</sup>“五卅运动开辟了中国大革命高潮”。<sup>③</sup>以上对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状况及历史地位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且抓住了要害。

《大革命史》在论述南昌起义时指出：“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这一军事行动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同时领导者也有错误，如：“一、没有明显的革命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系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等。<sup>④</sup>可见对南昌起义的评价实事求是、一分为二。

《大革命史》对广州起义也进行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指出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敌人力量强大，另一方面“广州暴动之社会基础还没有十分的广大”，“工农行动联系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同时又指出：“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还有如下的政治结果及其历史意义是不能磨灭的：第一，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

①②③④《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67-68、71、133-134、99、237页。

洲。”“第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第三，广州暴动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结为亲密的革命联盟。”第四，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中国革命的惟一领袖。“第五，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特别是所谓‘左派’的国民党，经过广州暴动之后，他们的丑态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六，“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之一幕”。<sup>①</sup>这些分析是很深入全面的。

《大革命史》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行径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批判。指出，“三二〇”事件开始，“中国资产阶级便开始反动了”<sup>②</sup>。

“四一二”事件是蒋介石的“叛变”，并揭露了蒋介石等大规模屠杀工人群众的事实，“一时尸横满街，堆积如山，适大雨如注，满街道竟成血河，死伤数目无从统计。据目击者言，事后尸首系用搬场汽车搬出葬埋，所装竟有七八车之多，蒋介石、白崇禧等刽子手手段之残暴，可谓无以伦比了！”<sup>③</sup>“汪精卫、唐生智等事实上已和蒋介石一样走入反革命营垒。”

“他们接着便是大肆逮捕与杀戮，且有‘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之豪语。”<sup>④</sup>这些揭露和批判，不仅表达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也披露了历史的真相。因为那些国民党学者的《中国革命史》，都掩盖了蒋介石之流的残暴罪行，甚至把反革命叛变、反革命屠杀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分共”，并且颠倒黑白说因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国民党被迫“分共”。华岗的《大革命史》对于澄清大革命历史的真相，批驳国民党的造谣中伤，是有极大的革命作用的。《大革命史》能在30年代初公开出版，实在是投向蒋介石新军阀政府的匕首。

《大革命史》是一部无产阶级的优秀的中国革命史著作。它之所以比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表现在理论的分析、提炼方面，这不只是研究者个人素质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共六大以后、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水平、研究水平的反映。此外，华岗的研究和恽代英的研究还有一个区别，即华岗着重于理论研究，而恽代英着重于通俗宣传。恽代英是给普通的干部、群众讲演，重视深入浅出，浅显易懂，所以资料不多，理论色彩也不浓。华岗以理论研究为己任，且研究历时数年，所以资料丰富，理论色彩浓厚。彼此的研究任务有所不同，成果的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

①②③④《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259-265、156、228、235页。

同,亦是自然的事。《大革命史》对以后的中共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是有影响的,不少中国革命史书中可以看到它的体系及观点的影子。

### 3.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川沙县)人。在中共党内长期化名洛甫。1919年,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求学时,参加了五四运动,8月发表《社会问题》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12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7月赴日本留学。1921年1月,由日返沪,8月任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编辑,开始译介外国文学,创作新文学作品。1922年8月,赴美国勤工俭学,至1924年1月回国。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28年9月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在苏联学习的五年期间,使他成为党内的马列主义理论家。1931年2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9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之一。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问题上,他和博古等人发生了公开的争执,开始和“左”倾路线发生分歧。红军长征以后,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支持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实现了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在遵义会议上,他代替博古担任了中共领导人。1935年12月,他主持了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起草了决议,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不再是党的负责人,而以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从事东北地方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7月至8月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系统发言,诚恳批评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遭到了错误的批判,被撤消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1960年11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监护审查。但他始终不屈不挠,为马列主义的真理而斗争。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无锡监护之

所。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为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大会,肯定了张闻天是中共党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中共党内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下简称《现代革命史》),长期以来因为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sup>①</sup>很少有人知道是张闻天写的。1986年12月6日,当年任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说明了《现代革命史》是“张闻天同志主持编写的,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sup>②</sup>从此,这本书才被认定是张闻天的研究成果。这可以说是张闻天写作《现代革命史》的“人证”。而张闻天写作此书的一个有力的“物证”,便是他写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1933年,张闻天在江西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此书1934年正式出版。1936年,张闻天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又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一书实际上奠定了《现代革命史》的理论和资料基础。把两书对校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第一讲《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讲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实是《现代革命史》的前半部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第二讲《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实为《现代革命史》后半部分。两书的很多观点、资料都是相同的。说明《现代革命史》是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完全是张闻天的研究体系、理论观点的反映。

《现代革命史》,1936年已有油印本问世。1937年冬,延安解放社出了第一个铅印本。因为,1937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已开设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课程,印行首先是为了解决课本的需要。现在找到的较早的本子是署“全国各大书局”发行的1937年12月出版的本子。然这个本子提到:南京失陷后,陈群在南京傀儡政府中当伪内务部长。日寇占领南京是1937年12月13日。陈群当伪内务部长在1938年3月。既然提到了1938年的事,那么,这个本子应该在1938年上半年以后才出版。1938年,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还讲了《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反动时期》、《苏维埃革命运动》等,但这些内容没有补入《现代革命史》,《现代革命史》只从鸦片战争讲到1927年广州起

①有的版本不署编者。

②《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4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义。1946年,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时,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内容略有删改,但未作补充,仍是从鸦片战争写到广州起义。1938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版和1946年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版,是《现代革命史》的两个主要版本,反映了两个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对书的不同要求,决定了书的文字和内容的变化。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1938年版本为底本,并以解放战争时期版本相校,重新出版了《现代革命史》。新版删去了原书第二讲中《中国藩篱的丧失》一节,附录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第一讲及莫文骅《〈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等文。

《现代革命史》成书出版于1936年至1938年上半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张闻天主持着中共中央工作,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之一。1936年8月25日,中共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内战”,重建两党合作关系,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当前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放弃了“反蒋抗日”口号。9月17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发布,进一步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逼蒋抗日”的基本方针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形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教训。张闻天是政策制定者之一,自然也会有的放矢地拿起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武器,为宣传中共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此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共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面临党内的右倾路线、倾向的挑战,同时还面临党外中国托派的猖狂攻击。托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污蔑攻击。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1937年2月21日通过了《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案(载《斗争报》第3卷2期)说: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

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促进了蒋介石死党们的法西斯运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站在彻底的阶级立场上”，“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对于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挑衅、攻击，张闻天在政治上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闻天在1937年8月9日《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就强调：“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sup>①</sup>1938年2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继续抗战和国共关系》的讲话，再次强调：“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有些人一看到与国民党发生磨擦，就觉得恐怕马上要分裂了；一看到与国民党关系好一些，就认为没有问题了。这些都是错误的。”<sup>②</sup>这表明，在当时，宣传中共正确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各种谬论、攻击，是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张闻天不仅在政治上担负起和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同时也在史学战线上，在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努力担负起和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弄清以上的背景，我们再打开《现代革命史》看，就不会为书中强烈的统战气息感到奇怪，不会觉得书中的“观点陈旧”，而会由衷地钦佩，这不愧是一部宣传中共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杰出的中国革命史著作。会明白，书的主题思想在宣传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是十分必要、完全正确的。

### （一）史学思想

此书史学思想主要是宣传中共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种宣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成功

书中反复论述了中国的国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封建经济是基础，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所以革命面对的封建势力、封建统治阶级是十分强大的。此外，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不是一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而是众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革命面对的帝国主义也是十分强大的。要完成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不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不行

①②《张闻天选集》第154、15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的。《现代革命史》在论述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推翻满清政府的原因时指出：“就是因为当时有最广泛的反满民族统一战线，革命所联合的阶级范围及革命直接间接的后备军，都很广泛。”<sup>①</sup>而辛亥革命所以失败，“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为当时革命统一战线的分裂”。

而论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则指出失败的教训是：“‘二七’事变在另一方面又教训了中国无产者：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取得其他阶级首先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无产者的孤军独战是没有最后胜利的把握的。”“因此‘二七’事变后，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更严重的将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第一位，而形成了以后的‘国共合作’。”<sup>②</sup>这也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了统一战线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的结论，指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重要的方针政策。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的大革命，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了重点的论述，并且写了《大革命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训》一节，强调了必须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来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张闻天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国国民革命要战胜自己强大的敌人——民族的敌人，必须善于最广大地集中民族的力量和最广大地动员民族的力量。……国共的合作，造成了大革命胜利的发展，这是不可争辩的；而国共合作的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这又是不可争辩的。今日残酷地进行灭亡我民族的日寇，就是当年最积极地阴谋分裂国共合作的（这本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公开承认的）。不幸，当权政党的当时一些人物缺乏政治的远见，竟中了敌人的阴谋，实行分裂政策，没有那一度的分裂，决不会有大革命失败，没有大革命失败，日寇是不敢那末轻易进行‘九一八’的强盗行动的。创巨痛深，这是需要当年有关的人物深长反省的。”<sup>③</sup>这里在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外，又强调了分裂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一贯政策、阴谋，希望国民党不要再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不要再在统一战线内部搞磨擦、分裂，而要坚持合作，坚持改善工农生活，这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希望他们吸取历史教训。同时，张闻天对孙中山开创的以联俄、联

①②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06、164、347~348页。

共、扶助农工为政策，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斗争指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不朽的伟业”。所以作为“中山先生最忠实的革命信徒以及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决为中山先生的革命精华而奋斗到底，求其贯彻”。<sup>①</sup>即继续贯彻实行孙中山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新时期的国共合作健康发展。

**(2) 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既有利于中国革命，也有利于国共双方，反之，既不利于中国革命，也不利于国共双方**

张闻天在书中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首先肯定了“国共合作后，中国革命运动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肯定了中国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和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分不开的。然后强调，由于国共合作的发展，同时使国共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在北伐胜利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大大的扩大了。中国国民党从北伐开始时的五十万党员增加到五百万党员左右，中国共产党员亦由五万人扩大到五十万人左右(案：这个数字有误)，而急进的势力也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加强起来。革命政党的扩大与组织的巩固，也就是革命运动领导的加强，因而在革命政党领导加强的推动下，革命运动更是一日千里的向前开展起来。”所以，“国共合作是互利，历史正是这样做了的，而这种互利，正是有利于中国革命，有利于中国民族。反之，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派正是反对国共合作，而又反对国共互利的，帝国主义者所阴谋的，不仅在加害于共产党，而也正是在加害于国民党，同时也就是在加害于中国民族。”<sup>②</sup>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国共合作遭到破坏后，给中国的大革命、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同时也给国共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张闻天指出：“国共的分裂，首先是我们民族的受害，这是无疑的。同时，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及社会中最纯洁最精明能干，敢作敢为的分子，固然遭受非常不幸，然而这不能看为一党一派的不幸，而同样地是全民族的不幸，因为那死者受难者，都是民族的精华，民族灵魂的寄托者，是费了民族许多力量，才培养出来的。再则，分裂以后受害的也决不只是共产党，同样地是国民党。国民党是由于国共合作壮大起来的，因为国共合作，国民党力量才大大发展起来。十年中国国民党虽则是统治的政党，但我们可以说：国

①②《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83、259-260页。

民党组织的发展不但没有超过大革命国共合作的时代，而且反要减少得多，这正是因为国民党因国共分裂而和群众失掉了联系，同时，一切腐化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甚至有些卖国贼，都乘机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名义以营私误国，进行剥夺国民党的革命生命，甚至许多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竟连国民党的组织都没有，或者简直不要国民党的组织，这都是在国共分裂以后才有的现象的。”<sup>①</sup>张闻天强调国共合作是互利，国共分裂是互害，既是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是提醒国民党人要深刻反省，告诫国民党人再也不要干于国于己都不利的蠢事了。这在实际上就是强调了巩固和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中国革命，也有利于国共双方，有利于国民党的声望提高和组织发展。

### (3) 批判否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种种谬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张闻天称之为“尾巴主义”)，也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思想(张闻天称之为“关门主义”)。张闻天清算了右倾投降主义，也对拒绝国共合作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张闻天引用中共四大的决议案，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观点是“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不了解无产者应怎样在广泛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去争取革命的同盟者”<sup>②</sup>。有“左”倾观点的人认为实行国共合作是违背马列主义、放弃马列主义，张闻天批驳了这种观点，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相当条件之下和相当时期内，可以参加在一般的革命民主党内或革命的民主政府内，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这在历史上，本来是有先例的。马克思自己及其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中，就曾参加过莱茵省资产阶级民主同盟会。而列宁在共产国际二次大会上更这样演讲过：‘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因此，在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奋斗时，在共同的目标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容许的。”<sup>③</sup>这就在理论上肯定了实行国共合作

①②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350-351、195、189-190页。

是符合马列主义的，粉碎了从理论上对国共合作的攻击。

大革命失败以后，有人便借口大革命的失败，否定当时的国共合作，对这种错误观点，张闻天也在书中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忽视了中国国情，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即有参加革命的一面，也有背叛革命的一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帝斗争的时候，是有革命性的，是应该与之联合的。托洛茨基的对国共合作的攻击是完全错误的。张闻天一针见血地说：只有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才反对国共合作，“托洛茨基派的所以反对国共合作、破坏国共合作，除了说明他们是为帝国主义者效忠而外，不能找得其他的说明”<sup>①</sup>。

在批判共产党内机会主义及托派的错误理论观点的同时，张闻天对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错误思想观点也进行了分析批判。他指出：“在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和实行国共合作的时候，曾有一部分国民党温和派，对于这问题有怀疑或不满，在国共合作后，这种情形还是存在。”“温和派对于中国共产党有很大的不正确的误解，比如所称：‘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意打破国民党与国民党各实力派（指当时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这种见解，在后来证明完全是无根据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不但不是要消灭国民党，而且恰是帮助国民党的革命新生及其力量的发展。”<sup>②</sup>批判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出现在国民党内的错误思想观点，其用意也是很显然的，即旨在批判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内的反对国共合作的种种错误思想；希望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持有不正确看法的人，以历史为鉴，端正思想态度，以便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 （4）统一战线要由先进阶级领导

张闻天在书中总结了整个“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说明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他在论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农民战争要取得胜利，要在资产阶级（如在俄国）领导下才有可能。农民要取得彻底解放，则唯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达到。”<sup>③</sup>这里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过去”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如法国革命；现在无

①②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282、196~197、43页。

产阶级时代,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如俄国革命。

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时,张闻天更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张闻天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发展,工人运动高涨起来,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在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这次运动“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以“领导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二七罢工是中国无产者在中国革命中树立指导问题的开始”,它“在中国民众面前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指导中国革命的能力,这种指导能力可使中国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可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宰割下,封建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sup>①</sup>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从“二七”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力量不如资产阶级“雄厚”,所以革命不应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而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张闻天的这个分析,就是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批判。张闻天指出,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的“骨干与主力军”作用进一步显示出来。“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五卅运动的过程中是运动的组织者,而且表现了自己的伟大指导能力。”“工人们站在运动的最前线,成为反帝的先锋队,正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的充分表现;而各城市工商学联合会,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统一战线在群众中的实现。如果当时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对运动的坚持与正确的领导,五卅运动的这种广泛的深入的开展是不可能的。”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仍对此“不加以深刻注意”,在放弃领导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sup>②</sup>以至“把机会主义发挥到登峰造极,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可痛心和可耻的失败”。

张闻天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引用中共六大决议指出,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底最高表现。”<sup>③</sup>尽管由于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一部分原因,使大革命失败了,但这并不表明无产阶

①②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64-165、231-232、346-347页。

级没有领导能力，张闻天强调：“大革命中充分的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说明了无产者是革命最坚决和彻底的领导者。”<sup>①</sup>同时，大革命的历史进一步证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参加革命的一面，也有“离开革命”，“与革命为敌”的一面，所以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做中国革命的领导的。在历史事实和理论相结合的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张闻天严肃地而又心平气和地规劝国民党人士，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不要意气用事，应该服从革命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他说：“革命需要领导，而这种领导的必要，是为了能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发展。那一个政党能在政治上进行这样的保障的，就可以保障其在革命中的领导。可惜的，这点没有被当年缺乏政治远见的人所认识。当年关于领导权的争取，事实上，就是关于国民革命前途的争取。这种争取，当然是不能免的，在革命方面说，还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争取在革命统一战线的营垒中，应当采取和平的、政治的方式，应当归之民众的政治的公决；而一切合作的政党要珍重自己的革命生命，珍重民族的前途，就要尊重民意的公决，而不应对于民族统一阵线进行武力的分裂，更绝不应该反戈来屠杀革命党员和工农大众。”<sup>②</sup>这里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希望要革命的、有政治远见的国民党人，应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为镜子，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要识大体顾大局，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领导权的问题“归之民众的政治公决”，而不要用“武力分裂”、“屠杀”政策来解决领导权问题。

张闻天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述，是有广度和深度的。这些论述体现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原则和立场，对当时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是一种有力的批判，对当时国民党中的一些错误思想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 (5) 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张闻天在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性，必须和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而决不能放弃斗争，做国民党的尾巴。同时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独立性、放弃斗争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批判。张闻天指出，当时共产国

①②《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338、351页。



际有关中共必须保持独立性的指示是正确的。书中多处引用了这方面的指示。张闻天分析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为着避免革命的分裂，革命的让步有时也为不得已的必需，但这里同时又必需顾及避免革命力量的削弱；但当时机会主义者是不能理解这种革命的原则的，结果在事实上就造成了许多错误，而其后的进一步发展，就影响到后来中共领导机关以后机会主义的路线之形成。”<sup>①</sup>张闻天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与其联合的时候，必须与其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的一面进行坚决的斗争，否则就不能维持革命的统一战线。而陈独秀所执行的恰是相反，他们“对于同盟者的关系，不是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不是批评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或紧急关头的动摇，不是准备防范同盟者走上不幸的道路，准备孤立变节者，而是随同盟者的尾巴，机会主义者没有独立的政策，而是根据同盟者的喜怒为转移”。<sup>②</sup>“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底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sup>③</sup>

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张闻天又进一步指出：“大革命时，国共合作虽然规定了合作的斗争纲领，但还缺乏为纲领斗争的坚持性，没有根据纲领来更进而互相劝勉，互相督促，以求实行，来批评同盟者的动摇妥协的倾向与行为。”“这一错误教训我们：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联合，也就是说统一战线的建立，要在一定纲领上形成起来，绝不是私人间的勾结，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将这一纲领在国民中作深入的广泛的宣传，并动员国民为实现纲领而斗争，而共产党就必须成为执行这一纲领的模范与先锋，帮助同盟者对于纲领的实施，如果同盟者对于这一纲领的每一违背行为或动摇的倾向，都应给以善意的规劝，都要在群众中给予善意的批评，以国民的力量来求得纲领的彻底实现。”<sup>④</sup>强调了，不仅共产党要实现革命纲领而斗争，而且要向群众作宣传，动员群众起来为实现革命纲领而斗争，只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而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要战胜“同盟者”的动摇妥协是不可能的。大革命中没有战胜资产阶级的动摇，一方面是共产党的领导层本身就动摇，另一方面共产党内执行正确路线的人也没有向广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作宣传，动员群众起来与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与资产阶级的动摇作斗争。张闻天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是对大革命教训的

①②③④《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247、310~311、346、352-353页。

科学的提炼,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与投降、倒退、分裂的行为作斗争,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最有效的方法。张闻天强调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是对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也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的新的机会主义思想的批判。

## (二)史学成就

《现代革命史》,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第一部有完整体系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专著,而且是第一本有完整体系、有理论深度、资料丰富的专业教材。恽代英的《民族革命运动史》,体系不够完整,理论深度、资料均欠缺。华岗的《大革命史》,又偏重于大革命,还不是完整的中国革命史。《现代革命史》,既是理论研究的成果,又采取教材的形式;专著和教材合一,广度和深度并举,是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巨大进步。《现代革命史》的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主要有:

### (1)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史

张闻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比恽代英、华岗有更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他不仅自觉性强,而且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现代革命史》一方面引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文对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粗略统计一下,约引用马克思语录3条,恩格斯语录4条,列宁语录13条,斯大林语录10余条),另一方面更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分析问题。

第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说明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社会的发展。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张闻天正是按照这一原理具体论述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产生、发展。

打开《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目录,便能清楚地看到:张闻天在论述每一次运动时,总是先分析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探讨运动产生的本质原因和发展规律。

在《辛亥革命》一讲中,第一节写《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二节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着重说明了《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者所操纵,

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的基本原因也就在此”。“同时满清的封建统治与对帝国主义的屈服,实际是帮助帝国主义来绞杀中国幼稚的工业。这说明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经发生冲突,生产力向前发展,非打破旧有的生产关系不可。这一冲突反映到政治斗争上来就是帝国主义、满清政府极力要求现状的维持,旧有生产关系的保证,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人、资产阶级、华侨资本家、知识分子、新官僚、农民、手工业者则要求打破现状、打破阻碍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旧有生产关系,也就是要求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与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开辟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就展开了辛亥革命。”<sup>①</sup>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斗争原理出发给了辛亥革命本质的说明,既肯定了辛亥革命最深刻的经济原因,也肯定了其历史必然性和革命性质,完全超越了满汉矛盾说、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说,给辛亥革命以科学解说。如此鲜明地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斗争的原理来论述辛亥革命,这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还是首次。

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时,先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一节,再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指出:“跟随中国无产阶级之产生、壮大与觉悟程度之提高,中国共产党也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由于: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开办了许多企业,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相当发展,产生了中国强有力的(虽然数量不大)无产阶级。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在日常的斗争中,特别在参加五四运动的斗争中,不仅表现了中国工人力量的伟大,而且提高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而感觉到组织自己政党的必要。第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与共产国际创立后,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推动着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sup>②</sup>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放到了经济的阶级的原因及历史发展规律中来论述。然后又进一步指出:“在五四运动中,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参加战斗,因为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一部分急进的知识分子已逐渐的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新青年》一步一步地变成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杂志,……这些刊物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散播,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上的准备。不但如此,而且有些急进知识分子于五四运动后已在上海开始在工人中工作,建立工会,……在同一时

<sup>①②</sup>《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83-85、140~141页。

期,北方工人中社会主义者帮助工人十人团的工作,设立劳动补助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在阶级基础上的准备工作。”<sup>①</sup>既注意了党的阶级基础,也注意了党的思想基础、干部基础的研究分析。张闻天从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历史发展规律着手,对中共产生的基础进行各个方面的论述,这种专题式的、集中型的全面论述,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也是较早的。蔡和森等人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很集中、全面,恽代英、华岗则还没有对此作专题的集中的研究论述。

在论述五卅运动、大革命运动时,张闻天先写了《五卅前夜中国经济危机的发展与革命运动罢工运动的发展》一节,着重分析了五卅运动及大革命爆发的基本原因,指出:“一九二三—二四年,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得到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的帮助,残酷地把无产阶级革命镇压下去,而得到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开始;而半殖民地的中国,却正因为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加紧,而发展着经济危机。在中国,经济危机与民族危机正表现了特殊的联结。这种经济危机的特殊形态,特别是表现于工业发展的停滞状态,而于一九二五年初尤为严重。”<sup>②</sup>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结”,是五卅运动和大革命爆发的原因,这寥寥数语就抓住了历史的本质。完全跃出了上海工人斗争的范围,从世界经济局势,从更高的宏观层面,分析了中国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结”,从而也就剖析了五卅运动和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显然,因为张闻天注重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来分析研究历史,从而使他的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现代革命史》的很多论点、论断,至今看来仍然是科学的。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历史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认为,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的主要斗争,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使人们在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抓住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而张闻天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而且特别善于运用它来研究中国革命史。

在论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时,张闻天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阶级分析。他指出:“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国无产

<sup>①②</sup>《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41-142、208~209页。

者是在这个国度中生长起来的。”“帝国主义在华工业比起民族工业的比重是大得多，而在帝国主义工业中做工的，也完全要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工人，因此，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富有殖民地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中国无产者的力量要比资产者的力量来得大。第二，又正因为中国无产者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生长起来的，因此，中国无产者所受的剥削是三重剥削——帝国主义的剥削，资产者的剥削，还加上半封建的剥削……中国无产阶级受剥削得特别厉害，生活特别痛苦，就使其争取解放的要求也格外迫切，因而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最容易团结起来，同压迫者与剥削者斗争，且在斗争中特别表示勇敢坚决与激烈，比较不易接受改良主义的思想……第三，中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是比较复杂。在帝国主义向中国积极侵略下，不断地产生了庞大失业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农民、小资产者，他们不断地流到无产者这一群中来，不断地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落后，‘老工人’的数量比较少，一般说来，中国无产阶级是比较年青的。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产业后备军的过剩，使中外资本家可以随意开除工人，形成中国无产阶级的流动性。这些，使中国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着不少农民的意识，行会观念，流氓习气等许多弱点，斗争的经验也比较差……第四，中国无产阶级的又一特点，就是他们由‘自在的阶级’的斗争转到‘自为的阶级’的斗争的时候，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如果说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还经过相当长期的转弯抹角才转到正确的革命道路，那末，中国工人阶级却经过很短的时期，便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sup>①</sup>这里的分析，抓住了主要的特点，即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力量大、最革命，在转到“自为”斗争时立即受到了无产阶级政党、马列主义的指导等优点，以及年轻、存在农民意识、流氓习气等弱点。在这个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优点和弱点，一面是以后中国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卓绝的英勇斗争与积极领导革命的重要原因，一面又是以后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时党内各种不正确倾向和派别的一个根源，及其存在的条件（另一个根源，则为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党内所散布的影响）。”<sup>②</sup>他正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革命由无产

①②《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36~140、140页。

阶级领导的必然性,也指出了党内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而使理论分析深入到说明了17年来中共历史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某些规律,足见张闻天阶级分析的深度、功力。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张闻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史研究,使《现代革命史》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对中国革命史的理论上的宏观研究,超越了以往所有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也建立了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理论基础、理论模式。以后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基本上仍然是建立在张闻天30年代的理论基础之上。

## (2)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

第一,指明了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现代革命史》以“现代”为范围,指鸦片战争至当时抗战以前。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史,以后,有的仍称“现代革命史”;有的称“近现代革命史”;有的则称“中国革命史”。现在一般习惯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革命史为“中国革命史”。革命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现代革命史》所反映的、所指示的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国民革命。全书的章节安排清楚体现了这一点:

- 第一讲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 第二讲 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
- 第三讲 辛亥革命
- 第四讲 五四运动
- 第五讲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 第六讲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国共合作
- 第七讲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这样一个体系,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农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近现代通史中独立出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显然,这一部分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当时的革命斗争最迫切需要总结和吸取的。无产阶级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首先从其中的革命史着手,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这样一个体系,是无产阶级研究体系的反映,从根本上打破了资产阶级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体系。资产阶级研究中国革命史,其对象只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研究新时代的农民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如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史》、

陈功甫的《中国革命史》、贝华的《中国革命史》等都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研究对象,不提其他。在张闻天《现代革命史》出版的同一时期里,韩述仙的《中国革命史》虽然也涉及到了太平天国,但他对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看法是:中国革命史“是记载中国整个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不是帝皇朝代的变迁史,也不是饥民、流寇或农民的暴动史;这些只让中国许多旧史书去记载”。<sup>①</sup>还是否认以新时代的农民革命为研究对象,实即否认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为研究对象,而强调以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为研究对象。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对象,是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反映,是狭窄的、有阶级局限的。而张闻天研究革命史,既把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也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革命及新民主主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使中国革命的历史得到更全面的反映,同时使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无产阶级必然领导革命的历史规律得到反映说明。这就抓住和反映了历史的本质,是科学的。而资产阶级研究的狭窄,正是在回避历史的规律和本质,是不科学的。

第二,理出了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线索。

张闻天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研究对象,同时又抓住这些革命运动中的最重大事件,理出了中国革命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国共合作——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这样一条中国革命史的基本线索,在当时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它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研究中首次形成的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在此以前的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华岗《大革命史》以及蔡和森等人的中共党史研究、邓中夏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等,虽然都触及到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张闻天理出的这条中国革命史基本线索,标志着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体系初步建立起来,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统天下被打破,成为过去。其次,这条基本线索是科学的、革命的、精辟的。说它科学、革命,因为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体系,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即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颂扬

<sup>①</sup>韩述仙《中国革命史》第5页,1938年福建警官训练所印。

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为主，肯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也批评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革命。张闻天论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史，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突出了工农革命运动的主线，是民主革命已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本质和特点的反映；把资产阶级极力掩盖的真相重新披露出来，既有革命性也有科学性。

总之，张闻天理出的中国革命史线索，是科学的、精辟的，奠定了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体系的模式、规模。张闻天对于中国革命史发展线索的探讨，也为中国革命史的分期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对象、线索、分期等是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张闻天为解决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对主要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评价。

《现代革命史》在论述南昌起义时，一方面指出了它的缺点，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它的功绩，认为它是“以武装斗争反对反革命的苦迭迭，挽回革命的胜利继续推动革命前进的尝试，这一行动是对的，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这个评价比无产阶级以往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评价高了一些，是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对国民党学者污蔑攻击南昌起义的一个有力的批判、驳斥。

《现代革命史》对广州起义的得失、经验教训也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给予反革命的最有力的回答，“洗刷了机会主义者所给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耻辱”，“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旗帜——中国苏维埃的旗帜”<sup>①</sup>。它“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在东方殖民地革命运动中也有极重大的意义”；它“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能力，说明了中国的无产者能领导中国革命贯彻到底，解放中国民族并进而解放广大劳苦群众”。<sup>②</sup>资产阶级学者研究广州起义，则进行污蔑攻击，如韩逋仙认为广州起义是共产党“联合第四军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暴动。……大举焚杀……十三日第五军李福林部会同薛岳师攻共胜利，夺回省城，杀共产党二千余人……”<sup>③</sup>污蔑工农革命军“大举焚杀”。而国民党军队屠杀工农群众七八千人，却说成是“杀共

①②《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322、330页。

③韩逋仙《中国革命史》第102页。



产党二千余人”。完全掩盖真相,颠倒事实。张闻天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现代革命史》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给予了科学的分析、评价。这些分析评价对资产阶级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是一系列的批判、驳斥,也是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巨大进步;这些分析、评价,是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研究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反映,给予以后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以很大影响。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的党史、革命史著作中,仍可以见到张闻天观点的影响。

### (3)资料丰富,博采众长

张闻天写作《现代革命史》是在延安,当时有陕甘宁边区的相对安定环境,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全国大好的政治形势,研究条件、资料搜集,可能相对比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好一些。所以,《现代革命史》是继华岗《大革命史》后又一部资料丰富的专著,是一部理论和资料相得益彰的力作。

《现代革命史》研究和引用了很多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在论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时,大段大段引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二七大屠杀之经过”的报告》,引用了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在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引用了共产党、国民党等很多文献资料,如引用了《中共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第二次对时局主张、第四次对时局主张、中共四大宣言等,说明在国共合作建立的过程中,及国共合作建立以后的巩固、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及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在论述孙中山联俄联共思想的形成时,引用了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给蒋介石的信、1923年国民党宣言、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在平定广东商团的叛乱中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电文和孙中山给苏联遗信全文。关于共产国际及苏联对中国国共合作的推动,则引用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关于统一战线的演说、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1月12日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决议等。在论述五卅运动中,不仅引用了上海工商联合会等上海方面的文件,还引用了福州学生联合会电文等。在论述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时,引用了中共五大决议,《八七告同志书》。对于“八七”会议以后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引用

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进行分析。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也完全引用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在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引证中共党内的文献,一方面表明张闻天扎实的资料工夫;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历史研究中、在对外宣传中有党的组织纪律观念,遵守党的决议、宣传党的决议,而决不标新立异。

《现代革命史》也引用了很多统计资料。

在论述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时,引用了纺织工业8家工厂的统计资料,面粉工业7家工厂的统计资料,其他工业5家工厂的统计资料。在论述五四运动的背景时,张闻天写了《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节,扼要叙述了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又论述了段祺瑞“大量向日本借款,使日本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利”。接着列出了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统计资料。在论述五四运动的背景时,还专门写了《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停止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节,引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如1913年至1922年外国机器输入中国的统计资料表;1915年至1922年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统计资料表;中国面粉工业发展统计资料表;中国人开办的银行1912年至1923年统计资料表等。并分析道:在一次大战期间,因为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这些发展还是有限的,而且只是限于轻工业方面,至于重工业的发展则是极其微弱的”。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更加壮大了”。<sup>①</sup>在论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时,对于当时中国工人的人数引用了多种统计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1930年的统计资料:南方九省29个城市中,工人数量总计1204317;1930年铁道部、交通部统计资料:铁路工人共有99754;1927年苏兆征统计:中国产业工人人数达275万人,城市手工业工人有1200万人;苏联卡赞宁统计:中国纺织工人有30万,丝织工人约20万,矿工约25万,铁路工人则在20万至25万间,工厂手工业的盐业工人将近70万人,人力车夫约有150万人;李达《中国产业革命》中的各部门工人统计表,总计275万。然后指出:“这些统计虽不是精确的(好些不是产业无产阶级也计算在内),可是从此也可以知道,中国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当在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间。”<sup>②</sup>对于工人数量,张闻天不是只采一说,而是诸说并存,只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这说明他在研究历史

①②《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18-121、136页。

时采用了“存疑”的方法,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反映。在大概估计了中国的工人人数后,又引用了卡赞宁《中国经济地理》中对中国工人年龄、性别等的统计资料,对中国工人的质量也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中国工人受压迫深、革命性强等特点。在论述大革命发展时,也引用了很多统计资料,如工人罢工的统计资料、农民运动发展的统计资料等。这些统计资料的引用和研究分析,是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机结合,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

此外,《现代革命史》还引用研究了很多典型的说明问题的资料,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

在《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节中,引用了俄国卡岗诺维夫《关于外资与中国铁路》一书。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一讲中,引用了爱林诺尔·奔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一讲中,引用了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中华民国政治史》、《字林西报》等资料。可见,张闻天在研究中国革命史时,除了搜集、研究大量的原始资料、统计资料外,还搜集研究了很多其他有关的中外文献资料。《现代革命史》资料的丰富扎实是空前的。华岗《大革命史》虽然也有资料丰富的特点,但它的资料大多是大革命运动前后情况的资料,而《现代革命史》的资料已涉及到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中国革命史,已为鸦片战争至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奠定了资料建设的规模。

《现代革命史》资料丰富,也反映了张闻天研究的博采众长的特点。张闻天对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了排比整理分析,下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从而集前人研究和资料之大成。在写作《现代革命史》时,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的资料进行了精选、修正、补充。《现代革命史》中的不少资料是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选用的,如1884年至1899年中国对外贸易入超表,1894年至1898年中国借外债统计资料,帝国主义投资铁路、航运统计资料,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统计资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中国各轻工业发展统计资料,大革命期间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计资料等都是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选用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还有些统计资料就没有被采用,如1905年至1932年中国外贸入超表、辛亥革命后中国战争省份统计表等。这说明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的资料作了精选。同时,《现代革命史》采用了不少《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所没有的资料,如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银行统计表,中国自办银行统计表,辛亥革命前

中国纺织工业、面粉工业统计表,1912年至1923年中国自办银行统计表,中国工人人数统计等资料。此外,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1913年至1921年的中国输入机器价值统计表的资料作了修正。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多次引用《统计月报》和中国《年鉴》的统计资料来看,《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现代革命史》中引用的统计资料,有不少出自这两种报刊,而且也是有批判地、有分析地录用。正如他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所说的:“我们对于过去中国政府的统计,是不能过分相信的。”<sup>①</sup>

张闻天没有参加中共的建党工作,1925年入党后即去莫斯科,至1931年回国,开始进入中共领导层。他对于中共建党至大革命时期的党史,缺乏直接的实践的了解,所以他研究论述这段时期的党史,大多参考了建党时期的一些领导人留下的文献资料。如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是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的党史报告,当时张闻天正在莫斯科学习,可能直接听了这个报告,或者以后看到了这个报告的油印小册子,所以《现代革命史》有些观点和资料是与《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相同的。如《现代革命史》论述中共的产生是中国工人运动及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就是蔡和森书中的观点。又如论述建党时期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斗争,与合法主义者李汉俊的斗争等,这些材料基本上也是蔡和森书中的。

张闻天也没有参加中共建党以后至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所以《现代革命史》对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采用了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资料。如论述中共建党初期在工人中的宣传、组织活动,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工人周刊》、香港海员罢工、唐山矿工罢工等,有些就是概括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资料。又如论述“二七”惨案,提到京汉铁路总工会16个分会,提到京汉铁路工人罢人后提出的五项要求等,这些资料和《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是相同的。

张闻天基本上没有直接参加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对大革命史的研究,借鉴参考了华岗的《大革命史》。如关于汉口英租界收回、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大革命史》的论述很详尽,而其他书论述均少。《现代革命史》对于这些资料显然有所采用或概括。在结构上,《大革命史》第五章为《中国大

<sup>①</sup>《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373页。

革命中的各社会阶级》，《现代革命史》最后一讲中也有《大革命中的各阶级》一节，两书对于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基本相同，而张闻天的分析更深刻、准确。如关于农民问题，《大革命史》谈到：“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是很伟大的，大革命中最有力量的除了无产阶级，就是农民群众。”<sup>①</sup>《现代革命史》则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sup>②</sup>这种分析就更深刻。

李平心(李鼎声)《中国近代史》，1933年11月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这本书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话来分析中国近代史，虽然某些论述的立场、观点离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些距离，但作者基本上是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作的。这本书也成为张闻天的参考书之一。这本书引用了不少中外文献资料。如论述太平天国以前的农民起义受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引用了《国史》第11册“除教匪歼除外，良民被戮者二万余人”。这一资料就被《现代革命史》采用。《中国近代史》论戊戌政变及“四一二”事件，用了“苦推打”一词，并注：“法文 Coup d'état 之音译，有非常的急剧的政变之意。”<sup>③</sup>《现代革命史》用“苦迭挞”一词，当是借鉴于此。

张闻天的治史态度、方法是严谨的，既注意全面地占有第一手资料，也力求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之长；而且在取舍上，可以看出张闻天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提炼能力。即使引用同一资料，张闻天的分析往往更切中要害、更深刻。《现代革命史》是张闻天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之大成的优秀成果。

张闻天的《现代革命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高峰，对于以后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有极大影响。如胡华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就受到了《现代革命史》的影响。胡华1950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其结构、观点、资料有不少就是采自《现代革命史》。其最大的不同是，张闻天的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反映，胡华的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反映。

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284页。

②《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338页。

③《中国近代史》第16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版。

### (三) 史学方法

#### (1) 史论结合

《现代革命史》在论述历史时,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总是先提出资料再作理论分析。如论述同盟会,就先列举同盟会的党纲六条,然后再分析它的进步之处和缺点。论述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民军的妥协,也是先摆资料,再作理论分析。又如论述广州起义时,先摆出了苏维埃政策的主要内容:“对于工人阶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恢复并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由国家照原籍(案:应为“薪”)津贴失业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对于农人,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田界,各村各区即日成立苏维埃政权;对于贫民,没收资产者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他们的财产救济贫民,取消一切捐税、债务、房租,全市房屋为公有,没收一切当铺,贫民的质物无价发还;对于士兵,国有的土地分给士兵失业人民自由耕种,组织士兵委员会。”<sup>①</sup>然后分析道:“这些任务和政策,因为苏维埃政权只存在三天,所以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同时,就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革命任务看来,有些部分也有过左、过早的,应该避免提出的。”<sup>①</sup>然以这些政策的内容等为依据,对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现代革命史》一般不空发议论,不作无据之谈。其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水平,已达到了很高程度。

#### (2) 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张闻天很注重采用这种方法。在论述戊戌变法时,就特别将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了比较研究,并且还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宫廷政变作了比较研究。

又如论述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时,也进行了中外比较研究,谈到中国工人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家、半封建的三重剥削时,他指出:“如果说西欧资产阶级从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血汗中,以获得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去收买一部分本国工人阶级上层分子,去缓和与分裂本国工人的斗争和团结,树立其改良主义欺骗的经济基础;那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则情形又是另一回事。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对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工人,毫不放松其加紧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者把中国工人当成奴隶牛马,加以任意鞭撻开

<sup>①</sup>《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327页。

除, 在各方面进行超度的剥削, 同样地利用中国半封建的剥削方法, 加之于中国工人身上, 以增加其额外利润。”同时又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命脉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 不仅压抑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且使中国民族工业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使中国民族工业不仅丧失了与外货竞争的能力, 而且要依靠加强工人剥削来苟延残喘。因为只有对工人施行超度的剥削, 半封建的剥削, 才能补偿其在外货竞争下的损失。所以不论在中国资本家的企业或外资兴办的工厂中的工人, 总是工作时间特别长而工资即特别少, 待遇也非常恶劣。”<sup>①</sup>这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中国工人受剥削压迫特别深的原因、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 得出了中国工人比西欧工人受剥削压迫深, “因而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 斗争特别“勇敢坚决”的结论。此外, 还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一登上政治舞台不久, 就受到了共产党、马列主义的指导, 比西欧工人阶级少走弯路。<sup>②</sup>正是通过中外比较研究, 才使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得到了清晰深入的说明。张闻天的这些比较研究, 表现了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 以后的无产阶级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者往往都借鉴之。

### (3) 实事求是

张闻天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关于历史事件的评价, 前有论述。这里来分析一下张闻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谈到中共建党时, 对于那些已与共产党为敌的人, 也不回避, 指出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李达、沈玄庐等<sup>③</sup>。书中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但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建党的贡献仍然是肯定的。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全面分析的精神。

在研究方法上, 《现代革命史》也是比较成功的, 比以前有进步。

①②③《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37~138、139~140、142页。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中共党史 研究的曲折道路

(1949. 10—1978. 12)

### 一、概 说

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建国初十七年、“文革”时期。

#### 1. 建国初十七年(1949. 10—1966. 5)

这个阶段可以1957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小阶段。1957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能进行地下的、半地下的、内部的研究成为过去，中共党史书不能在全国公开发行为过去，一批党史书公开出版发行，如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在全国各地的发行达数百万册。还有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1956年)、黄河《中国共产党三十五年简史》(1957年)、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1954年)、荣孟源《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1954年)、王德庆等《中国现代革命史讲话》(1957年)等。其次，党史研究由规模小向规模大，由不成体系向较有体系发展。开始划分历史时期，开始进行通史的、断代史的各种类型的研究。如司绶延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廖盖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等相继出版。其三，党史研究的队伍空前壮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党史，主要是根据地宣传部门、学校的少数人；建国后发展成全国各高校、中学、各地领导部门、宣传部门、报刊杂志社等浩浩荡荡的理论大军，群众性的学党史、宣传党史的热潮此起彼伏。例如对当时上海的学习、宣传情况有这样的记载：

1951年6月13日，市委发出指示，提出了要“进行党的历史的讲解与宣传”。接着，由领导同志在市党员干部庆祝党的30周年大会上作了学习党史的动员报告。会后，上海各区、各单位，以党支部为核心，普遍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党史宣传。前后共有260多次大小庆祝会和干部会议，由华东、上海



市及各区报告员工 177 人作了有关的党史报告。当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后,全市学习党史达到了高潮,仅普陀区参加党史学习班的学员就有 4505 人,计党员 1216 人,团员和积极分子 3289 人,分 29 个班,最大班 516 人,最小班 37 人。华东局宣传部举办了 4 次演讲会,由魏文伯主讲。全市各单位从 7 月中旬开始学习,至 9 月上旬先后结束,基本都完成了学习计划。通过这次党史学习,明确了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使有些不理解、不服贴工人阶级的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和认为党是“穷入党”、“学生党”、“解放军就是共产党”的工人同志,都改变了看法,较具体地体会到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与正确,也增强了大家做一名党员的光荣感与责任感。<sup>①</sup>

从这个记载中,可以清楚了解到当时党史学习、宣传热潮一斑。从中又能引出当时党史研究的第四个特点,即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宣传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需要向全国人民群众进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教育,进行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理论的教育,人民群众也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这决定了当时党史研究的宣传色彩浓厚。尽管如此,这在当时是合理的,是大变动以后的社会需要的,社会作用是积极的。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后,特别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始不正常。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经济生活开始不正常。政治、经济生活的“左”倾发展,自然影响到学术研究、党史研究。从 1958 年到 1965 年出版的党史书、党史讲义数量日益增多,地方党史的研究也随着毛泽东号召各地编写地方党史发展起来,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开始反映出来。如:(1)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突出毛泽东,围绕毛泽东著作写党史、解释党史,逐渐成为党史研究不成文的规范。(2)路线斗争逐渐成为党史的主线。多线条、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开始被单线条的研究取代。(3)大批判式的研究日趋严重,否定一切、肯定一切式的走极端研究蔓延开来。因为批判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也批判“百团大战”是“右倾投降主义”。这一时期也有较有价值的、较受欢迎的书,如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等。

五六十年代的党史工作最具学术价值的是资料建设全面展开。如报刊资料的影印出版。《新青年》、《向导》、《布尔什维克》、《八路军军政杂志》、《解

<sup>①</sup>《党史信息报》1990 年 3 月 16 日第二版。

放》等47种革命期刊先后影印出版；《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6种共产党报纸，也先后影印出版。如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中国工会历史文献》5集、《土地改革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党史资料》20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244册等先后问世。如回忆录资料整理出版。《跟随毛主席长征》、《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回忆叶挺将军》、《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等有500多种，《星火燎原》10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55辑等也是回忆资料。此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中国现代丛书目录》等，也是有实用价值的二三次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工作的成绩，对当时的党史研究起着积极的影响，也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党史研究有积极的影响。

## 2. “文革”时期（1966.5—1976.10）

“文革”时期，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遭受极大破坏，学术研究，党史研究也遭受摧残。党史研究在很长时间里基本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控制。不经他们审定的书一般不能出版、发行。因为控制严，十年中公开出版、发行的党史书极少，只有《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上海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广东版《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以及《东方红》、《韶山升起红太阳》等。此外，各高校内部印行了一些资料，体系、观点自然是当时的论调。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毛泽东史代替党史。“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自然就把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加在毛泽东身上，把党史变成毛泽东史。如《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的章节标题就有：《毛主席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五四运动的伟大旗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等。当时的这些书写中国共产党建党，不写陈独秀、李大钊，只写毛泽东；写解放战争不写朱德、周恩来，不提各野战军番号及首长姓名，只写毛泽东如何指挥，甚至把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说成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布的。又如1971年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收录的是50幅毛泽东的照片，毛泽东画传代替了党史画传。不仅把功劳都归于毛泽东，还把毛泽东无限拔高。比如说毛泽东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时“就特别注意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伟大的天才，创造性地指出了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道路，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篇章！”<sup>①</sup>实际上1919年，毛泽东还没完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何谈“结合”、“指出了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道路”？

第二，路线斗争史代替党史，大批判代替全面客观评价。“文革”中把“文革”当成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同时把路线斗争客观规律化，认为党内的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党是在路线斗争中发展的。这样自然就把党史看成是路线斗争史，进而以十次路线斗争史概括全部党史，即：(1)与陈独秀路线斗争；(2)与瞿秋白路线斗争；(3)与李立三路线斗争；(4)与罗章龙路线斗争；(5)与王明路线斗争；(6)与张国焘路线斗争；(7)与高岗、饶漱石路线斗争；(8)与彭德怀路线斗争；(9)与刘少奇路线斗争；(10)与林彪、陈伯达路线斗争。有些书的名称就是“路线斗争史”、“十次路线斗争史”。这些书论述路线斗争的方法完全是大批判式的上纲上线，以偏盖全，以人论事，因人废事，路线斗争的对象从来都是彻头彻尾的坏人，没有做过一点好事。如《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谈到陈独秀就说：“陈独秀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凶恶的敌人。在党的幼年时期，他窃据了党的总书记职务，从党成立以来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完全充当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广东版《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说刘少奇“是一个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长期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说刘少奇在安源就推行“一反二压三叛卖”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土地革命后期及抗战时期则变本加厉地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sup>②</sup>。

第三，“七真三假”方法论盛行。“文革”时期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搞逼供讯，以假证据定案，在学术研究、党史研究中也以假充真，甚至公开鼓吹“七真三假”。假党史也就由此产生。《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为了吹捧林彪，就把井冈山会师写成是林彪与毛泽东会师，说：“1928年4月，林彪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军队，经过湖南发动农民起义，扩大兵力也奔上井冈山，直接参加毛主席领导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事件”。事实上林彪当时只是朱德属下的一个

<sup>①</sup>《韶山升起红太阳》第25~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sup>②</sup>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第229~235页。

连长。还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是林彪指挥的：“在林彪同志指挥下，仍然采取灵活机动和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速战速决的歼灭方针，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sup>①</sup>。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主要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林彪当时鼓吹“短促突击”，和游击战、运动战是唱反调的。

第四，党史资料建设完全停顿。“文革”时期没有公开出版任何党史资料，只能见到所谓的假资料、大批判资料满天飞（中央专案组搞的刘少奇资料，就是假资料）。而且以前出版的文献资料、回忆资料，大都被定为“大毒草”，被作为批判资料，或被封存。图书馆里所有解放前报刊杂志都被封存，禁止查阅。“文革”时期要进行科学的党史研究已无条件，已不可能。科学的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已完全被破坏。当时的所谓党史研究，完全成为英雄史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玩偶，成为为林彪、“四人帮”服务、为“文革”服务的工具。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两年，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共党内仍占主导地位，中共党史研究虽然有所拨乱反正，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党史毛泽东史化、路线斗争史化仍未根本改变。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年可以归在“文革”时期。

## 二、中共党史研究

### 1.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1930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37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并兼任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1937年7月到延安，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青委等处工作，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至于1966年“文革”爆发前才不再担任这个职务。延安期间，在毛泽东领导下，他参加了整风运动，参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还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重要文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

<sup>①</sup>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第239-240页。

记及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等。“文革”期间,受到“四人帮”迫害,“文革”结束后,重新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还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等,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编纂、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主要领导人。1991年,病情已很重,仍然抱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修改和审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并撰写《回忆毛泽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是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写的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长篇文章(计五万字)。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6月30日在北京集会庆祝中共建党30周年,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刘少奇即请胡乔木起草大会报告。胡乔木以一周时间一气呵成《三十年》。照例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发表《三十年》。各地的报刊纷纷转载<sup>①</sup>。6月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1月出版修订后的第2版。此后不断重印。至1962年5月,人民出版社已重印28次,印数达212万余册。此外,各地出版社也租型重印,如上海人民出版社至1962年3月就重印38次,印数达156万册。成为五六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中共党史研究著作,自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共党史研究著作。此书所以受到当时社会的极大欢迎,有以下原因:(1)配合了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宣传中国共产党、学习中共党史的政治形势,既适应了这种宣传、学习热潮的需要,同时又推动了这种宣传、学习热潮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不少中共高级干部都撰写了纪念中共建党30周年的文章,而惟有胡乔木的《三十年》最受社会欢迎,说明此书在当时较符合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的需要及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这与胡乔木参加过1945年《决议》及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对中共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共党史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极高有关。(2)配合了《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为学习、宣传《毛泽东选集》提供了理论和历史资料。《毛泽东选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出版过

<sup>①</sup>《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438-4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多种版本,但当时的各种版本均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编制体例、文字注释等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重要的著作没有收入。新中国成立后,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新的精神支柱,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编纂《毛泽东选集》成为紧迫任务。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直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出版一套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1951年上半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辑完成,10月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有助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也有助于中共党史的宣传学习。同时,学习宣传《毛泽东选集》也需要有一些理论、历史资料 and 背景资料,《三十年》恰好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胡乔木是《毛泽东选集》编纂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把握较准确,《三十年》成为学习、宣传《毛泽东选集》的极好辅助资料,是很自然的。这些说明《三十年》在当时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和积极的社会效益。下面就《三十年》的史学思想、史学成就、史学方法等作一些分析研究。

### (一) 史学思想

#### (1) 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理论

《三十年》有不少篇幅介绍毛泽东的实践活动,称颂他是中国革命的英明领导人。如写中共一大召开,就说参加的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sup>①</sup>,以毛泽东为首。又写:毛泽东同志是湖南的党的组织的代表。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在1920年又组织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于同年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第一次大会以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任党的湖南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工作,使湖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最发展的省份之一。写中共建党时期的历史,主要写毛泽东的活动,突出毛泽东的地位。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说:“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表现了自己的伟大的革命天才。毛泽东同志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认识了工人阶级能否实现对于农民的领导,乃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这个问题,却是党的历次大会包括第三次大会所没有解决的……”接着介绍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指出:这篇文章“既反对了陈独秀的只看见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而看不见农民的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1年11月第2版。

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了张国焘的只看见工人而看不见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又介绍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作的重要价值是:(1)充分地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2)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3)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了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并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4)着重地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因为这样,这个著作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文件。”强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除了毛泽东同志等少数人以外,却没有能够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能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突出了毛泽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确代表。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介绍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强调了毛泽东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惟一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制定了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发展的总路线,而且在各项具体政策方面,在对待中间阶级的政策方面,在战胜优势敌人的军事战略战术和部队工作方面,在农村环境和军事环境下的党的建设工作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创造……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中国革命困难时期的工作,已经奠定了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基础”。强调,在这个时期,“党认识了自己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同时也认识了各种‘左’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并在与各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sup>①</sup>。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主要突出了毛泽东的地位、作用。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都突出了毛泽东的地位、作用,也把介绍毛泽东的著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三十年》中直接引用和介绍的毛泽东论著有18种。这一方面概述了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正确思想理论,把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理了一下,有助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另一方面实际上进一步突出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称颂了毛泽东的功绩。《三十年》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建国初期政治形势、政治任务的需要,是有积极作用的,并对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这方面的宣传,也已流露出一点(哪怕是很少)个人崇拜的色彩,从新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实践已证明,这样的宣传过头了,就产生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42页。

了消极影响。

## (2)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巨大历史作用

《三十年》分析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成功的教训,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软弱性,已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需要有新的阶级来担负领导责任,这个阶级要能够提出正确的和完全的斗争纲领,并且能够在国内和国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坚持不屈的斗争。这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党的有效活动,全国工人斗争有很大的高涨”。两年中,中共领导了一百多次罢工,“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全的胜利”。以后中共制定了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就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由于中共的努力,国民党一大召开。这个由共产党人出席并参加领导的会议事实上成了革命高涨的起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使中国共产党遭受打击和损失,但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而是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战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达到政治上的成熟,推动革命新高涨,奠定了后来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各方面基础。《三十年》在分析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强调了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在分析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原因时,强调了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总结,是中国人民2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的总结。并借用毛泽东的话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作用时,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政府,进行了揭露批判,通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比研究论述,进一步突出了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光荣的、伟大的三十年”,是“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奋斗,通过许多艰难曲折,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三十年”<sup>①</sup>。并进一步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共领导地位、历史作用的宣传,是建国初期政治形势、政治任务需要的,是新中国树立新的政治领导核心需要的,是有积极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83页。



作用的。《三十年》中的这种宣传对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

### (3) 总结、宣传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对于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三十年》对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了较全面、深刻的总结。在论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后,书中写下这样一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证明了以下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原理:(1)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来担任;没有统一战线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统一战线不由工人阶级领导而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是要失败的。(2)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取得了农民作为革命的同盟军,才能够取得革命胜利。(3)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一切。这些教训,不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到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sup>①</sup>

这里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书中对民主革命时期各项工作阶段的经验教训都进行了总结,并通过对右倾、“左”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使经验教训得到更鲜明的反映。书中的最后一章《三十年的基本总结》,是专论三十年经验教训的一章。在分别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全面总结。其中强调了:①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扬光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具有这样作风的党,乃是领导中国革命直至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②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要在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③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和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分不开的。当党在正确地解决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特别是对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实行联合或斗争的问题时,党和革命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错误地对待这些问题时,党和革命就遭到挫折”。④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人民战争,并且要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⑤争取国际援助。“没有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始终一贯的伟大,特别是没有列宁斯大林及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20-21、83-93页。

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援助,没有苏联(红)军在西方消灭希特勒,在东北歼灭日寇关东军的援助,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其他多方面的援助,中国革命的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sup>①</sup>对于三十年经验教训的以上五个方面的总结,基本上抓住了经验教训的主要方面,只是在词句的表达上,与现在中共党史书中对民主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相比,尚有欠缺和不够完善之处。但这样的总结在50年代初期,应该是高水平的,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是有影响的。至于论述外援强调苏联的援助,这是建国初期“一边倒”政策的反映,是中苏关系友好阶段形势的反映。

#### (4)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

新中国是怎样一个国家,方针政策是怎样的,这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迫切想了解的,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任务。《三十年》将中共党史写到1951年,写了新中国初期的历史,借此对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三十年》写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国家呢?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以及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呢?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1949年7月1日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作了完满的答复。<sup>②</sup>接着便借用《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共同纲领》中的一些观点对这些重要问题一一作了解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指出,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现阶段仍然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又指出,《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各方面政策都有系统的规定。《共同纲领》对经济政策有特别详细说明,即“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

①②《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20-21、83-93、75页。

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sup>①</sup>。这样对新中国方针政策的宣传介绍，是原原本本、准确、有积极作用的。《三十年》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写进中共党史，作系统、准确介绍，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的宣传介绍，今天读来仍觉意味深长，仍有现实意义。这样的文字在 60 年代的版本中仍然保留，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50 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共党史书中再也没有这样的宣传，因为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 （二）史学成就

《三十年》是以论述中共党史作政治宣传的史论著作，政治思想上的成就是主要的。此书政治作用、影响很大，同时，在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尽管此书以论为主，不是以史为主，其史学上的影响，说明它的史学成就亦是不可抹杀的。以下分析研究之。

### （1）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

《三十年》把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分为四个时期：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1949）。为什么分为四个时期而不是分为五个时期？为什么没有把“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分为“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两个时期？较此书早一年出版的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也是把中共 1921 年至 1927 年的历史合为一个时期，而不是分为两个时期，大概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将中共 1921 年至 1927 年的历史作为党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阶段的。《三十年》在最后一章中引用了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中共党史的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便是 1921 年至 1927 年，第二个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阶段，第三个阶段即抗日战争阶段。<sup>②</sup>《决议》也将 1921 年至 1945 年党的历史分为以上三个阶段，将 1921 年至 1927 年作为“中

<sup>①②</sup>《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 75 - 78、85 - 88 页。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sup>①</sup>。此外,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分期也是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没有“党的成立”字样,这是因为《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毛泽东论著从1925年12月开始(第一版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年代定为1926年3月,实际上应为1925年12月,第二版改正了),没有收入1921年以来的论著的原因。胡乔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纂,将《三十年》的分期也定为四个时期,大概也有与《毛泽东选集》分期相符合的意图。《三十年》将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分为四个时期,其根据大概并不是中共党史发展的内在特点,如果按照中共党史发展的内在特点,党的成立和大革命时期完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而是根据中央文件、毛泽东的观点来分的。这样的分期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样的分期对新中国初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体系影响很大。如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1956年6月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初稿)》就完全按照《三十年》来分期。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三个阶段的划分,与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分期相同,更成为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党史书编写的定式。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有学者向这种分期体系提出挑战,提出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可以以遵义会议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尽管已有人提出新的分期主张,但按照新的分期编写的中共党史书尚未见有出版。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比《三十年》早出版一年,但胡华的书只写到抗日战争,所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分期体系的奠定,仍应首推《三十年》。《三十年》奠定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分期体系,首先应肯定是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此前没有这样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宣传,对《毛泽东选集》的宣传、学习,有推动作用,使中共党史研究较民主革命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框定”了中共党史的分期体系,束缚了研究者的思维及创造性研究,使《三十年》分期体系在很长时期里都没有被突破。

中共党史分期体系是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共党史理论问题的论述,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方面,《三十年》也为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研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2-95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究奠定了基础,有些问题下面详论。

## (2) 探讨、解决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三十年》在第一章的一开头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sup>①</sup>。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理论问题的科学说明。这个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蔡和森曾对这个问题有所说明,但不如《三十年》完整、准确。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比《三十年》早出版一年,但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说明。《三十年》对这个问题的论断,论述了中共产生的阶级基础、思想理论基础,突出了中共产生的时代性、历史必然性及合理性,奠定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中共建党史的理论基础。这是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一理论说明被以后中国大陆的中共党史学界普遍接受,对中共建党史研究起了导向作用。

《三十年》对中共二大的理论分析、评价也是深刻的。指出:

这次大会制定了党的宣言,在宣言中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批评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指出了中国人民的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然后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党就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提出了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口号。宣言的缺点,是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号召工人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和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这个缺点,后来不及就在党对1924年到1927年革命的领导工作中,被陈独秀机会主义集团发展成为严重的路线错误。<sup>②</sup>

这里强调了中共二大提出了“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口号”,肯定了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最低纲领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就肯定了中共对民主革命的指导、领导作用。真正革命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什么?是谁提出的?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又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的分析研究,《三十年》重视了这个问题,反映出胡乔木理论上的卓识。此后的中共党史书都重视了中共二

①②《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2、8-9页。

大民主革命纲领意义、作用的论述,正是《三十年》的理论影响的反映。《三十年》对中共二大及其宣言既肯定,也指出了其缺点,而且指出了其缺点对以后中共的影响,这样的分析是客观全面深刻的,从而奠定了以后中共党史书对中共二大评价的理论框架。至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中共二大的评价基本上沿用了《三十年》的一分为二的评价,甚至“破天荒”提出了……一词也搬用了。<sup>①</sup>

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原因、经验教训的分析,对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原因、经验教训的分析,理论上给予准确把握,也是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三十年》也进行了探讨(详前),也给予后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以很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这也是民主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三十年》强调:抗日战争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一部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相联合而共同反对侵略”的战争<sup>②</sup>。为什么说中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书中虽没有专题论述,但一些抗战具体历史的论述中,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如论述中共的抗战路线,就指出:洛川会议通过的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反对蒋介石反动的两面政策的指针”<sup>③</sup>。这里强调了正确的抗战纲领是共产党提出的。又如论述《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证明了自己是抗日战争的真正领导者,就必须同时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的全部见解,以便彻底剥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的精神武装,而给予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装。这个任务,由毛泽东同志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负担起来了。”在介绍《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内容后强调,此书的发表“极大地帮助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极大地帮助了全国人民解放区的政策的统一,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sup>④</sup>这里说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是中共对抗战思想理论领导、精神领导的进一步体现。书中不仅强调了中共对抗战的思想领导,而且强调了中共在抗日战场上担负起了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指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日益消极避战,以至在1944年造成大溃退。“而与此相

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2-3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②③④《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62、49、53-54页。

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相继武装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展了强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五十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在三年作战中收复了县城一百五十座。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千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八十万人。从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一线直到广东和海南岛,都有了共产党员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日战争成为真正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了”<sup>①</sup>。这里强调了在抗日战场上,中共及其军队逐渐取代国民党及其军队成为主导力量,从而突出了中共对抗战的领导。书中对中共抗日领导权的论述,对以后的中共党史书也有影响。

书中对很多重大理论问题都作了研究,不少是精辟深刻的,也有一部分因为政治形势及资料等方面的局限,存在一些局限。如对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全盘肯定,这显然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又如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较多指出它的软弱性,说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害怕工人和农民,他们不但不能解决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甚至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sup>②</sup>。说中国资产阶级“甚至不敢提出”反帝反封建问题,这是不客观的。1924年国共合作后,孙中山曾经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纲领。

### (3)对中共党史的一些事件、人物评价提出了独到见解

《三十年》长于理论研究和分析,不仅注意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对一些事件、人物在理论上作出了深刻的评价,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如对中共一大、二大的评价,既涉及到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对事件的评价。又如对中共五大的评价,书中说:

这次大会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但完全被陈独秀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并被剥夺了在大会上的表决权。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但是缺乏积极的办法。第五次大会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虽然通过了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而陈独秀却在实际上坚持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样,第五次大会在事实上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sup>③</sup>这里对中共五大的评价是一针见血的、独到的。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52、5、20页。

史》对中共五大的论述,偏重于介绍经过、内容,没有《三十年》这样一针见血的评价。中共五大“缺乏积极的办法”、“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评价,被以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史书搬用,以至《辞海》1980年、1984年版“中共五大”条目,几乎完全照抄了《三十年》的文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中共五大的论述内容文字有了变化,而基本观点、精神仍与《三十年》相同。再如对长征的评价,《三十年》中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有了希望。它使全中国全世界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相信了为着战胜当时在中国得寸进尺的日本帝国主义,非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不可,非停止反共的内战不可。<sup>①</sup>这里对长征胜利意义的论述是极深刻的。对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对中国革命前途、抗日前途的影响,对中共及红军威望的影响的提炼,可以说是站在抗战胜利、民主革命胜利的高度来看问题的,把长征的意义作了极大的发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到了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是长征刚结束后的评价,还没有十分清楚涉及长征对抗战胜利、民主革命胜利、革命转危为安的意义,当时刚站住脚,也不可能再有再深远的认识。可以说,胡乔木在1951年对长征意义的提炼已较1935年12月毛泽东对长征意义的提炼更有高度了。《三十年》中很多历史评价借用了毛泽东的观点,而对长征的评价没有借用毛泽东的观点、文字,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胡乔木理论卓识的反映,从而把毛泽东的论述向前发展了。《三十年》对长征的评价,被以后很多党史书采用。有的党史书既采用毛泽东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评价,也采用胡乔木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基本上采用了《三十年》对长征的评价。

此外,对国民党及其人物的评价也有独到的见解。如论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的国民党说: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是1911年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中的主要组织者,它在政治上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联盟。在1911年革命被出卖以后,这个联盟中的许多力量

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37页。



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派则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并且继续遭受失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苏联对中国和其他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政策，五四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这一切，逐渐地引起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人的注意，使他们倾向于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的革命政策。<sup>①</sup>

这里对同盟会的性质分析，对孙中山采用联俄联共政策的分析，寥寥数语，却抓住了要害，不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十分精辟。比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的论述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对1928年建立的蒋介石政府的评价是：

叛变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引起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相反，由于比以前的反动统治者更加彻底地依靠帝国主义和更加残酷地压迫革命人民，蒋介石和国民党是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配下，国民党新军阀的内战和以前一样地循环不息。工人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以前更为严重，尤其在城市中，国民党的统治比旧军阀的统治凶恶得多。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蒋介石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以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比以前受了更多的压迫……<sup>②</sup>

这里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性质的分析是深刻的，抓住了本质。认为蒋介石的官僚资本主义有封建、军事、垄断的性质，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更多的压迫，这是一种有理论深度的独到的见解。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还没有这样的见解。

《三十年》的很多见解成为党史研究中有影响力的一家之言，不少被以后的党史研究者所采用。

#### (4) 开研究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先河

《三十年》论述1921年至1951年的中共党史，自然也就论述了新中国建立后近两年的历史。首先论述了新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就，有20多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或承认了新中国。然后论述了国民经济恢复、土地改革展开、抗美援朝取得巨大胜利等。同时也论述了建国初期中共的组织、思想建设，谈到：

①②《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10~11、23~24页。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党的巩固在目前和将来的一切革命事业中的决定意义。党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年份有了迅速的扩大。中国共产党现有党员580万人。党决定在老区农村中一般地停止接收党员,而着重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党决定在党员中认真地进行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每个党员彻底了解依靠工人阶级的必要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并且按照严格的标准对党的组织作一次认真的整理。<sup>①</sup>

这里对建国初期中共的党建作了客观的论述,从中可以了解到建国初期中共党建的基本内容、特点。“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是建国初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内容,这实际上又成为研究建国初期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研究建国初期思想理论宣传与“大跃进”、“共产风”掀起的关系。这一论述,不仅有史学价值,显然也有资料价值。《三十年》论述建国初期的国史、党史,其最重要的史学价值是开创了新中国研究现实史的先河。以后的中共党史书、中国革命史书,历史发展到什么阶段,就写到那个阶段,这种勇于写现实史、当代史的传统,就是《三十年》奠定的。中国传统的“易代修史”陋习被打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50年出版,只写到抗日战争结束,相比之下,胡乔木的理论勇气实胜于胡华。

### (三) 史学方法

《三十年》是一本史论著作,或论史著作,通篇以论为主,而且论的方法有以下的特点:

#### (1) 较多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

如为了说明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就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第6页)。为了说明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很多正确的指示,就引用斯大林《中国革命的前途》等的论述(第17页)。为了说明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人没有被征服,又继续战斗,就引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论述(第23页)。为了说明1928年蒋介石政府的性质,引用了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论述(第29~30页)。为了说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形成,引用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论述(第38~39页)。为了论述1946年伪“国大”召开是蒋介石自套绳索,引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论述(第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80页。

69页)。为了说明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是革命的转折点,引用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论述(第71页)。为了说明新中国的性质及方针政策,引用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第75~76页)。为了论述中共的发展史,引用了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的论述(第85~87页)。为了说明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引用了列宁1919年11月在东方各民族人民共产主义组织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报告的论述(第88页)。为了说明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引用了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论述(第90~91页)。为了说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引用了斯大林《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中关于十月革命意义的论述(第93~94页)。《三十年》中还有一些毛泽东论著的专门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以上提到的《三十年》引用经典作家论述基本上属借用来作理论分析的类型(拙文《历史研究中引经据典的误区》,载《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5期,将历史研究中的引经据典分为四种类型:①当作历史研究对象;②当作历史研究的史料;③当作理论分析加以借用;④代替史料)。借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来进行理论分析,往往较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有某些合理性。但科学研究贵在独立思考,不能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来代替自己的独立思考。经典作家的论述可用可不用时,最好不用。自己的思考能超越经典作家的论述时,更应该用自己的独立思考进行理论分析,就如《三十年》论长征的意义那样。中共党史研究中引经据典,在民主革命时期已开始,而在《三十年》以后日益严重。这大概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①长期以来政治理论著作写法的影响。②《联共(布)党史》的影响。③突出毛泽东,或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④崇拜经典的影响。这些影响很难说是积极的。在政论中引经据典另当别论,在史著中引经据典,并非都妥当。特别在历史研究中一味地引经据典,以为引经据典越多,理论色彩越浓,理论水平越高,这就会走向反面,造成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不良学风。《三十年》建国后中共党史研究引经据典的风气,这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值得具体问题具体研究。比如论述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人没有被征服,又继续战斗了,作为历史研究,摆出具体的史实,应该比引用一段毛泽东的话来说明,更雄辩、更符合历史研究的原则、规律,或者说更能体现学术价值,更符合学术研究的要求。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过多地引用毛泽东的论述来说明各种问题,不仅易于走向毛泽东史代替党史的不健康之路,也易于造成用毛泽东的是非来评定中共党史的是非的不科学倾向。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很多科学的论断,但他也有失误之处,他的某些个别论断是不正确的,或因为时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过时。如毛泽东对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一些论断就是不正确的。中共党史研究者的责任是借鉴毛泽东的正确论断,修正毛泽东的错误论断,发展超越毛泽东的论断。

### (2) 按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论述党史

党的决议,是每个党员必须执行的,胡乔木又参加了《决议》的起草,十分熟悉《决议》的内容、观点。《三十年》按照《决议》的观点来论述党史就是很自然的。如《三十年》对中共六大的一分为二的论述,就是《决议》的观点,有些文字就是《决议》的文字(第27页)。对李立三“左”倾路线的论述,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论述,也是《决议》的观点,并用了《决议》的一些文字(第34~35页)。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论述,也是《决议》的观点。作为中共党员,按照党的决议来论述党史,是合理的。作为建国初期很多史料、史实还来不及研究清楚时,搬用《决议》的论述,也是合理的。但当中共党史研究不断进展,一些史料、史实搞清楚以后,再盲目搬用,就不一定合理了。如《决议》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sup>①</sup>。《三十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sup>②</sup>。这样的论述在1951年是无可非议的。而以后搞清了遵义会议后推举张闻天为中央主要领导人(负总责),新的指挥军事的三人团中,由周恩来为主要负责人(下最后决心)。中央既不是以毛泽东为首,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谈不上确立。这些都清楚了,说明《决议》有不准确之处,如果再盲目搬用《决议》就不妥当了。《三十年》按《决议》的观点论述中共党史,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有合理之处,情有可原。但《三十年》开了按《决议》论述党史之风,不仅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影响到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之说长期以来一直被搬用,这就不尽合理了。到了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已有很大发展的今天,再坚持认为必须按《决议》的观点一成不变地写中共党史,就不妥当了。从今天的研究成果出发,《决议》中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之说不够准确,其他地方也有不妥当之处。如《决议》说:

1931年1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9页。

②《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36页。

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况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的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sup>①</sup>

这里认为王明路线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是受到“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的妥协和支持，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等人的批评，这样的批评现在看来，并不妥当。

《决议》可以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史实才是研究中共党史最重要的根据。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研究，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最重要原则。

### (3)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

或者说从政治原因、政治需要出发论史。《三十年》为中共建党30周年而作，是配合纪念活动、宣传活动的产物，或者说是纪念史学、宣传史学的产物。作为纪念史学、宣传史学的作品，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以史作政治宣传，是合理的，也是社会需要的。纪念史学、宣传史学作品，如果完全反映历史真实，就可以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如果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真实，那么，那些不真实之处，就不合理了，就会造成作品的矛盾性，即一部分合理，一部分不合理（实际上即使纯学术的论著，也会是合理和不合理部分的统一体，正确之处是合理的，错误之处是不合理的）。

《三十年》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说：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冬天开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以及其他同志在其他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他們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战争，成了新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sup>②</sup>

这里突出毛泽东是政治需要，同时也没有抹杀其他同志的功绩，这是实事求是的，合理的。《三十年》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各阶级的分析说：

毛泽东同志首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sup>③</sup>  
这里说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然大革命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3页。

②③《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28、17页。

时期是否是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呢？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1925年12月发表的（《三十年》作1926年3月，见第18页），而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不少领导人都发表过分析中国阶级关系的文章。如邓中夏1924年11月发表了《我们的力量》等文，强调了“只有工人阶级配做革命的领袖”。此外，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也对中国社会阶级作过研究分析（详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8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说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就不合理了。又如《三十年》中说：

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之下的先在鄂豫皖根据地后来转移到川北根据地的红军……在徐向前同志所领导的红军中工作的张国焘，由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曾经进行分裂和背叛党的活动……<sup>①</sup>

这里突出徐向前，贬低张国焘，自然是因为张国焘叛党在政治上是要否定的。但鄂豫皖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谁？徐向前与张国焘上下级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鄂豫皖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张国焘在1931年4月以后就到鄂豫皖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徐向前任红四军参谋长，后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是张国焘的下级。为了否定张国焘而不提张国焘曾是鄂豫皖红军的主要领导，甚至似乎把张国焘说成是徐向前的下级，这就不合历史事实，不合理了。《三十年》中还说：

1917年秋冬到1928年春，党还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组织了起义。其中湖南南部的起义，是朱德、林彪、陈毅等同志领导的；他们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以后保留的一部分转入湖南南部，在领导当地农民起义后不久，又率领部队和起义中组织的农军与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sup>②</sup>这里突出了林彪。建国初期林彪的地位比陈毅高，把林彪也说成是率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部队会合的领导人，并把林彪排在陈毅之前。事实上，林彪当时只是连长，率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部队会合的领导人是朱德、陈毅。为了突出林彪，把他说成是当时仅次于朱德的领导人，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是不合理的。

《三十年》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出现了一些不合理之处，怎么评价？首先，应该看到，这些不合理之处占全书的比例是少的。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合

①②《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31~37、26页。

理的,不合理的只是极少部分,而不是极大部分。其次,至1951年,胡乔木对党史,特别是军史还了解、研究得不够,是个客观原因。胡乔木1937年到延安,此前主要从事文化工作,对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很多史实没有亲历,《三十年》又是一个星期左右急就而成,无暇全面搜集资料、深入研究,于是将政治感觉当成史学感觉,从政治感觉出发论史,应该说这是可以原谅的。而以后大量党史资料陆续整理出版,基本史实日渐清楚,再故意违背历史史实从政治需要出发论史,就是史学犯罪,不可原谅了。《三十年》在建国初期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写作方法给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乃至历史研究,或多或少带来了些消极影响。到“文革”时期,这种消极方面的东西发展到极端,以至于“七真三假”盛行,完全不合理的假党史出笼。林彪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说法跃然纸上。这便是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走向反面,走向伪史学的恶证。

史学是可以为政治服务的,史家是可以从政治因素、需要出发研究史学、论史的。但其中有个合理与否的问题。怎样做是合理的,怎样做是不合理的,其中的原则必须把握住。这个原则就是必须从史实出发研究历史、论史,而决不能违背史实。史学是有科学品格、学术品格的,企图扼杀史学的科学、学术品格,把史学当作奴仆,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史学的审判。

## 2. 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

王实、王翘、马奇兵、章凌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1958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作者都是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教学的专家,此书是作为干部教育的教材,层次是较高的。从发行量来看,1958年9月第一次印刷就是十万册,至1962年7月第16次印刷,印数达153万余册,说明此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影响是不小的。以下略加分析。

### (一)版本

《简编》1958年出版,以后多次印刷。至1962年第16次印刷,虽仍用1958年版,但将1962年本与1958年本相比校,可看到已做了一些修改。其中最大的修改是1958年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的第二节的第五小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1962年

本中删去了。为什么删,作者没有作说明。这一节的内容,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产物这一命题,其中有些理论分析可能不够成熟,或者在当时有点忌讳。如谈到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按社会地位来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sup>①</sup>。这在当时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年代里可能有点忌讳。又如说:“即便社会主义产生了,如果它不与工人运动结合仍然是毫无用处的”<sup>②</sup>。这样的提法显然是不够成熟的。这一小节被删除不是偶然的。1958年本在论述中共一大时,谈到会议反对了李汉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了刘仁静极“左”观点<sup>③</sup>。这些论述在1962年本中也被删除了。此外,修改之处还有不少。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出版),1962年本中改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论述不少。

## (二) 史学思想

### (1) 宣传毛泽东

中共七大宣传毛泽东,新中国建立初期宣传毛泽东,是革命和政治形势的需要,是合理的。到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已完全树立起来,这时宣传毛泽东较多是出于个人崇拜的需要了,不合理的因素开始多起来。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发展,这对思想理论界、学术界产生影响,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更为直接。《简编》在建国初中共党史书对毛泽东的宣传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对毛泽东的宣传。

第一,拔高毛泽东。此前中共党史书,在论中共一大时,把毛泽东列在一大代表之首。《简编》不仅如此,在论五四运动时,也特别突出毛泽东。说:

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上,思想性最高的刊物之一,是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sup>④</sup>

并把1919年7月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是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及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没有的。这实际上就是说毛泽东1919年夏就完成了世界观的

①②③④《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24、26、31~32、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马克思主义转变，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过分拔高了毛泽东。毛泽东完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实际上是在1920年以后。

《简编》在论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时，特别强调：“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得最好的代表”<sup>①</sup>。这样的论断在胡乔木和胡华的书中也是没有的。这似乎在说中共一大之前，湖南工人运动是搞的最好的。实际上，中共一大之前，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工运工作的成绩是较大的。毛泽东领导湖南的工运并做出成绩主要是在中共一大以后。就是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做工运工作，开始也并没有经验，以后才有了经验。<sup>②</sup>

这些拔高毛泽东的做法，不只是宣传毛泽东、突出他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反映，实际上已有某些个人崇拜的因素包含其中了。

第二，较多介绍毛泽东的论著。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已开始介绍毛泽东的论著，而《简编》介绍毛泽东的论著更多，而且更多地列专节介绍毛泽东的论著。胡华的书列专节介绍毛泽东的论著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两篇。《简编》除了这两篇之外，又专节介绍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还设《毛泽东同志关于根据地建立的理论》专节，介绍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介绍毛泽东的论著成为中共党史论述的重心，论述中共党史以论述毛泽东的论著为主线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第三，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论断。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已开始引用毛泽东的论断来论述中共党史，《简编》引用毛泽东的论断论述党史就更多了，不少地方都是整页整页搬用毛泽东的论断。1960年《毛泽东选集》四卷出齐后，论述中共党史引用毛泽东的论断大为方便，以下以《简编》1962年版谈一下书中引用毛泽东论断的情况。以上提到的《简编》专节介绍毛泽东的论著，这些节一般都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81-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是整页整页搬用毛泽东的论断,少则1页多(如介绍《实践论》、《矛盾论》),多则7页(如介绍《新民主主义论》)。此外,整页搬用毛泽东论断的还有:在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6页引用)、军队建设(3页)、土地革命路线(1页);论述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6页)、论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4页)、论述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页);论述抗战时期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4页);论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斗争策略(6页);论述整风运动(5页);论述大生产运动(3页);论述中共七大(2页);论述1947年中共中央12月会议(4页)等都大段大段、整页整页引用毛泽东的论断。其他行文中也多处引用毛泽东的论断,似乎只要能引用毛泽东论断的,就尽量引用,似乎越多引用越好。如全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论述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就引用毛泽东的论断(第1页)。以后论述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引用毛泽东中国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资格更老的论断(第6页)。论述十月革命的影响,引用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第10页)。论述中共一大,引用毛泽东中国革命面的日焕然一新的论断(第29页)。论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引用毛泽东“机会主义起作用”的论断(第82页)。论述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军阀统治性质,引用毛泽东城市买办阶级与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的论断(第89页)。论述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意义,引用毛泽东“整个人类历史转折点”的论断(第228页)。论述抗战国民党战场,引用毛泽东“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的论断(第230页)。论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引用毛泽东“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的论断(第266页)。除了以上引用的论断及整页引用的论断之外,还有30多处引用了毛泽东的论断,其中有的地方引用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以外的论断。如引用毛泽东在人民政协一届会议上的讲话(第255页),引用毛泽东建国初期的讲话“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第296页)等等。粗略统计,《简编》引用毛泽东论断的总篇幅达80页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余。这表明用毛泽东论断论述中共党史的模式,以毛泽东论断作为评定中共党史是非的格局基本形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引用马、恩、列、斯的论断较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50年代末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引用毛泽东的论断成为主流。《简编》引用马、恩、列、斯的论断也有,但量很少,仅12

处左右，合起来 2 页左右，与引用毛泽东的论断相比是很少的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党史研究中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论断，介绍毛泽东的论著，一方面是宣传毛泽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与《毛选》出版，掀起学《毛选》、宣传《毛选》热潮密切相关。学《毛选》和学中共党史，宣传中共党史和宣传《毛选》已结合起来。同时，不可否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思潮的发展已经影响了中共党史研究，造成了中共党史书中介绍毛泽东的论著、引用毛泽东的论断日益增多。

### (2) 宣传中国共产党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政治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成为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中共党史研究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革命作用、领导地位，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全国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逐渐以中共党史课取代中国革命史课，这也推动了中共党史书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简编》在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面，较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有所发展。如论述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说：

1924 年到 1927 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次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组织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胜利。<sup>①</sup>

这里强调了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没有的论断，也比胡华的书更强调了中共的领导。《简编》也强调了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见 1958 年本第 248 页）。论述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强调了：“除了客观条件而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決定因素”<sup>②</sup>。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功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可以存在的。但如果只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而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忽视民主党派的作用，这是不妥当的。《简编》就存在这种局限性。如论述人民解放战争，谈人民群众的支援不多，谈民主党派的支持更少。

### (3) 总结、宣传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简编》的又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总结、宣传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与

<sup>①②</sup>《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 93、30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胡乔木、胡华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目的是相同的。《简编》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宣传大致与胡乔木、胡华的书相同，同时也反映出一些50年代末60年代初政治形势的影响。

《简编》1958年本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说：

在这个时期内，党终于认识了自己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同时也认识了各种“左”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并在与各种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中，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sup>①</sup>

这一段论述基本上是从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搬过来的（见《三十年》第42页）。《简编》1962年本对这段论述作了修改。将“真正的”马列主义领导者，改为“杰出的”马列主义领导者。同时在“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后又加了一句：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内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sup>②</sup>

这一修改，更突出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总结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突出毛泽东的正确杰出，或多或少是庐山会议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起来的反映。

《简编》有些经验教训的总结仍有现实意义。如总结解放战争的经验时指出：“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正和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党曾不断地整顿自己的队伍，反对各种不良的倾向……这是取得全国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sup>③</sup>。这里强调的整顿党的队伍的重要性，是有现实意义的。《简编》又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三大经济纲领等及“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一切正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指针”<sup>④</sup>。在反右派运动以后仍强调联合民主党派，强调统一战线政策，这在当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简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还强调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胜利”<sup>⑤</sup>。但没有强调马列主义应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胡乔木的书中很强调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相比之下，这方面的理论提

①③④⑤《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175-176、170、302、301~302、3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170页，1962年版。

炼,《简编》较胡乔木的书逊色,或许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一定的关系。

### (三) 史学成就

《简编》有不少地方是搬用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及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 (1) 中共党史民主革命时期的分期体系略有发展

胡乔木、胡华的书基本上都将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然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分四个时期。《简编》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独立为一个时期,将“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独立为一个时期,然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分为五个时期。这是对胡乔木、胡华书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是合理的。中共建党时期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有变化发展的,决定了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时期。分两个时期论述,更有助于清楚地认识中共发展的历史线索,有助于总结中共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正因为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划分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中共党史书基本上都采用了这样的分期。

《简编》只写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不涉及社会主义时期,与胡乔木书相比,与何干之1958年版《中国现代革命史》写至1956年相比,是一个缺陷,致使中共党史的分期没有进一步延伸、发展。这是《简编》作者缺乏政治的、学术的勇气和识力的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当时无所依据,遂不敢写了。

#### (2) 理论研究有所发展

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挖掘是不够的,而理论研究是有所发展的。《简编》即是如此。如《简编》论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专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一小节,其中不仅对经验教训进行了提炼,而且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先指出了它的主要错误是:第一,在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陈独秀一贯否认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因而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投降主义政策,一切顺从资产阶级,企图用让步、妥协来取得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以下举例论证)……第二,对于农民革命的态度问题上,陈独秀在北伐战争中对农民革命的基本态度是“不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要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能

带有阶级的色彩”，多方阻止农民革命斗争，不许农民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当广大农民已经起来消灭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时，陈独秀提出“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来保持地主阶级武装维护封建统治……第三，在武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问题上，陈独秀机会主义集团忽视掌握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意义。他始则容忍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反革命阴谋，继则反对北伐，最后交出了工农群众的武装……接着又对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性质作了分析，指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党内的反映”。并指出：“在阶级斗争中，敌对阶级的思想时时刻刻在影响和腐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党内不坚定的分子接受这种影响，以非无产阶级思想来反对无产阶级思想，以机会主义的路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是革命斗争的规律。这个规律，不但为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所证明，而且为后来党内反对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错误所证明”<sup>①</sup>。这样的理论分析，胡乔木的书中没有（篇幅有限，不可能展开分析），胡华的书也没有这样深入的分析。表明理论研究发展了。但这样的理论分析是否客观、准确，仍是值得研究的。这里对陈独秀路线的批判，已或多或少带有当时“大批判”的色彩。如果将《简编》对陈独秀路线的分析批判与1991年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陈独秀的分析批判相比较，可以发现《简篇》的局限性。

《简编》对李立三“左”倾路线也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其错误是：第一，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幻想革命马上胜利……第二，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第三，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幻想全世界革命同时爆发并同时取得胜利……第四，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又指出：这次错误路线的产生，主要是“左”倾分子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不承认客观规律<sup>②</sup>。《简编》对王明“左”倾路线，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又专设一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产生的根源》，对三次“左”倾路线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集中的分析。指出，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小有产者，他们都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具有劳动性和私有性两重本质。“我们党不仅从党外说是处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包围

<sup>①②</sup>《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82~84、123~124页，1962年版。

之中，而且在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也占着很大的比重。因此，小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有各式各样的反映，是不足为怪的”。《简编》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共党内反映的特点也做了分析，指出：第一，在思想方法方面，表现为主观主义……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表现为左右摇摆……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sup>①</sup>这些理论分析也较胡乔木、胡华的书发展了。此外，《简编》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建党路线、军事路线、土地革命路线也有很多篇幅的理论分析，尽管大量引用了毛泽东的论断，但表明理论研究的发展，是无疑的。

中共党史的理论研究应该发展，同时又应该客观、准确、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研究。

### (3) 资料工作略有进展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篇幅小，采用资料很少，《简编》篇幅达 22 万字，是胡书的 4 倍，自然资料采用就多了些。说《简编》资料工作略有进展，只是与胡乔木的书比较而言，实际上当时的资料整理出版很有限，采用的资料是不多的。

从思想理论资料来看，《简编》运用毛泽东的论著资料很多，前已论述。但中共党史书应适当采用毛泽东论著的资料，应多采用中共中央的文献资料、档案资料才是。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状况的资料，《简编》采用了很多统计数据，基本上每个历史时期都采用了一些统计数据，有的前人已用过，有的前人还较少采用。但有一个缺点，即都不注出处，也就难以查核。如论述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谈到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资本的膨胀说：

据 1946 年 5 月的估计，四大家族占有全国产业资本的 80% 以上，全国银行 4389 家，有 2446 家，即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四大家族的；“接收”敌伪的商业财产的总值据他们自己公布是 4 万亿元，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要大的多……<sup>②</sup>

这里的数据没有出处，据“估计”，什么人的估计，没有说明。如果翻阅一下 90 年代的中共党史书，可以看到，《简编》中的一些数据已经不用了。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谈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时说：

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 6200 亿元法币。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 146 ~ 52 页，1962 年版。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 252 页，1958 年版。

实际数字当远不止此数(据吴承明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一书所提供的资料,1944年日本在华投资总额即达61.63亿美元。此类资产除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接收,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它的各级官员侵吞、隐匿、变卖了)<sup>①</sup>(按:括号中的文字,书中是作为注释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采用的资料,注明了出处,比《简编》“实”得多,且接收财产的价值数字有所不同。

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文献有所采用。如中共二大、三大的文献有所运用,并注明来源于胡华编的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见1962年版第30~31、36页,1958年版没有注明出处)。中共四大的资料也采用了,但没有注明出处(见1962年版第48~49页)。1927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文献资料采用了,也没注明出处(见1962年版第82~83页)。这些资料的采用,表明《简编》较胡乔木的书资料多了,但仍然很有限。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还做得不够,只有《革命史参考资料》几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成书于40年代,但在五六十年代还没有公开。中共一大的文献资料,50年代已由苏联移交中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在当时没有解密,没有公开发表,自然无法采用,致使《简编》对中共一大的论述不够准确。如认为中共一大指出,“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党都应当利用”<sup>②</sup>。这是不准确的。中央档案馆在草创之中,档案的整理出版还没提到议事日程。这些都使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工作受到限制。《简编》没采用什么档案资料,是可以理解的。但报刊资料的收集、采用,《简编》也很少,这应是主观努力不够的反映。

《简编》的资料工作较胡乔木书有所发展,但与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比较,似乎还有点差距。如胡华的书采用了1922年6月15日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胡华书1953年版第42~43页),1924年9月10日中共第三次《对时局主张》(胡华书第54页),“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发表号召全国一致抗日的宣言(胡华书第138页),等等,这些资料,《简编》都没采用。胡华书还引用了孙中山(第56~57页)、蒋介石(第151~152页)等言论资料,《简

<sup>①</sup>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sup>②</sup>《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32页,1958年版。



编》也没采用。

总的来说,《简编》资料工作的略有进展及局限性,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及中共党史研究的氛围密切相关。

#### (四)史学方法

##### (1)实事求是

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原则和方法。《简编》有些地方能够实事求是论述,有些地方还不够实事求是。

论述中共一大召开,胡乔木书、胡华书基本上只论述了其重大意义,《简编》还指出:“当然,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准备等方面也还有它不足的地方,党的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也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的”<sup>①</sup>。这里指出了不足,有实事求是之意。因为中共一大的文献当时还看不到,所以对于中共一大纲领的不足之处,还无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简编》在论述中共三大以后,对中共创立时期作了小结,肯定了成绩,同时也指出:“这个时期的党还是幼年的党,是缺乏斗争经验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对于工人农民的政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等等,却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sup>②</sup>。这样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简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提到了《新青年》、《湘江评论》,还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尚有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评论》等”<sup>③</sup>。这也有实事求是之意。但《简编》过分拔高《湘江评论》(详前),这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简编》在介绍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突出了李大钊、毛泽东,而贬低陈独秀,说陈独秀是“急进民主派”<sup>④</sup>,这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的。《简编》在论述中共一大召开,介绍出席代表时,搬用了胡乔木《三十年》中的提法,只提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四人<sup>⑤</sup>。而胡华的书在此四人外还提了王烬美、邓恩铭、李达、刘仁静四人,共提了八人。尽管胡华书没有提12人的姓名,但《简编》只提四人,相比之下实事求是方面稍有逊色。

《简编》某些地方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也有不够实事求是的,详下。

##### (2)较多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

胡乔木《三十年》已开始较多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详前),《简编》有了

①②③④⑤《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34、45、17-18、16-17、31页,1958年版。

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更多地引用毛泽东的论述(详前)。这种引经据典的做法有些并非是合理的,前已有论述,此不再重复。总的来说,在历史研究中、中共党史研究中引经据典的发展,容易助长教条主义的风气,助长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风气。比如《简编》论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已开始准备内战,只用了毛泽东的论断:他们正在“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sup>①</sup>按照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说明任何问题,最好摆出具体史料、史实。说国民党正在准备内战,摆出其调兵备战的史实即可,这才有说服力。如果只用毛泽东的一个论断来说明国民党正在准备内战,说服力是不够的。这样研究历史,显然反映出某些教条主义的风气。不可否认,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理论界、学术界的教条主义风气有了滋长,《简编》可以说是这种不良风气滋长的一个反映。

### (3)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

胡乔木《三十年》按照《决议》的观点论述中共党史,这也是一种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的反映。《简编》不仅按《决议》的观点来论述党史,而且还按胡乔木书的观点来论述党史,不少地方直接搬用了《三十年》的论述。如《简编》论述中共二大,指出有功绩也有缺点(1958年版第37页),这个评价就是搬用了《三十年》的分析。《简编》对中共三大的论述(1958年版第43页),对中共五大的论述(1958年版第87页)等,也基本上搬用了《三十年》的分析。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的观点,《简编》也搬用了(1958年版第160页)。这种从某种政治原因出发的因袭式的研究,合理与否,前已有论述,此不再赘述。这种因袭式的研究不能使研究发展,是无疑的。而不进则退,这也是自然规律。《简编》给刘少奇以较突出的论述,这也是政治因素决定的。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刘少奇在国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特别是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主席以后,政治地位更高了。《简编》不仅引用了刘少奇的一些论断,如多处引用了刘少奇《论党》中的论断(见1962年版第154、235~236、238页等),还引用了刘少奇1950年6月《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62年版第237页)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领导人中被引用论断的除毛泽东之外的第二人,其他人的论断就没有怎么引用,足见对刘少奇地位的突出。此外还在一些史实的论述中突

①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256页,1958年版。

出了刘少奇。如1958年版《简编》在论述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时说：

这个运动中的左翼——因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恽代英、陈独秀等人，则同时在这一运动中传播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传播了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sup>①</sup>

这里还提到了陈独秀，尽管排名在末尾，而1962年版将陈独秀名字删去了（见1962年版第16页）。这里把刘少奇排在毛泽东之后，说刘少奇在五四运动中就宣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五四运动前后，刘少奇忙于中学毕业的考试及到北京报考大学，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详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0页）。为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突出刘少奇，遂拔高五四时期的刘少奇，这是不妥当的。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造成不实事求是，这就不合理了。联想到“文革”时期在政治上否定刘少奇，因而中共党史书中也全盘否定刘少奇，表明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很易变成因风修史、改史，很易走上实用主义歧途。政治因素不应该成为治史的主要原则，实事求是才是治史的主要原则。

### 三、中国革命史研究

#### 1.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

胡华（1921—1987），浙江奉化人。1937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不久因战事学校停办，回到家乡宣传抗日，并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38年11月到达陕甘宁边区，先入陕北公学普通班学习，后又入高级研究班。1939年2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起在解放区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教学。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授，曾任中共党史系主任等。曾是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共党史人物传》主编。先后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主编了《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

①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16页，1958年版。

等,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是胡华1949年秋编写的中共党史教材,经吴玉章修改,陆定一、胡乔木、胡绳、钱俊瑞等同志讨论、审定,最终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书名,195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不断修订,至1953年3月出版了修订后的第11版,各地不断翻印,仅上海至1954年就第18次印刷,印数达43万余册。1981年4月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增订本。《初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革命史教材(也是中共党史教材),与胡乔木的《三十年》一样,都是建国初期极有影响的中國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下面就此书略作一分析研究。

### (一) 史学思想

#### (1)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用、革命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使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建设新中国就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初稿》编写的重要目的,就是为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做一点贡献。《初稿》出版后社会影响、社会效益很好,主要原因也就在此。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目的、特点,是宣传中共的革命作用、革命功绩,三四十年代是这样,五六十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初稿》宣传中国共产党,从书的章节标题中就有鲜明的体现。《初稿》第二章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中第二节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正确组织原则和政治路线的奠定》。这里强调了“正确”。第三章论述国共合作,其中第二节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对国民党合作的促进》,第三节的标题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都突出了共产党的作用。第五章论述中共建立红色政权,标题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揭起了红色政权的新旗帜》,强调中共开始了新的革命。第七章论述“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斗争,标题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卖国殃民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通过国共的比较,突出共产党的正确、革命性。第八章论述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其四节的标题分别是:《从七七事变到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中两条路线的出现》;《从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蒋介石集团的动摇……》;《敌后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长》;

《中国共产党政治威信的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些节都称颂共产党，批判国民党。第九章论述抗战相持阶段，第十章论述抗战反攻阶段，其中节的标题有：《八路军新四军成长为抗战的主力》，《解放区成为反攻的主力，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也称颂共产党，批判国民党。

《初稿》在行文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功绩、作用，也有很多称颂。如对1921年至1927年的历史进行总结时指出：

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推动和组织之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无数革命青年在一起，埋头苦干地担负了最实际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动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形成为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些奇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垂不朽！<sup>①</sup>

《初稿》指出，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相当于俄国1905年的“总演习”，经过这次总演习，使中国人民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长城、民族的柱石，因而，即使在后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也是要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的颜色，听一听共产党人的主张；而每当我们民族国家处在最危难的时候，全国人民总要求共产党人出来。这次总演习，对中国人民正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我们也可以说：若没有1924年到1927年的总演习，则1949年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便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以上两段分析，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功绩、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大革命历史也作了充分肯定。这种很高的赞扬，在以前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中是没有的，在以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中也是很少的。《初稿》写到抗战胜利为止，没有写解放战争，但在书的结

<sup>①②</sup>《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105、10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修订第11版。

尾强调：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和胜利，就规定了中国人民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的发展和胜利。胜利的光荣，永远属于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属于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sup>①</sup>

这里强调了胜利属于人民，也强调了胜利属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功绩作了充分的有感情色彩（喊口号式）的肯定。《初稿》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称颂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可以说表达了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感情。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是应该的，是合理的。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向全国各阶层人民宣传共产党是必要的、重要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新中国树立新政治领导核心需要的。如果《初稿》仅仅作为政治教材，作为政治宣传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作为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就有个实事求是、客观评价的问题。也就是要对中共的功绩、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肯定，同时不能忽略、轻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功绩，也不要忽略民主党派的作用、功绩。此外，也不要对蒋介石国民政府进行脱离事实的批判。如果用学术的眼光来审视《初稿》，还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对人民群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述很少。对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述很少，而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作全盘否定论述，这显然是不够妥当的。

#### (2) 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宣传新领袖，使全国人民团结在新领袖周围；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全国树立新的精神支柱，这是建国初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初稿》把宣传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为写作的重要目的是很自然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成果，大多形成于中共七大之前，书中宣传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很少，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将宣传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政治

<sup>①</sup>《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268页。

形势变化、政治任务变化的反映,是自然的、合理的。《初稿》宣传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在书的章节标题中已有鲜明的体现。如第一章论述五四运动,其中第五节的标题是《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从办〈湘江评论〉到做工人运动——五四时期最正确的方向》,专节宣传五四时期的毛泽东。第四章论述大革命,其中第五节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章论述土地革命战争,第一节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红色政权新旗帜的揭起,毛泽东领导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造》。第八章有《……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发表》一节。第九章有《……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一节。第十章有《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一节。在章节的标题中突出毛泽东,专节论述毛泽东的实践、思想,称颂他的功绩,这在建国以后的革命史、党史书中,《初稿》首开风气,并对以后的革命史、党史书有很大影响。

《初稿》在具体论述中也很突出毛泽东的地位、作用。如论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说:

当时最有价值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术论文,是鲁迅的小说如《狂人日记》、《孔乙己》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则是影响及于华南各地。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地较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了。<sup>①</sup>

这里一方面肯定了李大钊、陈独秀,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毛泽东,实际上在说,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介绍到中国是有贡献的。《初稿》又说:

从办《湘江评论》——新文化运动,走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五四时期最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的代表,就是毛泽东。<sup>②</sup>这里进一步突出了毛泽东的地位。在论述中共一大时,《初稿》强调了:“大会在讨论党章时,反对了合法主义的观点和极‘左’的观点……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中,毛泽东等提出了正确的主张……”<sup>③</sup>突出了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的作用。

宣传毛泽东,突出毛泽东的地位、作用,在建国初期是需要的,也有积极

①②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15、18、27~28页。

的作用。但与宣传中国共产党一样，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违反历史事实。《初稿》说毛泽东代表了五四时期最正确的方向，就有点拔高毛泽东。说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反对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也有点牵强。中共一大上还谈不上出现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本人也曾经这样说过，再说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是做记录的，很少发言，是否对一些“左”的观点、右的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也没有确实的材料（详见拙文《中共一大上毛泽东是否反对了“左”右倾思想考》，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2期）。

《初稿》中引用毛泽东的论断来论述党史的地方很多。如第一章论述五四运动，就有8处引用了毛泽东的论断。第五章论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创建红色政权，有10处引用了毛泽东的论断。其中的第一节第一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遍及全国的白色恐怖》，仅三页半，就有3处引用了毛泽东的论断。如论述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性质，引用了毛泽东“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的论断（第112页）。论述新军阀统治中国的状况，引用了毛泽东“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的论断（第113页）。论述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引用了毛泽东“又继续战斗了”的论断（第114页）。

《初稿》中介绍、论述毛泽东的论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等已设专节，此外，设专目介绍，或在行文中专门介绍的还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也引用、介绍很多。《初稿》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强调：

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对于中国社会、革命诸问题，能够在理论上正确地、完整地、而又实际地加以解决，发展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并长期领导全部中国革命事业前进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是继续了发展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也是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规模和各项革命政策的由来。<sup>①</sup>

<sup>①</sup>《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184页。



对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作了全盘肯定的赞颂。这是《初稿》为什么较多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是符合《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符合中共七大以后宣传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政治形势要求的。这样的宣传有积极的作用,但作为中共党史的学术研究来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完全妥当,是不是会引发某些消极影响,前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初稿》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进行了总结。但其总结的深度还不及胡乔木《三十年》,总结的广度也不及《三十年》,因《初稿》只写到抗日战争结束。

## (二) 史学成就

### (1) 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体系

《初稿》以论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内容,所以论史从五四运动开始,并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初稿》从五四运动写到抗日战争,分为五四运动、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四个时期。可以说与胡乔木《三十年》的分期是基本相同的。《三十年》没有把五四时期独立出来,而在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追述了五四运动。《初稿》把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为一个时期,与《三十年》一样,其主要原因是按照《决议》及毛泽东的观点论史。《初稿》的分期体系与《三十年》一样,给予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中国革命史、讲中国革命史,只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只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而不涉及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分期体系、内容体系,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一个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重的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主。这是当时的革命形势、革命任务所需要、所决定的,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当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有了新的内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重点跟随社会、形势的发展发生变化是自然的。《初稿》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以宣传中共领导的革命,总结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经验教训为主,是社会、形势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政治需要决定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宣传中国共产党,让全

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是理论界、学术界的重要任务。研究中国革命史,把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助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所以《初稿》以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主,是当时社会、政治需要的,是有积极社会作用的。《初稿》所以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巨大的影响,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也在此。这是《初稿》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贡献。当然不可否认,《初稿》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也起了某种“框定”作用,束缚了研究者的创造性研究。而且,研究中国革命史,不研究旧民主革命,不将新、旧民主革命作比较研究,革命史的研究不能深入,这也是一个局限。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思想路线,解放了思想,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的研究才不断有了新的突破,中国革命史研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旧民主主义革命也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分期体系有了新的发展。

#### (2) 做了些资料工作

《初稿》不仅引用了不少毛泽东以及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资料,也引用了一些历史资料。这是《初稿》与《三十年》的一个明显区别。《初稿》的篇幅是《三十年》的3倍,原因之一即在此。《初稿》引用的资料是较广泛的。中共方面的资料,如1922年6月15日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第42~43页),1924年9月10日中共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第54页),1924年11月25日中共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第55页)等都有引用,也提到了中共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内容。如陈独秀起草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第93~94页)等也有引用。如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报(第238、252~254页)也有引用。统计资料也引用了一些,如中国红色救济会关于1927年至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人数的统计(第113页),如《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中关于1929年至1931年全国灾区的统计。此外,孙中山临终前给苏共中央的信,全文引用(第56~57页)。1931年9月23日蒋介石的演说词,也有引用(第152页)。张继等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护党宣言》(第53页),胡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第7页),抗战开始后美联社关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议和的报道(第213页),国民党《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第215~216页),阎锡山与日军谈判条件(第216页),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军所拟停战条件,《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中蒋介

石对陶德曼活动的讲话（第198页）等等也都有引用。因为资料工作较为扎实，所以叙史就较详细。如叙述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报刊，就提到“除《新青年》外，北京有《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上海有《星期评论》，湖南有《湘江评论》，成都有《星期日》等”。报纸有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及《时事新报》的《学灯》等<sup>①</sup>。如叙述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读物，说：“全国不下千百种，单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知识》、《东北知识》、《生活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每种都销售几万甚至十几万份以上（如《大众生活》）”<sup>②</sup>。如叙述“二七”运动就用了两页篇幅，其中记述了林祥谦的英勇气概，记载了他“头可断，工是不上的”的气吞山河的语言。记述五卅运动用了一节12页的篇幅，运动的前后过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交涉条件（第64页）等都有记述。又如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及其发展也有专节的记述，有5页篇幅，从第一军到第七军的建立及其领导人都有记述（第172页）。西安事变也有专节记述，西安事变的过程，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第179页）等都有记述。这些都说明《初稿》做了很多资料工作。重视资料工作，尽可能详尽地叙史，这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革命史的特点，也是胡华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特点。这是胡华给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的一个好的导向。当然，因为当时资料建设还未全面展开，《初稿》的资料工作仍然是有限的。

### （3）做了些理论研究工作

《初稿》的理论研究与胡乔木《三十年》相比，是略逊一筹的，胡乔木的理论修养是胡华所不及的。《初稿》总的来说以资料见长，但理论研究也有所展开，而且某些方面是有深度的。如《初稿》对中国工人阶级特点的分析，先指出了他与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具有的特点：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然后指出他的独有的特点：①受压迫深，革命性强。②走上政治舞台就受到了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最有觉悟的阶级。③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易和农民结成革命联盟。最

①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14、169页。

后又指出了他的弱点：人数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低（和资产阶级比较），内部还存在一些农民意识、行会观念、流氓习气等<sup>①</sup>。这里对中国工人阶级特点一分为二的分析，在今天来看仍然是有深度的，只是个别的观点可以商讨。这样的分析，以后很多革命史的著作、教材都沿用了，说明其分析的合理性及理论研究的影响。而这样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在《三十年》中是没有的。

《初稿》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其错误第一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第二是忽视农民土地问题，第三是放弃武装斗争，第四是忽视政权问题，第五是没有正确进行党的建设<sup>②</sup>。这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分析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但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当时是很有深度的。这样的分析在《三十年》中也是没有的。

《初稿》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与《三十年》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到。如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的理论问题，《初稿》没有进行研究，而《三十年》作了研究。《初稿》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至论述很少，似乎回避了中共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的错误，这与《三十年》比较也是逊色的，尽管《三十年》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研究批判也只是初步的。

### （三）史学方法

#### （1）较多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革命史、中共党史已开始引用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体现了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指导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1945年《决议》通过以后，特别是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以后，政论、史论引用毛泽东的论述多起来。《初稿》沿续了这一风气。《初稿》中引用毛泽东的论述来论史的地方很多（详前）。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论述论史也有一些。如论述五卅运动掀起中国革命高潮，就引用斯大林“中国革命运动底力量是不可计量的……”（第60页）等。如论述应重视农民问题，就引用斯大林的两段论述，并用以说明毛泽东与斯大林

①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24～25、106～107页。

的意见是相同的(第95~96页)。不仅如此,《初稿》为了论史还引用了刘少奇的论述,如论述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就引用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论述(引24页)。还引用了陈伯达的论述,如论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就引用了陈伯达《关于十年内战》中的论述(第119~120页)。这种引经据典论史的做法,如何评价,前已有论述。总的来说,叙史、论史应以历史资料为据,而不应以某人的论述为据;应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而不应拘泥于前人的研究;应发扬光大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应沾染教条主义的风气。

### (2)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

按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论史,即按照政治决言论史,这是一种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的反映。《初稿》中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第146页)的观点即是《决议》的观点。按《决议》论史如何评价,前已有分析。

突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历史作用、地位,这也是《初稿》中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的一个反映。此外,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中共和政府中、军队中地位较高的人,给予了突出的论述,这也是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的一个反映。如建国初期刘少奇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较高,《初稿》中就给予突出的论述。如记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写到:

在北方则有刘少奇、邓中夏等帮助工人设立劳动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十人团的工作。<sup>①</sup>

如第四章第四节设《在刘少奇领导下,武汉工人收回租界》一目。说:“武汉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袖刘少奇指导之下……”最后收回英租界<sup>②</sup>。在该章第五节中又谈到: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和刘少奇、苏兆征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仍在蓬勃发展着”<sup>③</sup>。建国初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较高,《初稿》也给予突出的记述。如谈到北伐军中的叶挺独立团“干部和战士都是英勇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像林彪、粟裕、周士弟等)……”<sup>④</sup>谈到井冈山会师时说:“朱德、林彪、陈毅率领原南昌起义的部队……四月间和湘南农军八千余人,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sup>⑤</sup>这类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如何评价,前已有论述。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如

①②③④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26、84~85、98、79、119页。

果符合历史事实,是合理的,如果不符合历史事实,就不合理了。如说刘少奇在中共建党前就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这就没有历史根据。说刘少奇领导了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这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但领导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的第一领导人是李立三,第二领导人是刘少奇(详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98页),只提刘少奇,不提李立三,这有失实事求是之意(不提李立三自然是政治因素决定的)。又如记述井冈山会师,将林彪的名字排在陈毅之前,这也有失实事求是之意。史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但史学不是政治的奴仆。史学为政治服务,应注意其合理性、科学性。政治感情色彩,《初稿》中还是有所反映,这也是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的体现。如口号式的叙述(第268页,详前),如“蒋介石匪帮”的提法(第136页)等。建国初期从政治宣传需要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感情出发,作有感情色彩的论述,有某些合理性,但这在科学研究中是应该避免的。

### (3) 实事求是

《初稿》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有某些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初稿》较重视史料、史实,努力追求实事求是叙史。

《初稿》对某些史事、人物还是能够客观地记述。如记述五卅运动,谈到上海总工会成立,指出,李立三是委员长,刘华是副委员长(第63页)。没有因为李立三犯过错误,回避之。如记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提到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并“当选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不到任)”(第74页)。没有回避毛泽东在国民党中的实践活动。这类客观的记述是有实事求是之意的。

《初稿》还较注意记述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如记述北伐军,除了记述叶挺独立团之外,还提到了以林伯渠、李富春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参加的第六军、第二军的功绩(第86页)。如论述南昌起义以后中共领导的各地起义,除了提毛泽东以外,还提到了彭德怀、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张云逸、邓小平创立右江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等建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贺龙等创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刘志丹、高岗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徐向前等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说:“此外海南岛、广东、陕西、江苏等省都有农民起义……”<sup>①</sup>在论述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时,除了提陕甘宁边区外,还提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率

<sup>①</sup>《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121~122页。

领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豫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创建的晋绥根据地,邓华、宋时轮、李运昌等领导的冀热辽根据地,曾生等领导的华南根据地,还提到了山东根据地、华中根据地等<sup>①</sup>。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众多人物及其功绩的记述,既突出了集体,也客观地记述了历史,并且使述史较为详细。这类的记述也是有实事求是之意的。

当然,《初稿》可以更客观地述史,可以更多地记述中国共产党的众多人物。特别是注意避免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就可以在实事求是方面更进一步。不可否认,建国初期中共党史资料的建设还没有全面展开,这也影响着客观述史、更多地记述中国共产党的众多人物。

## 2.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

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人。原名谭郁君,学名谭秀峰。1936年以后用“何干之”笔名写文章,遂以笔名行。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教育系。在学校里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参加一些革命活动。1929年避地日本求学,进一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东京参加了抗议日本侵华的斗争,并毅然回国。1932年任广州国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主讲《中国经济》、《社会科学》等课程,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933年底由于受到广州反动当局通缉,避地上海。在上海找到了共产党组织,193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党组织调往延安,担任陕北公学的教师。先后在陕北公学高级班和普通班主讲《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三民主义研究》及《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并担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1939年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后,调入该校任教。后任华北联大法政学院院长、政治学院院长等,主讲《新民主主义论解说》、《思想方法论》等课程。1948年8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社科部副主任、主任,兼社会科学系主任。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先后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等。受高教部的委托,开始组织编写《中国革命史讲义》。1959年初,为了批评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左”的倾向,开设了一门新课——《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

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第204~206页。

②刘炼:《何干之》,载《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7月印行。

题》。明确说：“我开这门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左’”<sup>②</sup>。课还没讲完，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何干之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1960年被借调到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61年开始撰写《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1963年初稿完成。1965年上半本刚排印出清样，下半本还未来得及整理付印，“文革”很快爆发，何干之受到迫害。1969年11月16日因心脏病突发，倒在北京郊区农村的田间小路上与世长辞。“文革”结束后，何干之得到平反。遗著经夫人刘炼整理亦相继重版或出版。主要著作已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何干之文集》及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何干之文集》（三卷本）。

《中国现代革命史》（以下简称《革命史》），是由《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修订而成。1950年高教部决定在全国高等院校开设《中国现代革命史》课程，委托何干之编写教材。在何干之主持下，先由北大、清华、北师大的一些中国革命史教师写出初稿，然后由何干之修改，陆续印发各高等学校，供中国革命史教师教学参考，并征求意见。根据一些学校的意见，由何干之再度修改后，1954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高校内部试用教材，书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6年2月出版第二版。第二版较第一版有不少修改，并增加了抗战中《对敌斗争中的民兵斗争》、解放战争中《党的新区政策和新解放城市政策。党关于加强党内纪律性和健全党委制的指示》两节。此书1956年7月北京第13次印刷，印数达116万余册，1956年9月天津第15次印刷，印数达130万余册。足见当时影响很大。1956年底至1957年初，何干之根据中共八大的精神，根据各地提出的新的意见，再一次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为及时供应教学上的需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上册，1957年6月出版，下册1958年2月出版。两卷本书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字数由原来的29万字扩展到33万字，下限由原来的1952年延伸到1956年。1964年应外文出版社的要求，何干之再次对此书做了较大修订，准备译成外文出版。然修订完成后，未及翻译出版，“文革”爆发。幸亏手稿保存完好，“文革”结束后，由刘炼重新整理，1985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下以1957年6月、1958年2月出版的两卷本为主，对此书作一分



析研究。

### (一) 史学思想

#### (1) 宣传中共八大精神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总结，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为党的建设，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中共八大以后，何干之认为有必要根据八大的精神进一步修订《革命史》，以宣传八大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1957年出版的《革命史》上册，何干之写的出版说明中说：

这一次，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精神，同时根据高等学校教师们和广大读者两年来使用本书时所提出的意见，以及我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经验，由我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正和补充。<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根据中共八大的精神进行修正、补充，就是为了使《革命史》能体现和宣传中共八大的精神。这是《革命史》修订的指导思想的明确的体现。

中共八大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强调了要健全民主集中制，要反对个人崇拜。这一精神在修订的《革命史》中得到了体现。如1956年版《革命史》的《导言》中说：

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对人民敌人进行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的经验，研究党和毛泽东同志对党外各种反动思想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进行猛烈斗争的经验，就能帮助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提高政治警觉性。<sup>②</sup>

1957年版的《革命史》，这段话修改成：

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人民敌人进行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经验，研究党对党外各种反动思想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的经验，就能帮助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提高政治警觉

①《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卷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6月版。

②《中国现代革命史讲议（初稿）》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2月第2版。

性。<sup>①</sup>

这里将1956年版中的“毛泽东”删去了。这是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精神的体现,实际上也宣传了这一精神。

修订的《革命史》下限到1956年,增写了一届全国人大、宪法的内容。其中特别指出了“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制度为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一切国家机关都要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指导自己工作”<sup>②</sup>。在记述一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之后,书中强调:

人们可以相信,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以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组织经验,使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sup>③</sup>

这里强调了“集体主义”原则。这样的论述,既宣传了宪法的精神,也宣传了中共八大的精神。

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开始产生、发展,这就修正了中共八大的路线、思想理论。中央主要领导人中断了八大某些路线、思想理论的贯彻执行,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思想理论界、学术界。《革命史》虽然体现、宣传了中共八大的一些精神,但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就没有体现、宣传中共八大的思想理论,特别是下册1958年2月出版,在反右派运动以后,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1957年6月19日)之后,自然也就宣传中央对中共八大精神修正的精神了。《革命史》谈到:

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是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最彻底的革命。所有制改变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因而除了经济战线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外,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这是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sup>④</sup>

这里体现和宣传的已不是中共八大的精神,而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

①《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1~2页。

②③④《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85、388、39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民内部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精神了。《革命史》宣传八大的精神虽然不够全面、彻底，但还是宣传了一些八大的精神，这在50年代末是难能可贵的，是应该肯定的。

### (2) 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斗争提供借鉴

何干之与胡乔木一样，研究历史注重现实的研究。1954年版《革命史》写到1952年土改完成、“三反”、“五反”运动；1957年至1958年版《革命史》写到1956年6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正是何干之重视现实研究的体现。正因为关注现实，所以何干之特别注意总结现实社会的经验教训，来为现实服务。《革命史》在《导言》中谈到，研究中共领导党内外斗争的经验，能“帮助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提高政治警觉性”

（详前），这就是研究革命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的一个体现。《导言》中又说：

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就能领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路线和经验，就会通晓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的规律的知识，用以武装自己。<sup>①</sup>

这里指出了领会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重要，领会经验教训就能通晓社会发展、政治斗争的规律，而用历史经验教训、社会发展规律武装自己，就能更好地投入现实斗争，在现实斗争中头脑清醒，不迷失方向，不走弯路。这是研究革命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的又一个体现。从何干之的这些论述中，可以体会到，何干之研究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为现实服务。

《革命史》对现实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中深刻而极有价值的是对肃反及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书的最后一章（第十五章）第三节是《肃清反革命运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其中谈到肃反运动时指出：

在这次运动中也曾经发生过某些缺点和错误。在这次运动之前，即在1954年春至1955年春，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的阴谋破坏估计不足。1955年下半年运动开始，在斗争中，一方面对于反革命的破坏，还没有完全加以制止，有些重要的反革命案件还没有适时破案；另一方面又逮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的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完全不应捕的人。在

<sup>①</sup>《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1页。

机关内部，有的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偏向，斗了少数不应该斗争的人。同时，也有些人过高估计敌人分化瓦解的趋势，因而产生了新的麻痹情绪。<sup>①</sup>

在革命史书中指出建国初期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是第一次，难能可贵。正因为看到了缺点，错误，自然也就能够比较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革命史》指出肃反工作的经验教训是：

肃反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严肃和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等等<sup>②</sup>。

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呢？《革命史》指出，即：

针对着每个时期敌人活动的情况作出恰当的估计，使肃反部署符合于客观情况的发展。必须重视真凭实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讯）的方法。<sup>③</sup>

《革命史》强调，只有很好吸取这些经验教训，“才能领导复杂尖锐的肃反斗争，掌握肃反的规律，提高自觉性，避免盲目性，克服‘左’右错误倾向”<sup>④</sup>。这里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深刻的，也是大胆的。提出了要克服“左”右错误倾向，特别是提出了要克服“左”倾错误，这在当时是有理论勇气的。建国以后，何干之在革命史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很注意反“左”，这便是一个体现。《革命史》对肃反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有指导意义，对此后的现实政治也有指导意义。就是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这样的总结不仅有深度，也有深远意义。

《革命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非常重视。指出，“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是十分必要的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是镇压敌人，同违法现象作斗争，同时保护人民。“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深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有保障，他就不会受到任何人和任何机关的侵犯”。如何完善法制建设，《革命史》提出了两方面的具体工作。一是“公安、检察、法院必须执行审判、侦察、起诉分工的法律程序，发挥法院、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既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约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总结过去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的各种法规，而原有许多法规，也

①②③④《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89、388~389、389页。

应当加以适当修订”<sup>①</sup>。这里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提出,显然是与深入总结肃反的经验教训密切相联的。同时这些意见也是中共八大精神的反映、宣传。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有指导意义,对此后的现实政治也有指导意义。联想“文革”中出现的“无法无天”的现象,就更能看到这些意见的宝贵,更能体现《革命史》深刻的思想性。

何干之有浓厚的经济理论修养,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经济问题就有深入的研究,1934年出版过《中国经济读本》。他对于新中国的经济问题、经济建设也给予特别的关注,《革命史》中有很多篇幅论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对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也进行了总结。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革命史》指出,“党和政府的任务首先是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须的前提条件”<sup>②</sup>。这个总结是抓住要害,有深远意义的。在总结土改的经验时指出:“全国土地改革之所以获得伟大胜利,是由于执行党中央的正确的土地改革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指出中央中立富农的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中立富农的政策,“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采取这个政策,就更进一步孤立了地主阶级,并有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sup>③</sup>。正是由于政策的正确,土地改革顺利完成,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这里对建国初期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给予肯定,也是有深远意义的。关于工矿企业的建设,《革命史》指出,工人阶级在接收企业以后,一边恢复生产,一边进行民主改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发掘生产潜力,推广先进经验,实行经济合算,提高劳动生产率”。指出开展劳动竞赛,也是有积极作用的<sup>④</sup>。这里对企业管理、建设的经验的总结,对此后的工矿企业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的问题上,《革命史》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需要的,这是列宁的思想。但其他经济部门,农业、轻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也不能忽视。“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又指出:“依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和建设,这是苏联的经验早已证明了的,但是,在我国,还必须解决

①《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90-391页。

②③④《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52、363、369~370、375~376页。

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来逐步建立计划经济的问题”<sup>①</sup>。这里的总结,最有价值的是提出了要正确对待苏联的经验,要走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的思想。这里虽仍未摆脱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框(这是当时社会、政治的局限所致,是难免的),但能提出走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的思想,是卓识。当然这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这些精神的一种宣传。此外,强调了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也是卓识。

以上可见《革命史》对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深刻的,是有很大成绩的。《革命史》在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教训时,反映出了局限性。书中全盘肯定了毛泽东当时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7月省市县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全面地、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右倾的错误思想和行动,并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步骤。<sup>②</sup>

强调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就是党内右倾思想。必须加以纠正,才能使农业合作化运动走向高潮”<sup>③</sup>。这里经验教训的总结,紧跟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理论,只批右没有批“左”,没有作一分为二的总结,反映出了局限性,即当时政治形势的局限所致(1958年版的《革命史》对农业合作化的“左”的做法有所批评)。

何干之研究革命史开始注意反对个人崇拜,并特别重视现实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为现实服务,这是何干之研究革命史指导思想的特点和优点。何干之写作《革命史》的指导思想与胡华写作《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的指导思想相比,已有所变化、发展,这是革命史研究史学思想的一个进步,也是革命史研究的一个进步。

## (二)史学成就

### (1)发展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

《革命史》以前的革命史书、中共党史书,如胡华的《初稿》、胡乔木的《三十年》等,一般以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主,同时追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史》的第一章是《五四运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一章的开始,首先扼要叙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论述了中国封建

①《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75~376页。

②③《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92、392页。

社会的特点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并且长期停滞不前。并指出，在鸦片战争以前，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将缓慢地但又必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sup>①</sup>。这些论述使中国国情得到更深刻的反映，从而有助于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作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就会有更全面更清楚的认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认识、理论问题的论述，就有了历史基础，就能更深入更准确。比如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比较就能有深刻准确的认识。论述中国现代革命史，追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和特点，这是何干之高超的宏观研究、理论驾驭能力的反映，是革命史研究体系的一个发展。作为革命史教材，首先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的概况和特点，有助于学生全面认识、把握中国的国情。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高等院校把中国革命史作为必修的政治理论课，并强调进行国情教育，接受、光大何干之的革命史研究体系就很自然了。很多革命史书，都首先论述中国古代社会的概况、特点。如陈旭麓主编的《中国革命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章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负荷与深远的社会基础》，专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概况和特点，第二章再论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变化及其特点。这样的体系正是何干之《革命史》体系的继承、发展。

《革命史》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专题论述。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标题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败》。其中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两次革命斗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作了重点研究、分析。最后指出：“鸦片战争后，旧式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都失败了，都没有完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要完成这个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新的阶级及其政党来担负领导的责任才有可能，这个阶级和政党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sup>②</sup>。通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然后引出以上的结论，就比较自然、合理。研究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有利于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有利于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比较研究可以使研究更深入，更有

<sup>①②</sup>《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3-4、7-8页。

说服力,何干之的革命史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篇幅是较多的,从客观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不长,自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幅就不多。新中国建立后,胡华《初稿》作为第一本革命史出版,客观上因为书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不叙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自然的。但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不将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比较研究,研究就不能深入。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主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但并不忽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研究,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研究更深入,这是何干之高超的宏观研究、理论驾驭能力的又一个反映,是革命史研究体系的发展。这样的革命史研究体系,以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肯定。

在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方面,胡华《初稿》、胡乔木《三十年》一般都按照《决议》、毛泽东的观点及《毛泽东选集》的分期进行分期(详前),此后的党史书、革命史书也没有大的突破。而何干之《革命史》有了较大的突破。胡华《初稿》以一编为一个时期,全书分四编。胡乔木《三十年》以一章为一个时期,全书分五章(最后一章为《三十年的基本总结》)。何干之《革命史》全书分为十五章。1954年版的十五章与1957年至1958年版的十五章略有不同。兹将1957年至1958年版的章名列于下: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19.5—1921.6)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7—1923.12)

第三章 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革命运动的高涨(1924.1—1926.7)

第四章 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急阶段(1926.7—1927.7)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低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1927.8—1931.9)

第六章 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共产党纠正党内“左”倾路线彻底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1931.9—1935.12)

第七章 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国内和平的新时期(1935.12—1937.7)

第八章 抗日战争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和建立抗日根据地(1937.7—1940.12)

第九章 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



(1941.1—1942.12)

第十章 解放区开始局部反攻。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3.1—1945.9)

第十一章 日本投降后中国人民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斗争(1945.9—1946.6)

第十二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略防御,人民解放军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1946.7—1947.6)

第十三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略进攻,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1947.7—1949.10)

第十四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1949.10—1952)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3—1956.6)

以上这样的章节体系,从中共党史分期的角度来看,是对《三十年》、《初稿》的一个突破和发展。这里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分为三个阶段,虽然不能说完全抓住了历史发展的特点,但基本上还是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阶段的命名,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解放战争的几个阶段的划分和命名,基本上被以后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书所沿袭。《革命史》将抗日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上、下限及命名,与现在革命史、党史书三个阶段的上、下限及命名不同。现在一般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阶段(1937.7—1938.10)、战略相持阶段(1938.11—1943)、战略反攻阶段(1944—1945.9)。何干之的阶段划分与现在不同,主要是出发点不同。何干之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出发来分期,而不是从抗战全局的发展阶段出发来分期。何干之的出发点反映出他写革命史突出共产党的思想,这在建国初期,在反右派运动以后,是政治形势决定的,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不可否认,这样的出发点,这样的分期和命名,对于中共党史来说,也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缺陷的。写革命史,写抗战史,回避或忽略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是不妥当的。《革命史》把新中国成立最初七年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即第十四和十五章,这段历史是何干之第一个写入革命史的,这两个阶段的划分也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阶段的命名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第十四章的命名

不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开始，而又突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这既符合历史实际，又非常巧妙，含义深刻。“国民经济恢复和改造”，是反映1949年10月至1952年历史实际的，当时的国民经济既有恢复的一面，也有进行调整、改造的内容，土改、“三反”、“五反”，可以视为“改造”。第十五章的命名，反映了当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当时把三大改造视为“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完成，也即社会主义革命完成。这样的命名（观点），现在看来是值得研究了。

《革命史》的历史阶段、历史分期的划分，反映了何干之的独立思考。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分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分期及其命名，何干之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都较前人有所发展，都对革命史研究体系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同时，也是对革命史研究的理论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 (2) 丰富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

胡华《初稿》、胡乔木《三十年》的内容偏重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何干之的《革命史》研究了更多的内容。

何干之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对中国经济问题很有研究，这使他的革命史研究经济方面的内容大大增加。如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一步的发展”，就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工矿企业的发展，以及洋务运动中中国工矿企业的发展。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引用了大量的经济统计数字。第六章第二节论述“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就论述了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如何通过金融、商业、工业、农业等各方面的垄断，掠夺全国人民财富，引用了很多经济统计数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建设问题，何干之更为关注，更注意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所以经济方面的内容及其篇幅也就较多。如第十四章第二节是《解放初期经济状况。实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基本方针》。全节都是论述建国初期的经济问题，并且很有深度。如这一节中谈到，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以后，“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民经济和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开端。但是，这个转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暂时困难”。物价下跌，打击了投机商人，“但同时也给一般工商业者以很多的困难”。“它会使生产者不敢进行再生产，消费者不愿购买，商人不愿进货，结果就会使生产萧条和商品滞

销”。接着分析了生产萧条和商品滞销的原因。一是“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和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二是过去适应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若干工商业如洋货店、钱庄、西服店、金银首饰店等，不符合人民的需要而倒闭。三是有些私营企业机构臃肿庞大，企业经营的方法不合理，造成亏本、歇业。四是生产的盲目性，引起许多工商业的减产、停工、倒闭。但由于政府的努力，这种萧条现象很快成为过去。<sup>①</sup>以上的一些分析有值得讨论之处，但表明《革命史》研究经济的内容是多的，而且是有深度的。《革命史》对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分析同样是有深度的。

《革命史》研究经济的内容较多，还表现在论述形势背景时，往往先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和背景。如论述中国大革命、国共统一战线的背景，先论述国际形势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暂时稳定。论述苏联的形势，先论述经济形势，再论述政治形势。论述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也是先论述经济形势，再论述政治形势<sup>②</sup>。论述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也是先论述经济形势，再论述政治形势<sup>③</sup>。又如论述“1929年至1932年国际形势”，先论述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再来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sup>④</sup>。再如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也是先着重分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再分析政治形势<sup>⑤</sup>。不仅很重视经济形势的分析，而且分析是有深度的。

《革命史》重视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反映。社会变化发展的最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原因，只有重视经济原因的分析研究，才能使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得到最深刻的说明。革命史的研究，向经济问题扩展，何干之带了好头。《革命史》中不少经济问题分析的观点被以后革命史、中共党史书采用。也有些经济问题分析的观点，是何干之的大胆探索，如对新中国初期统一财政经济以后曾经带来短暂的萧条的论述和分析，就是何干之的大胆探索，以后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一般没有这类的探索和观点。经济问题的一些新探索，也是对革命史理论研究的新探索、新贡献。

①⑤《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53~354、287-290、287页。

②③④《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55-56、57-58、151~154页。

《革命史》对民族问题也有论述、研究。第十四章的第三节有一半篇幅论述了建国初期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其中谈到：

解放后，国营贸易机构已经深入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用合理的价格，供应各族人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收购土特产。根据民族的自愿，有些民族的农业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一部分牧业区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人民政府用各种方法帮助各族人民发展农业和牧业生产。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县都建立了卫生机构。少数民族的人口正在逐渐增长。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状况也不断改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有了现代工业。内蒙古和新疆开始建设规模巨大的钢铁、有色金属和石油的工业基点。党在少数民族中采取了积极、慎重地发展共产党员和普遍、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在那里建设了党和培养了干部。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改善文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了充分的尊重。<sup>①</sup>

对于西藏的和平解放及其民族工作的胜利作了重点论述。不仅论述了民族工作的成绩，对中共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及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经验教训也作了总结。指出，马列主义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中建立各民族真正合作的区域自治，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原则，注意各民族历史特点和差别，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而新中国正是这样去做的。第一，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用彻底的民主主义来解决民族问题。第二，新中国以各民族平等友爱互助为出发点，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来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第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汉族应当帮助其他兄弟民族，各少数民族应当认识汉族对他们帮助的重要。第四，国内各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步骤应有所不同。<sup>②</sup>这表明《革命史》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有广度也有深度。《革命史》增加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这在此前的革命史研究中很少，在此后的革命史研究中也很少。反映出何干之研究革命史的广阔视野及卓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论述了民族问题，阐述了中共的民族政策，无疑，何干之

①②《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60~361、359~360页。

受到了影响、启发。关注现实问题的他，关注民族问题，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总结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这是必然的。

《革命史》作为 50 年代的成果，研究内容方面的局限性还是存在的，特别是对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论述还是太少，并缺少客观的分析、评价。

《革命史》研究革命史的内容、范围有所扩大，对以后的革命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后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使革命史的研究内容在《革命史》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3) 理论研究有进展

何干之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作过不少研究，《革命史》在理论研究方面有进展，有浓厚的理论色彩，是很自然的。如《革命史》第一章第三节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及对中国的影响，就作了以下的分析：①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②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转变，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新时代。③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根本转变，开辟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时代。④是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斗争方法、组织形式和思想体系的根本转变，开辟了马列主义和第三国际统治的新时代。⑤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信心，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力（神），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⑥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变为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的一部分。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列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解放自己的真理。<sup>①</sup>这里的理论分析，在今天看来虽有可讨论之处，但在 50 年代是有深度有贡献的，因为《初稿》、《三十年》等书中没有这样的理论分析，而且《初稿》对十月革命意义的分析基本上就是引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见该书第 8 页），而《革命史》的分析是以何干之自己的独立研究分析为主，这是很可贵的、值得提倡的。

《革命史》在论述李立三“左”倾错误时，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其错误是：①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革命在全国到处一样，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同样地尖锐化，没有根本区别。认为只有中心城市起义，形成全国革命高潮，才能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②不承认革

<sup>①</sup>《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 13-15 页。

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错误地认为革命力量的初步发展和当时军阀战争，就已经造成了武装起义的条件，全国各地都可以马上举行起义。

③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必须在世界革命总爆发下，才能成功。④忽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因而对中间阶级规定了“左”倾冒险主义政策……<sup>①</sup>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初稿》、《三十年》中是没有的，也是有深度的。

《革命史》不仅对中共有关理论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也对其他很多问题作了理论分析。如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戴季陶主义也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指出它的基本内容和反动实质是：①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认为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必采取斗争方式，可以用仁爱之心去感动资本家，使他们尊重工人的利益。②以“国家”、“民族”为最高原则，而所谓“国家”、“民族”是以资产阶级为主，而工农必须处于从属和被统治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③主张建立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共产党员应当信仰三民主义，承认三民主义是惟一的理论，国民党是惟一救国的政党……企图消灭共产党。<sup>②</sup>这里的理论分析是必要的，有深度的，对大革命史的研究是有益的。而这样的研究分析在《初稿》、《三十年》中是没有的。从对戴季陶主义的研究，也可以看到《革命史》研究、论述的内容是较广泛的。

《革命史》每一个大的时期都有“结束语”，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及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其中也有一些很好的理论分析。在研究每一个时期的经验教训时，在研究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民族等问题时，都进行了理论研究。《革命史》在理论研究方面是取得了不少进展的，对后来的研究者有不少启迪。如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中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分析，基本上是搬用了《革命史》中的分析（详见《简编》第123-124页）。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的某些地方也借鉴了《革命史》，如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分析等。

①②《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140、76页。

### (三) 史学方法

#### (1) 实事求是

《革命史》与胡华《初稿》、胡乔木《三十年》相比较,在实事求是方面是有进步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一分为二。《革命史》对中共建立作了一分为二的论述。一方面指出了中共建立的伟大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成分在党内占极大多数,成为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指出了党在成立之前,缺乏马列主义思想上的充分准备,党成立以后,又立即投入革命斗争,没有充分时间在全党进行思想工作,在思想建设不足的情况下,“左”右倾机会主义能够在党内暂时取得统治地位。<sup>①</sup>这样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有理论研究深度的,同时也有现实意义。而这样的分析在《初稿》、《三十年》中是没有的。

《革命史》在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运动时,一方面对工人阶级作了肯定,另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影响和侵蚀工人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小生产者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小生产者的传统习气也不断地影响工人阶级。工人中出现了不遵守劳动纪律,过高地要求生活福利、做投机生意、购置土地、囤积粮食、在私营工商业中参加股份等现象。因此在工人群众中不倦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宣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是必要的。<sup>②</sup>这里对工人阶级一分为二的分析,在50年代是要有勇气的,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极高的。这样的分析,是有实事求是之意的,在《初稿》、《三十年》等一些党史、革命史的书中是没有的,而且至今看来仍有新意,有现实意义。这样的论述、分析也有理论深度。

《革命史》中这类的一分为二的论述、分析是不不少的。如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某些地方的过左的土地革命政策进行了批评(上册第144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肃反工作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了批评(详前)。既肯定成绩,又批评不足,这都是一分为二的体现。当然从今天的研究水平来看,《革命史》的一分为二还不够彻底,有些史实、人物的评价还没有一分为二,

①《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38页。

②《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71页。

这是 50 年代的政治形势、社会状况、研究水平决定的,在当时对毛泽东及其相关的事就不可能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论述。

第二,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减少。《革命史》对毛泽东仍有较突出的论述,但比起《三十年》、《初稿》,《革命史》对毛泽东的论述已客观得多。如论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主要论述李大钊的实践和思想,不再提毛泽东。<sup>①</sup>在论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产生及初期活动后,即先论述北京、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再论述毛泽东的生平及其早期活动。指出毛泽东是 1920 年初第二次到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以后,“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sup>②</sup>,不再说毛泽东 1919 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革命史》仍然提到《湘江评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当时国内思想性最高的一个刊物”<sup>③</sup>)。《革命史》在论述中共一大时,提到出席代表是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没有提会上毛泽东反对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提:“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反对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右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种是‘左’的冒险主义观点……”<sup>④</sup>这比起胡华《初稿》论述中共一大客观得多(《初稿》说:“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中,毛泽东等提出了正确的主张……”该书第 28 页)。《革命史》对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突出的论述,同时也论述了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右江左江等革命根据地及其一部分领导人。《革命史》对其他各革命根据地论述的篇幅较胡华《初稿》更多(《初稿》仅二百字左右,《革命史》一千字左右)。

《革命史》论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时不再提刘少奇,论述大革命时期汉口租界收回,也没有提刘少奇。在论述井冈山会师时,只是说“朱德同志率领的在南昌起义的队伍,由湘南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的队伍会师……”<sup>⑤</sup>不再提林彪的名字。这些说明《革命史》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减少了很多。即在实事求是方面前进了一步。

《革命史》在论述抗日战争时,不仅注意论述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还设专节(第九章第四节《对敌斗争中的民兵斗争》)论述抗战时期民兵的作用,并分四个部分论述:①民兵在反扫荡斗争中。②民兵在反蚕食斗争中。③民兵在反清乡斗争中。④民兵在生产斗争中。充分肯定了民兵在巩固抗日根据

①②③④⑤《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 19-21、32、38、128 页。



地以至打败日本侵略者中,起了重大的作用。<sup>①</sup>这也说明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突出重要政治人物的做法有了改变。开始重视人民群众及其作用的研究、论述。这既是实事求是原则和方法的反映,也是唯物史观、群众观点的反映,是革命史研究的进步。

## (2) 史论结合

50年代,中国史学界争论的一大热点是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从《革命史》全书来看,史、论关系的处理还是较合理的,一般都是先史后论,史论结合。《革命史》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都在结束时进行总结。如第二章的“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结束语”、第四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语”、第七章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语”、第十章的“抗日战争结束语”、第十三章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语”等,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总结部分,也就是集中“论”的部分。这是先述史后做论的一种形式。在具体的述史过程中,也注意从史料的分析中引出结论。如论述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转入低潮,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就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所有的赤色工会都被封闭,赤色工会完全处在秘密状态中,不能公开活动。工人及其领袖被镇压,工人中比较有斗争经验的分子,差不多80%都被杀害或被开除了。工人斗争的特点表现为:①极大多数是经济斗争。1928年下半年上海工人的斗争,因改善工资待遇而起的占92%,其他为8%。②斗争大多是自发性的。自发斗争占49%,黄色工会发动的占12%,赤色工会领导的占37%。③参加罢工的工人,店员和手工工人占很大数目,产业工人还未恢复元气。④斗争胜利占22%,部分胜利占19%,失败、无结果占59%。然后引出结论:“在反革命恐怖之下,城市工人运动的高潮暂时过去了,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工人阶级的斗争,由进攻性质转为防御性质”<sup>②</sup>。这里引用的资料很有说服力,引出的结论自然也很有说服力。

《革命史》在论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城市接管工作时,先谈到:

鉴于在新收复城市中曾经发生过违反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行为,党中央决定对于攻城入城部队和接管人员,进行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教育,进行爱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纪律教育。党中央指出城市

①《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262~264页。

②《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册第120~121页。

一经解放,城市中的一切都将永远属于人民,不应当使它遭到任何的破坏。规定攻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的责任,而没有处理的权利,后方机关不得派人到新收复城市购买物资或做生意。

然后谈到解放军如何与城市地下党组织、人民群众互相配合接管城市。最后引出结论:“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接管城市的正确方针,由于接管人员执行了党的决定,由于新解放城市中人民群众的护厂护校斗争,这就保证了用战争夺回的人民财产,原封不动地交还人民”<sup>①</sup>。这里述史是充分的,引出的结论也就实事求是,有说服力。

总的看来,《革命史》的史论结合是做得较好的,以经典作家的论述代替史料的现象,基本上是没有的。

### 3.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编写始于1956年。1956年春,当时的高教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李新、彭明等起草中国现代史大纲。是年秋天,高教部指定李新、彭明和山东大学孙思白等组成中国现代史编写小组,根据草拟的大纲编写讲义。后又有北师大王真等参加。1958年冬,初稿完成后,征求了意见。高教部再指定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复旦大学)、陈旭麓(华东师大)等进行补充、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又有中国人民大学路尔铭、冷超,吉林大学刘耀,湖南师大谭双泉,甘肃师大任翰,郑州大学林德龙,北师大王桧林、王文瑞,山东大学李兆彩、王兆良等以及其他教师、进修生、研究生多人参加工作。会集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专家。1959年8月修改稿完成。1959年10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第二、三、四卷1960年、1961年、1962年相继出版(出版社略有变化)。书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之所以不称为“中国现代史”,是因为作者们认为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的历史才是中国现代史。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既不能称为中国现代史,称中国近代史又不合适,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最合适。此书是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来编写的,故又加“通史”字样。此书第一、二卷的第一版为内部发行。出版后又征求了意见,再

<sup>①</sup>《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第337-339页。

进行了修订。1962年7月,此书的第一、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第一版”。至此一至四卷都公开出版。“文革”期间,此书遭到批判。“文革”结束后,1978年以后,此书又数次重印。

此书署“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编”。领衔主编李新1919年生,四川荣昌县人。原名李忠慎。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曾任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约集同志数人,徒步去延安,入陕北公学。3月重新入党。以后较多从事青年工作、教育工作。1948年参与负责中共中央华北局青委工作。后到华北大学组建青年团,任团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以后又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文革”结束后,还兼任过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等职。李新1953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中共党史,从此一直进行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教学工作,并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组织工作。五六十年代他领衔主编了《通史》。70年代初起领衔主编多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大事记》。70年代末起领衔主编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还推动了《末次资料》、《满铁资料》的整理出版。他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下以60年代出版的《通史》为主,作一些研究、分析。

### (一) 史学思想

60年代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受当时的政治形势影响很大,《通史》也难免。当时的政治形势的特点很重要,①阶级斗争的理论发展起来,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发展起来,《通史》中对中间路线、民主党派人物的批判,或多或少受到这方面的影响。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发展,这是庐山会议以后的一个重要政治动向。从《通史》的全书看,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全书的一个主题,用当时的话来说,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如果说何干之《革命史》对毛泽东的宣传较以前略有“降温”,体现了中共八大的一些精神,那么,《通史》对毛泽东的宣传较何干之以前“升温”了。以下对《通史》宣传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略作论述。

#### (1) 突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在章节目录中提毛泽东增多,评价更高。如第一卷第二章第四节论述马列

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设一小节《毛泽东的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实际上强调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共建党前，毛泽东已经注意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样的评价有点过分拔高了。再说，当时注意深人工农群众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工人运动的成绩，比当时的毛泽东更好。《通史》这一小节的提法，在此前的书的目录中是没有的。又如第二卷第二章第九节设一小节《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胡乔木《三十年》等书中已有，但将这样的说法在目录上反映出来，《通史》是第一次。这样的观点是《决议》的观点，但并非是很准确的。在这一小节中，引用了刘少奇《论党》中的话：

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sup>①</sup>

这是对毛泽东全面肯定的评价。在 40 年代，在树立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时，说这样的话是需要的，是合理的。但如果从科学的精神、态度出发，说这样的话，没有一分为二，绝对化，就欠科学了。实际上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民主革命时期有过失误，遵义会议以后的土城之战的失败，就是一个失误。在 60 年代引用这样的话（庐山会议上林彪也说过类似的话），实际上就有点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味道了。

《通史》在章节目录中提毛泽东的论著及思想理论很多，如：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以上第一卷）

毛泽东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建党的理论

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

毛泽东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毛泽东对理论工作的巨大贡献，《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以上第

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 223 页，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7 月版。

## 二卷)

毛泽东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

毛泽东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毛泽东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上第三卷)

毛泽东《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以上第四卷)

毛泽东这么多论著、思想理论,放在书的目录上,这是第一次。此外,不上章节目录,论述毛泽东思想理论也还有一些。如第二卷第三章第七节第五小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主要就是介绍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三卷第四章第三节《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重点介绍的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第四卷第三章第十节《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虽然《通史》的篇幅较大,论述的内容较多,论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篇幅在全书的总篇幅中比例是小的,但绝对篇幅较以前诸书多,如此突出毛泽东,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个人崇拜色彩。

## (2) 以毛泽东的理论、论著指导历史研究

中共七大以后,以毛泽东的理论、论著指导政治研究、历史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发展,以毛泽东的理论、论著,即以毛泽东的论断,研究、论述政治、历史问题,渐渐形成风气,《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更有助于这种风气的形成。《通史》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引用毛泽东的论断论史的地方也不少。如《通史》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就引用毛泽东“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sup>①</sup>的论

<sup>①</sup>《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版。

断，概括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又如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发展，就引用毛泽东“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sup>①</sup>。论述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sup>②</sup>论述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引用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③</sup>论述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引用了毛泽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四段（条）论断。论述五四运动意义的篇幅约1400字，其中毛泽东的话占四分之一左右<sup>④</sup>。论述新三民主义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异同，引用了毛泽东“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sup>⑤</sup>。论述1945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引用毛泽东“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sup>⑥</sup>。

如《通史》第二卷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论述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形势，引用了毛泽东“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的论断<sup>⑦</sup>。这一节论述新军阀统治，引用毛泽东“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两段（条）论断<sup>⑧</sup>。这一节论述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引用了毛泽东“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sup>⑨</sup>这一节计8页余，引用了五条毛泽东的论断。论述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引用毛泽东“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论断<sup>⑩</sup>。论述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引用毛泽东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者半破产的

①②③④⑤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第23、25、57、73-75、185-186、18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版。

⑦⑧⑨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5-6、7-8、40页。

境遇”<sup>①</sup>。论述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愚民政策，引用毛泽东“造成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sup>②</sup>。第二卷第二章第八节第三小节《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篇幅3页，引用毛泽东的论断4条。第四小节《红色区域的政权建设》，篇幅3页半，引用毛泽东的论断5条。第五小节《红色区域的文教建设》，篇幅3页，引用毛泽东的论断2条。论述长征的意义，引用毛泽东“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400余字一大段话。<sup>③</sup>

如《通史》第四卷第一章第三节《中国共产党为反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斗争》，3页篇幅，引用5条毛泽东的论断。第五节第一小节《解放区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3页出头篇幅，引用3条毛泽东论断。第八节第一小节《解放区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的开展》，2页半篇幅，引用9条毛泽东论断。第二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国共产党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方针》，3页半篇幅，引用11条毛泽东论断。第三章第四节第一小节《中国共产党的新区政策》，3页出头篇幅，引用5条毛泽东论断。第三章第八节第五小节《决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和胜利的原因》，4页篇幅，引用5条毛泽东论断……

以上所列举的引用毛泽东论断的情况，还不包括那些专节介绍毛泽东论著、理论的部分。说明《通史》引用毛泽东论断述史、论史的现象是不少的。《通史》中引用毛泽东的论断，不仅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字，也引用了一些《毛选》以外的文字。如毛泽东给延安平剧研究院编导的信（第三卷第377页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第一卷第1页引），如《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二卷第97、212页引），如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第四卷第68页引）等。这表明搜集毛泽东的论断是千方百计的，是用毛泽东论断指导历史研究的鲜明体现。《通史》所以要用毛泽东的论断指导历史研究，正如《通史》第三卷论述抗战时期“各派反动史学的破产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时强调的：“毛泽东最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正确处理历史遗产问题”（第300页）。“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许多著

①②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47、97、232页。

作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等，是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文献，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光辉著作”（第298页）。这表明作者们认为毛泽东的论著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指南。应该说毛泽东作为一个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规律的认识是深刻的，是有真知卓见的，但并不能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准确全面的认识。所以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历史研究是正确的，但如果用毛泽东的每一条具体论断来指导历史研究，就未必完全妥当。引用毛泽东的一些精辟论断来述史、论史，未尝不可，但如果一味地、多多益善地引用毛泽东的论断，那些不必引用的地方也引用，那些引一二句即可的地方却作大段大段引用，完全用毛泽东的认识来认识历史，来述史论史，这就容易走向教条式的史学研究，容易扼杀史学研究、科学研究的创造性。《通史》也引用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的论断，甚至还在大革命史的论述中专设一小节《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第一卷第五章），但主要引用、较多引用的是毛泽东的论断。这表明60年代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中引经据典的风气在发展，同时也反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发展。

## （二）史学成就

《通史》的史学成就、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 （1）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向通史发展

通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体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纵向“通”，古今贯通。“中国通史”，就是写中国从古迄今的历史。二是横向“通”，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贯通，融为一体。《通史》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引向“通史”方向，主要是向横向贯通的通史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以来，多以研究政治、军事为主，涉及经济不多，涉及思想文化更少。何干之的《革命史》颇重视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思想文化方面仍不够重视，所以何干之《革命史》不能称为“通史”。而李新等编写此书，就是要把这段历史作为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来写，要把它写成“通史”。《通史》的前言中写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应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为中心，同时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但是，目前要编写这样的通史是很困难的。这一历史时期，既缺乏完备的资料，又缺少成熟的专史，例如关于这一时期的民族史资料即很缺乏；关于这一时期经济史、文化史等专著，也不多见……我们迫切地希望各方面的专家，及早写成各种专史，然后再由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富有研究的同志，在各种专史的基础上编写出高质量的通史来，那我们这部书就算完成了它的过渡的任务了。<sup>①</sup>

这里表达了作者编写通史的决心和愿望。一方面在困难的条件下仍“力图在革命史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另一方面也希望抛砖引玉，希望高质量的通史早日问世。这表明作者们认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一定要向通史发展，并决心和学术界的朋友、同志们一起努力。

《通史》在横向贯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有的是开创性的努力。

如对中国社会经济及其史的研究，《通史》设了一些专节进行论述，这是以前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的。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日、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加强》，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第三章第二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迟滞和农村经济的凋敝》，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情况。第二卷第一章第五节《国民党反动统治初期的社会经济》，论述了20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出现、民族资本受到打击、工农生活痛苦的情况。第三章第二节《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加紧及其影响》，论述了日本在华的各方面经济扩张，影响到了英、美利益、四大家族利益，也影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造成了四大家族、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倾向。第四卷第一章第九节《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继续高涨》，第一小节是《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迅速恶化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空前膨胀》，第二小节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继续高涨和下关惨案》。第三章第九节《国民党反动统治走向总崩溃》，第一小节是《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体系的瓦解和经济生活的混乱》，第二小节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四分五裂及其“和平攻势”的破产》。以上章节的设置，不仅说明《通史》中有一定的篇幅来研究经济问题，也表明，正是重视了经济问题的研究，才使

<sup>①</sup>《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卷首。

社会政治的变化得到了深刻的说明。

再如思想文化的研究,《通史》设了很多专节,占了较多篇幅,这是开创性的,是以前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的。《通史》第一卷第三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运动的新发展》,其中第七节是《文化思想的斗争》,论述了中共的宣传教育工作,以及文化界反对封建复古派的斗争、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等。第四章《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高涨》,亦设一节《文化思想界的斗争》(第九节),论述了中共的宣传教育工作,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非基督教运动)、反对买办、封建文化的斗争。第二卷第一章第九节《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斗争的开展》,设三小节: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和文艺战线上的斗争。②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毒害。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③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其中第二小节,特别介绍了杨贤江(李浩吾)1930年出版的《新教育大纲》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理论的宣传。思想文化中的教育思想理论,以前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基本上是空白。第二卷第二章第十节《白色区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围攻和反围攻的斗争》,设六小节:①国民党法西斯的反动宣传和对革命文化围攻的失败。②买办、封建知识分子反动言行的破产。③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分化。④历史问题的争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⑤辩证唯物主义和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战。⑥在斗争中发展的左翼文艺。其中第三小节对黄炎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理论作了分析研究。第四小节中对郭沫若、吕振羽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作了论述。这在以前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也是空白。第二卷第三章第五节《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和文化界的新启蒙运动》,介绍了陈伯达、艾思奇等发起的反对异民族奴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及一切愚民政策的新启蒙运动。这在以前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也是空白。第二卷在论述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统治时,设《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奴化教育》一小节。在论述红色政权的发展时,设《红色区域的文教建设》一小节。《通史》第三卷论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也设《解放区的文教建设》一小节。第三卷第一章第十节《抗战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章第九节《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第三章第九节《抗战后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第四章第七节《抗战后期文化阵线上的成就》,都对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哲学、文学、文艺、史学、教育等各领域的斗争作了研究、论述。很多是以前革命史、中共党

史书中所没有的。第四卷第三章第七节《革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设三小节：①解放区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新闻、教育事业的危机。②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和成就。③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新成就。其中第三小节介绍了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及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这是以前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没有涉及过的。《通史》对思想文化的研究较多，也较深入，这是《通史》的一大特色。当然其中有些分析，有些观点、评价，在今天看来是不妥当的（详下）。

民族问题的研究，何干之《革命史》中有所涉及，但主要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民族问题，还很少涉及。《通史》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设了专节，用了很多篇幅，对于民主革命时期民族问题的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通史》第一卷第二章第六节《中国各民族革命斗争的新阶段》，论述了中共建党时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情况。这一卷的1959年版，这一节为两个小节：①中国各民族斗争的新阶段。②中国各少数民族和台湾人民的觉醒。没有论述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1962年版，这一小节为三个小节，即在原来的两小节中插入了一小节《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增述了蒙古族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这种增补，正是极重视民族问题及其史研究的最鲜明体现。第一卷第三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运动的新发展》，第八节《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分为两小节：①中共二次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意见。②少数民族人民民主革命的发动。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的民族政策及中共领导的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第四章《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高涨》，第十节《开始走向高涨的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分为三小节：①僮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②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③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侵略的加紧和西藏人民的反英斗争。第二卷第一章第十节《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的高涨》，分五小节：①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和中共六大正确的民族纲领。②左右江地区僮、瑶等少数民族参加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③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④军阀杨增新的灭亡。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军阀金树仁的斗争。五、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的高涨。第二章第十一节《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分四小节：①广西北部的瑶民起义和云南丘北的苗民起义。②西藏人民争取摆脱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加强与祖国联系的斗争。③盛

世才对新疆统治权的窃取。新疆少数民族起义的失败。④红军长征对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推动。第三章第六节《少数民族抗日反蒋斗争的发展》，分为三小节：①内蒙古人民抗日斗争的高涨。②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革命活动和新疆统一战线局面的出现。③湘西苗族人民的革屯抗日起义。第三卷第一章第九节《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和抗战初期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分三小节：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②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③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第二章第八节《敌后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发展和甘肃回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分两小节：①敌后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的发展。②甘肃海固回民的第一、二次起义。第三章第十节《少数民族的斗争》，分四小节：①敌后少数民族艰苦的抗日斗争。②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③热振的辞职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背叛祖国的活动。四、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反动统治的斗争。第四章第二节《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其中第四小节是《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次革命》。第四卷第一章第十节《内蒙古人民的自治运动和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斗争》。第二章第七节《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和新疆联合政府的破裂》。第三章第六节《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其中第五小节《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成立。三区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第六小节《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蒋斗争》。以上是《通史》四卷中设少数民族问题的专节、小节的主要情况。此外，还有一些节中也设有少数民族问题的小节，如第一卷第一章第五节有一小节《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第二卷第二章第五节有一小节《东北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斗争》。第六节有一小节《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等。从以上的章节可以看到，《通史》对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研究、论述，使中共建党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族问题及其史、中共民族工作及其史得到了较充分的反映，填补了以前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的空白。在论述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通史》对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进行了歌颂，对各族人民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杰出人物进行了赞扬，如蒙古族“独贵龙”运动的杰出领袖乌勒吉·吉尔格拉（锡尼喇嘛）（第一卷第36、270页，第二卷第108~109页），僮族人民领袖韦拔群（第一卷第112、176、268页，第二卷第107~108页），僮族人民英雄陈洪涛（第二卷第108页），台湾高山族雾社起义领袖摩那·罗达奥（第二卷第112~113页），蒙古抗日游击队

队长高风英(第三卷第169页),回民抗日领袖马本斋(第三卷第171~172、310页)等的事迹都有记述。对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记述,不仅拓展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范围,也进一步增加了革命史反映人民斗争的深度,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通史》把革命史的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是把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向通史方向发展的反映。《通史》作者“希望能较为全面地阐明这一历史时期中的重要问题”,这个愿望是基本实现了。作者希望此书能作为革命史、党史向通史发展的过渡时期的成果,这个任务是很好完成了。《通史》在向通史发展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可以说《通史》指引了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体系发展的正确方向。《通史》在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分期上,较前人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向通史发展方面,较前人作出了新贡献。这是《通史》对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体系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 (2) 拓展了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

研究范围有不同的层次。把革命史、中共党史引向通史方向,把政治、军事的范围拓展到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的范围,这是高层次的拓展研究范围。在政治、军事的研究中研究什么,这也有个范围问题,这是中层次的范围问题。或者说政治、经济、文化是一级范围,政治内部的范围是二级范围。《通史》不仅拓展了一级范围,也拓展了二级范围。

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主要研究中共的实践、思想理论,革命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如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也是主要研究中共的实践、思想理论,中共以外的党派、团体,就很少花力气研究。研究政治、军事都要涉及我——敌——友,往往只研究“我”,而不注意研究敌、友。《通史》改变了这种狭窄的研究范围,使革命史、中共党史开始研究敌、友,研究外国。如《通史》对军阀(新、旧军阀)、国民党的研究有很大发展,用了不少篇幅。《通史》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统治》,论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及孙中山领导的反军阀革命斗争。第三章第一节《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重新加紧和中国封建军阀的混战》、第三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提出》、第六节《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斗争》,先论述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再述中共反帝反封建纲领的提出,再述中共领导人民反军阀的斗争,这样就把军阀及其史的

研究与中共的纲领、思想理论及中共的工作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共的实践、思想理论的一个方面、一个侧面得到深入的反映。第四章第三节分四小节: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②中苏协定的签订。③工农运动的开始高涨。四、广东商团反革命的被镇压。从这一节的四小节内容看,其中第三小节以写共产党的活动为主,其他小节都不是以写共产党的活动为主,但又都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及工作成绩。第四章第三节分五小节:①北京政变。②国民会议运动。③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④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五、孙中山逝世。从这五小节的内容看,只有第三小节是专述共产党的活动,其他各小节都不是以写共产党的活动为主,但其他小节也涉及到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共产党的活动及其成绩。第五章第四节分三小节:①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加紧干涉。②蒋介石的反动。迁都南昌和迁都武汉的斗争。③南京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三小节都不是主要写共产党活动的,但其中涉及到了共产党的主张、态度。第五节分六小节:①武汉政府对蒋介石的声讨。工农运动的继续高涨。②反革命势力对武汉政府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的动摇。③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④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汪精卫集团的反动。⑤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危害。⑥汪精卫集团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里六小节中,第三、第五小节主要论述共产党的活动,其他各小节都非主要论述共产党的活动,但都涉及共产党的主张、态度及活动。从以上列举的第一卷的部分章节中可以看到,虽然某些小节并非是主要论述中共的活动,某些节的主要篇幅不是论述中共的活动,而着重反映了军阀、国民党甚至帝国主义的活动,但这些非中共活动的反映,可以有助于从各个侧面来反映中共的思想理论、态度、各方面工作。对军阀、国民党等的研究,拓展了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围,实际上也拓展了中共思想、理论、工作的研究范围。中共的思想、理论、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工农运动,而是有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范围。

《通史》第二卷第一章共十节,其中第一节《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低潮》,第三节《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妥协和对苏联的挑衅》,第四节《国民党新军阀的大混战》,第五节《国民党反动统治初期的社会经济》,这四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写共产党的活动,占这一章五分之一

篇幅。第二章共十一节,其中第一节《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当时的世界形势》,第三节《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和上海军民的抗日斗争》,第四节《帝国主义各国对日本侵略的纵容。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支持》,第七节《四大家族的形成和法西斯统治的加强》,以及第五节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军事统治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掠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奴化教育》三小节,第六节中的《长城要塞的失陷和塘沽协定的签订》、《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和失败》、《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失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投降外交的继续发展》四小节,以上这些节、小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写共产党的活动,占这一章五分之二余的篇幅。《通史》第三卷第一章共十节,其中第一节《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国际形势》,第二节《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第三节《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战场上的大溃退》,第六节《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继续发展和国民党战场的继续溃退》,这四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写共产党的活动,占这一章的五分之二篇幅。第二章共九节,其中第一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方针》,第三节《国民党的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战》,这两节的主要内容及第四节中《欧战爆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反共逆流》等小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写共产党的活动,占这一章的五分之二的篇幅。第三章共十节,其中第二节《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第三节《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残暴统治和沦陷区人民的斗争》,第五节《国民党统治的更加反动和腐朽》,这三节的主要内容不是写共产党的活动,占这一章的十分之三篇幅。第四章共七节,其中第二节《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第四节《美蒋勾结的加紧,国民党对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准备》,第五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苏联出兵东北》,这三节中有很多内容不是写共产党的活动,占这一章的五分之二篇幅。第四卷中也有一些节主要写国民党的活动,如第一章第七节《国民党反动派对政协决议的破坏》,第十一节《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第二章第三节《国民党伪国大的召开和美蒋和谈阴谋的破产》,第五节《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的加深》,第三章第五节《国民党反动派的垂死挣扎和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阴谋》,第九节《国民党反动统治走向总崩溃》等。从第二卷到第四卷,对国民党的研究,对帝国主义的研究(特别是美、日)占了不少篇幅,这些

研究论述对于反映中共的方针政策、思想理论的变化、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就中共论中共,中共的方针政策、思想理论不可能得到深入的论述,方针政策、思想理论的变化、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只有从全局出发,从敌、友、我全面看问题,才能有全面深入的说明。

从以上列举的章节中,还可以看到《通史》重视了中外关系的研究、论述。即政治活动中的外交活动的内容也有了研究、论述。如各卷中对国际形势的设专节论述,如第一卷第四章第二节第二小节《中苏协定的签订》,第二卷第一章第三节第二小节《改订新约运动及其实质》,第三小节《对苏联的绝交和抢夺中东路事件》,第二卷第二章第四节,第三卷第二章第三节第一小节《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活动》,第三卷第三章第二节,第三卷第四章第四、五节,第四卷第三章第五节等,都对中外关系、外交活动进行了研究论述。这是政治研究范围拓展的又一个反映。

《通史》对民主党派的活动,也给予了关注。第三卷第三章第一节的第四小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以及第二卷第二章第十节第三小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分化》,第三章第五节《文化界的抗日救国运动》,第三卷第一章第六节第四小节《抗战初期中间集团的动向》等,对民主党派及其人士的活动也进行了论述。不过对民主党派的记述还是太少,特别是第四卷第三章第十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的两小节《各人民团体的壮大和统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涉及民主党派活动及其贡献太少。

《通史》对国民党、民主党派的论述、评价有某些不妥当之处(详下),但这些论述拓展了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这是值得肯定的。这对建国以来的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有了突破,对于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当然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中,也是注意把军阀史、国民党史的研究与中共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如蔡和森的中共党史研究便是这样。所以,《通史》研究范围的拓展,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共早期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通史》研究范围的拓展是坚持了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通史》对研究范围的拓展,在60年代曾受到批判,“文革”时期更是作为“毒草”被批判。当时批判此书“没有在书中贯穿红线,而且到处都是白线和黑线”。当时“左”的观点认为“只有写毛泽东思想和解放区才是红线,只要写



国民党统治区就是白线,写敌伪统治区就是黑线”<sup>①</sup>。当时李新等人能顶住这种“左”的压力,拓展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围,用不少章节、不少篇幅记述中共活动以外的内容,是难能可贵的。而《通史》中对国民党、民主党派的论述评价有某些不妥当之处,其中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 (3)资料工作有很大进展

胡华《初稿》、胡乔木《三十年》都是50年代初期出版。建国之初,百废待举,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工作建设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资料不多是可以理解的。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学术研究的恢复和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中共党史资料整理、出版也陆续展开。《毛泽东选集》四卷陆续出版,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李大钊选集》、《瞿秋白文集》、《孙中山选集》等文集相继出版。革命回忆录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并出版小册子。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陆续出版。文史资料、近代史资料陆续出版。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54年起,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期刊先后影印再版,至“文革”前共影印出版了47种。档案资料开始整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了民国史资料。这些资料工作的进展,成为研究人员能在资料工作中有所突破的基础。《通史》的资料工作较以前诸书有很大进展,其基础即在此。《通史》资料工作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用资料很丰富。

如档案资料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一卷第117页引)、《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第二卷第12页引)、《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第二卷第12~13、54~57页引)、1936年《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第二卷第337~338页引)等中共方面的档案资料,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如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第一卷第251页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记录(第三卷第361页引)、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中国恢复关税主权之经过》(第二卷第25页引)、外交部档案第016号(第三卷第19页引)、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二十五)3042(第二卷第294页引)、国家档案馆保存《蒋介石消极抗日史料》(第三卷第134页引)等。有的档

<sup>①</sup>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组等编《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第二卷《李新》,中国人民大学1995年印行。

案资料用照片的形式公布,如第二卷第306~307页之间有1936年刘少奇写的指导白区工作文件的一页照片,第二卷第98~99页之间有国民党迫害左翼文化文件的两页照片。

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资料书中的资料有很多的引用。如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以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申报馆1933年编印的《最近之五十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外条约汇编》、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北京民国大学1925年出版的《五卅惨案调查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北平公记印书局1931年出版的曾志陵《中东路交涉史》、30年代出版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出版的陈觉《国难痛史资料》、乡村书店1939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出版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新北京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中国大众教育问题》、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1938年出版的《抗战文选》、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40年代出版的《皖南事变面面观》、大公报报社40年代出版的《中共问题重要文献》、民盟总部1946年编印的《民主同盟文献》、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出版的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新华书店1950年出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解放战争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等等。以上这些书中民国时期出版的,有些现在已很难看到,《通史》以后的书也很少引用,由此可见《通史》引用资料的丰富、广泛及其价值。

《通史》引用的报刊资料是大量的,中共的报刊及其他各方面报刊上的资料都有引用。如《每周评论》、《新青年》、《中国青年》、《共产党》、《向导》、《先驱》、《前锋》、《创造月刊》、《政治生活》、《政治周报》、《革命生活》日刊、《布尔什维克》、《光明》、《文史》、《大众生活》、《解放》周刊、《群众》、《新中华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中国文化》、《新华日报》、《文化粮食》、《读书生活》、《新世纪》、《生活星期刊》、《民主》周刊、《希望》、《人民日报》等。还有上海《民国日报》、《东方杂志》、《时报》、《申报》、《时事新报》、《改造》、天津《大公报》、《努力》周报、《国闻周报》、《外交月报》、广州《民国日报》、《晨报》、

《现代评论》、《中央日报》、《新月》、《教育杂志》、《独立评论》、《银行周报》、《中行月刊》、《时事月报》、《十日谈》、《乡村建设》、《研究与批判》、《文化评论》、《现代》杂志、《钱业月报》、《自由评论》、《文化战线》、《文汇年刊》、《新民报》、《抵抗》三日刊、上海《导报》、《现代农民》、《抗战与文化》、《战国》、桂林《大公报》、《浙江日报》、《人与地》、《思想与时代》、《武汉日报》、《世界知识》等,还有外国报刊,如美国《美亚杂志》等。民国时期政府及各派的报刊资料,时事、政论、学术、文艺、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报刊资料,都有引用。这些报刊资料,有的是言论资料,如中共及中共领导人的言论资料以及各党各派的言论资料,有的是新闻报道资料,如报道一些事件、会议等。其中的很多资料都是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有些报刊,现在已很难看到,《通史》以后的书也很少引用,这是《通史》引用资料丰富、广泛及其价值的又一个反映。

国外资料、翻译资料也有引用。如美国国务院出版局出版的《1931年美国外交文件》、《1931—1941年美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美)韦罗贝著、吕怀君等译《中日纠纷与国联》,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的别德尼亚克著、丘仁宗译《日本对华侵略与美国的态度》,英文版《艰苦与希望的年代(1946—1953)》,以及《史学译丛》、《历史问题译丛》、《近代史资料》上发表的一些翻译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等。历史人物的个人资料、言论和史实资料也引用了不少。除了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孙中山等人物的集子引用了不少外,其他还引用了:恽代英日记(1958年第11期《历史研究》发表)、1946年出版的《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康有为诗文选》、《吴虞文集》、《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蒋介石言行对照录》、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等。还有《鲁迅全集》、郭沫若、艾思奇、陈伯达、周扬等人的论著。此外,以上提到的报刊资料中,也有不少历史人物的言论资料。《通史》还引用了一些诗歌。为了反映红军长征的英雄气概,引用了毛泽东《长征》诗(第二卷第229~230页)。为了反映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气概,引用了李兆麟《露营之歌》(第三卷第124页)。为了歌颂摆地雷阵的民兵英雄李勇,引用了当地群众歌唱李勇的歌词(第三卷第217页)。为了控诉“九一八”事变中国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引用了当时的民间小调(第二卷第123页)。为了控诉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独裁恐怖政策,引用了“万千逻卒猎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的诗句(此诗引自萧三编《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出版,见第三卷第360页)。这些

诗歌类资料的引用,不仅使《通史》的资料更为丰富,也更为生动。

《通史》搜集、引用的资料是空前丰富的,引用如此广泛、丰富的资料,这在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通史》的资料工作有进展的反映,也使《通史》成为有史料价值的学术著作。《通史》资料工作在今天看来也有某些遗憾,即资料的出处注释还不够规范。如有的书的注释,没有注明作者,或没有注明出版单位,或没有注明出版日期。有的报刊文章,也没有注明作者,或没有注明在第几版。这就给复核这些资料造成某些麻烦。当然,这些不规范的地方是个别现象。总的看,《通史》资料工作的主要方面是值得肯定的。《通史》资料工作还有一个局限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国民党、民主党派人物,对中共党内曾经被批判的人物的论述的资料的选择,某些地方可能还不够全面,对一些资料的分析可能还不够全面(详下),这当然是60年代政治形势影响所致。

第二,采用了很多照片,绘制了一批地图。

《通史》全书采用了很多照片、地图,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是开创性的。这是资料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报刊上经常发表一些历史照片,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各地革命纪念馆办历史展览、历史陈列,都需要图表、照片,这些都推动了照片资料、图表资料工作的进展,为《通史》的这方面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史》不同的版本,采用的照片等资料略有不同,下面就60年代的《通史》版本,来分析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工作。

《通史》四卷采用的照片约270余幅。这些照片中有人物照片,如李大钊(第一卷第54~55页间),毛泽东(第一卷第102~103页间、106~107页间、182~183页间,第二卷第210~211页间,第三卷卷首、第54~55页间、346~347页间,第四卷卷首、第96~97页间、232~233页间、256~257页间),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第一卷第106~107页间),施洋、林祥谦(第一卷第144~145页间),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孙中山(第一卷第182~183页间),刘少奇(第一卷第214~215页间、286~287页间,第三卷第196~197页间),苏兆征、邓中夏(第一卷第230~231页间),马骏、韦拔群(第一卷第270~271页间),叶挺(第一卷第286~287页间),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第一卷第294~295页间),张太雷(第二卷第10~11页间),鲁迅(第二卷第98~99页间),锡尼喇嘛、李裕智(第二卷第106~107页间),方志

敏、瞿秋白(第二卷第262~263页间),杨靖宇(第三卷第124~125页间),马本斋(第三卷第172~173页间),王孝和(第四卷第192~193页间),以及白求恩、柯棣华(第三卷第24~25页间)等等。采用这么多人物的照片,在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是第一次。这既有助于叙述史事,有助于对历史人物形象的了解,也使革命人物的群体能得到一些简略的反映,能形象地说明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一二个,而是一大批,是层出不穷的。而且在60年代能采用锡尼喇嘛、李裕智等人的照片,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60年代比较“左”的政治形势也影响到了历史人物照片的采用,如陈独秀的照片没有采用,中共一大代表12人中也只采用了5人的照片,还有7人的照片没有采用,这当是60年代政治形势影响的反映了。

人物手迹、手稿的照片也有一些。如施洋狱中日记手稿(第一卷第144~145页间)、孙中山手书追悼列宁逝世的挽辞(第一卷第182~183页间)、毛泽东手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二卷第58~59页间)、毛泽东反“围剿”时手书军队动员令(第二卷第82~83页间)、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手稿(第二卷第346~347页间)、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手迹(第三卷第254~255页间)、毛泽东土地改革总路线题辞(第四卷第160~161页间)、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就皖南事变的题字(第三卷第196~197页间)、方志敏狱中手稿、瞿秋白狱中手稿(第二卷第262~263页间)、鲁迅手迹(第二卷第322~323页间)等等。这些人物的手迹照片一方面有助于对这些人物的研究,如孙中山追悼列宁的挽辞“国友人师”,有助于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如施洋狱中日记手稿,方志敏、瞿秋白狱中手稿,都有助于研究这些人物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研究一些史事,如毛泽东反“围剿”的动员令,周恩来就皖南事变的题字,就有助于研究相关的史事。同时,这些照片的采用,也使全书资料更为丰富。手迹照片也有证据的作用。如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卷首就采用了蒋介石1932年写的“攘外必先安内”手令的照片,这就成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一个有力证据。这是90年代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资料工作的新进展。60年代的《通史》没有采用这样的照片,当是因为资料的发掘工作还有个过程。这既说明《通史》的资料工作是有成绩的,同时也说明这方面的工作还可以继续努力。

《通史》采用的照片中有很多史事、事件的照片。如五四运动的照片,北

京两幅,上海各界声援一幅(第一卷第70~71页间),五卅运动照片三幅(第一卷第230~231页间),内蒙归绥城“五卅”示威游行大会照片一幅(第一卷第270~271页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照片两幅(第一卷第294~295页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人民的抗议示威及蒋介石反动派捕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照片三幅(第一卷第326~327页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南京的抗议活动照片三幅、“一·二八”抗战照片一幅(第二卷第138~139页间)，“一·二九”运动在北京、上海照片各一幅(第二卷第306~307页间),中国军队芦沟桥抗战照片一幅(第三卷卷首),民兵地道战照片两幅(第三卷第196~197页间),八路军解放张家口照片一幅(第三卷第366~367页间),蟠龙战役照片一幅(第四卷第96~97页间),收复延安、解放石家庄、攻克洛阳照片各一幅(第四卷第152~153页间),渡江战役、占领南京总统府、上海解放照片各一幅(第四卷第232~233页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照片两幅(第四卷第256~257页间)等等。这些照片只是《通史》史事、事件照片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这类的照片不一一列举。这些照片对于说明史事起到了形象的作用、征信的作用。在60年代采用的史事照片包括国民党军队方面的,如“一·二八”抗战、芦沟桥抗战的照片,这可以说是有学术勇气的。不过,史事、事件方面的照片还可以进一步发掘、采用,特别是有关国民党、民主党派方面的。史事、事件原址的照片,《通史》也采用了不少。如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照片各一幅(第一卷第106~107页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外景照片一幅(第一卷第134~135页间),上海大学(二三十年代)校舍外景照片一幅(第一卷第166~167页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武装纠察队本部外景照片一幅(第一卷第230~231页间),农讲所大礼堂外景照片一幅(第一卷第250~251页间),井冈山茅坪照片一幅(第二卷第18~19页间),古田会议会址照片一幅(第二卷第58~59页间),红军大学校址照片一幅(第二卷第210~211页间),遵义会议会址照片一幅(第二卷第226~227页间),洛川会议会址照片、平型关战斗旧址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42~43页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址照片一幅(第三卷第54~55页间),延安宝塔山远景、抗大校址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76~77页间),中共七大会场照片一幅(第三卷第346~347页间),中共中央(1947年)十二月会议会址照片一幅(第四卷第160~161页间)等等。这些原址照片是对相关史事、事件的另一种记述,即非文字的、形象性的记述,使史事、事件的记述进一步深化。现在的史书记述一次会议,往

往往只记述会议的过程,通过的决议,参加会议的人员,至于会议的场景、外景往往不描写(这类的描写被认为是文学手法),而照片的采用正可以补场景、外景描写的不足。

《通史》采用的史事照片,有很多群众场面的反映,使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如五四运动等运动的群众场面,如地雷战等战争的群众场面,都使群众的力量得到形象的反映。此外,如香港市民庆贺海员大罢工胜利(第一卷第134~135页间),海丰第三次农民代表大会合影(第一卷第144~145页间),汉口码头工人欢迎北伐军(第一卷第286~287页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河南省信阳县农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湖北省人民群众庆贺农民代表大会召开照片各一幅(第一卷第302~323页间),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行军照片(第二卷第10~11页间),群众庆祝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照片(第二卷第138~139页间),红军将领和苗民在一起照片(第二卷第274~275页间),青年奔赴延安照片(第三卷第76~77页间),延安民族学院各族学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76~77页间),儿童团放哨、山西兴国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88~89页间),琼崖抗日游击队女战士照片(第三卷第124~125页间),阜平县村民选举、农民减租减息斗争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156~157页间),冀中回民支队民兵、黎族民兵、蒙古骑兵、东北抗联中朝鲜族士兵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172~173页间),阜平县农民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妇女纺织合作社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254~255页间),群众向子弟兵控诉反动派进犯解放区罪行照片一幅(第四卷第16~17页间),昆明学生抗议反动派暴行、解放区农民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区农民集会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斗争照片各一幅(第四卷第24~25页间),农民参军、翻身团、民工运输队、妇女做军鞋、妇女护理伤员、群众慰劳子弟兵照片各一幅(第四卷第100~101页间),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上海学生抗暴游行、上海摊贩包围黄浦警察局照片各一幅(第四卷第112~113页间),农民丈量土地进行分配照片各一幅(第四卷第160~161页间),上海申新九厂女工与反动派坦克搏斗、北平学生“反美扶日”示威游行照片一幅(第四卷第192~193页间)等等。第三卷中白求恩、柯棣华照片、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志愿人员照片(第24~25页间),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在山海关会师照片(第366~367页间)等,则反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中国革命的支援。以上这

些照片对人民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了多方面的反映。既采用领袖人物、英雄人物的照片,也采用普通群众(无名无姓)的照片,这在历史观点上是值得肯定的,在资料工作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以上有些照片反映的史事,《通史》的文字记述没有涉及,采用照片正填补了文字记述的不足,使史事广度、深度得到进一步反映。当然这方面的照片还可以更多地采用一些。

《通史》中采用的照片有不少是书籍、报刊,这可以使思想文化的情况得到形象的反映,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书籍报刊的版本。如1920年在中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照片(第一卷第94~95页间),上海大学《社会科学讲义》照片(第一卷第166~167页间),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照片(第二卷第58~59页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资本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照片各一幅(第二卷第98~99页间),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早期单行本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54~55页间),《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照片一幅(第三卷第156~157页间),《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陈伯达等《评中国之命运》、赵树里《李有才板话》单行本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280~281页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单行本照片各一幅(第三卷第346~347页间),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周立波《暴风骤雨》照片各一幅(第四卷第192~193页间),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单行本照片一幅(第四卷第232~233页间)等。通过以上的照片,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各个时期思想文化界的热点及思想文化界斗争的情况。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的情况及政治理论界、文艺界、学术界等各界的情况。这些照片可以补文字记述之不足。从这些书籍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些书籍早期版本的某些情况,而这些书籍的早期版本现在已很难看到,对于研究这些书籍的版本自然可起补助作用。《通史》中报刊照片,如《青年杂志》、《新青年》照片各一幅(第一卷第38~39页间),《湘江评论》照片(第一卷第102~103页间),《向导》、《先驱》、《热血日报》照片各一幅(第一卷第166~167页间),左联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照片一幅(第二卷第98~99页间),《红色中华》照片一幅(第二卷第210~211页间),《救国日报》照片一幅、1931年至1936年出版的十余种救亡刊物照片一幅(第二卷第322~323页间),《人民日报》照片一幅(第四卷第160~161页间)等等。这些照片也有助于了解各个时期思想文化界的情况及报刊版本的情况。《通史》



采用的书籍、报刊照片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国民党、民主党派方面的极少，反面的书籍、报刊和帝国主义的书籍、报刊的照片没有，这表明这类照片的采用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还可以采用更多的照片。

《通史》采用的《白毛女》剧照（第三卷第280~281页间）、《刘胡兰》剧照（第四卷第192~193页间），也有助于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也可以补文字记述的不足。由此亦可见《通史》采用照片资料的丰富。

《通史》采用的地图有：《北伐军进军路线》图（第一卷第278~279页间），《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路线》图（第二卷第14~15页间），《中央红区第一次反围攻战役》图（第二卷第82~83页间），《中央红区第二次反围攻战役》图、《中央红区第三次反围攻战役》图（第二卷第86~87页间），抗日根据地分布图（第三卷第110~111页间），《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路线》图（第四卷第95页间），《辽沈战役》图、《淮海战役》图（第四卷第211~212页间），《平津战役》图（第四卷第220页）等等。这些地图的采用，有助于反映、了解当时的军事形势，很有必要。地图的绘制是一件技术要求、资料要求极高的工作，《通史》采用了这些地图，表明资料工作的深度，也反映了图片资料的丰富。当然还可以采用更多的地图，如长征图等。

《通史》除了照片、地图外，还采用了一些图画，即美术作品，如毛泽东在农讲所（第一卷第250~251页间），毛泽东在井冈山（第二卷第18~19页间），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发表整风演说（第三卷第244~245页间），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第四卷第160~161页间），南昌起义（第二卷第10~11页间）等。还有雕塑作品，如抗战中共生死的童长荣、崔今淑烈士（第二卷第170~171页间）等。这些是艺术作品，不是历史资料，虽然能反映历史本质的某些真实，但不能反映历史现象的真实。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史学作品，应以采用历史资料为上，而不应采用艺术化的资料。在史学作品中采用艺术作品资料，不能表明资料的丰富，反而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

《通史》采用的照片有不少可贵之处，也有某些局限性，但照片、地图用在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起了开创性的作用，指引了资料工作的另一条路径，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增加了全书的资料价值，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增加了不少研究性、资料性的注释。

注释可以用来注明资料的出处，也可以用来对某些史事、某些问题作补充的说明。这后一种注释，往往有资料性、有研究性，增加了学术价值。一部

学术著作，一般都会有一些这类的注释。这类的注释在《通史》以前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是很少的，甚至几乎没有，而《通史》中有不少这类的注释。

如《通史》谈到：“到达井冈山地区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原则就制定了……”然后加注：

1928年春，毛泽东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的三大纪律是：(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1)说话和气；(2)买卖公平；(3)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5)不打人骂人；(6)不损坏庄稼；(7)不调戏妇女；(8)不虐待俘虏。<sup>①</sup>

正文中没有详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具体内容，注释中则不仅叙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具体内容，还将它的来龙去脉，如何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过程作了详细叙述。这样的注释不仅是一种资料的补充，而且是史事的深入研究。

如《通史》在叙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提到了“张国焘反党叛党的罪恶行为”，但没有具体说明其行为的情况，但加注说：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叛党行为，作了系统的总结。张国焘本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表面上表示服从，实际上准备叛党。1938年春，他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并投入了国民党特务集团。<sup>②</sup>

这样就把张国焘反党叛党的具体行为作了说明和评价。这里的补充说明反映出资料性，而评价反映出研究性。

又如《通史》谈到“民社党(国社党)”参加“伪国大”，但正文中没有交待

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9页。

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第75页。

“民社党”是什么组织,而加注说:

国社党萌芽于1934年,初称再生社,标榜国家社会主义,1934年正式结党,以张君勱为首领……系一小撮封建买办的投机政客之集合体。抗战初期,该党领导集团一部分媚蒋,一部分参加敌伪政权。1941年,混入民盟。1946年8月,和海外伍宪子领导之民宪党合并,改称民社党;11月参加伪国大。<sup>①</sup>

这就把民社党、国社党的关系,及其历史沿革、政治主张作了概要的说明。这里不仅作了资料的补充,也作了研究评价。

《通史》论述五卅运动时说:“1925年2月初,由于内外棉第八厂开除一批男工,用养成工替调,并且拘捕了前去领取工资的工人代表,因而引起了全厂工人的自动罢工……”这里的“内外棉”、“养成工”何意?《通史》分别作了注释:

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总共有19个工厂,在日本有3个厂,在上海有11个厂,在青岛有3个厂,在东北有两个厂。所谓“内外”即指日本国内国外而言。日本资本家收养一批男女幼童,从幼年即施以奴隶教育,待长成以后,用以代替成年工人,以便更好地进行统治和剥削。<sup>②</sup>

这里对“内外棉”、“养成工”的说明也是既有资料性,又有研究性。《通史》中的资料性、研究性相结合的注释还有不少,涉及中共党内外、中国国内外的诸方面史事。也有一些注释是纯资料性的。如《通史》谈到南昌起义的部队有四军的二十五师,加注说:

第二十五师中的第七十三团,是由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改编的,这时的团长是周士第。参加南昌起义的除七十三团外尚有属于二十五师的七十五团三个营及七十四团的一个重机枪连。<sup>③</sup>

如《通史》论述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时提到“论战主要交锋者为‘新思潮’和‘动力’两派……”加注说:

新思潮派以王学文、潘东周为代表,因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新思潮》杂志而得名。动力派以严灵峰、任曙为代表,因严灵峰的文章大部分登在《动力》杂志而得名……<sup>④</sup>

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四卷第85页。

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第215页。

③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0、100页。

如《通史》提到《民报》“六大宗旨”，便加注说明其具体内容（第一卷第11页）。提到白朗起义军，加注简介白朗（第一卷第32页）。提到内蒙古“独贵龙”运动，加注说明“独贵龙”的蒙语意思及运动情况（第一卷第36页）。提到1935年CC系反动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加注列举“反动教授”的姓名（第二卷第237页）。提到胡适的“五鬼”论，加注说明“五鬼”具体内容及出处（第二卷第244页）。提到盛世才发表的“八项宣言”、“九项任务”、“三项任务”，加注说明这些主张的具体内容（第二卷第332页）。提到日军扫荡搞“囚笼政策”，加注说明什么是“囚笼政策”（第三卷第111页）。提到英、日缔结“有田、克莱琪协定”，加注说明协定缔结经过及主要内容（第三卷第127页）。提到冯友兰“新理学”的几本书，加注介绍六本书的书名（第三卷第285页）。提到伪国大表演“还政于民”时，上海发生强迫“改组”中国劳协的事件，加注说明“改组”中国劳协始末（第四卷第87页）。提到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加注说明这个工会是怎样的组织（第四卷第118页）……《通史》中的此类注释，无论关于中外史事，或关于团体、组织、人物，或关于词语，都使相关的内容得到了补充说明，使其明白易懂。《通史》的资料性、研究性注释，是学术著作应该有或必须有的。这类注释是成果的资料价值、学术价值的体现。尽管《通史》中这类注释已有不少，但还是可以更多一些。而且，由于60年代政治形势、学术环境影响，《通史》中有些注释的叙述、评价可能还存在局限，如关于“中东路事件”注释（第二卷第29页）等。不过这些注释指引了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路径，这是值得肯定的。《通史》无论是征引的文献资料、图片资料还是注释，都非常丰富，都使以前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很多没有涉及的史事、人物，得以研究、论述，使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向前发展，这值得肯定。

《通史》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是有成绩、有进展的，详见《史学方法》中《史论结合》一节。

### （三）史学方法

#### （1）实事求是

《通史》在实事求是方面较前人作了更多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缺陷依然存在。

##### ①成绩

首先，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尽量不写，不作人云亦云之举。比如中共一大

召开的日期,胡华《初稿》、胡乔木《三十年》、何干之《革命史》都写1921年7月1日。《通史》则写:

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各地小组派出代表十二人……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sup>①</sup>

这里写“代表十二人”,因为这个问题已基本搞清。写“1921年7月”,不写“7月1日”,因为这个问题当时还无法搞清楚,“7月1日”与某些资料相左,所以没有采用。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反映,在当时也体现了学术勇气。又如胡华《初稿》中提到了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反对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何干之《革命史》不提此事,《通史》也不提中共一大上毛泽东表现如何,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说明。

其次,不因人废事。五六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潮和风气的滋长,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中滋长着因人废事的倾向,即有些人物晚节不好,或受到了批判,于是这个人做的一些事,特别是做过的好事,就不提了,似乎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从来就是坏人。《通史》中则尽量客观地叙史,不因人废事。如论述新文化运动时,对陈独秀的思想理论有较多的介绍,介绍了陈独秀宣传民主科学的情况,特别提到胡适提出“文学改良”,而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sup>②</sup>。论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介绍了陈独秀对玄学的批判,指出:“陈独秀的这些批判和论断是正确的,应该说他在这方面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真理,反驳了玄学鬼,也反驳了胡适派”<sup>③</sup>。《通史》对陈独秀的否定的批判也有,但并不否认陈独秀做过的好事,将这些好事也如实论述,这是《通史》以前诸书中没有的。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到批判,于是把彭德怀民主革命时期成绩也否定了。“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写中共抗战史还写不写“百团大战”,《通史》作者们认为彭德怀名字可以不写,但事情还是要如实地写。《通史》记:

1940年8、9月间,晋察冀军民在北宁路、津浦路(德州以上)、沧石路、平古路、平大公路北段、平汉路(正定以北),展开了广泛的交通破击战,并一度攻克娘子关等重要据点,敌人占据的井陘煤矿也被我军炸毁。仅8月20日至23日的三天之内,晋察冀部队即毙敌独立第四、第八

①②③《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一卷第105、47、173页。

混成旅团千余人，缴枪千余支。<sup>①</sup>

这里没有提彭德怀的名字，也不提“百团大战”，没有介绍百团大战的全貌，但还是介绍了百团大战的一些情况，没有废其事。当然不提彭德怀、不提“百团大战”，还是不够实事求是的，不过在60年代能不废其事，已是不容易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通史》也作了如实记述，写道：

一部分由共产党员控制的国民党军队于7月下旬举行了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并在平江、浏阳、通山、通城、修水、铜鼓、万载等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初步在湘鄂赣区立下了根基。11月下旬，由于敌人进攻愈紧，在湖南省委指示下，红五军主力南上井冈山与红四军汇合……<sup>②</sup>

这里虽然没有提彭德怀的名字，但对平江起义的经过、功绩作了肯定的记述，没有因彭德怀而废其事，而且比起记述“百团大战”进了一步，即提了“平江起义”。

第三，按照历史本来面貌、本来进程叙史，不作人为的改动。《通史》记述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按照历史进程，先记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指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成立的。然后再记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指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9月建立的。记述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再记述长沙、济南、武汉、广州各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第一卷第98~101页）。而不是为了突出毛泽东，便先记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在记述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时，谈到了小组成员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指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的最好方法之一。通过这种形式，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工人运动的实际斗争得到改造”<sup>③</sup>。尽管《通史》设小节《毛泽东的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此节置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及其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小节之后，即先述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群众，再述毛泽东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并不

①《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3~14页，344~345页。

②《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二卷第65页。

③《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一卷第100页。

是毛泽东首先开创的,在毛泽东之前,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已经开创了。这样的写法,也是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进程。

《通史》论述早期毛泽东,指出1918年9月毛泽东到北京后,“有机会吸收许多新思想,更加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这个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其思想的主流已经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了”<sup>①</sup>。指出第一次到北京以后的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通史》指出在1920年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以后,并引用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sup>②</sup>。这样就强调了毛泽东是在1920年夏天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以毛泽东自己的话为依据,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为确定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在记述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就没有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写:“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其所写的重要论文《民众的大联合》”<sup>③</sup>。没有写《民众的大联合》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反映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本来发展过程,而没有人为地拔高。

《通史》在论述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时写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有些共产党员开始注意农民运动。广东海丰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展较早,其主要领导人为彭湃……”<sup>④</sup>在用近一千字的篇幅介绍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之后,再写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这也是历史本来面貌的反映。而有些书几乎不提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只写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何干之《革命史》提到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但篇幅很少,仅二百余字。

《通史》在论述秋收起义时,对秋收起义的过程有较客观的记述。既写“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被派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又写:“秋收起义发动时,毛泽东正从省委到起义部队中去。在从省委去铜鼓的路上,他被敌人扣留;后来,他虽然机智地脱险,但起义已经失败了……”<sup>⑤</sup>这个记述是根据毛泽东的自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进程。而此前诸书一般只提毛泽东被派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而不提毛泽东没有赶上起义发动,即秋收起义的具体发动的指挥并非毛泽东,胡华、胡乔木、何干之诸书都是这样。这么一比较就可以看到《通

①②③④《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一卷第102、103、102~103、145页。

⑤《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二卷第13~14页。

史》实事求是得多了。

《通史》在论述西安事变时，谈到了蒋介石被扣留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中的一些干部和战士，基于爱国义愤与阶级仇恨，也赞同杀蒋”。但中共中央对事变作了极深刻的分析，“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sup>①</sup>。没有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毛泽东的主张。这样的记述是较实事求是的。胡华《初稿》记述西安事变，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转变到抗日战场上，所以对蒋介石，只要他答应抗日，就给他自赎的机会……”（该书第180页）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并且不提中国共产党内曾有人主张杀蒋。何干之《革命史》不提“在毛泽东领导下”，只说“党中央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该书上册第196页）。这比起胡华的书实事求是的多，但也没有提中共党内曾有人主张杀蒋。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内确实曾有人主张杀蒋，而首先主张和平解决的是张闻天。可见《通史》的记述较真实。

按照历史本来面貌述史、论史在《通史》中还有一些体现，如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军队，不只是记述一二个根据地、一二支队伍，而是较全面记述各根据地、各支部队。在前面提到的采用照片中也可以看到，采用了中共党内众多人物的照片、人民群众的照片，也采用了国民党军队的照片，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又如在论述解放战争时，专设《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一小节（第四卷第二章第四节第四小节），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体现。

## ②不足

《通史》作者们在主观上是力求实事求是述史、论史，但客观上受到当时五六十年代政治形势的影响仍不可避免，所以《通史》中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述史是存在的。如前面提到的，因为彭德怀受到批判，所以平江起义不提彭德怀名字，百团大战虽记其事，但不提“百团大战”，也不提彭德怀，这正是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述史的反映。再如新中国建立初期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通史》对民主革命时期的胡风便作了否定的记述。写道：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国民党统治区以后，给进步的

①《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二卷第344-345页。



文艺工作者指出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方向，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但是，胡风集团却力图诋毁这一伟大文献。还在1945年1月，胡风就在他主编的《希望》杂志第一期中刊载了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公开向毛泽东文艺思想宣战……

胡风集团最主要的反动论点有三……

对胡风集团“主观论”的批判，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

但是，胡风集团不但没有在这次斗争中正视自己的错误，反而对批评者进行人身攻击，以谩骂对待批评；并且在行动上更变本加厉地抗拒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继续在他们把持的刊物上对进步文艺进行恶毒的攻击，从而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sup>①</sup>

这里对胡风及“胡风集团”进行了全盘否定的批判，以至把胡风说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80年代胡风案平反，现在看来这样的论述是不妥当的，在民主革命时期胡风是“左”派文学工作者，是共产党的朋友，而不是共产党的敌人、反动派的朋友。

又如反右派运动中，丁玲被打成右派，这影响到了《通史》对丁玲也进行了全盘否定的记述。《通史》中有《解放区文艺界对王实味、丁玲的反动文艺思想批判》的专门小节（第三卷第三章第九节第五小节），其中写道：

正当抗日战争处在困难时期，延安文艺界出现了一小撮牛鬼蛇神，对党 and 解放区进行污蔑和进攻。托派分子王实味首先向党放出毒箭，起而响应的是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

丁玲不但在其主编的《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为王实味提供了向党进攻的“阵地”，并且她也肆无忌惮地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和诬蔑解放区的文章。1941年，丁玲在《谷雨》杂志发表了反党小说——《在医院中时》……以后又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以刻骨的仇恨诬蔑党并恶毒地中伤革命干部……

……在整风会议上，大家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对丁玲反党集团的反动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其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丁玲也作了“检查”，但是他们的“检查”是虚伪的，

<sup>①</sup>《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四卷第197~199页。

并未真心悔过，这样，就为他们预伏下在以后重犯性质更为严重的反党罪恶的祸根……<sup>①</sup>

丁玲总的来看是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革命史中对她进行这样记述、评价，现在看来是不妥当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梁漱溟遭到批判，这也影响到了《通史》对梁漱溟的论述、评价。《通史》写道：

梁漱溟是一个现代的封建文人，他在五四时期，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更进而大肆宣扬其所谓乡村建设理论和从事所谓乡村建设运动，以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攻，挽救地主阶级垂死的命运……

接着以两页余篇幅对梁漱溟的思想理论进行了全盘否定的分析批判<sup>②</sup>。这样论述、评价梁漱溟，现在看来也是不妥当的。

此外，由于受到反右派运动及“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对民主党派、国民党及民主人士的某些论述、评价在实事求是方面也有不足之处。如《通史》对章乃器作了否定的论述，写道：

曾经因为从事抗日反蒋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发表了投靠蒋介石的自白书——“少号召，多建议”。他谄媚地说：“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都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并要人们“多信托一些政府”……上述这些集团或个人，由于其阶级立场的关系，在蒋介石抗战言词的迷惑下，几乎把中间集团某种程度的独立性都自动地完全放弃了。<sup>③</sup>

还引用章乃器《平凡的领导和平凡的组织》中的文字进行分析批判。又如在论述民盟的过程中，一方面有肯定的论述、评价，另一方面也有否定的论述、评价。在论述民盟纲领时，指出：“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也表示反对……它是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的同时，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便在掌握或参加政权后，实现其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幻想”<sup>④</sup>。在论述民盟被国民党下令解散后，谈到：“民盟中的某些人，尤其是上层右翼分子，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对国民党、对美国和建立第三种力量的幻想，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保留着错误的看法和想法，后来证明，有的在当时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个人野心活动”<sup>⑤</sup>。《通史》对民盟作了一分

①③④⑤《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三卷第305、308、65、187、197页。

②《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二卷第245~248页。

为二的论述、评价,这应该肯定。但其中否定的论述、评价还是有某些过分之处的。

《通史》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论述、评价,某些地方也有不妥当之处。如对民国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第二章第三节第二小节作了专门的论述,其中强调:“国民党政府吹嘘的‘修约运动’是‘外交新纪元’,完全是欺人之谈”。“改订新约运动中的所谓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所谓关税自主一样同属骗局”<sup>①</sup>。对改订新约运动作了基本否定的论述、评价。这样的论述、评价,现在看来是缺少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精神的。

《通史》在实事求是论史、述史方面的不足,有的是受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但有的可能受到资料条件的限制。如《通史》论述西路军说:“会宁会合后,张国焘又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结果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连续苦战,为敌人所败……这一失败,完全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造成的……”<sup>②</sup>这里把西路军的组建、失败完全归罪于张国焘,根据现在披露的资料来看,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西路军的组建及西进,是中央军委命令的。但五六十年代,《通史》作者们还无法看到有关档案资料,自然难以真实地论述、评价。

## (2) 史论结合

在史、论关系问题上,《通史》还是处理较好的,一般以史为主,以论为辅,先史后论,有史有论。《通史》的资料较以前诸书大为丰富(详前),同时理论研究也有不少进展。

《通史》每一章的最后都设“本章小结”一节,这一节基本上是“论”的部分,从节的安排上看,这奠定了先史后论、有史有论的基本框架。在具体的论述中,一般先述史,再进行理论分析。如论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先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经过及其具体内容,然后对新三民主义进行理论分析。指出其与中共的民主革命政纲“在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然后又指出还有不相同的部分:“第一,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度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第二,中共“除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这是三民主义没有

①②《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二卷第26、231页。

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的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此外,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的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却没有革命的彻底性”<sup>①</sup>。这里一方面是先史后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论的深度,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进展。胡华《初稿》、何干之《革命史》对三民主义的分析主要是指出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相同之处,而没有更多注意分析其不同之处。胡乔木《三十年》基本上没有对三民主义进行理论分析。这样一比较,足见《通史》“论”的深度及理论研究的进展了。《通史》这种既同又异的分析,以后被革命史、中共党史书所采用。

《通史》论述北伐战争,设五个小节:

- (1)北伐前夕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尖锐化
- (2)湖南、湖北战场,军阀吴佩孚的崩溃
- (3)江西、福建战场,军阀孙传芳的溃败
- (4)浙江、安徽、江苏战场
- (5)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

从以上节的安排中可以反映出先史后论、有史有论、论从史出的框架,先述北伐胜利进军的情况,再来总结胜利原因。在两页半篇幅总结胜利原因中,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北伐战争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第二,是由于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北伐中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第三,苏联的无私援助……第四,由于革命形势发展,促使军阀内部发生分化,因而北伐军在战争中得以将其各个击破……<sup>②</sup>设专门小节对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作具体、深入的分析,这在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还是第一次。这个问题,胡华、胡乔木、何干之等书都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展开的研究分析。这表明《通史》的理论研究较前人有进展。而且《通史》对北伐胜利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其中谈到苏联的援助,这在事实上是存在的。胡华《初稿》谈到北伐时说:“北伐——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进行的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对战争的胜利,共产党是起了决定的作用的”(该书第79-80页)。胡华特别强调共产党的作用,

①②《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一卷第185、283~285页。

但其作用的具体表现没有研究分析,说服力不强。《通史》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北伐军中的先锋、骨干作用,既比较具体地突出了共产党的作用,又比较实事求是,比较有说服力,即论得有说服力。

《通史》论述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设以下小节:

- (1) 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召开
- (2) 决战的第一战役——辽沈战役
- (3) 决战的第二战役——淮海战役
- (4) 决战的第三战役——平津战役
- (5) 决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和胜利的原因

这样的节的安排也是先史后论、有史有论、论从史出的反映。对决战胜利的意义和原因设专门小节论述,这在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是第一次。这一节共四页,其中三页的篇幅分析了胜利的原因。指出三大战役胜利的原因:第一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第二是对敌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胜利……第二是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千百万人民群众支援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胜利……<sup>①</sup>这里的理论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深入的,是《通史》的“论”、理论分析既有进展,又有深度的反映。

《通史》中“论”的专节还有一些,如《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第一卷第二章第一节第一小节)、《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第一卷第二章第二节第四小节)、《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及其伟大意义》(第一卷第二章第五节第二小节)等等。此外,记述完一些重大事件后,也总是作一些理论分析。《通史》以“史”见长,但“论”亦有深度,史、论关系的处理还是较好的。

<sup>①</sup>《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四卷第 221 ~ 224 页。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

(1978. 12- )

### 一、概 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拨乱反正。随着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随着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盛世治史，学术研究、党史研究空前繁荣起来。

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空前繁荣的基础性特征是：(1)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投入不断增加。从中央到地方，党史研究的机构、领导体制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科研经费等逐年增加。(2)学术团体日益发展。除中共党史学会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党史人物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会、(各)革命根据地研究会、抗日战争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瞿秋白研究会……先后建立。学术会议频频举行。(3)党史研究的专业报刊杂志竞相创办，各省市都有一家甚至数家。其中《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等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主题刊物有数种，此外还有《瞿秋白研究》、《叶剑英研究》、《徐特立研究》等刊物。(4)党史研究人才层出不穷。除了老一辈党史工作者外，年轻的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党史工作者年年增长。还有一部分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跳槽”研究党史、写党史。(5)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发展。中外学者互访、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著作互译。很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国内。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年至1993年编译出版了《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10种。如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国外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等陆续出版。(6)党史资料建设突飞猛进。中共中央文件、中共领导人著作,越来越多地被整理出版。建党以来历次重要事件资料、各地区(根据地)资料、各部队和各团体资料,也越来越多地被整理出版。民国政府、国民党、民主党派的资料,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资料,也大量整理出版。有些资料还在互联网上公开,如上海档案馆已推出了“上海档案信息网”,一些政府机关也推出自己的信息网。这些现象,这些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并成为中国中共党史研究空前繁荣的基础和强大推动力。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出现的令人欣喜的崭新气象是:

### 1. 研究方法、编纂方法有长足发展

首先是实事求是、历史分析、客观评价成为潮流。个人崇拜式、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大批判式、贴标签式的研究,以论代史的研究,教条主义的研究,领袖史、路线斗争史、歌功颂德史的模式,因人写史、因人废事、因人废言、随“风”转的习气,被否定和抛弃。如研究中共创建史,不再一味突出毛泽东,而给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充分的肯定。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不再一笔骂倒,也肯定它在十年经济建设、外交方面的某些成绩。研究解放战争不再只讲解放军的辉煌,也讲不足、失误;不再只讲共产党的功劳,也讲民主党派的功劳。长期以来的“禁区”越来越多地被突破。其次,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被逐步引入党史领域。如乌杰《邓小平思想论》,采取了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如王建英《中央领导成员素质与第一次大革命成败》、《六大以前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基本状况的分析》等采用了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计量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等的运用也在发展。其三,编纂方法,不再是章节体、编年体的一张老面孔,出现了很多新面孔:长编体:李新等主编的12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刘国新等主编的4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等。典志体:郑惠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志》等。本末体:任建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等。史话体:刘凤舞《世纪风云——中国共产党史话》等。纪实文学体著作更是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乌杰主编《回眸世界潮:中共一大到十五大珍典纪实》,叶永烈撰写的纪实文学党史及党史人物书有十余种。演义体:广东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演义丛书》等。画史、画传,有《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新中国大博览》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众多人物画传一大批。连环画党史:《飘扬的党旗——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卷》等。80年代末以来,一种新的党史研究体裁,大受欢迎,

影响巨大——影视(型)史、影视(型)传,如《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如长征历史专题片,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历史专题片。方法的改进、发展,使党史研究向科学的方向发展,使党史著作可信、可读,推动了党史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从而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 2. 理论研究、学科组成体系建设大大发展

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著作,90年代以来陆续推出,实现零的突破。如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等。还有《毛泽东研究述评》、《周恩来研究述评》、《刘少奇研究述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等多种。中共党史学概论学科开始建立,代表著作有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张静如主编的更有分量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也将出版。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主要著作有: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张注洪等《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郭铁钲主编《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等。中共党史史科学学科开始建立,主要著作有: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张宪文《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何东《中国现代史史料学》、陈明显《中国现代史科学概论》等。中共党史文献学学科正在建设,论文如郭军丽《党史文献学刍议》、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理论问题初探》等。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也将出版。中共党史学批评(评论)学科正在建设,王仲清及张静如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均有“党史学批评(评论)”专章。论文有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批评刍议》等。中共党史目录学学科正在建设。张静如《中共党史学概论》中设“党史目录学”专章,论文有周一平《中共党史目录学几个理论问题初探》等。中共党史校勘学学科正在建设,论文有周一平《关于中共党史校勘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等。此外,周一平《建立中共党史心理学》、《建立党史计量学》等论文发表,也体现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新气象。

### 3. 党史研究的范围极大扩展

从只研究政治、军事、会议,只研究个别领袖,扩展到研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党派关系、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各种专题史研究的著作纷纷问世,学术研究空白不断被填补。如陈至立等《中国共产党建设史》、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张静如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林



之达等《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刘继增等《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稿》、曹润芳等《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费云东等《中共秘书工作简史》、王一帆等《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国防大学《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范平等《中国共产党党章研究》、龚海泉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吴传煌等《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顾龙生等《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赵效民等《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唐滔默《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王功安等《国共两党关系通史》、马维政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史》、唐纯良等《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杨淑娟等《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史稿》、王邦佐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王炳林等《中国共产党与私人资本主义》、曲峡等《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史》、向青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张尔驹等《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黄志仁《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史》、宋金寿等《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袁瑞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发展史》、张希坡等《中国革命法制史》、刘增杰等《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赖志奎等《苏区教育史》、金晓钟等《党员教育史》、王仲清等《党校教育历史概述》、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解放区邮票史》、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等纷纷出版。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各种专题史、事件史著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史、工人运动史、农民运动史、学生运动史、妇女运动史等各种专题史的研究著作也很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各种专题研究著作更是一批又一批出版。领域新、角度新、观点新、资料新、填补空白的论文更多，不胜枚举。

人物研究，从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领袖扩展到众多领袖，扩展到高、中、低各层次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并从政治人物扩展到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各界人物；从正面人物扩展到反面人物；从党内人物扩展到党外人物、民主党派人物、国民党人物、国际人物等等。不仅有大量的人物传记专著出版，还有百卷本《中共党史人物传》、多卷本《解放军将领传》和《解放军英雄传》、多卷本《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多卷本《民国人物传》和《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等等出版。人物研究空前火爆。

地方党史、行业党史研究后来居上。各省市、自治区、各区县、各系统、各行业的中共组织史资料、党史大事记的编纂陆续完成，有的还完成了通史、通志的编纂，这使党史研究的领域、层面进一步拓展、深入，使党史研究向社

会史化方向发展。

#### 4. 学术上领先、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如李新等主编的12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沙健孙主编的5卷本《中国共产党通史》、当代中国研究所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50卷本《当代中国丛书》、军事科学院5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3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朱德年谱》等等。这些著作都是权威部门、著名专家编纂,运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实事求是述史、论史,新颖翔实,连一些国外的专家都惊叹不已,自觉望尘莫及。<sup>①</sup>这表明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已有一部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二、中共党史研究

### 1. 郑德荣等《中共党史教程》

郑德荣、郭彬蔚主编,王学启、杨圣清、唐培吉等党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参加编写的《中共党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以下简称《教程》),是80年代较少的从中共建党写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党史教材,也是打破传统框框,提出新体系的著作。郑德荣,1926年生,吉林延吉县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和参加撰写的著作还有《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新中国纪事》、《毛泽东思想史稿》、《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20多种。以下对此书作进一步探讨。

#### (一)史学成就

##### (1)进行了建立新体系的尝试

作者在《前言》中说:“对传统纲目和教材体系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有哪些“调整和充实”呢?首先表现在历史分期上突破了一些传统的做法。《教程》上编为民主革命时期,下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章节安排上,没有拘泥于“党的创立”、“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分期法,

<sup>①</sup>参见陈志让《〈周恩来传〉读后》,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而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更细致地划分了历史阶段。具体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 (1)“五四”前后的中国(1919—1920年)
- (2)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工农运动的兴起(1921—1923年)
- (3)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1924年1月—1926年6月)
- (4)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失败(1926年7月—1927年7月)
- (5)国共两党两个政权的对立(1927年8月—1931年9月)
- (6)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工农红军的长征(1931年9月—1935年12月)
- (7)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和国内和平的实现(1935年12月—1937年7月)
- (8)全民族奋起抗战(1937年7月—1938年10月)
- (9)国民党消极抗日、敌后解放区成为主要战场(1938年10月—1940年12月)
- (10)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共产党的励精图治(1941年1月—1943年12月)
- (11)抗日战争的胜利(1944年1月—1945年8月)
- (12)争取和平民主 准备自卫战争(1945年8月—1946年6月)
- (13)全面内战的爆发(1946年6月—1947年6月)
- (14)战局的根本转折(1947年7月—1948年8月)
- (15)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8年9月—1949年10月)

这里的第1至2段(章),论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客观基础、思想基础,组织上、思想上建党的过程。但把五四运动和建党分开,表明“五四”时期不完全是建党时期,只是建党的过渡时期,这样的划分更符合历史实际。第3、4段(章),把国共合作大革命兴起和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划为两段,这样的划分是从中共历史的实际出发的。即北伐战争以前,中共各方面工作的主要成绩是成功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而1926年的“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1926年5月)以后,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全面推行。北伐战争的展开,革命继续走向高潮,而中共党内的路线政策则日益走下坡路。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大革命兴起和北伐战争合为一个阶段,从

中共党史的角度出发把大革命兴起和北伐战争分为两段,是有一定道理的。第5、6、7段(章)是传统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现在一分为三。一般来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可以以1930年11月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为标志。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还只是援救大革命失败的尝试。现在把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这段称为“国共两党两个政权的对立”,视为由大革命失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sup>①</sup>,比起把这一段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阶段,就更妥当些。当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划至1930年11月前更好,然后可把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乃至红军长征划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标志,而在此以前,中国人民、爱国官兵的抗日活动、战争已经开始,不能说与抗日战争无关。把七七事变以前的抗日救亡活动、战争,归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不尽合理的。而《教程》把第7段作为“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中国革命走向高潮迎接全民抗战的准备时期”<sup>②</sup>,将七七事变以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战争,与抗日战争联系起来,显然就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第8、9、10、11段(章),是传统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一分为四,把抗战相持阶段一分为二,使抗日战争发展的线索更加清晰了。第12、13、14、15段(章)为传统的解放战争时期。以“解放全中国”为目标的解放战争,是从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开始的。而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前后,是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战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目标是“自卫”,还不是“解放全中国”。至于抗战胜利后至1946年6月这一阶段是和谈阶段,战争没有爆发,把这一阶段归入“解放战争”,更不确切。《教程》没有采用“解放战争时期”的概念,把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的阶段,即“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全面内战爆发的过渡阶段”<sup>③</sup>;把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作为“全面内战爆发”阶段,显然更能切合历史实际。

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时,突破了1949年10月至1956年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框架,而把这一时期一分为二:①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②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1953年至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

①②③《中共党史教程》第131、226、360,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在1953年至1956年完成的,把1949年10月至1952年也作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时期是不够妥当的,而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比较切合历史实际。

历史分期,只搞几个大框框,往往在某些环节上就会失去准确性,产生硬套硬凑。而分得细一点,容易做到准确。从不够准确到准确,这是研究发展的体现。

《教程》建立新体系的尝试,其次表现在彻底清除了路线斗争史的影响。“文革”时期的党史书,把党史写成十次路线斗争史,即民主革命时期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六次斗争,社会主义时期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路线的四次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彭德怀相继平反昭雪,党史书中“十次”路线斗争不提了,但路线斗争史的格局仍有影响。很多党史书,除了彭德怀、刘少奇不提外,其余的八次路线斗争,每次都提。而《教程》完全抛弃了这样的做法。比如瞿秋白的“左”倾路线,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时间短,危害不大,《教程》基本上不提。至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文革”批判刘少奇等,《教程》都指出是完全错误的。其他几次论述到的路线斗争,也不是作为重要内容来论述,没有放在突出的地位。如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没有设立专章、专节论述,只是在第四章《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的失败》第六节《汪精卫集团叛变》中设立一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只是在第五章第二节设立一目《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的恢复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论述。王明的“左”倾路线及抗战时期的右倾路线,没有专章专节专目论述,只是在第六章第一节第三目《“一·二八”上海抗战和〈淞沪停战协定〉》、第三节第二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在第五节第一目《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的开始》中提到了秦邦宪(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及危害。在第八章第三节第六目《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到了毛泽东批判了王明投降主义的错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也没有设立专章专节专目论述,只是在第六章第五节第二目《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中,论述了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的经过。社会主义时期的党

①《中共党史教程》第195~196页。

内斗争,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设立节、目进行论述。而与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活动的斗争,没有设立专目论述,只是在第十七章第一节第四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中作了论述。《教程》没有把党内路线斗争作为惟一的内容、主要的内容来研究、论述,而更多地研究、论述了党在各方面的斗争和工作。

《教程》建立新体系的尝试第三方面的表现,是打破了会议史的模式。党史书的传统做法是每次代表大会必录,有些会议甚至专章专节论述,似乎中共党史就是中共会议史,而《教程》没有这样做。如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史、革命史书的范围仍较窄。也没有一次会议设专章论述。设节论述的会议只有三次:洛川会议、七届三中全会、八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七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等会议只是设目论述。中共党史不只是研究中共会议的,不必每会必录,只有那些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会议,才应该研究和反映。

#### (2) 扩展了研究范围、内容

传统党史书的研究范围、内容,往往局限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局限于中共党内。“文革”时期的党史书,范围更窄。只有“文革”前的革命史书,如李新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范围较宽。《教程》是“文革”以后较早注重扩大研究范围的党史书。如中共领导的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就给予了充分的反映。第五章第二节设了《边疆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一目,论述了中共领导的左右江地区壮、瑶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斗争。论述了中共领导的蒙古人民、新疆人民、台湾高山族人民的斗争。第八章第四节《少数民族和华侨的抗战》,论述了东北各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蒙古、新疆、台湾等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第十三章第三节设《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和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一目,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蒙古、新疆、台湾人民的斗争等。这一部分内容,是传统的党史书中忽略、缺少的。

《教程》除了研究、论述中共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外,还研究了中共领导的经济、思想文化建设和斗争。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党史书是忽略、缺少的。有些党史书论及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情况、文化“围剿”与反“围剿”、大生产运动,但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却没有论述。《教程》第六章第三节第三目《土地革命的深入和根据地建设》,就论述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除了论述农业、工业、商业外,还谈到了“对于个体手工业,也给以合理的安排和适当的帮助”,帮助工农群众集资组成各种商业消费合作社、供销社等,对于少数民族工商业则采取保护和监督的政策”<sup>①</sup>。文化方面,论述了普及小学教育,发展成人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创办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军政大学、中央红军大学、女子大学及各种专业技术学校等,还论述了出版事业、报刊发行事业、文艺团体的发展。第九章第四节,论述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就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部分。第十四章第二节《解放区的建设》,也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经济、思想文化建设,《教程》有更多的论述,并深刻总结了经验教训。很多论述是极有深度的,如第二十章第二节《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第九目《科学、教育、文化战线的成绩》论述新时期的文艺界有四个特征:①恢复和发展“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结束了“假、大、空”与“瞒和骗”的文学阶段。②与党、祖国、人民共命运,积极参与了国家的社会改革进程,表现出作家高度的道义水平和思想水平。③打破了文学的封闭系统,突破了创作方法的“统一论”格局,文学开始了多方选择、多元竞争、多边探索的探索性时代。④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老作家共同开创了自成格局的文学新时期。<sup>②</sup>这一总结,显然是研究文学史内行的手笔,既反映了新时期文艺界的特点,也突出了文艺运动发展的经验教训。党史书论述文艺运动的并不多,对文艺运动有如此深刻的研究和反映,就更为罕见了。

中共的外交工作,也是很多党史书忽略的,《教程》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论述。民主革命时期部分就有一定的篇幅论述中外关系,社会主义时期部分,则设专目论述中共的外交工作。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五目《外交战线上的成就》;第十七章第一节第六目《外交方面的重大成就》,都论述了外交工作及其经验教训。

《教程》论述国民党的历史和活动的篇幅很多,如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都论述了国民党的历史、活动。其中有些节、目是专论国民党活动的。如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目《国民党着手改组》;第三章第一节第一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节第三目《革命势力统一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第四节第二目《西山会议,中国国民

①②《中共党史教程》第195~196、647~648页。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目《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第四章第四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五节第一目《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二目《武汉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六节第一目《反革命势力对武汉政府的包围，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第五章第一节《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第六章第四节《爱国官兵的局部抗战和南京政府的法西斯统治》；第七章第一节第二目《国民党对日对苏和对共产党态度的某些变化》，第三节第二目《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八章第二节《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第九章第二节《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第十章第二节《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一目《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第三目《国民党军队在滇西和缅甸作战的胜利》，第三节第二目《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章还有很多节、目论述国民党。在论述国民党的历史时，作了一分为二的研究分析，对其法西斯统治和种种倒行逆施给予批判，对其做过的好事，如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做过的好事，给予肯定。如谈到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就指出因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积极作战，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掩护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了敌后战场，掩护了一部分敌占区工业的内迁……”<sup>①</sup>中共党史书中论述这么多国民党的历史、活动是否越俎代庖、画蛇添足呢？回答是否定的。中共党史书研究国民党，至少有三条好处：一是可以全面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全貌。国民党及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也是有过贡献的。二是只有研究矛盾双方，才能使矛盾运动得到准确深刻的反映。比如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危害，只有把国民党右派如何一步一步进攻，陈独秀等人如何一步一步地退让，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研究清楚，研究深。又如研究反“围剿”，只有把国民党如何“围剿”，共产党如何反“围剿”作比较研究，历史面貌才能清楚。三是反映国民党的活动，实际上也是反映共产党工作的一个方面，即中共的国民党工作。如《教程》谈到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就指出：“这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反对右派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sup>②</sup>又如两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党实行对日作战，也是中共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以及积极努力的结果。所以，把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结合起来研究，不仅扩大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也使中共党史研究更有深度，更能反映历史的

①②《中共党史教程》第265、113页。



真实。《教程》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教程》也有一定的篇幅论述民主党派的历史、活动,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为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作出很大贡献的,中共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教程》第十章第一节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一目,肯定了民盟的进步作用。第十一章第三节第三目《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论述了民盟、中国青年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的活动和政治主张。在论述抗战胜利以后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也多处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如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一部分民主党派就支持了中共的主张、提案。如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搞所谓“改组政府”,遭到了中共和一部分民主党派的反对。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得到了众多民主党派的支持。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统战工作,也有很多论述。第十七章第三节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确定》一目;第二十章第二节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一目等,都论述中共的统战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对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地位、作用,从理论上、实践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方面的内容在此前很多党史书中是不够重视的。

中共党史学科是一门通史型的专史学科。中共党史,本来是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种专史。然而中共的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的工作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又有通史、社会史的性质。中共党史的研究应向通史、社会史的方向发展,由单线的、平面的研究向多线、多侧面、多层次、立体的研究发展。《教程》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 (3) 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决定力量。历史研究及其体系是否科学,其中一个检验标准,就是看它怎么反映人民群众及集体的力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为个人崇拜服务,把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功劳都归功于毛泽东一人,自然就是非科学的。《教程》注意清除长期以来个人崇拜的影响,注意突出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如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指出:“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特点,总结国民革命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经验,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对李大钊、瞿秋白、刘少奇等人的具体贡献作了阐

述。而毛泽东只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探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sup>①</sup>。在论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首先论述了全国各地主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然后强调:“全国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经验,从而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形成作出了贡献。”<sup>②</sup>正是在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武装割据斗争的经验日益丰富的基础上,毛泽东概括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才完善起来。<sup>③</sup>在论述抗日战争时,设《共产党人论持久战》一目,这和有些党史书设“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章节就不同。《教程》具体指出:1937年7月15日朱德的《实行对日抗战》,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国防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中共中央提出的《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方针及作战原则案》等,均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只是“总结了我国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更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sup>④</sup>。再如解放战争时期,陕北的“蘑菇战术”,《教程》指出是彭德怀指挥的<sup>⑤</sup>。淮海战役的决战,是“毛泽东采纳了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粟裕等的意见”,抓住有利战机组织的<sup>⑥</sup>。这些都突出了共产党人的集体力量,而不是突出毛泽东一个人的力量,还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时,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出:“这个计划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主持制定的”。经过多次修改,1955年3月由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并经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这个计划中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陈云的重要思想。<sup>⑦</sup>谈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指出:“从1955年底开始,刘少奇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的工作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在这基础上,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之后由毛泽东在4月25日举行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作了阐述。”<sup>⑧</sup>这些论述,也都突出了集体的力量,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中共党史教程》第86、155、157~158、273~274、393、433、497、531页。

而不是突出毛泽东一个人的力量。从而也突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教程》在反映人民群众力量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如在记述人们熟知的群众运动以外，还记述了一些以往党史书从不记载的群众运动。1925年“首都革命”，一般党史书不提，《教程》作了详实的论述。谈到这次运动由朱家骅、于树德等人领导，“是五四以来北京革命运动的又一次高潮。给了北洋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革命群众夺取政权的觉悟和勇气”。<sup>①</sup>在论述“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时，谈到了各地工人、学生、工商业者、民主人士的抗日救亡斗争，也反映了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战。如“一·二八”抗战中，蕴藻浜一处阵地上60名士兵，以火油濡湿衣服，负巨型炸弹猛扑日军阵地，使敌军阵线崩溃。60名士兵壮烈殉国。<sup>②</sup>抗战开始后，对国民党官兵的英勇抗战，也给予充分的肯定。特别提到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扼守宝山城的姚子青营，坚守阵地，血战3天，全营殉职。谢晋元率800官兵坚守四行仓库4昼夜。<sup>③</sup>对于少数民族（见前）和华侨在抗战中的贡献，也设专节论述。谈到了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等组织筹赈；谈到缅甸仰光侨胞叶秋莲女士，将产业和首饰全部拍卖，得款3万余元，尽数捐献祖国，自己无以为生，入寺为尼；谈到华侨回国参军参战，进行技术服务等等。<sup>④</sup>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则“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击战、窑洞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等种种打法，真正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sup>⑤</sup>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抗日联军的高级将领杨靖宇、李延平、王光宇等英勇捐躯；如抗联八名女战士在掩护部队突围以后，弹尽粮绝，毅然跳入乌斯浑河激流。<sup>⑥</sup>因为对人民的具体贡献有较充分的论述，所以指出抗战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和英勇奋战是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sup>⑦</sup>。就显得不空洞了。

《教程》在反映人民群众力量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仍然可以进一步努力。一是各个时期的人民群众力量都应该充分反映。《教程》论述抗日战争史

①②③④⑤⑥⑦《中共党史教程》第75~76、181、261、279~280、333~334、301、358页。

较注意这一点，论述解放战争时却没有注意这一点。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提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人物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提到了1976年“四五”群众运动，而其他方面人民群众的力量就反映不多。二是反映人民群众时，应尽量列举具体的人名。如论述华侨支援抗战，列出了一些人名，而“一·二八”抗战中国国民党军队60名士兵负巨型炸弹猛扑日军阵地，就没有列举出一个人名。还有“八女投江”是哪八人，也没有列出姓名。反映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列出具体的姓名，才能使“人民”有切实具体的反映，才能彻底清除空洞、泛泛论述人民群众力量的积习。这也是历史研究真实、扎实所需要的。

## (二)史学方法

### (1)客观全面

《教程》在论述史事时，努力做到全面客观，这在研究范围、内容的扩大方面已经体现出来。如论述抗日战争，既肯定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贡献，肯定抗日根据地军民、少数民族人民、华侨的贡献，也肯定民主党派、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贡献。这可以说是宏观上的客观全面。在微观上，也努力做到客观全面。如论述建党时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列出的名单就比一般的党史书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列举：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沈雁冰、李达等。北京小组列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高尚德（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缪伯英（女）等。武汉小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济南小组有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王用章等。广州小组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刘尔崧等。长沙小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东京小组有施存统、周佛海等。法国小组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等。<sup>①</sup>论述中共一大，列出了所有与会者的姓名，并指出：“大会推举张国焘担任主席”<sup>②</sup>。在论述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时，除了论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外，对其他各地起义的论述，也较一般党史书多。其中提到了1927年10月，杨善集、冯白驹等领导的海南岛农民起义；马尚德（杨靖宇）领导的确山农民起义；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唐澍、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

①②《中共党史教程》第26-27、28-29页。

义;1927年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的黄麻农民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黄道、邵式平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桑植起义;1928年4月,刘志丹、唐澍领导的渭华起义;1928年4月到6月,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地区农民起义;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1929年4月,王维舟等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1929年5月,周维炯、徐其虚等领导的商南农民起义;1929年11月,徐百川、姜镜堂等领导的六霍农民起义;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等。并指出:这些起义是1927年8月到1929年间上百次武装起义中“影响较大的”。“所有这些武装起义,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寻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的序幕。”<sup>①</sup>在论述西安事变时,既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贡献,中共的作用、贡献,也肯定了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的作用、贡献;既肯定了苏联的作用,也肯定了英美的作用,如指出英国汇丰银行帮助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稳定上海金融市场,支持南京政府。<sup>②</sup>说明西安变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决定的,是“合力”的作用。客观、全面是历史研究反映历史现象真实、历史本质真实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素之一,《教程》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值得肯定。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努力,如能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全部名单列出(在正文中或在注释中),这样就“全”了,而且可以反映出研究的深度、资料的扎实。

## (2)一分为二

在历史研究中作一分为二的研究分析,不全盘肯定或否定,这实际上是客观全面的又一个表现。《教程》在研究论述中,对于中共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于缺点也毫不掩饰,进行批评。如评价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和《决议》,肯定了有革命意义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当时对各政党“采取独立、攻击、排斥的态度”,“表明年幼的共产党在当时还不懂得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sup>③</sup>。在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时,肯定成绩较多,批评错误也不少。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教程》指出“并非正确”,“很片面也很粗暴”<sup>④</sup>。谈到“大跃进”,指出它

①②③④《中共党史教程》第150、246、29~30、487页。

“搞乱了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生产力遭到破坏”<sup>①</sup>。谈到庐山会议,指出这场反右倾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sup>②</sup>。在论述反右斗争时,也指出了扩大化的错误。论述文化大革命时,指出“它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的灾难”<sup>③</sup>。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教程》也努力做到一分为二。评价毛泽东时指出:他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使国家遭受了重大损失,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就他的一生看来,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sup>④</sup>《教程》对毛泽东的很多论著有高度的评价,肯定其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同时也对他的某些论著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进行了批评。如指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是正确的。“但这个报告也有‘左’的思想,如肯定农民给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涌进大户‘杀猪出谷’等幼稚举动,并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个容易助长‘左’倾思想的错误口号。”<sup>⑤</sup>指出《工作方针六十条(草案)》,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其消极面就是助长了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sup>⑥</sup>。指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sup>⑦</sup>。第十八章第五节第二目《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错误批示》,指出这两个批示是对文艺界“不切实际的估计和错误指责”,致使“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一批优秀或比较优秀的电影、戏剧、小说,遭到错误的政治批判”<sup>⑧</sup>。指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以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都是错误的。在评价孙中山时,一方面肯定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也指出他“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说‘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中国产业尚未发达的时候,‘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些观点,曾被戴季陶,蒋介石等利用为反对马克思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中共党史教程》第552~554、562、589、622、103、548、576、585页。

主义的一个思想武器。”<sup>①</sup>对于孙中山也不是一味肯定的。再如对于胡风、批判胡风的评价，一方面肯定胡风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流派，同时也指出：他“把党向作家提倡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这是错误的”。但“将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这就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sup>②</sup>。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政党等进行一分为二的研究、分析，实际上就使研究更加全面、客观一些。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之一，是使历史研究科学化的方法之一，《教程》努力运用这种方法，是值得肯定的。

### (3)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之一，它既要求历史现象的真实，也要求历史本质的真实，从而比封建史家的“实录”，资产阶级史家的“纯客观”，更科学。实事求是的方法有多方面的体现，而不回避历史，不随意剪裁历史，不因人废事、因人废言，就是其中一方面的体现。“文革”时期的党史书叙述中共一大，只提毛泽东、董必武，叙述解放战争时期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只提毛泽东，不提朱德，诸如此类的回避、剪裁，就使历史的本来面貌被掩盖了，从而失去了历史现象的真实，失去了科学性。《教程》则对中共党内一些晚节不好的人，努力做到不回避。如张国焘，《教程》仍指出他是中共一大会议的主席。1927年7月12日，大革命失败前夕，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1931年，张国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副主席。如陈公博，仍指出他是中共一大代表。1926年5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讲所，陈公博也到所内讲课。如顾顺章，仍指出他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后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19委员之一。如高岗、饶漱石，仍指出高岗曾为中共西北局书记，新中国成立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饶漱石曾为华东局书记。如林彪，仍提到他参加了遵义会议、洛川会议，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并叙述了一一五师取得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局书记，平津战役时为总前委书记。如陈伯达，提到他写文章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陈伯达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

①②《中共党史教程》第57、509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草案的说明》。这些都表明,《教程》在实事求是、不回避历史、不随意剪裁历史方面,比此前的党史书做得好。当然,也应该承认,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如高岗在东北担任的工作,林彪在辽沈战役担任的工作,就没有提,这表明还是有所回避、剪裁。不回避、不随意剪裁,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貌,才有历史现象的真实。否则今日回避这,明日回避那,今日这样剪裁,明日那样剪裁,历史可以改来改去,就会变成实用主义、唯心主义。

#### (4) 史事详实

《教程》《前言》说:“历史过程写的比较翔实”,这确实是此书的一大特色,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详叙史事。《教程》以50余万字叙述中共近70年的历史,篇幅有限,但对具体事件仍然写得很详尽,做到了既精练又详尽。而论说一般极简略。如论述“整理党务案”事件,就指出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9人联名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提出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件》,蒋介石、谭延闿等8人联名提出的《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蒋介石提出关于党员重新登记的临时动议,这几个提案统称为《整理党务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决议案》。然后概括了这些提案的主要内容。并论述了陈独秀如何要求共产党员接受这些提案,使这些提案顺利通过。最后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被迫分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代理宣传部长和常务委员会秘书等职,由蒋介石、甘乃光、顾孟余、叶楚伦等分别接任。论述这一事件总共不过七百余字,但其中的一些事已是一般党史书中所不详的。而评论这一事件只用了一句话:“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篡夺了国民党的军权和党权,使北伐战争一开始就埋伏着严重的危机。”<sup>①</sup>又如论述1927年初汉口、九江租界收回,不仅详叙了“一·三”、“一·六”事件的前因后果,也详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陈友仁与英国参赞阿马利的谈判经过,从而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国民政府在汉浔租界收回中的作用。论述两地事件总计1600字左右,而评论只一句话:“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sup>②</sup>又如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大跃进”运动,就先记述了“大跃进”口号的提出过程。先是1956年1月提出“多快好省”口号,接着1957年

①②《中共党史教程》第85、98页。



9月至10月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便提出了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至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国民经济“大跃进”浪潮。然后主要论述了“大跃进”运动中农业和大炼钢铁的情况。最后指出：“结果对外损害了我国的崇高声誉，对内搞乱了计划经济。”<sup>①</sup>论述“大跃进”运动的经过，有四千余字，而评论只数十字，二三句话。史事详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是信史的基本条件之一。而要做到“实”，应该先做到“详”。“详”就能全面，就为“实”打下基础。史事详实了，基本事实搞清楚了，理论分析也就有了基础和依据，才可能比较准确、比较站得住，才能从历史现象的真实，上升到历史本质的真实。中共党史教科书，史事详实，说理简练，应视为上乘之作。当然，《教程》在个别事件的个别环节上，也有不够详实的地方。如论述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如何发动，各种因素的影响，很详尽，但中共如何决定和平解决方针的，就不够详实，张闻天在和平解决中的作用也没有提，作为中共党史书，中共方面的活动、决策应该有更详尽的论述。

②资料扎实。《教程》引用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在说明国共合作时孙中山一方面热情欢迎中共人士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也表示，共产党员“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就利用了1923年11月孙中山对邓泽如、林直勉等反对联俄共政策的信的批示。<sup>②</sup>论述省港大罢工，直接引述了《民国日报》等有关报道。论述“四一二”事件，直接引述了《申报》、《时报》等有关报道。论述“七一五”事件，直接引述了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国闻日报》、《民国日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3次扩大会议速记录等。论述西安事变，引用了《张学良广播词》、西安《解放日报》报道、周恩来论述等。论述中共的一些会议、宣言、方针、政策，都直接引用了档案资料。如论述中共一大、二大，引用了会议通过的纲领、决议及有关档案资料。论述遵义会议，引用了新发现的陈云《（2）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些都表明《教程》的资料工作是扎实的。史料是历史研究者主体认识历史客体的中介，史料的真伪、偏全对历史认识的科学与否有直接的影响。历史研究所以很重视第一手

①②《中共党史教程》第552、51~52页。

资料的研究、引用,因为它的真实性、可信性较高。因此,引用具体史料,还是不引用史料;引用第一手史料还是引用第二、第三手史料,往往成为历史研究质量高低的一个标准。

③让史事、史料说话。即论述史事时,尽量把史事、史料提出来,而不妄加评论,硬作结论。如有的党史书说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为各根据地树立了榜样,这个结论,胡乔木就不同意,因为当时各地建立根据地,并无直接联系,各地对井冈山的情况不一定知道。《教程》就尽量避免诸如此类的评论、断语。如论述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的传播,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标题,而不用“广泛传播”的标题。只是把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出版的情况,《新青年》等杂志介绍马列主义的情况,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宣传马列主义的情况摆出来,至于“广泛”与否,不下这个结论。再如,谈到抗战胜利前夕,解放区军民的反攻,就用“解放区军民大举反攻”的标题,而不用“全面反攻”的标题。让史事、史料说话,有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避免主观随意性,从而为信史建立基础。

#### (5) 引述经典作家的论述减少

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年代里,一些党史书中堆满了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在“文革”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里,党史书甚至变成了毛泽东语录集锦。这种用某个人的话代替历史研究、代替史料的做法,是违反历史研究基本原则和规律的,也不可能成为信史。这种不良影响,在80年代仍然存在。而《教程》开始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教程》不怎么引述马恩列斯的论述,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论述作了适当的引用。如引用毛泽东的论述,基本上有以下几种情况:①作为研究对象引述。如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就必然要研究《新民主主义论》;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研究《五·一六通知》。②作为史料引述。如论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就引用毛泽东1934年1月23日写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列举的1933年农业生产情况的一些统计数字。如谈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的活动,就指出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③作为理论分析引述。如分析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时,引用了毛泽东的分析“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以上三种情况,以第一、二种为多,第三种较少。至于用毛泽东的

论述代替史料,即论述历史时,不提具体史事、史料,只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明的情况基本没有。毛泽东的论述作为研究对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实施往往与他有联系。毛泽东的论述作为史料引用、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必然趋势,是符合历史研究规律的做法。毛泽东的论述借用为理论分析,也是可以的。因为领袖人物站得高看得远,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往往深刻、精辟,所以当研究者觉得自己的分析不如领袖们的分析深刻时,引用领袖人物的分析,是自知之明之举,是合理的。当然,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要求。特别是当研究者的分析可以超过领袖人物的分析时,或者领袖人物的分析已经因为历史研究的发展而过时时,就应该用研究者自己的分析,以反映新的认识水平。通览《教程》全书,作者自己的分析研究反映得是较多的,而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是不多的。

《中共党史教程》是80年代众多党史书中能够体现新研究水平的书,它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科学化的趋势。

## 2. 胡绳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988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编写一部篇幅不大的党史简本的任务。1990年3月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等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的希望。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90年5月,在胡绳主持下开始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简本。参加初稿编写的有沙健孙、金冲及、工秀鑫、戴鹿鸣、周承恩、席宣、郭德宏。1990年底初稿完成。1991年1月在胡绳主持下再请各方面专家进行修改定稿。参加修改定稿的有:胡绳、金冲及、龚育之、沙健孙、郑惠、王梦奎。修改稿完成后,即交胡乔木审阅。胡乔木着重看了第六、七、八、九章及结束语,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亲自作了多处修改,还为此书写了《题记》。1991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此书的出版。此书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8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胡绳主编”。

胡绳(1918.1.11—2000.11.5),江苏苏州人。1931年读高中时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35年在上海从事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作为社会科学界的代表出席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等。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等工作。

“文革”中遭受迫害。1973年起逐步恢复工作。“文革”后，曾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94年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85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兼任过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导者、组织者之一。著作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全书》、《胡绳诗存》等。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全书48万字，胡乔木称之为“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当然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党的七十年历史如此丰富，在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虽然文出多人，稿经数易，终得集合众长，统一条理，成为一家之言。积年余之功，竟初创之业，尤属可贵”<sup>①</sup>。胡乔木对此书作了较高、又是一分为二的评价，概括了全书的特色。以下对此书作一展开的研究分析，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 （一）史学思想

#### （1）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道路和经验教训作全面的总结

编者在《后记》中提到：“在这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我们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中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经验作一完整的叙述。”<sup>②</sup>全书开头也提出：“七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是先驱者们在缺乏先例的艰难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到的，是无数先烈以鲜血

①②《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卷首《题记》，第57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

为代价换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sup>①</sup>这表明《七十年》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总结70年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走过了70年的历史道路，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总结70年的历史道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对于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自产生以来，研究的重要目的、任务之一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七十年》作者们承担起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任务，把它作为写作的重要目的，是很自然的。从这一目的出发，全书“论”的篇幅较多，每章每节在夹叙夹议中都有“论”。如第一章第一节《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四页的篇幅主要是“论”，这一节的标题就有“论”的色彩。节中没有叙述武昌起义的过程，只是概要论述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及思想理论，而主要的篇幅是论述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意义、影响。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即教训是：没有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sup>②</sup>这既对辛亥革命的教训作了深刻总结，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作出了深刻的分析。这表明《七十年》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不仅用了不少的篇幅，而且所作的总结是深刻的（全书对经验教训总结取得的成绩，以下详论）。除了每章每节的夹叙夹议之外，全书末尾还设《结束语》一章，对中国共产党70年的经验教训作了概括，对今后前进的道路和目标作了概括。这使此书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70年的经验教训，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有很大的作用。此书能引发人们思考，使人们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其原因就在此。

#### (2)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七十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一分为二的记述，既肯定成绩，也不回避失误，同时强调：“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

①②《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5页。

心力量。回顾七十年的历史，使我们更加确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sup>①</sup>“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即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党。”<sup>②</sup>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一直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重要的目的、任务之一，《七十年》把宣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研究的目的、任务是自然的。但《七十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五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中共党史书不同。一是五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党史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往往作全盘肯定的记述，提及失误很少。而《七十年》不回避中国共产党的失误，对党的历史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记述。二是五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党史书，对如何坚持党的领导论述往往有片面性，不注意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研究、论述。而《七十年》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在论述党的方针政策时强调：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sup>③</sup>。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对如何改善党的领导进行研究、宣传，才能对坚持党的领导宣传更全面、深入。《七十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有很大的进展。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目的、任务之一，《七十年》将此作为研究的目的、任务是自然的。《七十年》在《结束语》中引用了1990年12月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共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作了概括性的介绍。这些方针政策，其中有些部分以后略有修改，如当时提“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后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当时宣传这些方针政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561-562、572页。

策，对于人们明确前进的方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是有积极作用的。

## （二）史学成就

《七十年》篇幅不大，但史学上的成就是很大的，主要是：

（1）对中国共产党70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总结，而且“陈言大去，新意迭见”

如《七十年》在分析、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一方面指出，客观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暂时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指出：“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缺乏斗争经验的党，是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而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革命措施，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使革命遭到失败。”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出了些错误的主意，这对酿成中共领导人的投降主义错误是有影响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sup>①</sup>这里的失败原因的分析总结，也就是失败教训的分析总结。这里的分析总结，已有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的内容。如指出反革命阵营不仅力量强大“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如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年幼、对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还没有深入了解，而且缺乏斗争经验，对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都懂得不多；如指出共产国际也出了些错误的主意，中共还没法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思想等。这些分析总结，是胡乔木《三十年》等书中没有的。这里突出了中共必须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经验，必须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有深入了解，必须走独立自主的路。这样的教训总结比以前的中共党史书更全面更深入，不仅有新意，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75~76页。

也有实事求是之意。

《七十年》在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党内“左”倾盲动主义产生的原因时指出：许多共产党人“还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恶，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他们容易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容易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革命者内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现象”<sup>①</sup>。在论述王明“左”倾路线上台的原因时指出：“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中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都不足。当王明等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sup>②</sup>这里对“左”倾路线产生原因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左”倾错误教训的总结，即强调了革命不能感情用事，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产生原因的研究分析，以前诸书都没有展开，有的书只提一句“滋长起来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1962年版第16页），而不作深入的分析。《七十年》在展开分析时，不是只笼统地说“小资产阶级‘左’倾情绪”，而是从当时中共党内普遍现象、社会心理出发，作了客观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从而使人们获得教训的启迪。这样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有新意的。

《七十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sup>③</sup>又指出：“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接着借用毛泽东的论断：“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

①②③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86、109、268页。



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sup>①</sup>这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经验作了概括。这里的概括,不仅是对民主革命经验的总结,实际上也指出了这些成功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仍然是有用的,应该发扬光大。

《七十年》写到1991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既有对一些运动的分别的总结,也有对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验教训的总的总结。《七十年》在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的教训时谈到:

经济建设有它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我们党还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许多同志有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来进行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当他们转向领导经济的时候,很容易相信如果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经济建设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好。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对于许多同志既是美好的回忆,又影响着他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大大加快和迅速完成,许多同志只看到它的胜利而没有看到它的急促粗糙所遗留的许多有待长期调整解决的问题,因而更加增强了靠反右倾、鼓干劲来加快建设和加速前进的自信心。群众运动中出现许多混乱和偏差,许多同志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那么一股干劲,担心纠偏就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懂得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切实取得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终将真正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总之,在一连串胜利面前,在党的许多干部包括许多领导干部中间,谦虚谨慎被逐渐忘却,骄傲自满在逐步发展。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不同的意见难以提出了,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这样,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就成为难以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69页。

避免的了。<sup>①</sup>

这里对“大跃进”，包括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际上也总结了教训。这里教训的总结既从经济规律方面进行总结，也从政治原因（党内政治生活等方面）、历史原因、社会心理原因等多方面进行总结。在分析历史原因时，既分析与民主革命有联系的历史原因，也分析与建国以来运动有联系的历史原因。在分析社会心理原因时，既分析中共党内许多同志的心理，也分析中共党内许多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心理。这样的分析比较客观、深入，而没有教条式的说教习气。通过深入具体的分析，突出了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尊重、遵循经济规律，决不能搞群众运动，必须谦虚谨慎，必须有正常健康的党内生活。

《七十年》对于“文革”教训的总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谈到：“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sup>②</sup>。《七十年》对“文革”教训的总结也反映在对“文革”为什么没有被抵制的原因分析中。主要是：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照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论断有误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使一言堂、家长制严重；“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还有许多不健全”等等<sup>③</sup>。这些分析、总结基本上是客观的，为以后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等提供了借鉴。

《七十年》在《结束语》中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总结。其中谈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右的倾向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所以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左”的倾向，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往往表现为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往往表现为不对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作客观的全面的调查分析，任意片面强调阶级斗争，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7-368、479、433-434页。

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实际上，“左”的倾向不能达到发展和进步，而只能造成混乱和倒退。“左”的倾向会无中生有地制造“阶级斗争”，搞乱自己的队伍，也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处理和解决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倾向同样是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因此也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sup>①</sup>

还特别强调：“二十九年中的两次大错误、大挫折都是‘左’的指导思想的表现”<sup>②</sup>。这里对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既指出要防止和反对右的倾向，也指出要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并且特别强调了要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这个总结对现实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十年》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肯定了邓小平的贡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总结以往的好的经验、好的思想，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又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了以往犯错误的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sup>③</sup>但《七十年》没有提到“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不奇怪的，因为“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是在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在1991年总结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还不可能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宣传。相信《七十年》修订时，或写《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时，在总结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时，会对邓小平理论作全面的阐述、宣传。《七十年》对中国共产党70年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入、有新意的总结，这应视为《七十年》在史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这不仅是政治理论上的贡献，也是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有积极的社会效益，也有学术价值。《七十年》对于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理论研究进展的体现。

#### (2) 提出了很多新论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思想路线，中共党史研究者、工作者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中共党史研究在各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很多没有研究过的问题被研究，很多研究过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的研究，以前一些中共党史研究的“禁区”，都被不断突破。在这样的基础上，《七十年》在研究上有突破，提出很多新的论断，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564、564、565页。

在中共党史的分期方面,《七十年》基本上沿用了旧体系,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分期,《七十年》提出了新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二年间党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九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十三年。”<sup>①</sup>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共党史分为两个时期,是一个新的分期法,而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一论断提出后,已被中共党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肯定。

上面述及的《七十年》对中国共产党7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很多是有新意的,这也是提出新论断的体现。其中,在论述王明上台的原因时,不再提“经验主义的支持”,这是对1945年《决议》的突破。又如《七十年》对西路军作了还历史本来面貌的记述,写到:“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sup>②</sup>。这里肯定了西路军的组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而不是张国焘指使的。这里对西路军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这样的论断,对以前党史、革命史书是个很大的突破。

百团大战,《七十年》设专门小节,用两页篇幅作了论述,并给以肯定的评价,指出: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指战员英勇杀敌,到1940年12月初,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多人、伪军一万八千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的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共产党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和进行百团大战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百团大战中,蒋介石于1940年9月11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正式承认共产党领

①②《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563、131页。

导的八路军的战绩<sup>①</sup>。

自从1959年彭德怀被批判以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就很少提“百团大战”。以后有的书提“百团大战”,但肯定少,否定多,说它过早暴露八路军的力量,得不偿失等等。《七十年》实现大突破,对百团大战作了肯定的论述,这是提出新论断的体现。其中还引述蒋介石的嘉奖电,这在资料上、论述上也是个突破。而且史论结合,引出“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的结论,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七十年》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期历史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论述也有很多新观点、新论断。如谈到:

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方案。蒋介石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虽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但又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侵略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sup>②</sup>

这里没有把西安事变前的蒋介石说成是妥协投降者,肯定了他在1935年已有联合苏联共同抗日的打算。《七十年》在论述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时指出:

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当时政策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sup>③</sup>

这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实行抗日战争,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在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是没有的。以上这些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新论述,反映了在思想路线端正以后,中共党史的研究已实事求是得多,客观得多。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七十年》也提出了不少新论断。如社会主义时期的失误问题,“大跃进”、“文革”是两次大的失误,此外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3、138~139、148。

还有几次失误，或者出现一些偏差。失误的次数有数次，那么失误在什么问题上，《七十年》提出失误在两大问题上：“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前后约达 20 年（1957~1976 年）之久的长时间中，我们党在这两个大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sup>①②③</sup>这个分析、论断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有新意的，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的。

《七十年》在就社会主义十年建设（1956 年至 1966 年）进行总结时指出，这十年存在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 1956 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 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 1960 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这两个趋向的关系如何呢？《七十年》提出：“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尽管正确趋向“本身还不成熟，不彻底，它终于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到后来反而被错误趋向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压倒。但是，它终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七十年》不仅辩证分析了两种趋向的相互关系，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影响，同时指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与“文革”前十年正确趋向的积累相比，“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有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创造、新开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360 页。

拓，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sup>①</sup>。这里对十年建设两个趋向研究分析没有停留在十年中，而是向“文革”延伸，向“文革”后延伸，从而使两个趋向，特别是正确趋向的研究更全面更深入，评价更客观更准确。《七十年》提出十年建设期间存在两个趋向，并对此作了辩证深入的研究分析，这些论断是客观的、全新的，是1981年《决议》中所没有的。这些论断可以视为对《决议》的补充和发展。

又如《七十年》在论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时，指出是“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sup>②</sup>。在论述“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时指出：“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层次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的一次重大倒退”<sup>③</sup>。这些论断也是《决议》中没有的，同时又是客观深刻、切中要害的。

《七十年》提出很多新论断、新观点，标志着中共党史研究大大向前发展了。这既是中共党史理论研究向前发展的反映，也是史事研究向前发展的反映。当然，《七十年》所提出的某些新论断、新观点，是以吸收八九十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些新成果为基础的。

### (3) 理论研究有新进展

《七十年》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的新论断、新观点，都是理论研究新进展的一些体现。此外，由于思想路线端正了、资料更多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深入，这样对一些历史问题、历史事件的理论分析也就向前发展了。比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国民经济恢复后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七十年》作了这样的分析：①因为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②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③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在土改完成后的农村中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也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显示出对

①②③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8~420、432~433、441页。

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经济制度仍然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榜样作用，这也是促使党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sup>①</sup>这里对为什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用近四页的篇幅作了展开的分析、论述，这样的分析、论述在以前的书中是没有的，而且是客观、正确的，体现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七十年》指出主要问题是：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但是有没有必要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改造的完成而扩展到全部经济生活，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还需要发挥，如何发挥？③国营经济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各级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需不需要划分层次，根据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层次的积极性？还是公有范围越大、经营越集中越好？《七十年》认为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来得及反复研究和慎重决策，就在改造高潮中被掩盖起来。这些问题应该认真调查和调整。<sup>②</sup>这里对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作了展开的分析、论述，有助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这个问题很多书是不展开分析、论述的，《七十年》能展开分析、论述，是理论洞察力、理论研究能力强的反映。

再如对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七十年》指出了两点：①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派扩大化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②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sup>③</sup>这里对反右派扩大化影响的展开分析是深刻而又切中要害的，是实事求是的。这样的分析对于如何认识、评价反右派运动奠定了理论分析的基础。

《七十年》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主要得力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树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98-301、336、359-360页。



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得益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所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理论问题的研究进展尤其显著。同时也受惠于中共党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向前发展,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向前发展,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会向前发展,会有新的突破。

#### (4) 运用了新的资料

《七十年》论述中共七十年历史,篇幅不满 50 万字,只能作概要性的论述。且“论”多,相对来说资料用得少些。尽管如此,《七十年》仍然运用了一些新的资料,其中有一些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这就使《七十年》有了资料价值。如关于陈独秀的右倾表现,引用了《中局给鄂区的信》(第 62 页);关于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引用了毛泽东 1936 年 12 月 27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第 142~143 页);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的态度,引用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谈到“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第 146 页);又如毛泽东 1958 年 12 月 22 日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批示,要求“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服务”(第 388 页)等等,都是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在 1991 年以前还没有公开过。毛泽东 1958 年 12 月 22 日的批示,收录在《七十年》以后出版的(1992 年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卷,论首次公布,当推《七十年》了。

有很多史实、史料在中共党史书中是首次披露。如谈到:1923 年冬吴玉章、杨闇公等 20 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以后,中国青年共产党也自动取消,要它的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 28 页)。如论述了鲍罗廷、陈独秀的“西北学说”(第 71~72 页)。如论述广州起义时谈到叶挺曾主张撤出广州,却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严厉批评(第 83 页)。在论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利用合法阵地开展文化工作时,谈到 1929 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第 119 页)。在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的矛盾斗争时,谈到 1937 年 7 月,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在红军改编时,因失去警惕,致使近千人

的武装在福建漳浦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162页)。在论述新中国建立后五六十年代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时,谈到: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第390页)。谈到邓小平曾试图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左”倾批判,1965年3月,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纠正北大社教运动试点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上讲到文化思想领域当时的状况,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第411~412页)。这样类似的史实、史料还有一些,都是首次披露。邓小平1965年3月的讲话,是《邓小平文选》中没有收入的,当是档案资料的首次披露。

回忆资料也引用了一些。如朱德和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情况,引用了谭震林的回忆(第90页);如红四军内部的一些分歧争论的情况,引用了江华的回忆(第95~96页),等等。还引用了一些其他资料。如论述1935年前后蒋介石开始试探国共谈判,引用了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1981年版)中的两段叙述(第138~139页)。如论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国民党中央军,引用了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第145页),这是日本公开的档案资料(见《现代资料》第9卷,东京1964年版)。还引用了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第147页)等。

以上说明,《七十年》篇幅不大,但是资料还是丰富的,也有资料价值。一些新资料的披露、运用,自然因为作者是中共党史编纂的权威部门的权威人士,他们看到的资料无疑是很多的,是一般党史研究者不可企及的。

### (三) 史学方法

#### (1) 实事求是

①力求客观述史,从政治因素出发的述史、论史减少。如记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谈到了“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杨匏安、李达等<sup>①</sup>。客观介绍了杨匏安、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论述中共一大召开,将12名代表的姓名一一列出,次序为先上海代表,次北京代表,接着是湖南、

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15页。

武汉、济南、广州、旅口代表,没有将毛泽东列于代表之首(第26页)。在论述中共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时,指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先后由张国焘、邓中夏担任(第34页)。指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罗章龙(第36页)。没有因为张国焘、罗章龙后来犯了错误而回避之。对毛泽东的活动,也能客观、一分为二地记述。如述大革命时期的农讲所,说:“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sup>①</sup>。没有人特地突出毛泽东。只是记述遵义会议时,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会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sup>②</sup>。这里都把毛泽东排列在前,似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首先是首先发言的,三人小组中毛泽东是负责的,这就不够客观。又如书中提到:“王稼祥于1943年7月1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sup>③</sup>这并非正确、符合实际。“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张如心1941年2月8日写的《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在1941年3月20日出版的《共产党人》第16期发表)一文就提出了。此外,有些事件涉及到的人物不列出姓名,如中共党内的第一次“左”倾盲动,就没有提瞿秋白的名字,这似乎也不是客观记述的方法。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争论,不列出具体人物的姓名,这似乎也是不客观的,而有故意回避的色彩了。

书中记述“九一八”事变,谈到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sup>④</sup>。这里说“南京政府”,不说“蒋介石”,这是较客观的。书中对蒋介石的言行是客观记述的。但书中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场还是记述太少,这就稍欠客观了。

②一分为二记述、评价。《七十年》在记述、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力求一分为二。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对毛泽东、陈独秀等人都作了一分为二的记述、评价,对蒋介石也作了一分为二的记述、评价。书中谈到八七会议时,肯定了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指出:“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像八七会议那样对过去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

①②③④《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5、127、202、113~114页。

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实行根本的转变，是不可能的”<sup>①</sup>。这里对八七会议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客观的。这样的记述、评价在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是没有的。书中论述中共六大时，一方面肯定“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指出：“六大也有缺点”，第一，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sup>②</sup>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在论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指出：“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显然过于迅猛，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sup>③</sup>。这里的评价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书中论述1958年1月和3月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时指出：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次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sup>④</sup>

这里对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作了一分为二的记述、评价。这样的分析是《决议》中没有，也是以前党史书中没有的。

《七十年》一分为二做得不够之处也存在。如第29页论述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强调中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年轻，但“革命要求极其强烈”，“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幻想”。而中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某些局限，中国工人阶级是否存在某些弱点，未作分析，这应是一分为二不足之

①②③④《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80、87、332、362~363页。

处。

### (2) 史论结合，夹叙夹议

“论”、“议”多，是《七十年》的特点。而书中的论、议往往都从“史”、“叙”中来。因为“史”、“叙”有新意，于是论、议也有新意。用“新意迭出”评价《七十年》是很恰当的。如书中记述中共筹建时谈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也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sup>①</sup>。这里的最后一句是“论”，很有新意，这完全是从俞秀松、李中的事迹中引出的，这里的史料在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用过，这里的结论自然也是以前的中共党史书没有的。又如书中叙述中共成立的史事，谈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波社’。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接着又记述四川中国青年共产党自动取消，要求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指出：“这些事实说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成为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建立，决不是偶然的。”<sup>②</sup>这里先述利群书社、中国青年党的事实，然后再分析“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再引出“论”，先史后论，先叙再议，史论结合，夹叙夹议。这里述利群书社、四川青年共产党的史实是以前党史书中所没有的，这里最后两句“论”也是以前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的。史有新意，论亦有新意。

又如《七十年》论述新中国建立初期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先详述史事，约1500字篇幅，然后引出结论，约200字篇幅。结论指出：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成功，“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

①②《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5、28页。

不能不表示钦佩、叹为‘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sup>①</sup>。这里的“论”，不仅分析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历史本质、重要意义，使史事本质得到说明，同时引出中共是否在经济上有作为的结论。这里“论”不是凭空的，而是先史后论，有根有据，有说服力。

前面已谈到《七十年》提出了不少新论断，理论研究有进展，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这些新论断、新进展都是“论”，而这些“论”也都是先史后论、论从史出。可以说《七十年》在史论结合、夹叙夹议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编纂者的史料工作、研究工作深度广度的体现，也是理论修养、理论水平高的体现。《七十年》的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确实“新意迭见”，而又能“引发思考”，“从中吸取营养”。这样高水平的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中共党史书，实在是不多见的。

《七十年》的“议”、“论”大多恰到好处，个别地方的“论”、“议”可能受到写作时的形势的影响，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

### 3. 沙健孙等《中国共产党通史》

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约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0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6人分工合作撰写。此项工作于1994年启动，1999年底完稿。第一卷199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5卷出齐。全书共304万字。沙健孙1934年生，江苏宜兴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概论》、《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中下编)、《中国革命史论稿》、《中国革命问题》等，主编《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两主编之一)等。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以下对《通史》略作分析研究。

#### (一) 史学思想

(1) 向读者提供一部内容比较翔实的党史著作，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77页。

《通史》的《前言》中谈到：“我们编写这部通史，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内容比较翔实的党史著作”，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能“向广大干部和党员、向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能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才能赢得胜利，中国人民才能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sup>①</sup>

《通史》在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领导作用方面作了很多努力。

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通过对近代中国与辛亥革命历史的回顾，《通史》指出，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接着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情况进行了阐述，总结了这段历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四、五章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第六章叙述了从中共一大到二大的历史，论证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特点，并对关于一大的若干不清楚的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考证。该卷最后指出：“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是弱小的、幼稚的，但她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引着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当她扎根于群众之中，组成宏大的群众党的时候，当她实施严格的组织和训练，全党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时候，就必然会显示出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不管在未来的道路上会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不可能阻挡她的前进的步伐。”<sup>②</sup>

第二卷《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第一章概述大革命前夜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局，第二章叙述早期工人运动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第三章叙述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合作、孙中山主张同共产党合作的原因，以及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余下各章叙述了大革命经过及从胜利转向失败的历史过程，揭示中国共产党人为坚持革命所作的英勇斗争和宝贵贡献，总结党的领导机关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历史教训。最后《通史》指出，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宗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是勇于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中国人民

①②《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卷首、第48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进一步觉醒了,许多人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所阐明的革命真理,从而成了党坚持革命的可以依傍的力量;正是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从而‘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使自己在政治上大进了一步,从而为未来的中国革命准备了一个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者。”<sup>①</sup>

第三卷《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第一章概述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局,揭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必然性和进行这场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第二、三、四章叙述党领导的农村斗争情况,第五章着重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等问题,以后的章节分别叙述了党内连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反“围剿”战争的情况等。这段时期的历史表明,“中国革命的前进与后退、胜利与挫折,从主观条件方面来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去迎接抗日战争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sup>②</sup>

第四卷《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第一章至第五章着重反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中期、后期在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情况,第六、七两章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和沦陷区人民的斗争,第八、九、十章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侨务工作和对外关系,等等。通过对这些历史的回顾,《通史》指出,“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仅有了空前的壮大,党在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威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sup>③</sup>

第五卷《为新中国而奋斗》主要叙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通史》在该卷前三章里讲述了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平民主的谈判和自卫斗争,然后重点阐述了解放战争的经过、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第十一章

①《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第688~68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②《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第80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

③《中国共产党通史》第四卷第892~89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反映了筹备创建新中国的情况,概括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基本经验。最后,《通史》总结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认为:“在1840年以来近8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英勇斗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一个如同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在1919年以来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由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虽然也经历过曲折,但终于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一个伟大的真理。”<sup>①</sup>

## (2) 突出、宣扬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通史》在章节的标题中提毛泽东的有多处。正文和章节的标题中还大量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语言和毛泽东诗词,正文中的引用更是比比皆是,许多重大问题的结论也大量采用毛泽东对历史的论断。《通史》还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主要著作,概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主张。如第二卷第七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毛泽东、瞿秋白等对投降主义错误的批评和抵制》,其中第一小节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三卷第五章是《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其中第二节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章中还有《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等小节。第六章中有《何孟雄、毛泽东等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毛泽东等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与“左”倾冒险主义对农村根据地工作的严重危害》等小节。第八章第六节是《毛泽东关于红军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第十三章有《瓦窑堡会议与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小节。第四卷第一章第四节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第二章中有《毛泽东系统论述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等小节。第十一章有《毛泽东动员全党整风》等小节。第五卷第二章有《毛泽东毅然赴重庆》等小节。第六章中有《十二月会议,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小节。第十一章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等小节。《通史》注意突出毛泽东,但并没有抹杀其他人的贡献。这从以上的标题中也有体现。又如第一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五卷第71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版。

卷第五章论述共产主义小组,其中第一节的第二小节是《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的成立》,第三小节是《李大钊、毛泽东等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这里注意突出毛泽东,但也突出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贡献。

### (3) 批判错误认识,还历史本来面目

比如,学术界曾有“救亡压倒启蒙”论,“告别革命”论,等等。有人提出,启蒙之所以没有取得成效是被“救亡”压倒了,从而把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有人提出“告别革命”说,意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好,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不好,对维新变法的激进派谭嗣同亦颇有微词。总之,革命的破坏太大,革命不如改良,而改良需要温和。因而,要“告别革命”。究竟应当怎样看这些问题呢?《通史》的前三章对中国近代社会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流产后又为什么会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讲得非常清楚明白。指出:“救亡”的口号,不是五四运动时提出来的,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来的,是辛亥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们(如严复)提出来的,是他们在19世纪末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重创的危急关头提出来的。革命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情况下的客观社会现象,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主观选择。

又如,在学术界曾对1949年的“划江而治”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原因是担心因此而引起美国出兵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种说法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部分领导人主张“划江而治”,等等。《通史》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通过认真分析,认为:“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势力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采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sup>①</sup>。这就说明,所谓的“划江而治”其实是美蒋的共同愿望,他们只不过是一种麻痹中国共产党的缓兵之计而已。斯大林在其中的具体表现是,他多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毛能够考虑跟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计划,“因为公开拒绝和谈会把渴望和平的旗帜送给国民党,好像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希望的;并且,公开拒绝和平谈判的倡议,也可能会给美国以借口,使美国更容易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就像当年帝国主义共同干涉苏维埃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五卷第598页。

俄国一样”<sup>①</sup>。显然,斯大林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议加入和平谈判,而丝毫没有主张“划江而治”的意思。

此外,《通史》还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等问题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看法和结论。

(4) 为一般读者提供了解党史的基本线索,引发他们对党史研究的兴趣、思考

《通史》的《前言》中谈到:“如果这本书能够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党史的基本线索,引发他们进一步研究党史的兴趣,如果它能够为研究者提供若干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料和可供讨论的观点,我们就感到深深的满足了。”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明了《通史》确实为一般的读者提供了详细的了解中共党史的基本线索。与此同时,《通史》还从许多方面激发读者学习党史、研究党史的兴趣。

比如,第一卷中,《通史》对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一段的描写,引人入胜,读来兴趣盎然,没有丝毫的枯燥乏味之感。通过引用一些学生和曹汝霖的回忆,作者分析了四种曹宅起火的原因:“(一)学生放的;(二)曹的家属放的(企图惊散群众);(三)电线走火;(四)曹的仆人放的(乘乱窃物,放火灭迹。”尽管作者指出大致可以肯定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把结论说死,从而给读者留下了问题,自己去研究,进一步把问题搞清楚。又如,《通史》在叙述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一节中,就党史中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释,既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引发读者深究这些问题的兴趣。《通史》认为,“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况下召开,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留下了一系列‘悬案’。”如“关于一大的会址问题”、“关于一大的日期问题”、“关于一大的人数”、“关于一大的日程问题”等。经过对史料的梳理,《通史》指出:“从以上几个不同侧面的论证中,可以认为,‘一大’的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是7月31日。”出席一大的中国代表13人,国际代表2人,共计15人。这就不但给人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而且也激发人们自己去独立思考。

《通史》也向读者提供了很多可供讨论的观点,抛砖引玉。如对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史家历来有不同看法。《通史》在深入分析战斗

①《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五卷第602页。

经过之后，肯定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认为：“‘百团大战’牵制了大批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延缓了日本南进的步伐。”“‘百团大战’的实施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在国际国内引起极大反响，提高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声望，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证明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次战役还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当然，《通史》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百团大战”的不足，如：“攻击时间长，特别是在日军已经高度戒备的情况下，强攻日军坚固设防的城镇据点，超过了自身低劣的武器装备提供的能力限度，使自己的力量消耗过大，以至于影响到对日军报复‘扫荡’的反击力度”<sup>①</sup>。这样的分析也能引发人们进一步研究、思考。

## （二）史学成就

### （1）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

比如，对于20世纪初在中国为什么不实行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无疑在今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通史》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企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允许，其次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过于软弱。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当时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种保留态度。《通史》分析了这个原因：“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建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所以，“直接推动中国先进分子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并不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和宣传，而恰恰是对于它的怀疑和否定。”“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的时代条件和中国自身的社会条件决定的，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sup>②</sup>这无疑是对今天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极力宣扬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的有力批判。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通史》第四卷第116页。

(2) 作为中共党史研究史上一部以“通史”命名的著作,进行了一些可贵尝试

第一,在体例上,从大的框架(即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说,这套书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本相同。不同的是,《通史》每卷都有前言、本卷题记(其中第二、三卷还有结束语),这样使每卷自成一体,每一个时期的党史都可以独立成篇,从而保持了分卷述史的完整性。这在以前的中共党史著作中是没有过的。

第二,《通史》的每个章节基本上都邀请在这个问题上卓有研究的学者、专家完成,体现了各个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独立见解和他们各自的写作风格,并尽可能地吸收近年来党史研究的新成果,这使相应部分的党史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目前党史研究的高峰,可以说《通史》是一部集90年代中共党史最新研究成果的大成之作。如第一卷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教授撰写第一章《近代中国与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撰写第二章《新文化运动》和第三章《五四运动》;沙健孙教授撰写第四章《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第五章《共产主义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邵维正教授撰写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其中,金冲及教授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复旦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辛亥革命史稿》、《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等;彭明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著有《五四运动史》、《五四研究》、《五四运动论文集》等;邵维正教授,解放军后勤学院少将军衔,著有《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其他四卷的情况跟第一卷大体差不多。

但由此也带来了问题。不同作者撰写的章节之间衔接不够缜密,历史事件的连接不够紧凑。如第一卷中,第三章是讲五四运动的,接下来似乎就应该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了,但第四章却论述的是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用了很多的篇幅阐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各种救国思潮和建国方案;然后又重述了本在第二章就写过的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内容,使得内容显得重复、拖沓。也正因如此,许多章节不可避免地表现了作者各自的写作风格,一些章节在文字、理论功底和写作水平上不免有些差距,甚至相去甚远。

第三,《通史》的内容达到了初步的“通”,基本上符合一般通史的特征。

①《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第247~249页。

比如从历史发展的横向上看,《通史》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外交、民族关系,甚至侨务工作等。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通史》记叙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即1919年到1949年,每一年和每一月的重要事件在《通史》中都有所反映。实际上还不至这些,《通史》几乎触及到了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只不过近代的历史非常简略罢了。当然,名为《中国共产党通史》,应该“通”到今天,不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是很遗憾的。严格说来,《通史》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通史》的《前言》中谈到,这是一部多卷本的党史著作,首先编写的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言外之意,以后还会编写社会主义时期部分。期盼《通史》继续写下去,期盼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早日问世。

### (3) 注意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胡乔木生前谈编写党史时,提出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顾右盼。第二,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位置。不能自己在困难时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却把人家忘了。这样做,是不公道的。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第三,党史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对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都应该有生动的形象的记录。<sup>①</sup>《通史》的作者们正是按照胡乔木的这些要求写党史的。

比如,在叙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历史时,《通史》记录了华北、华中和华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尤其是在抗战形势最为严峻的1942年。作者写道:“在这一年内,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77次,其中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达15次;同时疯狂进行‘蚕食’,推行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积进一步缩小。然而,华北敌后军民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对敌斗争,粉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前言》。

碎了敌人的‘扫荡’，打破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基本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扭转了不利局面，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再发展创造了条件。”<sup>①</sup>

又如，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人民，包括学生和农民、工人、商人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极大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进攻。《通史》记叙了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与此相应，“在1947年间，在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中，先后就有120万工人进行了罢工。”“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征税。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其中以四川、西康的民变规模最大”<sup>②</sup>。《通史》还专门叙述了内蒙古人民的斗争等。

民主党派和其他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共同斗争的历史方面也有反映，如《通史》第四卷，以一章的篇幅介绍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与进步文化工作，以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为核心，在重庆和武汉进一步联络进步的民主人士，并详细叙写了1944年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逐渐活跃起来的第二次宪政运动。“首先是各种民主刊物应时而起。1944年元旦，经黄炎培、张志让、杨卫玉等人商定发起的《宪政》月刊在重庆正式创刊。沈钧儒、郭沫若、陶行知、史良、邓初民、潘梓年和各界民主人士纷纷为该刊撰文。”“同时，各种宪政座谈会纷纷出现。”《通史》指出：“在民主运动中，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坚持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使之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与党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sup>③</sup>

《通史》还对支持国内抗战的进步人士华侨吴世荣进行了记述，“（吴世荣）是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的革命战友、德高望重的老同盟会员，也曾经是汪精卫的好朋友。他为支援辛亥革命而倾家荡产，由富商变成赤贫，晚年穷困潦倒，瘫痪在床。但仍关心祖国抗战。当他得知汪精卫叛国投敌时，愤怒地提笔给汪精卫写信，尖锐地斥责汪：‘千夫所指，无疾而死是你的下场了。’”<sup>④</sup>整个《通史》中对类似人物的记述很多。

其他章节也有相关阐述，如第五卷第八章《人民民主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第十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都高度评价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建立新中国过程中的巨大贡献。在反映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

①《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第174-175页。

②《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五卷第263页。

③④《中国共产党通史》第四卷第376、601页。

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方面，比如，在抗日战争中，《通史》就专门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及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而这些斗争都是长江局和南方局在中央领导下展开的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又如，在写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时，《通史》也详细叙述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活动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突出地提出了建立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的任务。中共满洲省委不但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研究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而且作出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训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装、创办刊物指导游击队工作、派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工作的决定。“这时中共满洲省委虽然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但罗登贤等省委领导人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把开展和领导反日民族战争作为满洲省委的中心任务，并提出创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方针。”“除原在抗日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杨林、杨靖宇外，金伯阳被派到南满，童长荣被派到东满，赵尚志被派到巴彦”<sup>①</sup>。由此，东北抗日战争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在东北牵制日军40万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sup>②</sup>

#### (4) 史料价值

根据《通史》第五卷附录的《文献、资料、论著要目》统计，《通史》共引用的文献、资料和论著达到了518种之多，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有一些专著是境外和台湾出版的出版物，如日本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原书房1965年版的《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67年版的《革命文献》、1957年版蒋中正著的《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等。

《通史》的《前言》中说“努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主要是第一手资料”，作者们确实这样去做了。书中的不少资料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如档案材料就有不少。如第三卷第五章用了《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感觉军委之重迭，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第三卷第244页），较好地反映了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在是否成立军委、

①②《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第658、673页。



前委和军部,职权如何划分等问题上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关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通史》引用了《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一〇〇一)三四四九》:“……原为陆征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后在美国等驻京公使的要求下,加派王正廷为代表,王正廷名列第二。”(第一卷第163页)等等。回忆性的史料也引用很多。如讲述共产主义小组时,在讨论李大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最初动机的问题中,《通史》援引了《1960年朱务善谈话纪录》:“……从主要方面来说,成立研究会,‘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后来北京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时,‘参加党的人就是组织研究会的发起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发起人都参加了党。”(第一卷第299页)从而很好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叙述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时还引用了吴玉章的回忆文章等。又如,《通史》在叙述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时,为了说明南方局怎样依靠文化界的进步势力开展各项工作,引用了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回忆文章。《通史》说:“当蒋介石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和阳翰笙提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周恩来对郭等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第四卷第385页)《通史》叙述1949年国共和谈时引用了张治中的回忆录,等等。

《通史》也参考了港台出版物,如在论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谈判中引用了台湾出版的蒋经国的《风雨中的宁静》和《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等(第五卷第610~611页)。《通史》也引用了外国出版的著作,有的是原版。如讨论跟国民党是党内合作还是党外合作问题时,援引了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一书(第二卷第110页)。如讲述王明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问题时,引用了米夫1936年版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其在书中赞扬了王明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领袖之一”(第三卷第333页)。阐述日本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向东北的问题时,《通史》介绍了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制订的《对华政策》,引用了上村伸一的《日本外交》和日本出版的《现代史资料》(八)(第三卷第675页),等等。

### (三) 史学方法

### (1) 坚持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

《通史》的《前言》中谈到：“我们将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尽可能让历史事实来说话”。从五卷的《通史》整体角度看，虽然较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字数增加了四五倍，但这种增加并不是史料长编式的辑录和堆积，更不是漫无边际的“演义”，而是比较充分地展现历史事实，并对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得出一些令人信服的结论。

但是《通史》也仅仅是“尽可能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因为毕竟也有“未尽可能之处”。从占有和使用的资料来看，《通史》基本上没有大胆涉入党史的“禁区”来重新评价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因而还不能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通史》对于党内斗争仍然着墨甚少，有时甚至是一笔带过，或者模模糊糊。事实上，党内一系列的残酷斗争历史正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在艰难困苦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是不容易被敌人轻易摧毁的。再如，随着一些资料的公布，关于新四军的一些历史是比较明朗的，但是《通史》在这方面却研究不深。作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对党和人民、对解放军和上海市的建设作出过许多贡献，尽管后来他和高岗结成反党同盟集团，但不能对他的功绩一笔抹杀，更不能不提及他的名字。其他还有对于陈独秀的研究、对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场的研究、对于1930年江西苏区肃反的研究、对于1943年的陕北肃反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有待于作者加深研究力度，使结论尽量符合历史真相。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和对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求真求实。

《通史》大概还不能算作具有个性色彩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应该说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有独特个性色彩的中共党史方面的著述很少，往往都难以摆脱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 (2) 注意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和论从史出

在阐述为什么中国只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而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为什么中国会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问题时，《通史》用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来回答这些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时期。“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

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通史》指出：“中国的这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负的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历史的基本内容。”（第五卷《本卷题记》）然后用第一章分析了面对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使中国回复战前的状态，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以毛泽东为核心，制定了对待美国和国民党的正确方针；第二章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在从抗战结束到解放战争爆发的过渡阶段里，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和武装反抗的两个方面的斗争；第三章主要叙述了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的自卫战争及其发展；第十一章反映了筹备创建新中国的情况，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这样，经过深入细致的论证之后，就不难对开始提出的问题展开回答了。

在五卷《通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述都采取先史后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比如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各自作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的两次合作，等等。

### （3）遵循“古今中外法”，注意四面八方

《通史》的《前言》中谈到“全书的编写，将努力遵循毛泽东提倡的‘古今中外法’”。毛泽东认为，研究党史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就叫“古今中外法”。具体地说，“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四面八方”，来自胡乔木的提倡，他强调：“我们党史工作者要阐明，我们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而为了更加有说服力地阐明党的这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有必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只有注意了四面八方，这样写出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通史》的《前言》）。如论述抗日战争，《通史》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战场是亚洲抗击日本的最主要战场，中国人民是抗击日本法西斯军队的主要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通史》也论证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方针成

为中国人民为新中国而斗争的严重障碍。《通史》还阐述了苏联的对华政策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 (4) 广泛地使用比较研究

“古今中外法”，也是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通史》用的比较多。比如在论述五四运动时，《通史》就同新文化运动及以后发生的大的学生运动如“一二·九”运动等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总结评价了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和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是经过还是结论，通过比较研究之后，都能令人信服。又如关于南京大屠杀，《通史》比较研究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的相同内容，然后得出结论。其他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次合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在《通史》中都进行了比较研究。

### 三、中国革命史研究

####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李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教育部委托，领衔主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文革”结束以后，受胡乔木的委托，又开始领衔主编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以下简称《长编》）。

《长编》编纂工作起始于 1978 年 8 月，原拟写成 13 卷 600 万字左右，最终完成的实际分为 12 卷，即：

- 《伟大的开端》(1919—1923)
- 《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
- 《北伐战争》(1926—1927)
- 《星火燎原》(1927—1931)
- 《抗日潮流的起伏》(1931—1935)
- 《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
- 《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1937—1938)
- 《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1938—1941)
- 《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1941—1945)
- 《争取和平民主》(1945—1946)

《战略防御 转守为攻》(1946—1947)

《最后的决战》(1947—1949)

各卷篇幅不一,少者 35 万字左右,多者近 60 万字,12 卷合计 500 余万字。全书由李新、陈铁健领衔主编,各卷又有分卷主编,李新、陈铁健亦是第一、第五卷的分卷主编。国内一批著名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各卷的编纂工作。

《长编》第一卷《伟大的开端》,1983 年 3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6 年后,全书的出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1991 年 6 月,第一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同时第二卷《国民革命的兴起》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 1997 年 9 月,12 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齐。从开始编纂至全书出齐,历时近 20 年。

《长编》卷帙多,工程浩大,参加编纂的人员众多,各卷的资料多寡、观点新旧、文笔高低略有差异,势所难免。总的说来,《长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篇幅巨大、资料翔实、学术价值极高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著作,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下面就《长编》的总体面貌作一扼要的研究分析。

### (一) 史学思想

#### (1) 写信史、写真史

《长编》是胡乔木倡议编纂的。胡乔木提出以《苏联国内战争史》作参考写出一部中国革命史。而《苏联国内战争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料、内容翔实,既引用大量的中央和地方的档案、各种文件和纪录,又引用了许多当事人的亲历记和有关人的回忆录,而把报刊记载只作为补充。所以,“力争如实地把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记录下来”<sup>①</sup>,成为《长编》编纂的宗旨。用李新的话说就是“写信史,写真史”。“写真话,不写假话。”“宁可写废话,也不写一句假话”。《长编》在《序言》中说的“凡是材料不足、问题还不清楚的,宁可暂时不写”<sup>②</sup>,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做到“写信史、写真史”,《长编》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一是材料不足、问题没搞清楚的不写,宁可少写些事,少写些问题(详下)。二是所写的事所写的问题,都尽可能写得详尽充实,将原始材

<sup>①②</sup>《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序言》,见《伟大的开端》卷首,亦见各卷卷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料充分提出来，重要的原始材料全文照录。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等等，都通过材料的叙述把它们展示出来<sup>①</sup>。即保持原始材料的原始性、完整性，不作人为的加工、取舍，从而保持所述史事的真实性(详下)。三是少论。即以述史为主，以摆史料为主，寓论于述史之中，一般不作专门篇幅的论断。但不是完全不作论断，而是论断很少，占全书的比例很小<sup>②</sup>。所作论断一般都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的论断才能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才是写真史必要的，否则不必作论断，而由读者自行判断、自行论断。这表明《长编》在写信史、写真史方面确实做了很大努力。

《长编》把写信史、写真史作为编纂的指导原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政治上、学术上拨乱反正的必然产物；是端正了思想路线的必然产物；是思想理论界、学术界深刻反省、认真反思以后的必然产物；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发展，相互推动的必然产物；是学术研究规律、历史研究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产物；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历史工作者、中共党史工作者学术研究责任、科学研究责任的必然呼唤；是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学术价值的必然要求；是社会需求、人民群众呼声的必然产物。总之，写信史、写真史，不只是《长编》编纂者们的个别信念，而是社会发展、学术发展必然产生的普遍信念、普遍原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写信史、写真史日益成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者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思想进步的反映。

#### (2)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提供有用的资料

胡乔木所以建议参考《苏联国内战争史》编纂中国革命史，还因为《苏联国内战争史》出版后成为许多专题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编写的资料依据。《长编》的《序言》说：希望此书“能够像《苏联国内战争史》那样，为各种专题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提供有用的资料。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也就满意了”<sup>③</sup>。这说明《长编》的编纂者，把提供有用的资料，也作为一个重要的编纂目的、指导思想。即不仅要“实”，而且要“详”；不仅要材料准确无误，而且要材料丰富详尽，以

①②③《伟大的开端》各卷卷首、《序言》。

便为其他各种类型的研究提供有用的资料。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长编》确实搜集、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很多资料都是全文照录(详下),成为一部资料极为丰富的中国革命史著作。

“长编”体裁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之一,这种体裁的特点就是资料性强,以罗列资料见长。《长编》将提供有用的资料作为编纂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体裁的特点决定的,这是长编体裁的有特殊性的指导思想。这样的指导思想不具备史学研究的普遍性,不是任何史学研究体裁都会采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长编》采用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应该的,有价值的,也是必然的。

## (二) 史学成就

### (1) 资料丰富

《长编》的资料工作很扎实,资料丰富、翔实,这是《长编》最主要的特色和成就。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反映:

#### ① 引用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资料

如档案资料,引用了中共方面的档案资料,也引用了国民党及其政府方面的档案资料,及外国政府的档案资料。引用的档案资料,有的是已经整理、出版了的,有的是还未公开的。如记述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被委任为北大文科学长,引用的是《北京大学文书档案》第32卷(第一卷第13页)。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年11月16日福州发生惨案,全国各地纷起声援福建人民斗争,记述天津召开的国民大会时,引用了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档案(第一卷第173~174页)。记述中共一大后党组织的发展状况时,引用了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第一卷第479页)。记述“八七”会议,引用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亦是档案资料(第四卷第7~12页)。第四卷中引用的很多文件、信件、报告均是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如《中央致江苏省委信——关于宜兴暴动》(1927年11月4日)(第17页)、《中央致两湖省委信》(1927年11月15日)(第18页)、《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第19页)、《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向潮汕进军问题》(1927年9月)(第47页)、《张太雷致中共中央紧急信——汕头的军事活动》(1927年9月27日)(第49页)、《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1927年10月12日)(第53页)、《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1927年10月23日)

(第 54 页)、《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 年 8 月 5 日和 8 月 9 日)(第 61 页)、《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 年 8 月 20 日)(第 62 页)、《中央致广东省委信》(1927 年 8 月 4 日)(第 87 页)、《中央常委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的信》(1927 年 9 月)(第 88 页)、《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 年 11 月)(第 90 页)、《信江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 年 6 月 8 日)(第 167 页)、《湘赣边特委致省委转中央信》(1928 年 6 月 16 日)(第 195 页)、《中央关于成立湘西北特委给郭亮同志信》(1928 年 1 月 9 日)(第 215 页)、《施元关于特委工作及暴动经过等向中央的报告》(1928 年 3 月 13 日)(第 215 页)、《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9 月)(第 220 页)、《周逸群给中央的信》(1928 年 8 月 22 日)(第 223 页)、《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1927 年 8 月 7 日)(第 227 页)、《中央给权忠同志信》(1928 年 3 月 20 日)(第 250 页)、《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8 月 1 日)(第 257 页)……《广西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4 月 22 日)(第 687 页)、《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1929 年 10 月 8 日)(第 697 页)、《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1930 年 3 月 2 日)(第 697 页)等等,以及《中央常委会记录》(1927 年 9 月 10 日)(第 215 页)、《中常委第十次常委会记录》(1927 年 12 月 28 日)(第 215 页)、《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30 年 5 月 20 日)(第 508 页)、第七次、第九次会议记录(1930 年 5 月 23 日)(第 510 页)、《临时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 年 8 月 24 日)(第 578 页)、《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1931 年 5 月 26 日)(第 484 页)、《总前委第四次会议纪要》(1931 年 5 月 30 日)(第 485 页)、《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 年 6 月 2 日)(第 489 页)、《总前委第九次会议纪要》(1931 年 6 月 22 日)(第 491 页)、《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主席团会议纪要》(1931 年 6 月 21 日)(第 491 页)……还有中央、地方、军队的通告、计划、决议、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大部分都是编纂《长编》当时没有公开的档案资料。第四卷中还有一些文献,如赵轸《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1927 年 10 月 22 日)(第 48 页)、《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8 日)(第 61 页)、韶玉《广东暴动纪实》(1928 年 11 月 1 日)(第 89 页)、佚名《广州红军来海丰之经过》(1928 年 1 月 13 日)(第 109 页)、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44 年 7 月 14 日)(第 147 页)、佚名《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与苏维埃的历史》(1930 年 7 月 1 日)(第 161 页)、邵式平等《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



(1945年3月)(第175页)、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6月)(第185页)、佚名《湖北秋收暴动经过报告》(1927年10月)(第209页)、佚名《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5月)(第212页)、佚名《陕甘宁边区简史》(1944年)(第289页)、胡义《醴陵的农民暴动》(1928年8月20日)(第443页)、周逸群《鄂西农村工作》(1929年8月)(第650页)、许光达《红六军历史材料》(1945年7月)(第659页)、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1945年2月)(第702页)、雷经天《广西苏维埃运动》(1944年)……这些大部分也是编纂《长编》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档案资料。第四卷中引用的中共方面档案资料数以百计,极为丰富。记述抗日战争的第七、八、九卷及记述解放战争的第十、十一、十二卷不仅引用中共方面的不少档案资料,也引用了民国政府的不少档案资料。其中一部分民国政府档案资料是还没有公开的,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蒋介石侍从室电稿》(第七卷第94页)、“国难会议”秘书处编《国难会议记录》(第七卷第2页等)、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第七卷第36页)、《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第七卷第172页等)、民国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第七卷第222页等)、民国政府行政院档案(第十一卷第521页等)、民国政府监察院档案(第十一卷第638页等)、民国政府教育部档案(第十一卷第728页等)、民国政府国防部档案(第十二卷第473页)等等。外国政府的档案资料,以引前苏联政府藏的档案资料及日本政府藏的档案资料为多。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资料丰富与否、资料深度、广度如何,首先就是看档案资料搜集、引用得怎样,而《长编》是引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的。

如回忆资料,引用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资料。这些回忆资料有的是中共人员方面的,有的是国民党政府人员方面的,有的是外国人士方面的,正面和反面的均有。有一部分回忆资料,如回忆录等已经公开出版了,有的则是尚未公布的采访记录、回忆资料。如刘清扬1962年4月27日回忆资料(第一卷第345页)、罗章龙1979年冬回忆资料(第一卷第388页)、谭祖荫1981年回忆资料、刘石心1981年回忆资料(第一卷第399页)、范天均1964年2月回忆资料(第一卷第400页)、谭天度1964年的回忆资料(第一卷第404页)、张申府1961年1月27日回忆资料(第一卷第412页)、叶剑英1979年7月16日晚接见萧克谈话(第四卷第23页)、《何长工谈话记录》(1973年7月19~24日)(第四卷第81页)、《谭震林同志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

争》(1977年3月2日访问记录)(第四卷第198页)、1987年4月16日访问李一氓记录(第四卷第507页)、袁克服等谈话记录:《鄂豫皖苏区三〇、三一年时期的一些“左”的政策》(第四卷第623页)、张云逸回忆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2月于南宁)(第四卷第695页)……以上这些资料都是《长编》编纂时未公开的,有的则是《长编》编纂者亲自采访的。这些回忆资料有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档案资料。回忆资料也是第一手资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回忆资料丰富与否也是衡量资料深度、广度的一把尺子。而《长编》引用的回忆资料也是很丰富的。

如报刊资料,《长编》对于民国时期各年代的报刊资料,可以说是搜罗极丰,很少遗漏。中共方面出版的革命报刊资料,应有尽有;民国政府各地区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也应有尽有。外国人办的报刊资料也引用了一些。引用的报刊资料主要是两种类型的资料,第一类是事件史事报道。如关于五四运动爆发的情况,引用了1919年5月5日、6日、7日等北京《晨报》的报道及《时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的有关报道。各地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则引用了各地报刊的报道。如天津的情况引用天津《益世报》的报道等。这些报道类的资料,也是第一手资料,是资料价值极高的。第二类是言论资料。一个党派、团体的主张、纲领怎样,便引用它们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主张。一个人物的思想、观点如何,便引用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如中共建党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便引用了各方人物当时在《新青年》、《改造》、《共产党》、《先驱》、《曙光》、《评论之评论》、《太平洋》、《新教育》、《政衡》、《职业与教育》、《秦钟》、《醒农》、《天义报》、《民声》、《进化》、《奋斗》(北京)、《劳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少年中国》、《湘江评论》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这类言论资料,也是第一手资料。报刊资料的丰富,也是《长编》资料工作深度、广度的一个体现。

如图书资料,《长编》引用了各个时代、时期的各种有价值的图书资料。其中有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资料书和研究著作,也有民国时期,2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一些资料书和研究著作,并包括50年代以后台湾出版的一些资料书和研究著作,还有外国各时代、各时期出版的一些资料书和研究著作。如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有:1925年3月5日广州书局印刷的《中国海员罢工第三周年纪念册》(第一卷第555页)、1923年9月印行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周年纪念册》(第一卷第530页)、1924年2月印行的

《施洋先生纪念录》(第一卷第638页)、中华全国总工会1930年2月7日出版的文虎《苏兆征同志传》(第一卷第536页)、政治月刊社1945年2月再版的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七卷第7页)、1938年出版的张执一《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第七卷第136页)、中国农村合作社1937年10月出版的《抗战言论集》(第七卷第140页)、1938年出版的《抗战妇女的活跃》(第七卷第149页)、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1月出版的钱云阶《抗战的认识》、独立出版社1938年12月印行的《中日战争与世界舆论》(以上第七卷第181页)、1946年出版的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七卷第199页)、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印行的蒋介石《抗战到底》(第七卷第299页)、1938年出版的蒋介石《抗战方针》(第七卷第572页)、三联书店1940年出版的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第七卷第442页)、青年书店1939年1月出版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第一期抗战领袖言论集》(第七卷第494页)、1940年印行的《何总长应钦出席历次重要军事会议训词》(第七卷第573页)、光华书店1948年出版的沙英《中国四大家族的危机》(第十二卷第114页)……如50年代以后台湾出版的图书有: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七卷第2页等)、(台)国防研究院编印《蒋总统集》(第七卷第4页等)、(台)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七卷第4页等)、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卷第8页等)、台北1965年出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七卷第16页等)、(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七卷第21页等)、台湾中央日报社1977年8月出版《蒋总统秘录》(第七卷第22页等)、(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出版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七卷第22页)、台湾出版《蒋百里全集》(第七卷第2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版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第七卷第37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七卷第71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七卷第10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七卷第169页)、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华侨革命史》(第七卷第184页)、(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张凤歧《中国国民党奋斗史》(第七卷第195页)、(台)中华文化社出版事业社1960年版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七卷第198页)、台北出版社《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第七卷第227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蒋廷黻回忆录》(第七卷第323页)、台

湾文海出版社出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卷第 561 页)、台湾国防部印行《戡乱简史》(第十二卷第 60 页等)……外国的图书,有一部分已译成中文,有的还未译成中文。《长编》中引用的外文图书原版资料有:韦尔斯《中国工人运动》(纽约约翰公司 1945 年版)(第一卷第 627 页)、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 1963 年版)(第七卷第 61 页)、美铃书房 1982 年版《现代史料 8·日中战争 1》(第七卷第 63 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 1974 年版)(第七卷第 64 页)、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1969 年再版)(第七卷第 66 页)、朝云新闻出版社《战史丛书 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七卷第 66 页)、牛津大学 1977 年版《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第七卷第 172 页)、(苏)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第七卷第 178 页)、(苏)博罗金《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帮助》(1965 年版)(第七卷第 179 页)、莫斯科 1969 年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七卷第 322 页)、臼井胜美《围绕中国的近代日本外交》(第七卷第 340 页)……

《长编》还征引了不少未刊的图书资料,如仇品真《五四运动纪实》(第一卷第 40 页)、陈雷编著《向炮口要饭吃——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纪实》(第十二卷第 288 页)等就是社科院近代史所收藏的未刊稿。还有湛小岑《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一卷第 357 页)、山东省益都县革命斗争史料(1961 年)(第一卷第 392 页)、《益都县东圣水村村史》(1964 年)(第一卷第 392 页)、李达《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卷第 484 页)、《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史》(第一卷第 593 页)、张浩《两个先进的青年——“二七”回忆之一》(1939 年 1 月 22 日)(第一卷第 627 页)、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 年 10 月)(第四卷第 22 页)、乐天宇《湘南农暴中的五岭怒吼》(第四卷第 187 页)、傅柏翠《蛟洋暴动前后》(第四卷第 238 页)等等都是未刊稿。

以上可见,《长编》搜罗图书资料可谓千方百计,资料是极为丰富的。征引的资料涉及各种性质、各个方面,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记述史事方面是更客观、更全面了。

从资料的体裁来看不仅有档案、资料集、研究著作、报刊报道,还有年谱、日记、书信、诗词等。其中有些资料是尚未公开的。如陈独秀 1920 年《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第一卷第 300 页等),就是北京大学收藏

的,尚未公开过。又如《陈毅安烈士给妻子李志强的信》(1927年9月20日)(第四卷第71页),也是尚未公开过的档案资料。诗词的引用,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国革命史书往往多引用毛泽东的诗词,而不提其他人物。《长编》引用了更多人的诗词。如刘伯承《记羊山集战斗》诗(第十二卷第20页)、朱德《攻克石门》诗(第十二卷第89页)、《陈毅诗词选集》(第十二卷第525页)等等。还引用国民党人士的诗词,如在“一·二八”抗战中殉国的营长朱耀章遗诗《月夜巡视阵线有感》(第五卷第194页)等。何香凝《赠前敌将士》、《赠敬爱的伤兵》等诗(第五卷第207页)等。这也是资料更丰富、更有深度、更生动活泼的反映。

### ②尽量保持资料的完整性

《长编》征引的资料不仅极其丰富,而且不少资料是全文引用,以保持资料的完整、原始性。如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全文引用,并注明引用的是英文本,因英文本文字表述较为清楚(见第一卷第450~451页)。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亦全文引用,并注明引用的是英文本(第一卷第461~463页)。记述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大会通过的《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均一一原文引用(第一卷第563~565页)。记述劳动立法运动时,劳动组合书记部拟订的劳动立法四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十九条,均全文引用(第一卷第573~576页)。记述南昌起义时,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1927年8月2日发布的命令(任命各部门负责人)全文引用,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组织编制亦详尽列表说明(第四卷第31~35页)。记述海南岛起义时,1928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工作计划决定、土地分配规定,均全文引用(第四卷第133~134页)。红四军司令部1929年1月布告(韵文),全文引用(第四卷第300~301页)。1929年10月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信江苏维埃政府施政纲领全文引用(第四卷第546~547页)。又如“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向十九路军提出的最后通牒、蔡廷锴军长的复函均全文收录(第五卷第182~183页)。以后中日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亦全文收入,包括附件一、二、三号均全文收入(第五卷第245~248页)。淞沪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的明细表(1932年2月1日~4月10日)全文列出(摘自1932年2月1日至4月10日《中央日报》)(第五卷第214~218页)。又如1933年5月6日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全文收入(第五卷第406~407页)。1933年5月31日签订的《塘

沾协定》及附件全文收入(第五卷第419~420页)。又如1935年6月11日日本梅津美治郎致何应钦的“备忘录”及何应钦7月6日给梅津的书面通知(即《何梅协定》)全文收入(第六卷第54~56页)。1935年6月27日签订的《秦德纯土肥原协定》从日文资料中译出全文收入(第六卷第60~61页)。又如1933年10月26日红军与十九路军签订的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全文引用(第六卷第274~276页)。又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中共北方局代表与国民党CC派代表会谈的详情一一记述,几次会谈双方提出的条件均一一全文引用,周小舟与谌小岑谈判后共同整理的《谈话记录》全文引用(第六卷第382~392页)。再如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1938年11月20日与日本方面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亦全文收入(第八卷第25~27页)……全文收入的资料很多,不再一一列举。这些全文收入的资料,有很多是档案资料。

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全部征引的资料都全文收入,对于没有全文收入的资料,《长编》尽可能作全面的介绍,使资料全貌有较好的保留。如记述“八七”会议,虽然没有将会议上每一个人的发言全文引用,也没有将通过的各项决议全文引用,但对会议前后经过、详细情况作了较全面记述。首先详尽记述了会议的酝酿与准备。接着记述会议情况,列出了参加会议的21人姓名,记述了会议的两项议程,记述了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报告的主要内容,将讨论国际代表的发言人姓名按先后次序一一列出,并将每个人发言的主要内容作了介绍,如毛泽东的发言讲了四个问题:(1)国民党问题……(2)农民问题……(3)军事问题……(4)组织问题……最后记述会议选出的临时政治局委员,如候补委员的名单及得票数。在全面记述会议的情况后,还就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作了详细记述,分三部分:(1)整顿和改造党的各级组织……(2)传达、贯彻“八七”会议决议……(3)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第四卷第2~18页)。这样的记述,基本上反映了“八七”会议全貌。又如记述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先记述大会准备经过,用了14页篇幅,然后记述大会详情,自1931年11月7日大会开幕至20日闭幕,每天情况均一一介绍,对大会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也作了详尽的介绍(第四卷第513~533页)。这样就使这次大会的全貌基本上得到反映。以后又另章对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及临时政府的建设作了详尽介绍(第五卷第506~513页)。又如记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6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军民

代表大会,对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十条全文收入,对大会通过的军事、财政、政治、组织等一系列决议的主要内容作了四方面的扼要介绍(第五卷第437~439页)。这不仅使这次会议全貌有了反映,也使抗日同盟军的基本状况有了反映。再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前后经过也有详尽记述。其中录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全文,录入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遗嘱,对国民政府1938年1月1日颁布的《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1月17日公布的《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的主要内容作了记述(第七卷第276~282页)。这使迁都重庆及政府调整的全貌基本上得到了反映。又如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对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的10项建议的主要内容、刘少奇作的第一次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及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记述(第十二卷第129~140页)。这使全国土地会议的全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全貌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

此外在记述五四运动时期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分别列出了1919年5、6月创刊的刊物名称6种;7、8月创刊的刊物名称11种;9、10月创刊的刊物名称4种;11、12月创刊的刊物名称17种;1920年1、2月创刊的刊物名称20种;3月至5月4日创刊的刊物名称11种(第一卷第176~177页)。虽然这里只列出了当时新出版刊物的一小部分,但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刊物,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当时刊物涌现的全貌。又如记述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各种思潮时,列举了当时八种社会改造的方案:(1)工读互助。(2)新村主义。(3)教育万能。(4)科学救国。(5)儿童公育。(6)工人储金。(7)批评至上。(8)改造人种(第一卷第195~197页)。这对于当时社会改造思潮的全貌有了基本的反映。再如谈到1920年《新青年》“五一”纪念专号共400页,“其中除了知识界写的纪念文章和工人生活调查报告外,还有工人和工界人士写的反映工人阶级觉悟的题词”。然后加了一条注,将植树工人刘朗山、恒半纱厂打包间工人李善让、大生纱厂打包间工人包礼盛、新怡纱厂打包间工人严鉴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和叶世清、南洋造船厂铁匠间工人严武、怡和纱厂工人刘光典和周傅勋、怡和纱厂筒子间工人詹用韬、先施公司大菜间张玉堂和王澄波、中华工界志成会明德等人的题词一一录出(第一卷第248~249页)。正文中未作详尽介绍,就用注作详细介绍。以上表明《长编》在尽可能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全面性方面是千方百计的。

《长编》资料的完整性还体现在记述史事的完整、详尽方面。《长编》记述

史事,对于史事的前因后果,具体经过,甚至是方方面面的细节,都一一记述无遗,很多方面、很多细节是以前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没有涉及的。如《华北事变》一章分为《日本侵略华北政策的形成》、《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冀东傀儡政权出笼》、《冀察成立特殊政权》、《日本策划内蒙古独立》七节。其中第二节又分《日本军部独裁制的确立》、《增兵华北,准备全面侵华战争》、《大规模走私》、《兴中公司——对华北全面经济掠夺的开端》四个小节。这里面的很多内容、资料、细节是以前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中没有涉及的。又如记述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分析了三方面的原因:(1)张学良的影响。(2)随着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明显改变,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日益深化。(3)共产国际的指示,加速了《逼蒋抗日》方针的最后形成(第六卷第297~310页)。分析这三方面的原因,引用了大量的资料,篇幅达八千字左右。其中的很多内容、资料、细节,是以前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中没有涉及的。

尽量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尽量保持记述史事的完整性,是《长编》资料丰富、资料工作扎实的又一方面反映。

### ③对资料进行了考证

研究历史,需要资料丰富、完整,更需要资料的准确、无误,去伪存真,所以资料的研究、分析是必要的。《长编》在资料的研究、分析,即考证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筹建的时间,《长编》在注释中用800字左右篇幅,引用了七八种说法,进行了研究,并作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确有一个过程,这就是从1920年5月开始筹建,1920年7、8月间正式建立”<sup>①</sup>。(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时间,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1920年5月)。遗憾的是注释中考证的结论说“1920年5月开始筹建”,而正文中却说:“一九二〇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七八月间正式成立”。<sup>②</sup>关于上海发起组最初成员,《长编》在注释中也用800字左右的篇幅引用了各种说法,进行了研究,指出:“上述种种说法,除了少数的是因为记忆出入外,大体上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多次酝酿过程。其中提到的张东荪,根本就没有参加组织,戴季陶、郑佩刚、梁冰弦、尉克冰、沈仲九、刘大白

①②《伟大的开端》第326~327、326页。



等人,参加不久就退出了。至于金家凤、叶天低、刘少奇,可能是把青年团和共产党搞混了……”<sup>①</sup>又如谈到:“一九二〇年秋,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sup>②</sup>然后加注说:“苏俄代表来广州的时间,1921年7月的《广东共产党的报告》说是1920年底;范天均回忆说是1921年1月至4月间;曾和梁冰弦一起到香港码头接别斯林的谭祖荫,1981年回忆说是在陈炯明打回广州之前。根据1920年10月3日创刊的《劳动者》来推断,当为1920年秋,因为他们来后不久才决定出版这个刊物的……”<sup>③</sup>又如关于参加“八七”会议的“其他二俄同志”,《长编》加注说:“当事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八七会议会场的主人——苏联派驻中国的农民运动顾问罗摩罗佐夫和他的妻子洛蜀莫娃;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洛蜀莫娃和少共国际代表牛曼。查牛曼系德国人非‘俄同志’,看来第一种说法较为合理”<sup>④</sup>。又如关于攻克横峰县城事,《长编》加注说:“有关著作与回忆录认为:‘攻下横峰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攻’。有误,根据历史档案文献记载,1928年无‘攻克横峰县城’之事,攻克该县城应是1929年10月25日”<sup>⑤</sup>,又如关于红八军问题,《长编》加注说:“各种史书说红八军番号是中央颁发的,有误。实是七军前委擅自决定的,并为中央否认……1930年4月3日,《中央通知一〇三号》中批评了七军前委,指出‘阳新、大冶红军中央决定为第八军,而广西又自己组织第八军’。”<sup>⑥</sup>诸如此类的资料研究考证,《长编》各卷中都有不少。

有些史事、资料暂时无法查考清楚,便采取存疑。《长编》中存疑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注明“待考”:在列出红四军编制序列变化表后就注:“关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时的编制情况,史学界说法不一。编者主要根据《江西省委转来毛泽东信》(1928年5月19日)……(以下还引四种文献,略)等历史文献综合分析编写的。5月下旬改编后是否还存在教导大队,待考”<sup>⑦</sup>。谈到“湘赣特委在平江芦头召开扩大会议”,注说:“一说在万载陈坑,一说在铜鼓,待考”<sup>⑧</sup>。谈到第五纵队党委和大冶中心县委召开联席会议,湖北省委巡视员吴致民参加会议,注说:“一说是湖北省委特派员胡梓,待考”<sup>⑨</sup>。谈到周逸群、众鸣、文化三人组成鄂西特委常委,注说:“有说‘众鸣、文化’即万涛、彭之玉。待考”<sup>⑩</sup>。谈到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后,孙德清任红七师师长,王—

①②③ 《伟大的开端》第327、398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 《星火燎原》第7、538、718、194、414、416、6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

鸣任红八师师长,注说:“另一说:七师长王一鸣,八师长许光达。待考”<sup>②</sup>。如众说中暂取一说:谈到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注说,大会的名称有多种提法,并列四种提法,然后说:“此处采用《先驱》第十号(1922年8月10日出版)刊载大会宣言时的原译名”<sup>③</sup>。谈到南昌起义时敌人的兵力,注说有三种说法,一是一万多人,二是三千多人,三是南昌起义纪念馆调查的结论“约五千人左右。”然后说:“本书从第三种说法”<sup>④</sup>。如加注另有他说:谈到1919年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四五十名代表参加,注说:“但据出席会议代表马骏回天津后的报告说,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代表‘有十三省、二十八处,六十八人之多’(见天津《益世报》,1919年11月24日)”<sup>⑤</sup>。谈到1937年10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注说:“关于新四军成立时间,另有9月28日、10月12日等说”<sup>⑥</sup>。如诸说并存:谈到“八七”会议会址,正文中不说会址的主人是谁,而在注中说:“关于八七会议的会场,许多会议参加者认定是在俄国农民运动顾问罗摩罗佐夫家里,也有个别会议参加者持不同意见。《郑超麟回忆录》认为‘会场在汉口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房屋的主人是‘一个美国公民’。”<sup>⑦</sup>谈到南昌起义后,“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注说:“关于起义军撤出南昌的时间和张发奎部进占南昌的时间,有如下材料:⊙《周逸群报告》(1927年10月30日):‘由三号起义军开始出动,叶系四号出发,贺系五号出发’。⊙《晨报》(民国十六年八月十日):‘九江六日电通社电:共产军首领贺龙叶挺,于五日率行退出南昌’。⊙《晨报》(民国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汉口十日东方社电:政府方面接报告……张发奎七日占领南昌对岸之牛行’。”<sup>⑧</sup>以上多种存疑的方法,表明《长编》搜集资料的广度,研究资料的深度。

#### ④资料性的注释很多

注释可以用来注资料的出处,也可以用来对史事、人物、资料等作研究性的说明。这种研究性的说明往往是资料性很强的,可以视为资料性的注释。学术性强的研究著作,资料性注释往往很多,甚至会出现注释篇幅多于正文篇幅的情况。《长编》的注释中资料性注释是很多的。如对一些人物、人名作了注

①②④⑦⑧《星火燎原》第652、672、28、7、42页。

③⑤《伟大的开端》第472、165页。

⑥《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第3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释：谈到王光祈，注说：“别名若愚，四川温江县人……1914年到北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1918年6月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发起筹备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1919年7月学会正式成立，被推举为执行部主任”<sup>①</sup>。谈到施存统，注说：“施存统原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浙江新潮社成员。1919年11月，因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在学校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该刊被军阀政府查封，施本人以及与此事有牵连的学生和支持《浙江新潮》的一师校长，均被追查，株连。于是，他同俞秀松、周伯棣和傅彬然等四人，离杭州赴北京，并立即参加了正在兴办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被编入第一组”<sup>②</sup>。

如对一些报刊作了注释：谈到中共成立后，《新青年》完成历史使命，注说：“1922年7月，又出版过一号，结束第九卷。1923年6月复刊，改为季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性机关刊物。1925年改为不定期期刊，1926年最后停刊”<sup>③</sup>。谈到《先驱》，注说：“《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此时《共产党》月刊已停刊，《响导》尚未创刊，《先驱》的一些重要文章实际上反映了党中央的观点”<sup>④</sup>。

如对一些史事作了注释：谈到1926年“东兰惨案”，注说：“1926年2月，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土豪杜瑶甫等勾结桂系龚寿仪团镇压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军，在武篆大肆烧杀掳掠，被杀农民500余人，财产损失约数百万元，史称‘东兰惨案’。”<sup>⑤</sup>谈到“王克勤运动”，注说：“王克勤，原系被抓丁入伍的国民党军士兵，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被俘，补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后为班长，在全班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活动先后在晋冀鲁豫军区和全军推广，被称为‘王克勤运动’。”（第十一卷第390页）

如对一些文献资料作了注释：谈到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写了报告——《前委给江西省委转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注说：“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当时抄写了三份，分别由湖南省委、江西省委转中央。这份抄件不是《毛泽东选集》中《井冈山的斗争》那份抄件。在《革命性质问题》一目中，多出“中国纯粹的民族资产阶级”一大段（是

①⑤《星火燎原》第165、693页。

②③④《伟大的开端》第226、302、490页。

该目的第二段,约450字)……”<sup>①</sup>谈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给中原野战军的电报,注说:“毛泽东起草的这个电报,原共五点,1960年版《毛泽东选集》中删去第四点,并将第五点改为第四点,删去的内容中有‘东西两兵团’问题。见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55页”。<sup>②</sup>

如对一些组织、团体、单位、部队等作了注释:谈到解放军第三十五军,注说:“第三十五军,系由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吴化文部改编而成”<sup>③</sup>。谈到红四军前委,注说:“当红军大队由沔渡出发时,取消军委,组织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陈毅为书记。退出桂东时取消前委,组织行委,毛泽东为书记”<sup>④</sup>。谈到原红六军第三纵队奉命改编为红五十师,注说:“按中央计划,长阳组建红五十师,巴兴归组建红四十九师。两者合编为红十军。此计划后未完全实现”<sup>⑤</sup>。谈到抗战时期的国防会议,注说:“国防会议,是国民党为筹划抗战事宜于1936年7月设立的,蒋介石为议长;1937年3月改设国防委员会,汪精卫任主席”(第七卷第112页)。谈到《新青年》八卷一号发表《武昌五局工人状况》,注说:“武昌五局即纺布局、纺纱局、铜币局、银币局、麻布局”(第一卷第383页)。谈到“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注说:“该组织以职业青年、失业青年、退伍军人及部分学生为核心,亦有老年参加,4万余人,主要负责人是陈金水、张武曲、林士山、陈学远”(第十卷第656页)。

如对一些会议作了注释:谈到曲阜会议,注说:“曲阜会议是1948年8月下旬,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有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sup>⑥</sup>。

如对一些地名、地理作了注释:谈到察哈尔,注说:“察哈尔当时为一个省,全国解放后撤销,南部划归河北省为张家口地区,北部锡林郭勒盟划归内蒙古”<sup>⑦</sup>。谈到热河,注说:“热河当时为一个省,全国解放后撤销,南部划归河北省为承德地区,北部划归内蒙古自治区”<sup>⑧</sup>。谈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各省,注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将东北划分为黑龙江、兴安、嫩江、吉林、松江、合江、辽宁、安东,辽北9个省”<sup>⑨</sup>。“北满”、“西满”、“南满”、“东满”等都作了注释(第十一卷第332~335页)。

如对一些时间等作了注释:谈到方志敏1927年12月中旬赴横峰工作,

①④⑤《星火燎原》第693、208、203、669页。

②③⑥《最后的决战》第480、512、4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⑦⑧⑨《战略防御 转守为攻》第275、2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注说：“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说是‘十一月中旬’，是指阴历，推算公历是‘12月中旬’。”<sup>①</sup>谈到《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时间，注说：“从报告内容判断，所署的时间是阴历”<sup>②</sup>。谈到1930年8月2日长沙举行“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和庆祝苏维埃成立大会，注说：“原定8月1日举行，因帝国主义军舰炮轰长沙，故改在2日”<sup>③</sup>。

如对一些词语作了注释：第四卷第19页注：“‘安中原’：中共中央代号。‘民中’：国民党中央。‘谭苏’：谭平山，苏兆征”。第一卷第534页注：“‘洗马沙’是广东话，意思是包工”。第583页注：“‘长牌’即正式工，‘短牌’即临时工”。第十二卷第484页注：“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第七卷第495页注：“‘制令线’是日军军事术语，指用以限制作战部队的行动界限”。

此外，各种类型的注释还有，如考证性的注释、存疑性的注释（详前）等等。众多的资料性注释，从又一个侧面说明《长编》的资料工作是扎实的，搜集、研究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

《长编》的资料工作是极有成绩的，但仍有可以继续努力之处。如资料出处的注释，有的还不规范。有的只注书名而不注作者，有的只注出版社而不注出版年代（如第七卷第227页注<sup>④</sup>）。又如可以搜集征引的资料还有不少，特别是国外的档案资料还可以多搜集征引。前苏联、共产国际的一些档案公布后，有很多是可以征引和研究的。再如《长编》第一卷《伟大的开端》1983年出版时尚附录了一些照片资料，而1991年再版时，不再附录照片资料，第二卷以后各卷也没有照片资料，严格说来，这也是资料工作的一个缺陷。总之，《长编》的资料工作，仍可以作锦上添花的努力。

## （2）突破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旧体系

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体系往往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为建党、大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五个时期论述。而《长编》分12卷，即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为12个阶段进行论述。大革命时期被分为国民革命的兴起（1923—1926）、北伐战争（1926—1927）两个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分为星火燎原（1927—1931）、抗日潮流的起伏（1931—1935）、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三个阶段，这突破了以前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体系。

以前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书往往以毛泽东的实践活动、毛泽东的著

①②③《星火燎原》第165、637、428页。

作为中心来记述,《长编》完全突破了这一做法,对所有的事件、人物均给予客观的记述。如以往的革命史、中共党史书记述中共建党,总要突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长编》则根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实际工作情况,根据小组成立的先后,首先记述上海小组的情况,并充分肯定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全国建党工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又如以往的革命史、党史书记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起义、根据地建设,往往突出秋收起义,突出井冈山根据地。《长编》的《星火燎原》卷《各地武装起义》一章分14节,分别论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海南岛起义、黄麻起义、弋横起义、湘南起义、洪湖湘鄂边起义、闽西起义、渭华起义、平江起义、全国其他武装起义。《全国其他武装起义》一节中又分12小节分别论述江西、湖北至河北、辽宁等12个省的起义。这些起义的论述,一般按照时间的先后,而不按照起义领导人的地位高低。各地起义领导人,不论他以后的政治面貌如何,都一一记述。在论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一章,并论述闽西、湘赣、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其他革命根据地》另立一章,分别论述闽浙赣(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广西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各地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的事迹,也不论他们以后的政治态度如何,均一一记述。以往中国革命史、党史书论述土地革命,往往突出毛泽东代表了正确路线。《长编》在论述各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时,论述了各地土地革命的情况,对各地的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论述湘鄂赣土地革命时,就指出很早就实行了只没收地主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中立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并承认土地私有,指出“上述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基本上构成了土地革命政策的完整体系,对党的土地革命理论、路线、政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sup>①</sup>。

以往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书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国民党军队一般都作全盘否定的记述,而且篇幅也很少,《长编》开始作一分为二的记述。特别对蒋介石及其政府、军队在抗战中的一些贡献作了客观的记述,对其失误、罪恶也作了记述。比如不仅肯定了战略防御阶段的国民党战场,对于相持阶段、反攻阶段的国民党战场的战役也作了客观的记述。除此之外,对于战时国民政府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也作了详实的客观的记述,

<sup>①</sup>《星火燎原》第448页。

而且篇幅不少。如《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卷写抗战的相持阶段,分为八章:第一章《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第二章《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及对内政策》、第三章《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第四章《大后方的经济建设》、第五章《持久战前期的中国战场》、第六章《日本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第七章《战时国统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第八章《皖南事变与中国政局的新变化》。这八章中主要写共产党战场的只有第三章,第八章有一半,而主要写国民政府及国民党战场的有一、二、四、五、七等章,占了全书大半的篇幅。这样的写法在以前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书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又如《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卷其章节目录如下:

- 第一章 国民政府的对日备战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日策略的变化
  - 第二节 国防建设与整军备战
  - 第三节 战前国防计划的剖析
- 第二章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政局
  - 第二节 卢沟桥事变
  - 第三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 第四节 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 第三章 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
  - 第一节 淞沪会战
  - 第二节 平津沦陷后的华北战局
  - 第三节 八路军三大主力挺进敌后实行战略展开
  - 第四节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南京陷落
  - 第五节 新四军奔赴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 第四章 抗战初期中国的内政外交
  - 第一节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 第二节 陶德曼调停
  - 第三节 沦陷区傀儡组织的出现
  - 第四节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与首届国民参政会
  -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 第五章 抗战防御阶段的结束

## 第一节 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 第二节 徐州会战

## 第三节 武汉会战与广州失守

## 第四节 中国抗战的军事战略

可以看到,这一卷的第二、三、四、五章共十八节中,只有六节涉及到中共方面的情况,大部分篇幅写了国民政府、国民党战争的情况。再如《同盟抗战赢得胜利》卷,其中的大部分篇幅也并非是在写中共方面的情况。《长编》中关于抗日战争的三卷,虽然主要的篇幅并非是在写中共方面的情况,但对于全民族抗战的全貌,有了较完整客观的记述。

## (3)提出了新观点、新论断

《长编》以资料丰富见长,但作为研究著作,《长编》也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论断。《长编》对很多历史事件都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研究,摆出了新史料,提出了新观点、新论断。如论述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一节中首先写了《短暂的曲折》一小节,记述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得知西安事变的确切消息后,12月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此事并没有作出正确的解决方针、政策,一度从“逼蒋抗日”的政策回到了“反蒋抗日”的政策。会上毛泽东还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针,倒是张闻天提出了比较正确的主张。《长编》指出:“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策层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经过13日会议的讨论,意见也还未完全统一起来”<sup>①</sup>。又谈到:“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12月13日在报道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中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6日,该报第二版刊登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的‘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罪行。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对蒋的愤恨,动员群众起来,要求‘罢蒋’、‘审蒋’。”<sup>②</sup>接着《长编》分析了中共在对蒋的策略上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和动摇,主要是:“(1)中共中央一些负责人在西安事变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认识不足……(2)感情因素起作用……”中共党内外群众对蒋介石的痛恨情绪和呼声,不能不在中共中央决策层中发生影响<sup>③</sup>。在写了《短暂的曲折》一节后,接着写《19日会议的正确决策》一小节。谈到直到12月

①②③《从内战到抗战》第676、677、677~679、679~6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才放弃了“审蒋”、“除蒋”的主张,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分析了中共中央很快转变,作出正确方针决策的原因:(1)西安事变爆发后,并没有出现像有人预想的那种张、杨登高一呼,全国群起响应的局面;相反,“拥蒋潮流”却波及全国……(2)周恩来的西安之行,帮助了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3)担心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政权……即担心“右派”(指何应钦、汪精卫)与日本勾结夺取南京政府,造成大内乱。(4)苏联的态度及其报刊言论的影响……分析了四方面原因后指出:“在上述几条原因中,第一条应当说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因为政治形势、力量对比是一个政党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基础或前提”<sup>①</sup>。这里提出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的决策层有“短暂的曲折”,提出中共中央的一些负责人最初对蒋介石在全国的影响力认识不足,提出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制定的最主要原因是“拥蒋潮流”波及全国等等,这些都是新观点、新论断。而这些新观点、新论断提出的基础是摆出了大量的新史料。这些史料是以前的研究者没有注意搜集和研究的。

又如论述“西路军的悲壮历程”,用21页的篇幅对西路军的产生、组成情况、作战历史等作了详尽的记述。可以说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中第一次作如此详尽的记述。对西路军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说:“自1936年10月24日西渡黄河,到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离队,残部分散游击,历时近150天。2万将士,身处戈壁,面对强敌,孤军苦斗,以血肉之躯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指挥部署,牵制敌军10多万人,毙伤敌2.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的作战,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sup>②</sup>。对于西路军在牵制敌军、配合河东主力红军以及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贡献,作充分的肯定,这在中共党史书、中国革命史书中还是第一次。这是全新的观点论断。书中对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原因、教训也作了全新的分析、论述。指出主要是:(1)“任务多变,行动徘徊,卒陷绝境。”“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引徐向前语)……(2)“丧失战场主动权”……(3)“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4)“对蒋介石估计不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便认为

①②《从内战到抗战》第679-684、463页。

西路军“前途共佳”，希望蒋介石能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西路军。当西路军不断向中共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中央又担心增派援兵会破坏与蒋的和谈，挑起内战，中央左右为难，总想尽力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以后迫不得已组织了援西军，但规定援西军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不能西进过远……最终无法挽救西路军失败的命运<sup>①</sup>。这里指出了中央对西路军的失败是有重要责任的。这里的分析，及提出的一些观点论断也是以前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中没有的。

再如在论述西路军时提到：“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到1936年两军第二次会合，一年多时间，打通国际路线具有日益紧迫的意义。张国焘南下川康，成立伪中央，与打通国际路线背道而驰。他后来取消伪中央，同意北进，赞成打通苏联，造成西北抗日局面，是其错误路线破产的基本标志。至于他提议四方面军独立进取甘西，或同意先机渡河夺取甘北，是在赞同中央关于逼蒋抗日、打通苏联的总战略方针前提下，发生的具体军事部署上的分歧，没有形成与中央对立和分裂的行动”<sup>②</sup>。这里对张国焘1935年至1936年的言行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特别是后半段的分析，是以前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所没有涉及过的。

诸如此类的新观点、新论断，在《长编》中是很多的。征引大量新资料，提出大量新观点、新论断是很自然的。

### （三）史学方法

#### （1）实事求是

求实、求真为《长编》编纂的宗旨、指导思想。在实现这个宗旨方面，编纂者作了以下的努力：

①材料不足，问题还不清楚的一般就不写，宁可少写些事，少写些问题，而不写无资料之事。如长征途中张国焘是否有电报要拦截、解决毛泽东等人的问题，大概因为这个电报还没有在档案中找到，所以《长编》没有提这件事，只是写：“当一、三军团北上以后，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曾企图阻拦，徐向前制止了这种行动，为维护红军团结作出了贡献”<sup>③</sup>。没有提张国焘曾有电报命令拦截。

②所写的事和问题，都尽可能写得详尽充实，将原始材料充分摆出来，重要的原始材料全文照录。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及其结局和影

①②《从内战到抗战》第463-467、450页。

③《抗日潮流的起伏》第7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响等等,都通过材料的叙述把它们反映出来。原始材料全文照录,前已列举不少,兹不再赘。通过资料叙述事件的全过程,叙西安事变,叙西路军都是典型,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样做,就能保持事件的实、真。

### ③记述事件、人物力求客观。

首先,对于领袖人物的言行不人为地拔高,对于他们的过失不人为地回避。比如述中共建党没有人为地突出毛泽东。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没有人为地突出秋收起义。叙根据地的建设、土地革命的开展,没有人为地突出井冈山,突出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详前)。在记述西安事变时,没有人为地突出毛泽东,肯定了张闻天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详前)。

其次,对于事件所涉及到的人物,一般不回避,而是如实将姓名一一列出。记述中共一大列出全体代表姓名。记述“八七”会议列出全体代表姓名,其中包括顾顺章、郑超麟<sup>①</sup>。宁都会议参加的成员,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国革命史书一般语焉不详,人为地回避,《长编》则列出了与会者的姓名,后方: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将会议上前后方各人的主要观点一一列出<sup>②</sup>。

第三,对于中共党内的一些犯过错误、晚节不好的人,也不因人废事、因人废言,不否认他们做过的好事。比如对陈独秀、对张国焘做过的好事有所记载。又如在记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时提到:“为了教育党员,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赣东北农村环境和党的状况,由江西省委特派员饶漱石编写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即《共产党员守则二十条》),它的内容有22条:(1)服从党的命令。(2)遵守纪律。(3)牺牲个人。(4)勇敢参加阶级斗争。(5)对党忠实。(6)要随时随地去宣传群众。(7)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群众。(8)努力做好党员的一切工作。(9)严守秘密。(10)按时到会。(11)缴纳党费。(12)勤习革命理论。(13)打破家庭观念。(14)打破地方观念。(15)打破亲族观念。(16)打破雇佣观念。(17)打破领袖观念。(18)打破迷信观念。(19)不得贪污。(20)要明瞭政治。(21)接受批评。(22)永不背党。《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一书,是土地革命时期闽浙皖赣农村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一本对党员进行教育的教材。它的最大特点是联系农村实际,具体和通俗,因而具有说服力和战斗性……其中第(17)条中特别指出:‘许多同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这

①《星火燎原》第6~7页。

②《抗日潮流的起伏》第560~562页。

是很错误的,我们应该服从整个的党,不应该盲从某个领袖’。这对党员正确认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党的组织原则,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当时,它广泛流传在党员中,深受党员的欢迎,成为党员行动的准则和座右铭,对赣东北党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大作用”<sup>①</sup>。这里对饶漱石编写《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事作了详尽的记述,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件事是以前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书中没有披露过的,这样的评价,这样的做法,也是以前的党史、革命史书中没有的。而且介绍饶漱石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又如记述广州起义时说,起义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叶挺等领导,然后加注对黄平作了说明:“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sup>②</sup>,既不回避黄平领导过广州起义,又指出了他以后叛变。记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时,谈到:“1931年夏,成立了湘鄂赣省总指挥部,总指挥为孔荷宠……”然后加注说:“1934年投敌叛变”<sup>③</sup>。不回避孔荷宠曾任湘鄂赣省总指挥,又指出了他以后叛变。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既指出他以前怎样,又指出他以后怎样,对于他做过的好事不回避,对于他做过的坏事不掩饰,这是全面、客观、一分为二、实事求是方法的很好体现。

### (2) 以史为主

作为长编体裁,决定了在编纂方法上以述史为主,而不是以论为主,也不是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史多论少,是《长编》的显著特点。《长编》各卷一般不设专门的章节来论。各章后尾一般不设“结语”、“结论”等节。十二卷中只有第一、第三卷在全书的末尾设了“本卷结束语”、“简短结语”,其他的十卷都未设“结束语”。在具体的叙述中,以摆史料,叙史为主,论很少。如记述中共一大,以记述一大的准备、一大的经过,介绍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为主,对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意义不再作大篇幅的论述,只说:“党的一大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宣告正式成立。”<sup>④</sup>又如记述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只用了200余字概要说明国内和国际意义,而没有展开进行分析。《长编》“论”少,但仍有“论”,“论”的篇幅少,但一般都有新意,都提出了新论断。如记述西安事变过程中,对“短暂曲折”原因的分析,对正确方针确立原因的分析,可以作为“论”。如对西路军

①②③《星火燎原》第565~566、86、436页。

④《伟大的开端》第449页。

失败原因、教训的分析,可以作为“论”。而这些论都是有新意的。通览《长编》可以发现,不提出新观点、新论断,往往不作长篇的“论”,而提出新观点、新论断就作较多篇幅的“论”。如第九卷第八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六节《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历史经验》,这是惟一的设专节论述意义和经验的“论”的专节,这一节用了13页篇幅,但“论”得是有新意的。在论述意义时指出了以下几点:(1)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帝斗争历史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2)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点。中华睡狮不但从沉睡中醒来,而且发出了排山倒海的怒吼,夺得了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3)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重振雄风,走向世界,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转折点。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日益提高。(4)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英烈倍出、正气弘扬的辉煌时期。千千万万的民族英雄,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烈的篇章。(5)抗日战争是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由于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政治上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共在处理国共关系、国际关系,在军事上、思想上都成熟起来。这里总结的第(2)、(3)、(4)点,是有新意的。在论述每一点意义时,都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如论述第(4)点时,举出了中共的一系列英烈,也举出了国民党军队的一系列英烈,还举出了一系列广大民众的可歌可泣事迹。这表明,“论”亦是由“史”组成。“论”出自“史”。“论”不是空论,是实论。在论述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时,强调了三点:(1)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在异民族侵略面前,具有何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所铸成的,它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是任何人所不能破坏的。(2)国共两党,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两个最强大的政党,这两个政党的关系如何?他们的合作与分裂,对中国的命运、前途,从来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日两国人民,应继承和发扬两国世代友好相处的传统,共同促进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两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这三点经验的论述都是有新意的,都是“论”从“史”出,而且有现实意义。《长编》的“论”,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新观点、新论断。这也表明,《长编》不仅重视资料工作,也重视理论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长编》也有很大进展。

《长编》以“史”为主,同时也不忽略“论”,“论”中亦重“史”,“论”中亦有“史”。《长编》的“史”、“论”关系,体现了求实、求真的指导思想,是可取的研究方法。

## 第五章 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理论分析

### 一、中共党史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原因

#### 1. 产生的历史条件

中共党史学科是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共党史研究则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成熟而产生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以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没有工人阶级的队伍，没有工人运动。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以后发展成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强迫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还攫取了中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中国逐渐沦为被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的领土、主权不完全的半殖民地。随着西方列强的商品输入，及以后的资本输入，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但又没有彻底瓦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但发展很缓慢，又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向半封建社会演变，最终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使得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了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由单一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转变成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革命任务转变成反帝反封建。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开办商业、企业，随着中国本土的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产生、发展起来，队伍不断壮大，工人运动渐渐兴起，此起彼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至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一样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

革命性更强。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和水陆交通线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使中国工人阶级有很强的战斗力。中国工人阶级又与农民有着天然广泛的联系,易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所以当农民阶级没有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也没有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重担自然而然便落到了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零星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传播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革命作用,同时向全世界、向中国人民宣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了。中国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影响很快扩大,逐渐在中国先进思想界举足轻重。

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完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从事革命斗争,需要有自己的政治团体,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政党。有了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干部基础,有了社会需求,中国共产党便应运而生,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了。

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过程中,便有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文字产生;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后,便有研究中共一大的文字产生,这样,中共党史研究就产生了。这些早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先进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导的研究。早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早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多为介绍情况式的、汇报工作式的,如佚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sup>①</sup>,就是一篇介绍、汇报中共一大经过情况的文字,篇幅不大,仅三千字左右。

<sup>①</sup>这篇文章可能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的。详见陈小枚等《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证》,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当时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发展,并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影响。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也在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宣传教育、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日益重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产生了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5年末至1926年4月完成)、《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等一些成果。这些成果篇幅大大扩大,已形成一定的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办的一些党校、训练班,开设了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课程。尽管这时的写党史、讲党史主要是一种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学术工作,还不能完全公开,系统地整理资料还未开始,但既然已经有了著作,已经开设了课程,这即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学科开始产生。

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学科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而产生的,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产生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

## 2. 产生、发展的基本原因

### (一)民主革命时期产生、发展的基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学科在民主革命时期产生、发展的基本原因是:

#### (1)国内外交流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处于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民主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是得到世界无产阶级帮助的,其中突出的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为了与共产国际联系,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于是便产生了介绍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情况的汇报、报告。正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所规定的:“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sup>①</sup>正是这些向共产国际和兄弟党汇报中国共产党情况的报告,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史研究文学。如佚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经过、中共一大开会的情况,就是一篇中共党史研究的

<sup>①</sup>《“一大”前后》(一)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文字。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也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情况的产物。

而在中共一大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报告,则是国内各地共产党组织交流情况的产物,也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史研究文字之一。

这些早期的国内外情况交流,是当时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是政治任务,而非学术需求。

### (2) 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需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党史研究者基本上以领导者为主。他们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首要目的和任务就是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以使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蔡和森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他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同志们对于党的生活及其斗争的经验想知道而不能知道,故应先做这个报告。”<sup>①</sup>蔡和森作《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也是为了总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发展的教训,以便在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在报告的末尾说:“我们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八年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立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sup>②</sup>可见,蔡和森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目的,就是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华岗写作《中国大革命史》,自叙目的说:“中国大革命所以受到这样惨痛的失败,一方面固然出于许多客观的困难,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国大革命给予革命阶级与革命政党的教训也特别重要。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更须仔细研究过去在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这便是我在百忙中编著本书的主要用意。”<sup>③</sup>这说明他研究党史的目的也在于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而作出这个决议的重要目的也在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

①②《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150页。

③《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第4页。

王明“左”倾路线的教训。《决议》指出：“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sup>①</sup>这一切都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一个首要目的和任务，就是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延安整风运动时产生的一批党史研究成果等，都反映了这方面的需求。

### （3）宣传教育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需要向人民群众作宣传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革命，从而靠拢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同时，也需要向广大的党员、干部进行经常的教育，使他们明确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意义及其担负的责任。一个新党员要了解党章、党纲，也要了解党史，才能真正了解党。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全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1924年5月，中共三届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都强调了党内教育是很严重的问题。后者明确提出：“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再次强调了要加强党内教育，要设立党校，并规定党的中央机关应当注意对党校统一的材料之供给。1925年9月，随着五卅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发展壮大，由近千人发展到3000人以上。10月召开的中共四届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开办两种形式的党校：（1）“各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培养群众鼓动员，对象主要是工人。学习期限一个月或一个半月。（2）“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训练政治知识较高的和已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党员，培养能够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才。学习期限不超过三个月。在此前后，各省区先后开办了党校。1925年夏，北方区委创办了北京党校。1925年10月以后，上海区委也开办了党校。上海区委党校的课程表，列出课程10门，其中有瞿秋白讲“中国劳动运动与我党的发展”（一次）、彭述之讲“农民问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题及中国农民运动之发展”(一次)。1926年2月初,上海区委决定开办高级党校与初级党校。高级党校10门课程,其中一门是“最近中国革命运动史”。初级党校9门课程,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略史”。1926年,广州、武汉都设立了党校。1927年,陈独秀还打算设立有两个部容纳500人的中央党校。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苏区的建立、扩展,中共中央更注意了向党员进行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宣传教育。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开办中央训练班,从2月开始到9月30日,共办了3期,其中的课程有:中国过去职工运动的经验、海陆丰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的经过及教训、中共之历史的环境等。同时,中央要求广东、福建、四川、山东、云南、河南、陕西等各省“开办训练班”,“以造就干部人才”;对于教材也提出了要求,指出福建省委训练班所用的材料“偏于理论方面,难使听者得到很深切的印象”,“最要紧的是要使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如讲农民运动时,要把闽西的斗争经过来做材料,这样才能使听者感着更浓厚的趣味与深切的了解”。1931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苏区开办党校及干部训练班。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对党员、干部的宣传教育抓得更紧了,先后开办了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华北联大等学校。1942年4月1日,中央党校第1期开学。1948年11月8日,马列学院第1期开学。这些学校都有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课程。要讲课,就得写讲稿,写讲课提纲,中共党史的研究便发展起来。从以上概述中可知,2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的讲稿或讲稿提纲,但现在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现在已经整理出版的仅有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大纲)、李立三《中国党史纲要大纲》、《党史报告》等。这些报告和提纲,都是适应向党员、干部进行宣传教育而产生的。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是给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进行宣传教育的报告。报告的开头说:“同志们离国久了,有的几年,有的几个月,在政治经济方面,尚有报纸和党团刊物,知道个大概,但是关于党及党的内部情形,一定很少知道的”,所以就作这个报告向大家介绍党的情况。又说:“同志们都是要作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sup>①</sup>可见,蔡和森除了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外,

<sup>①</sup>《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92页。

也是为了向党员进行党的知识、党的理论的宣传教育,才作这个报告的。再如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是1926年在李富春主办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及邓中夏任院长的劳动学院中讲课的讲稿。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是讲课的产物。莫文骅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写作经过》一文说:1937年,“党中央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定重新训练老干部,并且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于是在抗大设一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课程,只是苦于无适当的教员担任讲课。四月初,张闻天同志受中央委托,在抗大组织一个研究委员会,研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问题,并亲自担负领导责任……”《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教材就这样问世了。<sup>①</sup>可见,宣传教育的需要、作报告、编写教材的需要,推动了党史研究成果的问世。

宣传教育和任务是广泛的。比如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进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推动了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这也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又如,为了批驳国民党右派、反动派及其他各方面对中共的造谣,中国共产党人披露历史真相,进行正面宣传,这也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宣传教育的需要,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共党史研究社会化、大众化,社会影响、社会效益不断扩大。

国内外交流的需要、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需要、宣传教育的需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产生、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也是党史研究成果表现的主要形式。从中又可以看出,在当时,政治需要、政治任务、政治原因、政治动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几乎再也没有其他的原因和动力。

## (二)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的基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史研究的环境、条件大为改观,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客观基础。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发展的原因有与民主革命时期的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需要,是相同的。从建国初到60年代初,以及八九十年代的很多中共党史研究成果,都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党史研究成果,很多都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

<sup>①</sup>《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416-417页。

的成果,就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宣传教育的需要,是相同的。建国初,为了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作用、方针、政策,在宣传、学习的高潮中涌现了一批党史研究著作。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在全国各党校、高校,乃至中学的开设,又出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教材。在50年代、60年代及80年代的党史研究成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教科书。政治上国内外交流的需要的影响逐渐减少,中共党史研究向通史化、体系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一吋一地的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位日益降低。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交流在发展,但这些交流主要是学术交流。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成果,有一些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但这些成果并不是专为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共产党而写的,只是在国内出版后,又向国外发行而已。这是一个不同点。此外的不同点有:

#### (1) 党和政府的提倡、支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党史研究的,而社会主义时期不仅党重视,政府也重视,给予大力的支持。在各高校等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这是政府的规定。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负责搜集和保管革命历史档案和文物。同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征集革命文物令》。1959年,设立国家档案馆。这些都是政府对革命史、党史研究工作的提倡、支持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共产党的各项党史研究工作也得到政府在经济、物质方面的支持。195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集党史资料的通知》;1955年4月,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档案馆筹备处;80年代设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等,都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党史资料、党史专著的出版也得到政府的提倡、支持、资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更是重视和提倡全国各地进行党史研究。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毛泽东曾提议由董必武主持编一本党史。后来,毛泽东说:全党都可以来编,编出一百本来,总可以挑出一本好的。1958年,毛泽东又号召各地编写地方党史。<sup>①</sup>80年代,胡耀邦号召全党动手编写党的组织史资料。杨尚昆亲自兼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领导带头重视,各级政府和党组织也紧紧跟上,这就成为党史研究的强大推动力。

<sup>①</sup>《胡华文集》第2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这种推动力之强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 (2) 政治运动、政治活动的影响

如《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和学习,既培养了党史研究、教学工作者,也推动和影响了党史的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和公布,大大推动、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史研究,推动了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拨乱反正,推动了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也推动了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传统教育、国情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也都推动着党史研究向前发展。党史研究受到政治运动、政治活动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难免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作用、破坏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史研究。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文革”中的党史研究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完全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频繁的政治运动,时时影响党史研究,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没有的。

### (3) 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发挥作用

每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都有它的内在规律,顺应这个规律,学科就发展、前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中共党史学科的内在规律就是实事求是、科学性、学术性,就是要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前进。中共党史学科内在规律发挥作用的标志,便是党史学界开始把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学术、一门科学看待,而不只是作为政治的工具看待。这种境界的实现,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史研究者、工作者开始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学术性、独立性呐喊。如胡华就写了很多文章。1979年,在《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一文中,胡华强调:“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党史”;“学习和研究党史,就是要完整准确地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避免和克服生搬硬套、照抄、照办的错误”;“要敢于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要解放思想,敢于冒风险、闯‘禁区’。”<sup>①</sup>这些实际上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学术性,还历史本来面目。1995年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出版,反映了党史学界对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学术性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党史学界

<sup>①</sup>《胡华文集》第27-29页。

对于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学术性的认识加深,就大大推动了党史研究沿着科学、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前进。中共党史研究体系和理论问题的重新探讨、学科组成体系的全面建设、方法论的突破性前进、研究范围日益扩大、资料建设的专题化和规模化,都是在党史研究必须科学化、学术化的指导思想下得到推进的,也都是党史研究科学化、学术化的具体反映。正是在党史学界的认识达到了科学化、学术化的境界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才比较成熟了。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不认识它,承认不承认它,违反它或顺应它是人为的、主观的,但不认识、不承认、违反它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认识它、承认它、顺应它就会成功、前进,这是客观的事实,是必然现象。十年“文革”中的大破坏、大倒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繁荣、大发展,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战争环境中,在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中共党史学术研究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这是可以理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学术研究的条件已具备,但因为“左”的干扰,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学术性的认识还不深刻,所以,中共党史研究还不能达到科学化、学术化的境界。尽管如此,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已在起作用,推动人们向科学化、学术化的方向努力。而在经历十年“文革”的巨创深痛之后,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终于在反思中被人们完全认识、承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成熟,学术研究内在规律的作用是基本原因。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可比拟的。

纵论中共党史研究产生、发展的原因,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实事求是,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化、学术化方向前进,中共党史研究就发展繁荣;反之,则停顿、倒退。

## 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数十年来,中国国内和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方法不断发展,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学术成果日益增多,质量、分量日益提高。中共党史学科,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也是世界学术界重视的一个学科。这是可喜的一面。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要使中共党史研究上一个台阶,要把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成一个科学的学科,就必

须逐步解决目前存在的以及将来还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海外的学者不断进行着反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sup>①</sup>,中国学者也进行了批评。中国国内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国内的学者也有过反思,开展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海外学者也作过批评。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着问题的不断解决,研究的不断改进、发展。应该让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发扬光大。

以下就中国国内中共党史研究要上一个台阶应重视解决的一些问题,提一些粗浅的看法。

### 1. 资料问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无法进行历史研究。目前中共党史研究中,资料问题需要解决的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 (一) 档案资料开放问题

对中共党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资料是档案资料,而中国档案资料的开放,远远还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求。民主革命时期的档案资料尚未完全开放,更不用说社会主义时期的档案资料了。而国外的一些国家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是很令人羡慕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向前到美国访问,便到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和一些总统图书馆(实即档案馆)查阅资料,觉得很方便,可以看到很多资料甚至是绝密档案。他谈到,在美国,凡不涉及情报来源和某种人事及过于敏感问题的档案,包括60年代乃至更晚形成的档案,差不多都公开了。对于还不能公开的档案,美国档案机构通常的做法是,或在复印件上遮掉不宜公开的部分,或是将整个文件抽出,代之以一项“说明纸”,置于前后文件中。在“说明纸”上,注明被抽出文件的题目和根据何条法律或规定抽出该文件的理由。这使读者了解到某个文件的存在。如果需要查阅已被抽去的文件,可以向馆方提出申请。馆方有可能会向你提供该文件。如李向前在艾森豪威尔图

<sup>①</sup>如俄季塔连科《中共七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载《远东问题》1991年第5期)指出,前苏联学术界对中共40年代初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否定的评价是错误的。如美国1993年出版的沈大伟(《中国季刊》主编)编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是美国学者反思中国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柯恩《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出版),也是一本反思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



书馆提出申请查阅被抽去的一份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两届政府交接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共政策的文件,这是绝密文件,但馆方同意了他的申请,向他提供了这份文件。李向前还谈到,在美国档案馆,所有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任你翻阅并提出索求。在任何一个档案馆,只要你年满16岁,有身份证,不管是何地何国人,都可以长驱直入。经过简单的登记,写明要研究的题目,便可以进入宽敞、舒适,办公设备一应俱全的研究大厅,开始阅读。你走进任何一个档案馆,都会得到一位诚恳好客的档案管理员(专家)的专门接待。此后,这位管理员就成为你的直接“责任人”。他会从馆藏资料的基本状况到你的特殊索求,以至借阅手续,复印规定等等,都不厌其详地向你介绍一番。而且会根据你的特殊需要,提供相关的档案目录,供你选择。当你在阅读中遇到难点疑点时,他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为你解疑答惑。在美国档案馆查阅档案,绝不会遇到属于“国籍”方面的麻烦的。这里面的道理很明显:你在我这里看了档案,回去一定要写文章发表评论,而这正可以使美国政府从另外的角度,甚至从敌手的角度来评价自己政策的得失。这就等于“借鸡生蛋”,何乐而不为呢。<sup>①</sup>李向前还提到,美国总统克林顿主张大量解密历史档案,美国档案将会有更大的开放,这对历史学者们是个不小的“福音”<sup>②</sup>。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国的历史学者、中共党史学者,何时能听到中国的档案更大开放的“福音”呢?中国的档案馆是否能借鉴美国档案馆的一些做法呢?

俄罗斯基本上沿用英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的做法,超过30年的档案资料向公众开放。俄罗斯有三个最重要的档案馆。一是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这是1991年8月24日俄总统下令建立的,以原中央党务档案馆为基础组建。该馆保存着苏共中央1953年以前的绝大部分文献资料,还有共产国际档案。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苏共中央对外宣传部和苏共驻外干部训练局的档案,也在该中心。该中心的档案,除某些个人档案外,已全部开放。二是当代文献保存中心。该馆保存着1953年以后的苏共中央档案,包括外交部、克格勃和其他情报组织的报告等。这里的档案没有完全开放,但在征得该馆负责人同意后,可按主题进行查阅。三是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馆。该馆保存着1917年以来的苏联外交部档案。该馆隶属于俄罗斯外交部历史档案处。该馆的档案,年满30年,即开放<sup>③</sup>。俄罗斯档案馆的档案开放比较制

①②李向前《走进美国档案馆》,《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③详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4期《前苏联档案中的中共党史资料》。

度化,所以俄学者获益匪浅。如俄研究中共党史的新秀潘佐夫,已出版了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数十种,因为他看了一批档案后就可以写一本书。当然他不仅仅是看到了俄罗斯保存的档案,也看了美、英、法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保存的档案。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教授、学者,并非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他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令很多中国国内的普通党史研究教授汗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路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档案资料陆续开放了一点,也整理出版或公布了不少档案资料,这是国内外学者有目共睹的。但总的来说,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无法与美、俄等国相比,并且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被国外学者批评为“文献垄断”、“封锁史料”的现象。即有些档案资料,只有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一些高级别的研究人员和官员可以查阅,而一般高校、社科院的普通研究人员不能查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等,引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然没有注明出处,一般研究人员无法查阅已被引用的档案资料在引用时是否存在某些问题。日本学者在80年代中期就批评了中国的“封锁史料”、“垄断文献”。村田忠禧指出:“在中国确实存在着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一般人(更不用说海外学者)不能利用的现象。如果那是因为史料保存上的技术问题所造成的,也就没有办法了,然而根本不是那个问题,另一部分人却可以利用”。又指出:“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毛泽东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然而与争论有关的文献却没有公开,我们只能了解到中国学者引用的片断。像这样垄断文献、垄断文献解释权(引用也是一种解释)的研究,按道理说不能算是科学的研究。如果是科学,它应该经得起他人的查证,但我们现在却无法查证史料的引用是否妥当”。“总之,如果史料不公开,要想判断中国学者围绕毛泽东与立三路线关系的争论哪个是正确的,我看很难作出公正的判断”。<sup>①</sup>日本学者的批评,应该说是中肯的,也是值得引起中国党史学界、档案管理部门反思的。日本学者是很想多看到一些资料,以提高中共党史研究水平的。外国学者有如此的想法,中国的普通研究人员何尝没有如此的想法呢!

档案资料一部分人可以看到,另一部分人看不到,这首先就影响学科

<sup>①</sup>村田忠禧:《中国近年来在毛泽东研究上的成就与问题》,《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第556页~5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的科学建设。科学的结论，比如自然科学中的科学结论，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可以进行重复的实验，不能进行重复实验的结论，或进行重复实验得不出同样的结论，便不是科学的结论。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同样是这样。如果中共党史书和文章中引用的资料是他人看不到的，尽管被引用的资料可能是准确的，但至少暂时无法证实它是准确无误的，甚至会引起无法查对原件的研究者怀疑，文字是否无误，内容是否全面还是断章取义。如果被引用的这些他人看不到的资料，并不准确，暂时可能无人来修正，但总有一天会被人修正。如共产国际的档案和前苏联档案公开后，中共建党史的某些问题的结论、朝鲜战争某些问题的结论就被修正了。那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档案的人及整理者，他们不是神，不是完美无缺的、全能型的、通才式的专家，他们会受到各种局限，他们在抄录、整理、解释档案时会因为某种局限而出现失误。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64年版中的“我粟谭军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八月二十六日又歼敌一个旅，八月二十七日又歼敌一个旅”。1991年版修订为：“……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这当是整理者查对了毛泽东写的原稿进行了修订。而毛泽东的原稿是档案资料又无法查阅，于是就不知1991年版的修订正确与否了。幸而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的《纪念毛泽东》画册（198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有毛泽东原稿的照片，标题为“关于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文字与《毛选》本略有不同，其中涉及到的月日为代名，作“未养”、“未感”、“未俭”。“未，地支第八位代“八月”。“养”，韵目代日，代“二十二日”。“感”，韵目代日，代“二十七日”。“俭”，韵目代日，代“二十八日”。这一校勘，证明1991年版的“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中的“八月二十一日”是不符合原文的。1964年版和1991年版的“八月二十六日”、“八月二十七日”均有误，应作“八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这表明档案资料的整理者、引用者是会产生失误的，而这种失误便影响了成果的科学性。如何才能纠正这类失误，保证成果的科学性，那就需要开放资料，使研究者人人都可以查核。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查阅、校勘、研究档案资料，就会纠正更多已被引用、已被整理出版的档案资料的讹误，使成果更科学。日本学者提到的毛泽东与立三路线的关系问题研究的科学性，确实也只有这方面的档案资料完全开放、公布后，才能实现，

即才会得出正确的不可移易的结论。

档案资料一部分人能看到,另一部分人看不到,不仅不利于纠正研究中的错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学化,也不利于中共党史学科走向世界。任何研究领域,如果研究材料少,那么研究的人也就少,研究的材料多,研究的人也就多。中共党史研究的有关档案资料开放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研究者来研究中共党史。反之,外国学者研究的注意力、兴趣就会越来越少地投向中共党史研究,转而他顾了。可以相信,中国的档案馆开放程度高,就会有更多的国外研究者来中国查阅档案资料,也就会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广更深地向全世界扩展。海外的中共党史学发展了,会对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史学发展有促进作用。总而言之,资料条件、环境条件是研究条件的极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的开拓、扩展有重要的影响,在海外是这样,在中国国内也是这样。

档案资料一部分人能看到,另一部分人看不到,这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的表现。这种不平等、不公平,对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都是不利的,对任何一部分人的研究都是起着限制甚至是抑制的作用的。北京大学的张注洪教授说过这样的话:“有的材料明明知道在某个单位保存,但因为种种限制,只好放弃利用,最后索性将研究题目也取消了”。<sup>①</sup>这是对档案资料没有充分开放的批评,也是对学术研究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的批判。足见档案资料的不充分开放,档案查阅的不平等,不利于学术交流,不利于学术竞争、不利于学术研究发展,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就像法律面前不平等,不利于法制建设,不可能建立法治社会;经济竞争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一样。研究的科学性,有一个基本条件是自由,即自由研究才能实现科学的研究,受到限制的研究就难以成为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所以被称为“科学”,首先,它的任何研究是自由的、无限制的,任何研究领域都是开放的。自由研究会产生研究的自由竞争,研究的自由竞争,是推动研究科学化的有效手段,而这离不开平等、公平的环境。没有平等、公平的环境,就不会有真正的研究的自由竞争,也就难以有真正科学的研究。这在海外是如此,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学术研究的不平等、不公平,影响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影响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走

<sup>①</sup>张注洪:《中国现代史论稿》第40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向世界。只有平等、公平,才能既推动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推动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

就历史档案资料而言,其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被研究,被利用,并被更多的人研究、利用,以造福于社会。如果档案资料不能被研究、利用,就实现不了其价值,既不利于档案资料本身,也不利于研究,不利于社会。而档案资料只有充分开放,才能被充分研究、利用。档案资料开放得少,能看的人少,其被研究、利用自然就少。其开放的多,能看的人多,其被研究、利用自然就多,就会在广度、深度上得到充分的挖掘,研究利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开拓。

档案资料本身,还存在着鉴别真伪、纠正错误的问题,并非所有的档案资料都是真品,都准确无误。比如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是他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写的报告,当时抄写了三份,一份由湖南省委转中央(湖南本),一份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江西本)。因为抄写疏忽,各本的文字遂略有差异。如湖南本“西乡小江西一区”,江西本为“西乡小江西区”。《六大以来》作“西乡小西江一西”。建国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作“西乡的小西江区”。到出版《毛选》第二版,进行实地考察,才搞清楚,永新县只有“小江区”。“小西江区”、“小江西区”均误,均衍“西”字。档案原件的讹误在《毛选》第二版中得到纠正。档案资料只有尽早尽多地被纠正存在的讹误,才能有利于它的价值的实现,而不致于以讹传讹。这也需要档案资料更充分开放,让更多的人来研究、利用。

## (二) 资料整理、出版

资料的整理出版以求、全求真为上,这是衡量资料科学性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求全,就是要无遗漏。求真,就是要保持反映本来面貌。

比如整理出版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文稿等,能做到求全,研究、利用价值就高。中共中央民主革命时期的文件出版了《选编》,新中国成立后的文件出版了《选编》,都不是《全集》。毛泽东的文稿,出版了早期文稿及《选集》、《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建党至大革命时期的文稿尚未出版,大革命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稿是《选集》。《建国以来文稿》,也不全。《建国以来文稿》的《出版说明》已说明:“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sup>①</sup>而且可以从有些书和文章引用的建国以来毛泽东的言论中发现有

<sup>①</sup>《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卷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建国以来文稿》中没有收录的文字。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文稿都是《选集》。这表明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出版离“求全”还有很大距离。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不够“全”，研究自然就受到限制，也不可能“全”。国外出版的《毛泽东集》，篇目、内容比中国国内出版的多，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把某些并非毛泽东写的文章，毛泽东只表示同意的文章也作为毛泽东的文稿，如中苏论战的文章，社教运动的文件，“文革”的文件等<sup>①</sup>。这种“求全”，未免过分，反而走向失实失真。

整理、出版文献资料，求全的问题是要慢慢解决的，并非一时可以解决的，而求真的问题还是可以，并且应该在短时期内加以解决。

求真，保持、反映文献的本来面貌方面，最常见的问题是删节、修改原始文献。比如《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毛泽东文稿，删节、修改的都不少。有些文章只是收入了很多部分中的一部分，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只是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一部分。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了删节、修改，原文是给林彪的一封信。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了很多修改，等等。这就造成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没有保持、反映文献的本来面貌。这种文献整理出版时就形成的局限，自然就迫使研究也会有局限，受到某种限制。《毛选》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映了毛泽东 50 年代的思想认识，如果要研究 20 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就应该看毛泽东 1925 年 12 月 1 日发表在《革命》半月刊第 4 期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 20 年代的其他版本。如果以《毛选》上的《分析》文来研究毛泽东 20 年代的思想，显然得不出准确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自己的旧作一般不改动，如有改动，也要加以说明。斯大林 20 世纪初期的一些著作，有些论点是错误的，不成熟的，但在 1946 年收入《斯大林全集》时，斯大林没有因为 40 年后觉得不对而加以修改，只是在《作者第一卷序言》中说明：“为了理解和恰当地评价这些著作，应该把它们看做一个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因此，这些著作中自然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这些论点以后被我党纠正了。我指的是

<sup>①</sup> 详见〔澳〕黑利：《西方毛泽东研究中争论的焦点和存在的问题》，《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5 期。

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纲领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sup>①</sup>。这种尊重历史、不掩饰以往不足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如果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作为历史文献看，那么这些文献首先应该保持、反映本来面貌。中共中央的文献、毛泽东等人的文献，如果作为研究对象、历史文献看，也应首先保持、反映本来面貌。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时，注意到了保持、反映文献原来面貌的问题。如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原稿（手稿）为（一）、（二）、（三）、（四）、（五），五点，而收入《毛选》第一版时，毛泽东删去了第（四）点，并将原序号“（五）”改为“（四）”。《毛选》第二版编辑时，一方面尊重毛泽东删去第（四）点的意愿，另一方面加了一条注释指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电报，原共五点，这一段文字是其中的第五点。一九六〇年出版本卷第一版时，删去了第四点，其原文为：‘淮海战役的结果……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将第（四）点 220 余字在注释中全文补出。这一补就保持了文献的原来面貌，使研究者可以看到文献的原貌，同时可以体会、研究为什么第（四）点要删去。这种保持文献本来面貌的做法，值得提倡。保持历史文献原貌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应该注意研究和运用。遗憾的是《毛选》第二版并非所有的文章都有这样的补充。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仍不提林彪的名字，仍没有将原信的开头部分作注补全，只是题解重新修改了，作：“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 this 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作这样的说明，对于恢复文献的本来面貌是有益的，但仅仅停留在这个说明上，人们并不能看到这个文献的原貌，如果能将那些地方删改了作详尽的说明，这才完全恢复了文献的原貌。好在《纪念毛泽东》有《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第 91 幅照片）油印本的第 1 页照片，是信的开头部分，略可补《毛选》本反映原貌的不足。

《毛选》第二版注意保持、反映文献原来面貌，还表现在有些毛泽东文稿

<sup>①</sup>《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卷首，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7 页。

中的话已证明是错的,但保持原样,不改动。如《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在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所谓“极权政府”的诬蔑时,说:“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这里对铁托政府的指责,显然是错误的。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团时曾谈到: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五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这是毛泽东向南斯拉夫道歉,实际上就是纠正《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的说法。《毛选》第二版没有删除原文中批评南斯拉夫的话,但增加了一条注释,引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期间对南斯拉夫代表团说的话。这样,一方面保留了毛泽东文稿的原貌,另一方面又在注中提出了对原文的一点修正。这种做法与斯大林尊重历史的做法是一样的,是值得提倡,值得发扬光大的。

原始文献被修改了,这已不应该,拿已被修改了的原始文献为据再去修改其他原始文献就更不应该。而这种现象却存在着。如《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便被视为定本、标准本,字字珠玑,不能改易。于是出现,《毛选》本中的文字已改动了原始文献,而整理其他文献时涉及到《毛选》中的文字,便以《毛选》为准,将其他文献也作修改。如日本村田忠禧就指出,收入《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资料文献》(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写的《前委致中央的信》,因为其中的大部分被引用在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致林彪的信(即《毛选》本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而致林彪的信收入《毛选》时作了相当大的删改,以至连引用的1929年4月5日的信也作了修改,于是这封1929年4月5日的信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书中,凡是《毛选》本引用的部分,基本上与《毛选》本相同。造成某些文献《毛选》本没有保持、恢复原貌,其他资料书也不能保持、恢复原貌的现象<sup>①</sup>。村田忠禧接着指出:“可以认为4月5日的书简是了解下井冈山之后的毛泽东如何成长

①《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第558页。



的极为重要的文献。修改这么重要的文献,据说是要忠实于《毛泽东选集》,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尊重毛泽东,但实际上不是不理解毛泽东的生气勃勃革命精神的教条主义行为吗?”<sup>①</sup>村田忠禧还指出了其他类似的“对文献缺乏严肃态度”、“把《毛泽东选集》绝对化所带来的弊病”的现象,最后强调:“据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被否定,他已从神回到了人间。但是只要对《毛泽东选集》继续按‘经典’处理,毛泽东就不可能回到人间,他始终会被奉为凌驾于人民头上的‘圣人’。”“在原著被划为禁区,受到作为正统文献的《毛泽东选集》所束缚的状态下,毛泽东的研究能促使人们的思想解放吗?相反,不是有可能陷入对‘经典’的‘教条式’的解释吗?邓小平指出,在毛泽东所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这种作风对于毛泽东研究来说,不也是应该坚决提倡的吗?”<sup>②</sup>日本学者的批评是很值得中国的资料整理者、出版者深思,值得中国的学术界及学术研究领导部门深思。话又要说回来,村田忠禧批评的是80年代及80年代初的中国学术界,他应该看到近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已大为好转。

《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删改往往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由于政治上原因而修改原始文献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是隐去要回避人的姓名。比如某人出了问题,于是在一些文献中便以“×××”或“□□□”隐去此人的姓名。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隐去姓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收入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其中提到“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主义,以至鲍罗庭主义……”“谭××”,实即谭平山,大概因为谭平山是民主党派人士,所以想隐去他的名字。再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收入的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一个中文全本,较其他各残缺本自然为优,但遗憾的是其中的一些人名被隐去,代以虚缺号。这样整理,如果在政治上、政策上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学术上、在科学上是不可原谅的。这使文献失去了原来面貌,不利于学术研究,这种做法严格地说,是不科学的。有的不仅隐去姓名,甚至将有关此人的文献删去。荣孟源曾谈到,在编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时,把高岗的讲话都删去了,“那时主观上怕犯错误”。实际上“这样的删节是错误的”。要“接受这一教

①②《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第559、561页。

训，应该坚持实事求是”<sup>①</sup>。这样的回避做法，给研究制造了麻烦，研究者必须设法去查证被回避了的人名和内容，然后才能进行研究。

在文献整理过程中也有因为技术上的原因修改原始文献的。如由于对原始文献的字、词、句不懂，没理解透或者误认误读，于是认为原文不通，遂将其改通，而这一改，反而错了。比如80年代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发行）收入的1934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关于白区革命工会工作的决定》中，有两处将原稿中的“工反”改为“工友”。一方面“反”与“友”形似，另一方面可能不知“工反”何意，遂改之。实际上“工反”是“工人群众反日会”的简称。至1991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公开发行），已将“工友”改回为“工反”<sup>②</sup>。又如1934年1月28日《中央、全总执行局致河北省委与全总办事处党团的一封信》原件谈到：“英领事与开滦英矿务司，亲赴省府面于，要求严办工潮首事人，强令工人复工”。有的版本将“面于”改为“面谈”。当不知“面于”何意。实际上“于”，指当时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面于”即面见于学忠。1991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收入此信时按原件作“面于”。这证明，文献的整理者在整理文献时是会出现失误的。如何才能防止这些失误出现呢？（纠正失误是需要的，防止失误更重要）这就需要制定一些合理的行之有效的规则和方法。比如专家学者在整理中国古籍文献时曾制定了一些保持古文献原貌的规则和方法，现在已被中共党史文献的整理者所采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出版说明》就指出：“编入这部文献集的文稿，已经公开发表的，按发表稿排印，没有公开发表的，按手稿或其他原件排印。每篇文稿末尾，均有所据稿本或版本的刊印说明，有的还有不同版本变动情况和选用情况的说明。文稿中的错字、漏字，分别在〈〉号和〔〕号内校正，衍字加□号。原稿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原稿没有标点的，由编者加了标点。文稿中史实不准确的，加注释说明”。<sup>③</sup>这里谈到的对错字、漏字、衍字的处理，是首先保持原样，然后再加括号等注出正确的字，指出其错误。这样就避免了原始文献被误改，保证了原始文献保持原貌，这是合理的、科学的整理文献的方法。这个《出版说明》所谈的依据何种版本

①《史料和历史科学》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详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第84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卷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的问题,似乎还可以做得更科学一些。公开发表的版本,自然是定本,作为整理的第一依据是合理的。但手稿本是最原始的资料,其研究价值不可低估。如果某一文献的手稿本与发表本有差异,可以将两个版本的差异进行校勘和比较研究,藉以研究差异的原因以及思想、理论发展的脉络。这种比较研究的条件就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都能看得到。所以,文献的整理者在某一件文献有手稿本、修改稿本、发表本等多种不同版本的情况下,最好能写一校勘记,将不同版本的差异一一注出、说明。这样就最完整地保持了文献的本来面貌,并使这件文献有了最优最精的版本,同时也使研究者大大获益。

文献整理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如标点问题也不能忽视、小看。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中标点问题是个大问题,中华书局出版的由专家校点的二十四史等,至今仍因标点的错误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批评。在中共党史文献中,出现标点的错误要少得多,但还是存在的。如《毛选》第一版收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一句“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这个《报告》在1927年3月至4月出版的《战士》周报上连载时,此句为“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这两种版本,文字相同,标点不同,意思略有不同,前者无范围限制,后者有范围限制。查《报告》中相同的句子很多,如“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的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说明“地方”当与“农会势盛”相连,成为一个限制词。《毛选》第二版遂改为“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这就恢复了文句的原意。又如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献中有一篇1919年5月5日教育部咨文,其中谈到:“学生约二千人,齐集天安门外,对于青岛外交问题公开演说,继复游行街市,糜聚赵家楼、曹宅地方,纷扰滋事。”这里将“赵家楼”、“曹宅”点断,成为两地。实赵家楼曹宅为一地,两者是从属关系,不能点断<sup>①</sup>。又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有一句“在北伐军未到前五月中,汉口纱厂、烟草工人,已经开始斗争”。查此书40年代的版本亦如此。但此段文字是从张闻天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引来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此句作:“在北伐军未到前,五月中汉口纱厂烟草工人已经开始斗争”(详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24页)。查汉口纱厂、烟草工人的斗争起于5月,并非是北伐军未到前的五个月当中。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版及40年代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都将标点后移了,应该纠正。足见标点

<sup>①</sup>详见曹喜琛等:《档案文献编纂学》第240~241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的准确与否,与保持文献的本来面貌也是极有关系的,是不能小看了。

其他如原件的繁体字简化整理后是否准确;原件中是否有特殊的字型,是否有黑体字等;原件的行款,如分段、格式、版式是否维持原样等等,都与保持、反映文献的本来面目有关系,都是要引起重视的。如《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1期发表《新发现的两封何叔衡书信》。何叔衡信的原件是手写繁体字直排,该刊发表时改为简体字横排。格式、版式变通问题还不大,糟糕的是繁体字改简体字,文字讹误达14处,而两封信总共才一千字左右。如原件“圓”(圆),发表稿作“园”(园)。原件“歉仄”,发表稿作“歉疚”。原件“空色相”,发表稿作“空包相”。原件“骨肉之亲”,发表稿作“骨血之亲”等等。遭到了研究者的批评。<sup>①</sup>这表明文献整理过程中有很多环节都会出现失误,决不能掉以轻心,也说明文献整理者的素质提高是刻不容缓的事。

在资料的出版问题方面,国外学者意见最大的是“内部发行”。村田忠禧说:“但成问题的是‘内部发行’这一中国独特的制度,革命史料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内部发行制度呢?很显然,是担心人们滥用。我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如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发行的报纸《红军日报》(1930年7月29日至8月4日),1980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香港出了它的影印本。当时红军利用军阀混战的空隙占领了长沙,而以人民大众为对象的报纸,为什么在革命取得成功50年后的今天却要采用内部发行的形式呢?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果真只能由具有特殊资格的人才能进行吗?说明‘内部发行’不合理性的事例太多了”。内部发行的书禁止运出海外,“这种让外面糊涂的做法果真能有利于研究的发展吗?”<sup>②</sup>麦克法夸尔也谈到:中国“许多学术著作,甚至参考资料都被归类于‘内部资料’,很多这类书中没有任何敏感材料,而一旦被归入此类,就不容许出口。即使中国图书馆把它们作为交换图书寄往国外,海关也会把它们扣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这类图书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到了国外。这些书到了职业书贩子手中,特别是到了香港的重印出版商手中后,价格飞涨,而且内容也有所改动”<sup>③</sup>。“内部发行”现象的产生,主要是资料开放

①详见杨通才:《对〈新发现的两封何叔衡书信〉一文的订正》,《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②《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第549~550页。

③《美国中共党史研究资料来源及存在的问题》,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不充分的反映。如果档案资料能充分开放,档案原件都能看了,档案整理出版的书就更可以看了,就不存在“内部发行”与否的问题了。所以解决“内部发行”问题,首先要解决档案如何充分开放的问题。其次,应该取消“内部发行”制度。理由很简单,这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走向世界,并且会给中共党史研究制造麻烦,带来损失。比如香港的重印本,将内容也改动了,岂不糟糕!还不如让外国学者顺利地得到大陆的原版本,可以确保资料不走样,可使研究也不致走样。再说“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国外仍可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最后还是成为公开发行。很多内部发行的出版物,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外国学者仍可以在中国的书店里购买到,与购买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无异。“内部发行”已经名存实亡,何不尽早取消之。既可以争取更多的研究者,又可以扩大发行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可以提高,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内部发行”制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形象也不相称,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也不相称,实在是应该改革之。

### (三)抢救活史料

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回忆资料、口碑资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回忆资料、口碑资料可以补文献、档案资料的不足,又可以纠正其错误。当然文献、档案资料也可以补回忆、口碑资料的不足,纠正其错误。文献、档案资料,易于保存,只要需要,可以设法永久保存。回忆资料、口碑资料只有记录下来(或录音、录像)才便于保存,如果不记录下来,就容易消失。记录下来的回忆资料、口碑资料可以转化成文献资料、档案资料。记录回忆、口碑资料是很重要的资料工作,也是很迫切的资料工作,即通常所说的抢救活史料、活资料。

中共领导人历来都重视抢救活史料的工作。毛泽东1936年8月5日作《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号召参加长征的同志们“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以出版《长征记》。以后出版了《二万五千里》。40年代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也号召全党回忆党史、总结党史,当时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等等。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下,《星火燎原》、《红旗飘》、《文史资料》等各种回忆录丛书得以出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展开了全国规模的抢救活史料工作。

一批退休的老同志,有了良好的环境撰写回忆录,使众多的长篇革命回忆录得以出版。其中较重要的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等等。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思想文化人物、民主党派人物以及犯过错误、犯过罪的人物都有回忆录出版。这些众多的回忆录的出版,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交口称赞,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不过也应该承认,抢救活史料的工作开展的还不够理想,还应该抓紧做。说不够理想,一是很多重要的中共领导人没有留下回忆录。如毛泽东,除了曾向斯诺自述青少年时代至红军长征的经历外,其他没有系统的回忆录留下来。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等都没有留下系统的回忆录。当然,这有客观原因,即工作太多太忙,没有空闲的时间。国民党要人李宗仁留下了回忆录,自然与他长期赋闲有关。美国总统有不少写了回忆录,也与他们总要离任、退休,有闲暇时间来撰写回忆录有关。中共的很多重要领导人没有留下系统的回忆录,这是中共党史资料工作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胡乔木写《回忆毛泽东》也动手太晚了,原打算写40年代和50年代毛泽东的活动,可惜因为癌症,40年代毛泽东的活动还未完成就逝世了,50年代毛泽东的活动只得缺失了(详后),多么遗憾!党和国家领导人撰写回忆录,这不仅是留下党史国史资料的问题,而且是留下党和国家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造福后世的问题。高层次人物的回忆录,一般说来比低层次人物的回忆录价值高,应有更多的高层次人物写回忆录。二是重大事件的专题回忆资料还太少。有些事件参与的人成千上万,可撰写回忆录的很少,出版的回忆录更少。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斗争情况的回忆录很少。粉碎“四人帮”斗争的回忆录很少“文革”的回忆录很少。社教运动的回忆录很少。庐山会议的回忆录很少。“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回忆录很少。反右派运动的回忆录很少。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回忆录很少。合作化运动的回忆录很少。抗美援朝的回忆录也不多。西藏民主改革的回忆录很少。全国各地解放的回忆录不多。民主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回忆录就更少些。如大革命时期和中共建党时期的回忆录实在太少。足见抓紧抢救活史料的紧迫性。中共建党、大革命时期的活史料,几乎已无法抢救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活史料也将濒临灭绝。抗战时期的活史料,不抢救也将灭绝。比如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在各地的伤亡人数,再不进行有姓有名的调查,以后就很

难调查了。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史事,如中共八大、九大、十大,参加过的人已不多,参加过1959年庐山会议的人剩下的就更少了,怎能不抓紧做些抢救工作!知道要保护、抢救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就更应知道保护、抢救“濒临灭绝”的党史、国史活史料!

抢救活史料,党和政府有责任,参加过革命实践的同志都有责任。党和政府要积极组织人力物力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组织专业人员采访老同志。老同志应积极认真克服一切困难撰写回忆录,提供回忆资料。在重视抢救活史料后,接下来就应重视抢救活史料的具体方法。

任何人的记忆都会产生误差,于是回忆也会产生误差。如毛泽东向斯诺自述自己的经历(即《西行漫记》中《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谈到中共建党历史时说:“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实际上中共在莫斯科的最早代表是张太雷。瞿秋白1922年才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谈到:“1927年11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选举出了。主席是杜修经”。而以后杜修经说:“实际上没有那回事……我没当过苏维埃主席,也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说错了,还是斯诺访问时记错了”。<sup>①</sup>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在1936年10月,所回忆的建党时期的史事只过了十几年,所回忆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史事还不到十年,就产生了一些误差,那么二三十年后、四五十年后的回忆就更容易出现误差了。要防止、纠正回忆资料出现的误差,要防止、纠正抢救活史料时出现资料的误差,保证活史料的准确性,就必须重视史料的核实。这是抢救活史料的一个重要方法。

组织一个班子帮助重要人物撰写回忆录,在核实史料方面就容易做深做细,把好关。如薄一波撰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就由中共中央组织了班子帮助薄一波写。薄一波在书的《前言》中谈到:“我觉得,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去探讨,是我的责任”。“多年来我有一个愿望,想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了解的情况为基础,再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写出一部书来。可是因为工作量大,我又一直抽不出时间,迟迟没有动手。党的十三大后,中央分配我的日常工作有所减轻,这件事才总算提上研究日程。1988年4月,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这项工作,当即得到了中央的赞同。在中央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

<sup>①</sup>详见《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杜修经文。

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部书的上卷终于在党诞生 70 周年的前夕同读者见面了”。<sup>①</sup>可以说,这部书是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sup>②</sup>从薄一波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他对撰写回忆录的重视,也可以看到他对核实资料的重视。这本回忆录的上卷所以能核实大量的档案资料,所以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就是因为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从而既保证了资料的准确,又保证了完成回忆录的进度。又如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也是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前言》是“本书编写组”写的,其中谈到:“写成和出版一部回忆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思想 and 活动的著作,是胡乔木生前未了的心愿。1990 年初,胡乔木开始考虑撰写这样一部著作,并指导几个同志着手写了几个专题。1991 年 9 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工作。在这前后,胡乔木就这项工作进行过二十多次谈话。在他指导下,编写组写出四十年代的大部分专题的初稿,并陆续送他审阅修改。有些初稿经他审阅提意见后又写成修改稿。到 1992 年 4 月,他初审了三篇修改稿(即《皖南事变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整风运动:1941 年“九月会议”前后》和《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与“九篇文章”》),表示基本符合要求。以后,由于他病情加重,再也无力过问这项工作。1992 年 9 月 28 日,胡乔木逝世。按照原来的设想出书的条件已经失去。已写出的回忆 40 年代毛泽东的一批文稿,虽按照胡乔木的初步意见作了修改,但修改稿的大部分他都没有看过;他看过的几篇也还不是经他最后审定的文稿。考虑到胡乔木生前回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和在他指导下撰写的专题回忆文稿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经党中央有关方面领导批准,决定将它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名义编辑出版……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的记录。……这些记录未经他本人审定,但多是根据录音整理,只作了必要的文字修饰。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胡乔木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的谈话精神撰写的十九篇文稿。在写作这些文稿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及其他资料”。<sup>③</sup>从编写组写的《后记》中还可以了解到,胡乔木还“亲自翻阅和选择历史档案,并为文稿中得以使用一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欣喜”。也可以知道参加胡乔木回忆工作的人员前后有十余人,编写组由龚育之、郑惠、石仲

①《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卷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卷首,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泉负责,而逢先知、金冲及等都审阅过书稿。编写组也对这项工作动手太晚表示遗憾,谈到:“原定编写回忆50年代毛主席活动书稿的计划,更是无法实现。这是令人十分痛惜和遗憾的”<sup>①</sup>。尽管胡乔木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动手太晚,但是还是在写作班子的帮助下完成了回忆毛泽东40年代活动的工作。并且由于胡乔木严谨、忠实的学风和极高的理论水平,使这部“残缺”的回忆录,也很有体系,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作为组织班子撰写的回忆录,还可以提出更高的资料工作要求。如可以编写一些附录。《彭德怀自述》,有两个附录:(1)《彭德怀同志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给毛主席的信》。(2)《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的谈话(摘录)(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此外,还附了《注释》共85条。这些显然都是与回忆录有关的必不可少的资料,有助于阅读、理解、研究这部回忆录。又如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每一章的后面都有“人物”、“事件”、“文献”,即将本章涉及到的人物、事件、文献及本章的参考文献作一目录。这些实际上就是附录。这类的附录是目录式的、提要式的。这些附录,对于阅读、理解、研究这部回忆录也是有帮助的。附录还可以编写很多。如果是某一人物的系统的长篇回忆录,无论是组织班子撰写还是个人撰写,附录这个人物的生平年表、主要著作目录等,也是必要的。再如还可以编制索引。编制一些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主题索引或事件索引,可以方便阅读、研究。如果再选编些照片,那么资料工作更是锦上添花。这是形象资料,可以与文字资料互相补充。如《彭德怀自述》选编了彭德怀的生平照片11幅,还选编了彭德怀“自述”手稿两页照片。这很有必要,能使这部回忆录增色。应该说选编的照片还少了点,能再多选二三十幅照片更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仅选编了五幅照片,实在太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只有一幅作者工作照片,而与回忆录相关的历史照片没有选编,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可以说做好回忆录的资料工作是无止境的,应以精益求精为目标。既要考虑资料的准确性,也要注意资料的全面、完备、丰富性,以及检索、利用的方便等等。

胡乔木、薄一波等人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撰写回忆录有条件组织写作班子,而基层的干部、党员撰写回忆录,就很少会有这样的条件,怎样才能保证回忆资料的准确、质量高呢?这也需要花功夫核实史料。有条件查阅文献

<sup>①</sup>《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69页。

资料的,应该查阅文献资料;有条件查阅档案资料的,应该查阅档案资料。还可以与其他当事人一起回忆,请其他当事人一起核实史料。可以再到实地进行考察、调查。如陈平(河北唐山市委党史办干部),抗战时期曾在冀热辽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离休以后,他想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于是就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核实工作。一方面是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省委文件,还亲自到辽宁省档案馆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搜集敌伪资料。获得了一些有分量的资料,如日军驻冀东司令官铃木启久关于为什么要在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的交代等。另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一年中走了25个县,与当年的同事、老乡一起回忆、核查,搞清了很多问题,获得了更多的资料。最后写成《从坚持“无人区”到进军东北》一文,被《党史研究》采用,并获奖。以后又在此文的基础上写成著作——《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填补了抗战时期“无人区”斗争研究的空白。此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如果没有陈平的努力,后人将不知道抗战时期的“无人区”是怎么回事,没有他的努力,学术界就会缺少一部史料珍贵的回忆、研究专著。陈平撰写回忆录的做法及走的道路,应个人撰写回忆录的典范。

整理编纂众人的回忆资料集,也有很多问题应该注意,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吸取。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丛书编纂组,在编纂资料集时,注意了选编各种类型人物的回忆资料,既选编参加当年井冈山斗争的老首长、老同志的回忆资料,也选编曾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后来又脱离了革命的人的回忆资料。既选编在本地坚持斗争的革命老人、人民群众的回忆资料,也选编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资料。这就使回忆资料全面、丰富。当同一人的前后不同回忆的资料有出入,或者不同人的不同回忆有矛盾时,注意鉴别,注意查校文献资料。在史实搞清楚以后,回忆资料的原文保持不变,而加注说明“应为怎样”。史实尚未搞清楚,亦在保持原文不变的情况下加注说明“一说是……”这样既保持了回忆史料的原貌,又尽量保证回忆资料的准确性,并提供研究的线索和问题。这些做法都是可取的。但该编纂组谈到,原本搜集到一千多人四千多份的回忆资料,最后整理出版的仅160人左右的200篇左右的回忆资料,这似乎有点遗憾。<sup>①</sup>不知是因为财力方面的原因,还是其

<sup>①</sup>《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丛书编纂组:《我们是怎样整理老同志的回忆资料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1期。

他方面的原因。编纂出版革命回忆资料应多多益善，越多就越能发挥教育作用，就能越多地提供研究资料。很多资料不整理出版，万一日久天长有所遗失损毁，岂不可惜。而且随着回忆人的相继去世，核实回忆资料也就越来越困难，不趁早核实、整理也很可惜。这些没有被整理出版的资料，至少也应列出一个详细目录，指出保存在何处，还可以指出回忆人健在否，现在何处，也好让有研究兴趣的人查阅、核实。

江苏溧水县党史征委会在征集苏南反顽战役专题资料时，先后联系了98位老同志，征集回忆资料40多万字。征集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该战役东、西线作战的形势不同、得失不同，因而参加东线作战的人回忆时多肯定战役，参加西线作战的人回忆时对战役有批评。于是征委会设法使老同志能了解战役的全局，了解不同的意见，使老同志对自己的回忆资料作了一些修改，使分歧意见逐步转化成统一意见。在公开出版的资料中，对有分歧的问题作适当的回避，以利于进行宣传教育。<sup>①</sup>把片面性的资料全面化，把分歧性的资料统一化，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完全回避分歧意见，回避互相矛盾的资料，这似乎会影响对史实的全面、真实反映。在注意资料全面性时，应兼顾特殊性，特别是应注意保持史事、史料真实面貌。

无论是组织班子写或是个人自己写回忆录，最重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要秉笔直书，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决不能虚构史实。不能因为追求生动、追求文彩，而把写回忆录当成写小说，虚构情节。对于作假作伪的回忆资料，要注意鉴别。荣孟源曾谈到，有人写了一份回忆“八一”南昌起义的回忆录，一开头就描绘月光如何美丽，荣孟源指出，1927年8月1日1时，即阴历七月初四日子时，绝对没有月亮，肯定是伪造的。<sup>②</sup>伪造回忆录并不鲜见，值得警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还是个既肯定成绩，又揭露问题的问题。陶鹤山曾谈到，近十多年来中共党史的口述史研究一直比较繁荣，出版了大量的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不过，此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很多人只讲或只能讲好的、正确的一面，错误的一面不讲或不允许讲。在口述史研究中，这种现象较普遍，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也有害于中共党史研究内容的真实性，进而失去

<sup>①</sup>江苏溧水县党史征委会：《怎样统一老同志的分歧意见》，《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1期。

<sup>②</sup>《史料和历史科学》第10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可读性”<sup>①</sup>。报喜不报忧是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的不良作风,也是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撰写回忆录中的不良风气,是值得引起重视,予以抵制、纠正的。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董狐、司马迁等敢于秉笔直书,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共党史研究者应该比古人做得更好。

## 2. 减少、避免重复劳动

在中国史学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复劳动是比较严重的,也可以说是最严重的,因为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政治性的纪念活动最多,而且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团体、人员也最多,在党政机关中设有研究机构的,基本上只有中共党史研究。杨奎松曾指出:“任何一门学问,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须不断求新。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惟独中共党史研究有些例外。大同小异的内容,大同小异的资料,十年前是它,五年前是它,拿到今天,题目变变照样发。许多人不爱看党史文章,写得八股不八股不论,缺少新意是最大的问题。”<sup>②</sup>韩凌轩在对五四时期人物研究提意见时也说:“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劳动。同一个题目,集中了几个或者十几个学者去研究,结果在材料运用、文字表达上都差不多。尤其在论文方面这种情况更为严重,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sup>③</sup>。不仅是文章重复多,就是书籍也重复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中共党史书籍“千篇一律”,一方面是宣传色彩浓、观点雷同,另一方面是重复(可参见德国施韦德齐克《西方学者对中国党史研究工作的评介》,《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下面就1991年有关中共党史研究书籍的出版、论文发表的一部分情况记录下来,聊备参考。

先看看书籍出版的情况:

据1991年《全国总书目》<sup>④</sup>收录的1991年出版的关于中共党史的通史书有:

华夏出版社《历史的选择:1921—1991》

①陶鹤山:《中共党史研究现状简析》,《社科信息》(南京)1996年第2期。

②《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22页。

③《关于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东岳论丛》1994年第1期。

④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等编:《1991年全国总书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

辽宁人民出版社《不平凡的七十年：1921—1991》、《中国共产党70年简明读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共七十年：1921年7月—1991年3月》、《中共党史导读》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永恒的辉煌》

延边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纪实》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简介》

武汉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70年史纲》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七十年》

北京出版社《中国共产党70年讲座》

长春出版社《风雨沧桑七十年》

重庆出版社《中国共产党70年纪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之命运》

重庆大学出版社《翻天覆地七十春》

鹭江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纪事本末》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河南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简明读本》、《中共党史中的第一》

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70周年历史的启示》、《光辉的历程伟大的业绩》、《中共党史专题论析》

吉林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专题讲座》、《中共党史学习提纲》

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新华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从兴业路到天安门》、《新编中共党史教程》

山东人民出版社《光辉的七十年》、《中共党史纲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光辉的七十年》

湖南出版社《光辉的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建设原理讲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历程》

浙江大学出版社《光辉的历程》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光辉的历程》

江苏教育出版社《光辉的历程》

福建教育出版社《辉煌的七十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风云七十年》

延边大学出版社《中共党史干部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

延宁教育出版社《中共党史讲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共党史导读》

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共党史导读与题解》、《党史党建知识问答》

成都出版社《中共党史研究新辑》、《党史党建知识概要》

中国人事出版社《中共党史党建通俗读本》上、下册、《中共党史读本》

甘肃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简明读本》

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简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与建设简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

安徽教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

长征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党史知识集成》

警官教育出版社《党史党建和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百题解答》

辽宁大学出版社《中共党史若干问题研究》

暨南大学出版社《中共党史知识 200 题》

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学习纲要》

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学习纲要》、《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简明读本》

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共党史学习纲要》、《党史党建学习纲要》、《党史党建学习问答》

湖南师大出版社《中共党史学习指南》

河南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共党史党建知识要览》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中共党史党建学习纲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历史知识问答》  
 河北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七十年问题解说》  
 广西师大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七十年教育读本》  
 机械工业出版社《党史知识百题问答》  
 黄河出版社《党在我心中：中共党史知识学习问答》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前途》

关于中共党史学习辅导书还有数种，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此外，1991年《全国总书目》未收录的书还有一些，如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7册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专题讲座》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举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史、党建理论学习专题讲话》等，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改天换地七十年》等。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导读书有4种：

海洋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百题解析》  
 红旗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导读》  
 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注讲》  
 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学习问答》

关于中共创建时期历史的书有：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伟大的开端》、《红色的起点》  
 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中国社会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创始录》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百家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

中共党史图集有：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人民出版社《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历史图集》  
 吉林美术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此书1991年《全国总书目》未注录）

此外，各地各部门各学术团体在纪念中共建党70周年活动后出版的论

文集,《1991年全国总书目》注录的约有30种。而实际上,以各种杂志增刊的名义出版的论文集还有不少,也有一些自行印刷非公开出版的论文集,这些《1991年全国总书目》都没有注录。还有些论文集,在1992年出版,甚至到1993年出版,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册,就是1993年3月出版,自然《1991年全国总书目》不会注录。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书有: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七十年》

白山出版社《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七十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建设七十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建设七十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国共产党建设七十年大事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建设史论》

兰州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江西高校出版社《中流砥柱》

中共党史出版社《党风党纪建设七十年》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

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简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70年党建纵横谈》等是《1991年全国总书目》尚未著录的。

1991年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辞书、工具书有:

哈尔滨出版社《新编中共党史简明辞典》、《中国共产党大事典》、《共产党员辞典》、《中国共产党知识大全》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国共产党大事典》、《中国共产党大辞典》、《中国共产党党员大辞典》、《党的知识小百科》、《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

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大事典》



华龄出版社《中共党员大辞典》

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百科要览》、《新编党的基本知识 1000 题》

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建设大辞典》

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

红旗出版社《共产党员知识辞典》、《中国共产党章程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党纪党风辞典》

延边人民出版社《党员基本知识实用手册》

中国经济出版社《党的知识手册》

新华出版社《党的“三基”知识千题答问》

上海人民出版社《党的知识千题》、《党的建设辞典》

南京大学出版社《党的基本知识手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党的基本知识学习测试 2000 题》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党的基本知识 400 题新编》

关于“党的知识”方面的书还有 20 种左右。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书有：

中国华侨出版社《开国纪事》

河南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简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文史出版社《创业·曲折·奋进：新中国四十年历程》

陕西人民出版社《新中国史略》

福建教育出版社《新中国的自述》

新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就辞典论，还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大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学习修养大辞典》等，都是 1991 年出版而《1991 年全国总书目》尚未著录的。

以上所录的书，仅是《1991 年全国总书目》著录的书，《书目》未著录的书还有，如内部发行、自办发行的书等。并只是 1991 年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通

史、创建史、共和国史、党建史、图集、工具书等部分的书,其他还有很多部分的书,尚未录,如各阶段、各事件、各人物、各专题研究的书,不过这些部分的书也存在着重复。只有少量的专题书,重复较少,如: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学概论》、青岛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七十年》、湖南出版社《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等。各地出版的地方党史、部门行业党史的书,也重复较少。中国革命史书也与中共党史有关,《1991年全国总书目》著录的以“中国革命史”为书名的书约50余种,不包括不以“中国革命史”为名的中国革命史书,如《激荡百年》等。

以上所录反映出的重复情况有这样几类:(1)不同地区、省市出的书重复。如《光辉的历程》,浙江大学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等都各自出。(2)同一地区、省市,不同的出版社,出的书重复。如北京地区的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书。(3)同一出版社同时出版内容相同的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七十年》,只是书名略异而已。(4)以上的重复只是1991年一年时间内的重复,以前、以后出版的书的重复不算在内。

再看看论文发表情况:

以下据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著录的1991年发表的有关中共建党时期的先进分子作用、社会主义传播、历史必然性、特点方面的文章,作一摘录:

《党的创立和先进分子的作用》《文汇报》1991.6.22.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正确选择》《文史杂志》1991.3.

《新民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2.

《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对建党的贡献》《杭州师院学报》1991.4.

《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建党活动中的桥梁作用》《山西师大学报》1991.3

《试论先进知识分子在建党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历史经验》《空军政治学院学报》增刊

《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社会主义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上

《先进知识分子在我党创建中的地位和作用》《石油大学学报》1991.4.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选择思想简论》《河南大学学报》1991. 1.

《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和破产》《北方论丛》1991. 2.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河北日报》  
1991. 6. 12.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与分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 4.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河南党史研究》1991. 4.

《“理论准备不足”说辨析》《北京大学学报》1991. 4.

《试析建党前关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论争》《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1991. 1.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史学月刊》  
1991. 4.

《试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昆明师专学报》1991. 2.

《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吴中学刊》  
1991. 3.

《简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1. 2.

《略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党校教学》1991. 3.

《时代的产儿, 历史的选择》《华东师大学报》1991. 4.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教学与管理》  
1991. 3.

《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中共党史研究》  
1991. 3.

《近代中国社会时代主题的历史选择》《青岛大学学报》1991. 2.

《从近代政党的兴衰看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东岳论丛》  
1991. 4.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唯实》1991. 4.

《略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辽宁大学学报》1991. 5.

-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点》《昆明师专学报》1991. 2.  
 《试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德州师专学报》1991. 1.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福建党史月刊》1991. 10.

- 《再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形成的特点》《东岳论丛》1991. 4.  
 《再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特点》《福建师大学报》1991. 3.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特点及其影响》《宝鸡师院学报》1991. 3.

以上所录的论文只是中共党史的第一个时期中的某几个问题研究的文章,这一时期的其他问题研究未录,其他时期的研究未录。所录也只是《全国报刊索引》注录的。《全国报刊索引》注录报刊的范围是有限的,有不少的地方报刊、基层报刊、内部发行报刊,不在它的注录范围,可以说它没有注录的雷同的文章还有不少。此外,论文集还有不少文章,亦不在它注录范围,雷同的文章又会有一些。如百家出版社出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1年5月版),辑录了1991年以前发表的一些文章,其中有: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基础》原载《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7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成为新思潮主流的》原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7期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原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原载《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又如上海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的《光辉的历程》(纪念建党70周年论文集,1991年5月出版),其中有:

《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条件、特点与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比较研究》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合作与分离》

又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党史党建论文集》(为建党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专

辑,1992年1月版),其中有: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与分离》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若干问题的思考》

又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的《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纪念建党70周年》(1991年6月版)有: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建党时期值得研讨的几个问题》(谈“马列主义传播”、“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等)

又如北京大学出版社《胜利的旗帜光辉的历程》(北大纪念建党70周年论文集,1991年6月版)有: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

其他论文集还有很多,有的甚至是三卷本的,重复自然不少,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所录论文的重复情况,有这样几类:(1)不同的报刊杂志发表内容差不多的文章,如谈必然性,谈知识分子的文章,都有四五篇。(2)同一报刊发表内容差不多的文章,如《空军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增刊发表了两篇谈先进知识分子(即早期共产主义者)作用的文章。(3)报刊文章与论文集文章雷同,甚至是同一篇文章分别在报刊和论文集发表。如《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与分离》,在《华东师大学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党建文集》及上海党史学会的《光辉的历程》论文集上同时发表。《党史党建文集》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若干问题的思考》文与《华东师大学报》的《时代的产儿,历史的选择》(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若干问题的思考”)文亦是同一篇文章。(4)报刊文章与汇编旧文的论文集文章雷同,即1991年文章与1991年以前的文章,与两年前、五年前、九年前的文章雷同。如《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中的数篇文章与1991年报刊发表的文章内容差不多。(5)论文集与论文集的文章雷同。为纪念建党70周年,上海一地至少出了四本论文集,文章雷同自然难免。前面已提到的《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与分离》,就同时在两本论文集上刊载,即是一例。(6)文章与书雷同。先进分子作用、社会主义传播、历史必然性、特点等问题,几乎每本涉及中共建党的书(中共党史通史书、建党史书、中国革命史书、中国工运史书等等)都谈,有的书比文章谈得更深更全面,内容更多,资料更多。

以上可见中共党史研究中重复劳动之一斑。

重复劳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一本杂志、一本论文集,一般总是二三十万字上下,收入二三十人的文章,出版总需二三万元、三四万元。多者五六十万言,收入四五十人文章,需费六七万元。如果全中国1991年出了一百本论文集和纪念建党70周年专刊的杂志,所费总在500万元上下,动用的人力当数千人。出版书籍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多。篇幅较大的书,就著作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中共党史导读》上、下册篇幅较大,16开两册,共2196页,470万字。参加此书编纂的顾问3人、主编2人、副主编3人、编委9人、撰稿37人。此书印刷一万套,每套88元(当时的书价还不算高),印刷、发行成本至少要四五十万元。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篇幅较少,575页,48万字,但印刷量很大,它印了32开、大32开、平装、精装等多种版本,仅32开平装(普及本)1991年8月第1版就印三百万册,每册6.30元(当时书价较低),其码洋在1890万元,印刷、发行成本总在600万元左右。参加此书编写工作的人,也有16人左右。就工具书论,篇幅较大的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16开精装共9卷9册,9862项,1280万字,前后印1.1万套,每套450元,印刷、发行成本在二百万元左右。参加编纂的人主编4人、常务编委6人、编委31人、学术指导48人。此外,每卷都有主编、副主编、撰稿人。如第一卷《党的光辉历程》,主编5人、副主编5人、撰稿编务57人。每卷参加编纂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五六十人。其中第八卷编纂人员达70余人。全书参加编纂的人员达六百多人左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篇幅稍小,精装16开3卷,2032页,500万字。每套86元,印二万套,印刷、发行成本在90万元左右。参加编纂人员,主编1人、副主编4人、编委12人、编辑组7人、撰稿180人左右。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精装16开,1309页,260万字,定价56元,第一版印三千册,印刷、发行成本在10万左右。参加编纂人员,主编3人、副主编7人、编委28人、撰稿146人。图集的篇幅亦不小。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上、下两册,8开精装,总计1500页左右。每套495元,第一版印刷五千册。印刷、发行成本在180万左右。参加编纂人员,主编2人、副主编5人、编委10人、编纂人员25人、图片制作等14人。以上列出书名的书约二百种左右,加上纪念文集、专刊一百种左右,就有三百种左右,而这仅仅是199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书的一部分。这三百种左右的书,平均成本以15万元计,总计4500万元左右。而这仅仅是

1991年中共党史书出版费用的一部分。而这些书的码洋,即购买这些书,所费当在亿元以上。就人力讲,每本书平均参加人员20人,三百种,计人员六千人。而这仅仅是1991年参加中共党史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有些书是二三年编成的,每年20人次计算,三年当是60人次。

以上只是就1991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研究的重复劳动情况作一探讨,其全部的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复劳动情况可想而知了。如果再把1991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与此前此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作比较,也可以发现严重的重复劳动情况。此外,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1997年纪念建军70周年、199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这些年份与纪念内容相关研究的重复劳动也是严重的,与这些纪念活动前和后的研究的重复劳动也是严重的。

重复劳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从劳动的角度看,是不创造价值的,是无效劳动,是浪费;从社会价值看,重复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一方面是同一个课题,很多人研究,差不多的文章、书同时发表、出版,有的文章、书无人看,有的书只印一二千册也卖不完,积压在仓库里。另一方面是不少的课题无人研究,这类课题的文章、书从未发表、出版。有些填补空白的文章、书甚至发表、出版不了。这么一比较,就更令人痛心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人生,浪费太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复劳动对中共党史研究没有促进作用,而有阻碍作用。重复劳动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制止、杜绝。经济建设上的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已认识到要坚决制止、杜绝,学术研究的重复劳动,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造成重复劳动的原因,主要是:(1)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导部门协调不力或无方。(2)纪念活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很大。纪念活动前后发表、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文章、书,重复劳动情况是总是比较严重,且有“纪念史学”的色彩。似乎不出点有关的书,不发点有关的文章,就是对纪念活动“不重视”,而“不重视”会被视为是政治态度问题。于是出书、发文章被作为政治任务,追求与纪念主题一致,追求多、大、有分量,是否重复劳动就不管了。纪念活动前后,丛书、论文集大量出版,主要原因在此。(3)学术规范不健全。写书、写文章的人没有规范的约束,不知、不懂学术规范。不懂写书、写文需对前人的成果作出说明,不懂引用他人、前人的成果要注出处,以至从头到尾

一个出处也不注。有的人可能知道点学术规范,但反正没有约束(力),于是把规范扔一边。审稿的人没有规范约束,或不懂、不知学术规范。学术批评也没有规范约束,真正的学术批评机制没有建立,重复劳动的现象得不到及时、有力的批评,于是任“谬种”流传,贻害学术界。(4)缺乏创新意识及其氛围。这与学术规范的不健全有关,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有的人不愿坐冷板凳,不愿花功夫。有的人为了评职称,急着需要书、文凑数,于是找关系,出书、发文,花钱出书、发文。如有的科研项目、丛书、书、文的领衔人是党政领导,他们有权、有钱,于是组织人搞“研究”,这些领导并非学术研究内行,又要赶任务,难免“拼凑”、“演绎”。如客观上资料条件的限制。档案资料开放有限,挖掘一些新资料很难,不得不用权威部门、权威人士用过的资料。再如政治任务需要、宣传主题需要,已经做过的题目,还要做。又如某些人物说过的话,一些决议的结论变成框框,有的人便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是一味重复这些话、结论。此外,确立科研项目,发放科研经费,没有把创新、填补空白作为首要标准,以至出现一些做过的题目,重复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也没有重视在创新、填补空白方面提出严格要求,以至出现一些“拼凑”(“集大成”)的论文,并影响了研究生日后的研究思路、方法、习惯。最后是学术评奖,并不把创新、原创性作为首要标准,对创新的研究和成果缺少发现、激励机制。

找出原因,防止、避免重复劳动的对策、措施也有眉目了。这就需要:(1)中共党史研究、学术研究的领导部门,应关注重复劳动的现象,要设法防止、避免之,加强调控。(2)淡化“纪念史学”,减少纪念活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3)健全学术研究的规范。学术研究领导部门应尽快订立学术研究规范,作为学术法规颁布、执行。对重复劳动现象,应进行公开、点名批评,决不姑息纵容。(4)对创新、原创性的研究和成果,建立奖励、扶持机制。(5)评职称,把研究成果是否创新、原创性作为首要标准,而不把数量作为首要标准。(6)课题立项、经费发放,应把创新、填补空白作为第一目标,应找到最内行的学者,尤其应找有创劲的青年学者,而不应搞什么“平稳”、“照顾”。(7)为学术研究创造良好的资料条件,健全档案开放制度等。(8)创造良好的平等、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打破条条框框,扫除陈规陋习。

### 3. 政治与学术关系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仍未圆满解决。



中共党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是政治性最强的学科，它在现实生活的政治教育、政治宣传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巨大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要为政治、为现实服务。但这个服务是有“度”的。对以下几条必须有清醒的认识：(1)为政治、为现实服务不是中共党史研究惟一的选择、惟一的路径。另外的选择、路径仍然存在，如学术研究。以为政治服务否定学术研究，认为学术研究没有必要，学术研究得不到支持，导致学术研究发展不起来，那么学术品格的丧失就是学科独立品格的丧失，这个学科就会消失，也不会有真正的学术界公认的科学性。所以，为政治服务的可以支持，同时纯学术的研究也要支持。不能简单、轻率地否定、排斥为政治服务的，也不能简单、轻率地否定、排斥纯学术的。(2)为政治服务不能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学术不是政治的奴仆，不是可以任意使唤的。为了政治需要随意解释历史、歪曲历史，甚至伪造历史，把历史、中共党史当成胡适所谓的“摆大钱”、“打扮姑娘”，变成实用主义的工具，这就走向了反面，走向了伪史学、伪中共党史学。就如“文革”时期的历史学、党史学，最终被唾弃。前苏联也有过史学政治化恶性发展的时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可参见陈启能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第九章《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3)史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参与政治斗争，应以参与史学领域的政治斗争为主，而不是以参与政治领域的政治斗争为主。比如在毛泽东研究中，西方反华反共的资产阶级右翼学者通过攻击毛泽东来攻击中共，这就必须与之斗争。林克等人写的《历史的真实》，就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进行了批驳，在史学领域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史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积极作用。(4)不要把学术观点当成政治观点，不要把学术探讨当成政治问题。比如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的评价有人认为是有很大成绩的，有人认为是毫无成绩的，这是学术观点的争论，不要把哪一种观点扣上政治帽子，把说毛泽东有成绩的视为“两个凡是”派。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就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成绩很大，难道也把他视为“两个凡是”派？有人突破了中央决议的一些结论、观点，作为学术探讨应该允许，而不要视为反对中央的决议，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是历史文献,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认识水平,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发展,《决议》的结论、观点被突破是正常的,不被突破倒是不正常的。当然,对于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政治活动的人及其言论,也应保持警惕。对于敌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行、思潮,要进行斗争。要善于识别、谨慎对待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更要善于识别、严肃对待政治行为和学术行为。

#### 4. 加强理论研究

中共党史学科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 (一)加强理论学科的研究、开发、建设

中共党史学科组成体系的一些理论学科,如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科学、中共党史学批评、中共党史文献学、中共党史目录学、中共党史版本学、中共党史校勘学等,都是中共党史学科的一些理论学科,这些学科的建设目前还是滞后的。1989年张注洪在谈“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与改革”时,曾提到:“学科体系远未建立;党史学科虽有多年的研究历史,编了不少教材,但包括学科基本理论、文献学、史学史等内容的学科体系并未建立,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学科的发展”<sup>①</sup>。十年以后,理论学科的建设已略有起色。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概论》1991年出版,标志着“中共党史学概论”学科开始建立。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1990年出版,周一平著《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1991年出版,翟作君、周一平等主编的《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1993年出版,标志着“中共党史史学史”学科开始建立。“中共党史史科学”学科,从1985年到1987年已有张注洪《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何东《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书出版。中共党史文献学,已有论文发表,郭军丽《党史文献学刍议》(《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周一平《中共党史文献学理论问题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4期),周一平的著作《中共党史文献学》2001年将出版,反映出这个学科已开始建设。中共党史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文章都只有一篇,周一平《中共党史目录学几个理论问题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周一平《关于中共党史校勘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党史研究与教

<sup>①</sup>张注洪:《中国现代史论稿》第24-25页,又见《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学》2001年第1期)。中共党史版本学方面的理论文章还未见到,说明这个学科还有待于开发。中共党史学批评方面的文章已有发表,如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批评刍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6期),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也设有《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学批评》一章,这个学科也算开始建设。以上诸学科,无论已经建设或尚未建设,相对于具体的中共党史研究来说,研究是滞后的,出的书、发的文章都是少的,课题立项、科研经费资助都极少。甚至有关这些学科的书稿很难出版。从事这些理论学科研究的人屈指可数,这应该引起中共党史研究领导部门的重视,也应该引起整个党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希望在新的世纪里,这些理论学科的建设有较快的发展。

## (二)加强中共党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即加强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

关志钢1996年著文指出,中共党史研究还存在着“仍未脱离实证主义史学的窠臼”的问题,其表现之一便是“过分依重史料和具体史实的考据,缺少对历史现象及过程的宏观考察和思辨分析”<sup>①</sup>。宏观研究、思辨分析,有不同的层次,哲学层次的思辨是高层次。如司马迁写《史记》,目的之一是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这就是哲学层次的思辨。伏尔泰提出写历史要有哲学家的眼光,要写出哲学的意味,给人以哲理上的教益,亦是主张史学研究的哲学思辨。而中共党史学界,进行哲学思辨研究的人很少,书、文章也极少。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1995年出版),是这方面研究的惟一一本书。对中共党史进行“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哲学思辨研究,大有文章可做,只是提倡者少,问津者少。对中共党史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低层次的思辨研究。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新时期的改革是否是搞资本主义、走回头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共党内斗争性质,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与邓小平理论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具体问题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些理论问题的思辨研究,有一些实事求是的文章,但仍不多,相对于具体史实研究的文章仍很少。对整个中共党史作宏观考察,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这是中层次的思辨研究。如研究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研究对象问题

<sup>①</sup>关志钢:《中共党史研究的困惑》,《深圳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等。如研究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等。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与这方面研究相关的书，目前只有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文章有一些，但并不多。总的来说，各层次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辨分析，很薄弱，“百花齐放”的讨论更少。

### (三)加强中共党史研究的应用理论和方法研究

这是上面提到的中层次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提倡，但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少。国外已有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成果，而中国国内却很少，这应该激励起中国的中共党史学者，加强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研究，并进行应用的实践。这不只是学者的个别问题，而应是整个中国的党史学界，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导部门，需要认真组织实施研究的问题。

## 5. 培养后继人才

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由于高校课程设置的改革，中共党史专业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中国革命史方向的研究生招生、培养产生了不少困难。高校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陆续被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课取代。没有学过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要考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生，就有困难，这无疑影响了招生。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的去向，大多是“清水衙门”，挣不了大钱，于是感兴趣的人自然不多，甚至考中共党史研究生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就上海华东师大法政学院的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历年报考的情况来看，有的人想“跳进”上海，有的人想调动岗位，考别的专业研究生不行，就考中共党史专业试试。有的夫妻双方已有一方在上海读书或工作，另一方为了进上海，最好的选择便是读研究生，于是也考中共党史专业试试。结果是学中文、学外语，甚至是学工科、学理科、学医、学农林的都来报考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这些专业的人来考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绝大部分考不上，即使极个别的人考上了，实际上对中共党史专业也没兴趣，混过三年，找份工作，安下家，便达到目的。中共党史研究“忌讳”多、“禁区”多，资料看不到，这也使年轻人望而生畏，一些想一心搞学问的人，想在学术上有建树的人，自然就要转向其他领域、其他专业。一些历史专业、政教专业本科毕业的优秀生，基本上都不考中共党史专业。以华东师大法政学院为例，每年本科毕业最优秀的学生报考的

研究生专业大多是国际政治、法律专业等,甚至报考国际金融专业。1996年的本科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两人,都被华东师大国际金融硕士专业录取。1997年的本科毕业生中有一名最优秀的学生被北大国际政治硕士专业录取,另一名被华东师大国际金融硕士专业录取。一些基础扎实的学生,动员他们考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他们也不考。最终就造成,报考中共党史专业的考生,成绩不理想,以至于上分数线的人数达不到应招名额,不得不从其他专业上线的考生中“调剂”几名过来。招生就存在不少问题,培养自然也问题不少。

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些理论课程,如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等,研究生不感兴趣,将来拿这些课的成绩去找工作也不好找,以至这些课不得不取消。感兴趣的课是经济方面、法律方面的。这样,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的理论、方法、知识方面的专业训练、培养就很有限。毕业论文的题目,选择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纯党史)的很少,一方面有的题目已有人研究过,另一方面资料很难看到,于是找一些偏离中共党史的题目去做。研究生调研、考察、访问专家学者、查资料,经费很少,一般不足一千元。走不了几个地方,住不了几天。要下功夫研究一个问题,下功夫搜集资料,得不到经费的保障,更不用说到香港、台湾、欧美去搜集资料了。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质量不得不受到一定影响。培养起献身专业的志向就难了。

最可惜的是,导师花费了不少心血,研究生也搭上了时间、精力,研究生毕业后却改了行。以华东师大法政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来说,每年毕业都有改行的,1997年至1999年毕业改行情况如表5—1。

表5—1

年份	毕业人数	改行数	百分比
1997	7	5	70%
1998	5	2	40%
1999	6	3	50%
2000	4	2	50%

以上改行的去向,一部分是去机关,一部分是去企业,大多从事事务性的、行政性的工作。也有个别的去中学当老师。当然,改行也有客观的原因,高校等党史、革命史课程的取消,党史研究机构、党校编制压缩,对中共党史研究生的需求相对减少。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课的讲

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各个方向的研究生都可以胜任,就连哲学专业、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也能胜任。这就迫使一部分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改行。工资高、福利待遇高,自然也是一种诱惑,强烈“引诱”着研究生改行。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到企业,或者到机关,工资就相当于他们的导师的工资,有的还能解决住房,上下班有车接送,奖金相当可观,改行的不少,也在情理之中。1998年9月,华东师大法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为了解决后继无人问题,从南京大学历史系引进了一名中国现代史博士。岂料,由于半年中,家属问题、住房问题解决不了,而上海一所中学愿意解决这位博士的家属、住房问题,于是这位博士1999年1月便离开高校到中学去教英语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事业来说,这实在太可惜了。这对华东师大法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是一个损失,对国家、对个人也是一种损失。这是人才培养的浪费,对国家是浪费、对个人也是浪费。

对中共党史研究后继人才的培养,导师们基本上都是尽心尽力,甚至殚精竭虑。如张静如教授每两年召开一次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生导师会议,共商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每两年召开一次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生学术讨论会,促进研究生的交流、提高。在导师们的努力下,也培养出了一些挑起重担的接班人。但接了班的人实在是少数,后继人才不足的情况仍然严重存在。这个关系到学科前途的大问题,应该引起整个中共党史学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

中共党史研究后继人才的培养,受整个国家宏观面的影响,也与整个研究生培养的形势、格局密切相关,特别是培养经费、毕业后工资待遇、研究条件等问题,及研究生的某些个人问题,是导师们无能为力的。相信,只要政府部门重视这些问题,只要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随着不断的改革,中共党史研究后继人才的培养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高质量的、能自立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优秀人才一定能不断涌现。

## 6. 发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国内外合作的发展,学术的国内外交流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国内外交流也有了发展。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交流相比较仍然显得落后。如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与外国的中共党史研究

者互相访问，探讨还不广泛。如中国的研究成果，书、论文，介绍到国外的不多，国外的书、论文介绍到中国的有一些但也不多。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书，有的同时出版几种语种本，而中国的杂志、书很少出版几种语种本。如1990年创刊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杂志，在介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信息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却在1996年第6期出版后，宣布停刊。这是很遗憾的。又如中国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与国外学术界的对话很少。国内搞国内的研究，国外搞国外的研究，犹如井水不犯河水。国外讨论的热门话题，国内很少关注一下，也不参与讨论。这表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将既促进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也促进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发展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一方面需要政府在政策、经费等各方面扶持，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人员改善知识结构，如提高外语、计算机操作水平，扩大研究领域等。中国的研究人员，应多一些到国外去访问、研究的机会。外国的研究人员，应吸引他们到中国来访问、研究。

## 附录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党史研究简目(1949. 10—2000)

#### 凡 例

一、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党史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书目。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不多,主要的著作已在《中共党史研究大事记》中注录,可以参见,故不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党史研究的详细目录,可以查阅历年《全国总书目》。1950年至199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书目,也可以参见翟作君、周一平等主编的《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

二、资料基本上截止2000年10月。

三、以辑录著作为主,论文集、教科书、工具书、资料书一般不收入。

四、地方党史、革命史研究著作一般辑录以省市、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五、分类排列。同类书,按出版年代的先后排列。人物研究著作先分类,其次按姓氏笔划排列。

六、著作的作者,一般只注录第一作者(第一主编)。

七、既为书目,所有书名不加书名号。

#### 一、史学理论

- 中共党史学概论 王仲清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 张静如 湖南出版社 1995  
中国现代科学全书·历史学·中共党史 周一平 人民出版社 2001  
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 王炳林 北京出版社 2000

#### 二、史学史

- 中共党史学史 张静如等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 周一平 湖南出版社 1991



- 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 唐曼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 周一平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4  
 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 周一平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 周一平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6  
 毛泽东研究史论 侯且岸 北京出版社 1996  
 西方“毛泽东学”研究 叶卫平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 张注洪等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 郭铁轮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三、史科学、文献学

- 中国现代革命史史科学 张注洪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第2版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述略 张注洪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中共党史文献学 周一平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1

### 四、通 史

-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胡乔木 人民出版社 1951  
 中国共产党历史 李践为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0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胡绳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刘吉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历史的选择 张静如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1  
 不平凡的七十年 金春明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共七十年 高凯等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陈明显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通史 沙健孙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2000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 任建树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通志(上、中、下) 郑惠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 骆彬等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骆彬等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风云书系 郭德宏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五、中国革命史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胡华 人民出版社 1950年初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年再版  
 中国现代革命史 何干之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4年初版  
 1957—1958再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修订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李新等主编 1959—1962年初版,1980—1981年再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李新等主编  
 第一卷《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出版。第二卷《国民革命的兴起》、第三卷《北伐战争》、第四卷《星火燎原》、第五卷《抗日潮流的起伏》、第六卷《从内战到抗战》、第七卷《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第八卷《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第九卷《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第十卷《争取和平民主》、第十一卷《战略防御 转守为攻》、第十二卷《最后的决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至1997年出版。  
 中国革命史长编(上、下) 郑德荣等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革命史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 刘育英主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3  
 中华百年史丛书 吴廷桢等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3  
 二十世纪中国风云书系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段史

- 五四运动史 彭明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1版,1998年修订版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蔡韦(张静如)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第1版,1979年修订再版  
 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丁守和等 三联书店 1963年初版,1974年  
 修订再版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王可风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张洪祥等主编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张静如等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庄有为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邵维正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周尚文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新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稿 陈志凌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中国大革命史(上、下) 王宗华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0
- 中国大革命史论 曾宪林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国民革命史 黄修荣 重庆出版社 1992
- 北伐战争 胡之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 北伐战争史 曾宪林等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1927—1937) 郑德荣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 革命起义录(1919—1949) 范圣予等主编 求实出版社 1989
- 中国革命起义全录 张东辉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 南昌起义研究 张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南昌起义史论 张月琴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实录 花城出版社编印 1986
- 秋收起义 萧克等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79
- 中国共产党三大武装起义丛书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湘南起义史稿 李沥青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平江起义 凌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 陆仰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 马齐彬等 人民出版社 1986
-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 戴向青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中央苏区史略 陈荣华等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2
- 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 温锐等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 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 戴向青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 何友良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 广东革命根据地史 黄振位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江西苏区史 夏道汉等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井冈山革命斗争史 桂玉麟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 余伯流等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 编写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闽西革命根据地史 福建龙岩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华夏出版社 1987
- 闽西革命根据地史 蒋伯英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 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 编写组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 谭克绳等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 湘鄂赣苏区史稿 湖南省社科院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 编写组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 编写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编写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 编写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 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 中共南江县委党研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红军长征简史 力平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 长征史 李安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 红军长征史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 红军长征全史(5册) 柏福临等主编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96
- 中国红军长征史 力平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 四渡赤水 谭智勇 人民出版社 2000
- 西安事变史实 李云峰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西安事变研究 丛一平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西安事变简史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 苏区思想发展历程 段瑞华等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0
- 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 刘勉三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 龚古今等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1984
- 抗日战争史 何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下)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解放军出版社  
1991—1995
-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 王秀鑫等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 1995
- 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 张宏志 军事科学院出版社 1985
-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 张宏志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 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 张宏志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 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 陈廉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 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 田西如 北京出版社 1995
-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 编写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 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 樊有山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魏宏运等主编 档案出版社 1990
- 沂蒙抗日战争史 崔维志等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 山东抗日根据地史 申春生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 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 饶有庆等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北平人民抗日斗争史稿 王汝丰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 欧远方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苏南抗日斗争史稿 编写组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湖南抗日战争史 萧栋梁等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 总编委会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千里“无人区” 陈平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 范同寿等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 房成祥等主编 陕西师大出版社 1991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 工作组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晋冀鲁豫边区史 齐武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抚顺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 尉常荣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  
 抚顺人民抗日斗争四十年(1905—1945) 中共抚顺市委党研室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鲁西北革命史 谢玉琳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 师文华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3  
 云南抗日战争史 孙代兴等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  
 百团大战 金春明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1  
 百团大战始末 王政柱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  
 皖南事变本末 陈侃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  
 皖南事变始末 陈枫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  
 延安整风实录 张树军等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 沈庆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 肖效钦等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抗日战争史丛书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3 1995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 北京出版社 1995—  
 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抗战纪实丛书 湖南出版社 1995  
 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5—  
 中国抗日战争大写实丛书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5  
 纪念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丛书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东北抗战纪实丛书 高树桥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重庆抗战丛书 重庆出版社 1995  
 全国解放战争史 廖盖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三年解放战争 冷杰甫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8  
 震撼世界的人决战 王道平等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解放战争实录 解力夫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 决战的历程 陈廉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 黄友岚 档案出版社 1992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共5卷)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1997
- 解放全中国丛书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 城市解放纪实丛书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 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5—1952) 刘宋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 黑雾红尘——国共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 陈景彪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北平和平谈纪实 董世桂等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 五二〇运动史 华彬清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中原突围史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等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
- 东北解放战争史 朱建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辽沈战役史 梁延伦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 新编辽沈战役史 毛敏修等主编 辽沈书社 1994
- 解放平津 夏宁 新华出版社 1985
- 平津战役史 刘广志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淮海战役 冷杰甫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 淮海战役史 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渡江战役 冷杰甫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 王东溟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七、社会主义时期及各阶段史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朱建华等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靳德行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何理主编 档案出版社 198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李茂盛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1949.10—1991.12) 周华虎主编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共4卷) 刘国新等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共和国史记 徐达深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 廖盖隆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邓力群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 辉煌的五十年 编写组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

-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纲 郭彬蔚等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5
-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 赵永宪等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回顾与思考 谢忱 新华出版社 1999
- 人民记忆 50年 宋强等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
- 当代中国丛书(共150卷) 邓力群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1984—1998
- 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丛书 柏福临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 1989—1991
-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刘德福等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当代中国国是反思丛书 刘德福等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共10卷) 红旗出版社 199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共5卷) 徐达深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 新中国五十年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 邓力群等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 老新闻——共和国往事丛书 江沛等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 特殊年代的中国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 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 共和国之路丛书 北京出版社 1999
- 共和国里程碑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我们的共和国丛书 编委会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9
- 共和国将永远铭记丛书 西苑出版社 1999
- 伟人与新中国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丛书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 红色中国丛书 红旗出版社 1999
- 共和国里程碑丛书 刘国新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
- 开国奠基:中国1949年纪实 余科杰等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 1949:中国历史大转折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
- 抗美援朝战争纪实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 抗美援朝战争 谭旌樵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 抗美援朝战争史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 朝鲜战争实录 解力夫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李辉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9
- 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张聿温 北京出版社 2000

- 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长安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 中共八大史 石仲泉等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8
- 沉重的1957 叶永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 1957年的夏季 朱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春秋出版社等 1989
-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吉柚权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3
- 西藏平叛纪实 吉柚权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
- 铲除邪教：共和国铲除反动会道门述实 迟坡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 1962：中印大战纪实 师博 中国大地出版社 1993
- 新中国六次反侵略战争实录 李健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 “文革”前十年的中国 晋夫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肖冬莲等 红旗出版社 1999
- “文化大革命”论析 金春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严家其等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 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昨夜星辰系列丛书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4
- “文化大革命”史稿 金春明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 “文化大革命”简史 席宣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周全华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顾洪章主编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
-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 定宜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976~1981年的中国 程中原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红旗出版社 1998
-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丛书 邹东涛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共和国大转折：改革开放20年纪实 于济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 中国跨世纪的三大改革 刘国光等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 中国反腐败二十年 陈波 人民出版社 2000
- 人民信访史略 刁杰成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6

## 八、中国工人运动史

- 中国工人运动简史 钱传水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6
- 中国工人运动史 孙茂生等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中国工人运动史纲 李景华等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 中国工会史 王永玺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 中国工人运动通史简编 王永玺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
- 中国工人运动史(共6卷) 刘明达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蔡昌瑞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 齐武 人民出版社 1986
- 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 中共上海市委党研室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上海工人运动史 沈以行等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 周尚文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武汉工人运动史 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重庆工人运动史 黄淑君主编 西南师大出版社 1986
- 福建工人运动史 陆舟等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0
- 厦门工人运动史 厦门市总工会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 湖州工人运动史(1909—1990) 王玉林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 东北工人运动史纲 齐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 大连工会要略(1923—1990) 刘成功总纂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2
- 西北总工会简史 王建楼等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1
-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1921—1930) 刘善文主编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3
- 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 薛世孝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1937.7—1949.9) 编写组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
- 晋冀鲁豫边区(河南部分)工人运动简史 陈恒文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开封工人运动史 开封市总工会政研室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洛阳工人运动史(1940—1990) 张兴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 编写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九、中国农民运动史

- 广东农民运动(1922—1927) 杨绍练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编写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7
- 保定地区农民运动(1921.7—1973.7) 中共保定地委党研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 王全营等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89

## 十、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

- 中国青年运动史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 中国学生运动简史(1919—1949) 邵鹏文等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 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上、下) 于学仁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8
- 中国现代青年运动史 刘云久等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 郑沆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 中国学生运动史(1945—1949) 施惠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中国共青团简史 郑沆等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 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 北京团市委青运史研究室 北京出版社 1989
- 上海学生运动史(1945—1949) 上海团市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福建共青团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陈晓光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 漳州青年运动史 周跃红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 贵州青年运动史(1919—1998) 董少龙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共青团山西组织简史(1921.5—1991) 共青团山西省委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十一、中国妇女运动史

- 中国妇女运动史 全国妇联 春秋出版社 1989
- 上海妇女运动史(1991—1949) 上海妇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十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史

- 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 杜渐等 战士出版社 1982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共3卷)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 袁伟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 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 王健英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 中国工农红军史略 张廷贵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 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 王健英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 徐占权等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

- 红一方面军史略 李直等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 编审委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编委会 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第二版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 编委会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 红军纪实丛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 张廷贵等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 八路军 武国祿 新华出版社 1990
- 新四军简史 王辅一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 新四军发展史 马洪武等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新四军战史 编写组 解放军出版社 2000
- 东北义勇军 元仁山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 潘喜廷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下) 温永录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 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1991
-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 孙凤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 四大野战军丛书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6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 编委会 解放军出版社 1995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 编委会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 编辑室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 编写组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 新中国军事人事纪要 张驭涛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 共和国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50年光辉历程 姚廷进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年第1版,1990年第2版
-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史 黄毅等 金盾出版社 1991
- 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 李福生主编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1997
-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 李可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989
- 中国人民解放军 张爱萍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战史丛书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兵种历史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 1989—1990
- 名将·名军·名战丛书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6
- 中国特种兵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 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全纪录丛书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

- 军史辉煌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
- 当代中国海军 杨国宁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当代中国空军 王定烈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人民空军四十年 空军政治部 蓝天出版社 1990
- 当代中国民兵 韩怀智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武警部队四十年(1950—1990) 鲁英等 群众出版社 1990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 姜思毅主编 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 1984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社会主义时期)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9
- 军队政治工作史 张建川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 中国人民解放军民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陈舟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简编本 吴中和主编 金盾出版社 1993
- 中国人民解放军 财务简史 总后勤部财务部等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 苏士甲等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1
- 解放军舞蹈史 高椿生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 于化民等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经济思想史 龚泽琪等主编 海潮出版社 1992

### 十三、党 建 史

-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 赵生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 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 曹润芳等 档案出版社 1988
-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范荣祥等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陈至立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朱汉国等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七十年 李善塘等主编 白山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七十年 曹平等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建设七十年 方锐等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建设七十年 曾成贤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 党的建设七十年(1921—1991) 张天荣等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建设史论 孙友葵等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 十四、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

-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 向青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向青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纲 孙武震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下) 黄修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 杜文焕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 共产国际、斯大林和中国革命 王廷科 成都出版社 1992
- 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周文琪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苏联和中国革命(1917—1949) 向青等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 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黄修荣 求实出版社 1983
- 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 丁言模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 十五、外交史

-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牛军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 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谢益显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裴坚章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纲 孙勇胜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
- 新中国外交50年 王泰平主编 北京出版社 1999
- 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 谢益显等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 新中国外交纵横录丛书 黎家松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 吴学文等 时事出版社 1995
- 中美关系史(1949—1972) 陶文钊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 王红续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 钓鱼台档案丛书 红旗出版社 1998
-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 谢益显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十六、政治制度史

- 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史 黄志仁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 宋金寿等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 迟福林等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构五十年 国家行政学院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0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发展史 袁瑞良 人民出版社 1994  
 共和国宪政历程 文正邦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 李金山等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2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夏禹龙等主编 重庆出版社 1999

## 十七、法制史

- 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 张希坡等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 杨永华等 法制出版社 1987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 杨永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革命根据地法制史 张希坡主编 法制出版社 1994  
 中国法制四十年(1949—1989) 赵震江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 杨一凡等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当代中国立法 郭道晖总主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上、下) 韩延龙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史 张希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  
 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 陈景良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 郭道晖等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 公丕祥主编 法律出版社 1999  
 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 高铭暄等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

## 十八、统一战线史

-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胡之信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8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 姜华宣等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王邦佐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史 宋春等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7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 师锐等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社会主义时期) 关世雄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 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统一战线史 张裕良等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3
- 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 江平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 新中国统一战线50年 王国成主编 台海出版社 1999
-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丛书 华文出版社 1999
- 国共合作史 林家有等 重庆出版社 1987
- 国共两党关系史 王功安等主编 武汉出版社 1988
- 两次国共合作史稿 唐培吉等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国共两党关系史 苏仲波等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 国共关系史略 张广信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 国共两党关系通史(1921—1991) 王功安等主编 政治大学出版社 1991
- 国共关系七十年(1921.7—1991.7) 刘建武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
- 国共关系史论 唐纯良等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 国共关系七十年(上、下) 黄修荣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国共两党谈判通史 毛磊等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 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 唐纯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5
- 第一次国共合作 黄修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第一次国共合作史 陈廉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第二次国共合作 刘云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 中国现代多党合作简史 李世平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 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史稿 杨淑娟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 宋春等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 多党合作纪实 关世雄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 社会主义中国多党合作史纲 朱新镛等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史 马维政等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 我国多党合作的历程 张树桐 华文出版社 1999
- 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 张忆军主编 学林出版社  
2001
- 统战思想史 姜汝真等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 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 蒋建农等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三代领导集体与统一战线 高化民等 华文出版社 1999
- 我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李松林等 华文出版社 1999

## 十九、民族史

-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 郑广智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江平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周锡银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 民族工作四十年 国家民委政研室等 民族出版社 1989
-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 我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周竞红等 华文出版社 1999
- 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研究 周域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二十、经济史

-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 赵效民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 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史 唐滔默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下) 许毅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2
- 中央苏区经济史 余伯流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星光等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
-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 魏宏运主编 档案出版社 1990
-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 戎子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 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 朱建华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中国土地改革史 张永泉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 中国土地改革史 赵效民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0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稿(1949—1957) 孙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蒋家俊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 董辅弼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 武力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 中国现代经济史 李宗植等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 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 曾璧钧等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0
- 新中国经济史 苏晔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 新中国经济50年 曾培炎主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王海波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 汪海波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 中国现代工业史 祝慈寿 重庆出版社 1990
- 新中国劳动经济史 袁伦渠主编 劳动人事出版社 1987
- 新中国工资史稿 庄启东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6



- 新中国商业史稿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 赵玉芝等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 万典武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8
- 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 叶善莲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3
- 中国物价五十年 成致平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四十年 编委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 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发展史略 王林栋等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2
-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周太和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中国投资建设 50 年 曾培炎主编 计划出版社 1999
-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十年(共 4 卷) 王珏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
-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 王毅武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恢复史 范守信 求实出版社 1988
- 新中国会计 50 年 项怀诚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 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 左春台等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 中国财政 50 年 项怀诚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 中国财政改革二十年回顾 叶振鹏等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 国企改革二十年 王升生等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8
- 改革与开放中的中国金融业 狄卫平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史 陈守林等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 陈吉元等主编 山西经济出版 1993
- 中国农村 50 年 杜鹰主编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
- 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年 关锐捷 河北科技出版社 1998
- 江南农村发展研究丛书 王霞林等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 黑龙江农业合作史 邢泽民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 广西社会主义经济编年史 覃平等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 二十一、思想文化史

### (一)思想史

- 中国现代哲学史(1919—1949) 吕希晨等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 中国现代哲学史新编 吕希晨等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 中国当代哲学史稿(1949—1966) 刘梦义等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 中国当代哲学史 任俊明等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 王炯华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 秦英君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庄福龄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 李吉等 求实杂志出版社 1988
- 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 彭明等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 翁有为等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 李明山等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陈汉楚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林代昭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 胡希宁等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张静如主编 青岛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 丁俊萍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 顾龙生主编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 顾龙生主编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
- 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 李占才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沈宝祥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
- 时代的呼唤——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金隆德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8
- 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刘孚威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长征精神万岁 陈宁 黄河出版社 1997

## (二)文学史、文艺史

- 中国新文学史稿 王瑶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重版
-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 冯光廉等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黄修己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中国共产党人与新文学(1921—1927) 内蒙古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59
-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 廖超慧 武汉出版社 1997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 饶良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 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 戴知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江西苏区文学史 江西师大中文系苏区文学研究室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中国抗战文艺史 蓝海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4 年再版
- 河北抗战题材文学史 王继国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 晋察冀文艺史 王剑青等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 中国解放区文学史 刘增杰等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中国解放区文学史 许怀中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 陈辽等 昆仑出版社 1987  
 新中国文学史 舒其惠等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新中国文学五十年 张炯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当代中国文学史 洪子诚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朱寨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 李慈健等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中国当代小说史 汪名凡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新时期的乡土文学 春荣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  
 新时期的军事文学 范咏戈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 张炯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中国当代美术史 高名潞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1986) 汪毓和主编 华文出版社 1991

### (三)教育史

- 老解放区教育简史 陈元辉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一、二) 董纯才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  
 闽西苏区教育 谢济堂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 曲士培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冀鲁豫老区教育史 赵紫生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山东解放区教育史 编写组 明天出版社 1989  
 湖北老解放区教育史稿 编委会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东北解放区教育史 苏甫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党员教育史 金晓钟等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 王仲清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校史(1949—1989) 辽宁省委党校校史办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中共呼盟委党校志 中共呼盟委党校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1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校史:(1952—1992) 王文学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2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简史 编写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简史(1950—1990)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史编写组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2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简志:(1952—1992) 方荣湘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 上海大学(1922—1927) 王家贵等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86  
 革命熔炉 李志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再版  
 战火中的大学 成仿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北京大学校史 萧超然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再版  
 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校史 编写组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1  
 西南革大史稿 蒋子恒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0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史 编写组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9  
 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 金一鸣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0  
 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程凯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新中国教育四十年 郭筌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 柏福临等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共和国教育50年 教育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 刘一凡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1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史 龚海泉主编 武汉出版社 1992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20年 郝克明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四) 体育史

- 陕甘宁边区体育史 编审委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 武汉出版社 1990  
 当代中国体育 荣高棠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五) 邮票史

- 中国解放区邮票史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 (六)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史

- 中国新闻事业史稿 李龙牧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 方汉奇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中国现代新闻史 王洪祥主编 新华出版社 1997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 方汉奇等主编 新华出版社 1996  
 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 严帆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1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 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等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晋察冀日报史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 人民出版社 1993  
 新华日报史上卷 韩辛茹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

- 新华日报史新著 廖永祥 重庆出版社 1998
- 大众日报五十年(1939—1989) 朱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 李庄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 华东新华书店简史(1949—1954) 编写组 文汇出版社 1998
- 中原——中南新华书店史(1948—1954) 编委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风雨砥砺四十春秋:上海新华书店简史(1949—1989) 张泽民等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3
- 中国解放区广播史 赵玉明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 左漠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中国电视史 郭镇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 中央电视台简史 于广华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3

## 十二、其他各专史

-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作史稿 刘继增等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刘炳香 党建读物出版社 1998
- 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 刘继增等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 孔永松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中国共产党宣传史 林之达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 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 叶笃初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 盖军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6
- 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 费云东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史 魏明铎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 吴传煌等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2
-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 陈文斌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 徐昶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0
-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 龚海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 姜思毅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2
-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理论与实践 闫世奎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 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 张光宇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 二十三、地方党史

- 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中共陕西省组织发展沿革概要(1925.10—1987.10) 支盖民等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纲要(1924—1991)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 余世诚等 石油大学出版社 1997
- 中共山东省组织发展史概要 王海天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中共山东地方史(第1卷) 陈建国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光辉历程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委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共河南党史(上卷)(1919—1949)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委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中共哈尔滨党史大事本末(1919—1949) 梁文军等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 中共沈阳地方党史(民主革命部分) 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室  
沈阳出版社 1989
- 中国共产党在长春七十年(1921—1991) 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等 长春出版社  
1991
- 中共营口地方史简编(民主革命时期) 张庆斌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 中共济宁市组织发展史概要 李本森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 中共济宁地方史稿(上册) 范灵才等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中共济宁市郊区史稿(1921—1949) 中共济宁市郊区区委党史资料征研委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 中共德州地区党史 王邦瀛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 中共莱芜党史简编(1926—1949) 中共莱芜市委党史资料征研委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 河北省志《共产党志》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中国共产党保定市组织志(1922—1988) 中共保定市委组织部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2
- 中共莱阳地方党史(1925—1949) 中共莱阳市委党史资料征研委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 中共焦作历史(1925—1949) 路振乐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中国共产党浙江临安革命斗争史略(1927—1949) 中共临安县党史资料征研委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1

- 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 编纂组 南京出版社 1993
- 中共连云港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办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 中共广东党史概论 黄振位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 红旗不倒(中共琼崖地方史)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中共新会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新会市委党史办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云南地方党史简编(试用本)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共宁夏地方史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宁夏组织史资料编辑部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 中国共产党银川地区革命斗争史 中共银川市委党史征集办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 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发展简史 中共新疆组织史资料编辑部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 二十四、地方革命史

- 北京现代革命史 宋柏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北京地区革命史丛书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 北京出版社 1991
- 天津现代革命运动史 廖永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 冀东革命史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 涿州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豫南革命史 董雷等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信阳市革命斗争史(1919—1949) 中共信阳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新安革命史 翟耀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漯河革命史 漯河市史志档案办公室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临沂革命斗争史稿(1919—1949)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研委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沂蒙革命斗争史略 李佩芝等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鲁西南地区革命史 王宗普等主编 黄河出版社 1997
- 皖西革命史 陈忠贞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 南京人民革命史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 南京出版社 1991  
 扬州革命与建设史略 李学泌等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吴江人民革命斗争史(1919—194) 中共吴江县党史工委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盐城人民革命斗争(1919—1949) 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委 北京出版社 1991  
 淮安人民武装斗争史 李先臣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上海革命简史 卜杏英 学林出版社 1990  
 福建革命史 蒋伯英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闽中人民革命史 金文享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闽北革命史 中共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 人民出版社 1992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史 叶佐能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赣南革命三十年 廖正本等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2  
 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湖南省委党史委 湖南出版社 1991  
 湘乡人民革命史 谢秉中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沔阳人民革命史 刘正岗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随州革命史 中共随州市委党史办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西藏革命史 中共西藏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1  
 新疆三区革命史 徐玉圻主编 民族出版社 1998  
 呼和浩特革命史 郝维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 二十五、人物研究

### (一)政治人物

- 毛泽东传(1893—1949)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逢先知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青年毛泽东 高菊村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早年毛泽东 李锐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走出困境的毛泽东 蒋伯英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李君如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许全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晚年毛泽东 陈明显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我的父亲毛泽东 李敏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浅谈毛泽东思想 马齐彬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杨超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 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史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郑德荣等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 毛泽东思想史稿(社会主义时期) 郑德荣等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 毛泽东思想发展史 金春明等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范贤超等 湖南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杨超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1版  
1991年第3版
-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 汪树白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刘梦义等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一、二、三) 庄福龄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1991
- 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 毕剑横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翟作君等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阎洪渊等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 顾龙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 毛泽东经济年谱 顾龙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 乔宗寿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 宋廷同等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建党学说 张中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毛泽东建党学说史 张蔚萍等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王三欣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
- 毛泽东建军思想研究 丁世尤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 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 廖国良等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 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 张家裕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 李准等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 毛泽东文艺思想新探 周申明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 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宋贵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 张居华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戴知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 李鹏程 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的教育实践 张健主编 北京教育出版社等 1993
- 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 王自立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 现代中国的教育魂——毛泽东与现代中国教育 陈桂生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 窦其文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6
- 毛泽东编辑思想与实践 陈其相等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8

- 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 丁名宝等主编 湖北科技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 萧超然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研究 郑建邦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谁主沉浮——毛泽东的民主与法制观 王地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王功安等主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0
- 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 毕剑横主编 成都出版社 1989
- 帅才的理论:毛泽东与领导科学 超英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学说 张蔚萍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学说 阎志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 杨连云等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 毛岸青、邵华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与科学丛书 孔令华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研究丛书 邵华泽等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 论说毛泽东丛书 彭明主编 陕西师大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与湖南丛书 湖南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杨植霖等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交往丛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高层政治交往书系 北京出版社 1998
- 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 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体系丛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丛书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思想的拓展与胜利丛书 重庆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诞生100周年纪念丛书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之路(1—4)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 毛泽东研究全书 张静如主编 长春出版社 1997
- 毛泽民传 朱天红等 华龄出版社 1994
- 邓小平传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出版社等 1988
- 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 杨鹏翔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9
- 我的父亲邓小平 毛毛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毛毛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 宫力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 邓小平军事生涯 郝智慧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 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武市红等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00
- 邓小平思想论 乌杰 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版 1997年第2版
-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孟令伟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 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 俞良早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 从列宁到邓小平的伟大探索 彭大成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龚育之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 陈登才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 邓小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 李君如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高屹 武汉出版社 1999
- 从八大到十五大——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王顺生等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 石仲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十四大以来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韩荣璋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 九十年代邓小平理论研究 李锦坤主编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1999
- 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 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一、二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1997
- 邓小平生平著作思想研究集成 翟泰丰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 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丛书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 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 1994
- 邓小平理论全书 李忠杰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 邓小平理论研究丛书 杨春贵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 邓小平理论研究系列丛书 赵诗清等主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9
- 邓小平谋略研究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 邓中夏的一生 姜平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邓子恢传 蒋伯英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邓子恢传 编委会 人民出版社 1996
- 农民知己邓子恢 南云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 王若飞传 陈志凌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王尽美传 中共诸城县委等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
- 陨星之光——王尽美生平·家事 吕荣斌 济南出版社 1998
- 王震传 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 铁人传 编写组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0  
 王稼祥传 徐则浩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王实味——野百合花 黄昌勇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王实味全传 张钧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乌兰夫年谱(上卷) 王树盛等主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方志敏传 编写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方志敏全传 方梅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刘少奇传(上、下)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刘少奇年谱(上、下) 刘崇文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黄峥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我的父亲刘少奇 刘爱琴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伟人刘少奇(3卷) 黄裕冲主编 红旗出版社 1998  
 一代公仆刘少奇 柏福临等总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刘少奇冤案始末 黄铮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刘少奇之路 黄铮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刘少奇 王玉强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 陈君聪 华夏出版社 1988  
 刘少奇的思想概述 王爱玲等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刘少奇工运思想研究 陈君聪等 工人出版社 1988  
 刘少奇经济思想研究 魏兴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刘少奇发展战略 陈绍畴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邬正洪等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4  
 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 吴东华等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刘少奇建党思想 周琳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 金春明等 重庆出版社 1993  
 刘仁静 刘威立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朱德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出版社 1986  
 朱德传 金冲及主编 人民出版社等 1993  
 朱德传(修订本)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我的父亲朱德 朱敏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中国元帅朱德 青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朱德经济思想研究 曹学礼等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红军之父(朱德卷) 刘学民等 解放军出版社 2000

- 朱德军事活动纪事(1886—1976) 袁伟等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 江泽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8
- 指点江山:从毛泽东到江泽民 李晓文等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8
- 江总书记抓党建重要活动记略 江金权 人民出版社 1998
- 任弼时传(修订本) 章学新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李大钊 张静如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李大钊年谱 编写组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张静如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李大钊传略 尚恒其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 李大钊思想研究 吕明灼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
- 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朱成甲 人民出版社 1999
- 李立三传 唐纯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 李立三全传 唐纯良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9
- 李先念传 朱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 李克农传奇 姚一泽等 新华出版社 1999
- 红色情报王李克农 殷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 李时雨传奇 李武魁等 新华出版社 2000
- 阮啸传 元邦建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 陈云经济工作方法艺术 陈光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 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陈光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 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刘凤歧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陈云在延安 刘家栋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陈云年谱 朱佳木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陈云之路 叶永烈 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 陈延年 黎显衡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陈永贵传 映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
- 张太雷 林鸿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 张太雷 伊里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 张闻天传 程中原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 张闻天思想研究(东北工作时期) 施寒松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 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 李涛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 张鼎臣传 编写组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 周恩来传(1898—1949)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年第1版  
1998年修订版

- 周恩来传(1949—1976)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周恩来年谱(1989—1949) 力平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等 1989年第1版  
1997年修订版
-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力平等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 周恩来的卓越贡献 石仲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 周恩来经济评传 聂锦芳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 贾启玉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 周恩来军事生涯 力平等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实 编写组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姜爱凤 重庆出版社 1998
- 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 陈雪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力平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年第2版
- 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 胡华等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
- 周恩来行政理论与实践 李世英主编 红旗出版社 1995
- 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刘德军等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 周恩来教育思想 陈廷伟等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 刘焱等主编 重庆出版社 1993
- 周恩来的艺术世界丛书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 周小舟传 编写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周逸群传记 姜之铮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林伯渠传 编写组 红旗出版社 1986
- 林海云传 高峰主笔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 赵世炎传 姚仁隽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 胡耀邦传 出国良等主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新华出版社等 1998
- 项英传 王辅一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挥代英传记 田子渝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 挥代英传 张羽等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5
- 夏明翰 吕芳文等 人民出版社 1984
- 高君宇传 牛崇辉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 徐特立传 陈志明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 徐特立 杜草雨 人民出版社 1987
- 梁广大珠海为官十六年 茹晴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 萧楚女 黎显衡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2

- 萧楚女传 李畅培 重庆出版社 1991
- 彭湃传 蔡洛等 人民出版社 1986
- 曾山传 苏多寿等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曾山传奇 裘立俤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 董必武传记 胡伟章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 董必武年谱 编辑组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 博古传 李志英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 谢觉哉传 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1984
- 谢子长 张锋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 焦裕禄传 陈新等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
- 雷锋传 陈广生 解放军出版社 1983
- 谭震林传 编纂委员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 谭震林传奇 陈利明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 蔡和森传 罗绍志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廖承志传 铁竹伟 人民出版社 1998
- 潘汉年非凡的一生 陈修良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82
- 潘汉年 谭元亨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
- 潘汉年 张天民等 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 潘汉年传奇 张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尹琪 人民出版社 1997
- 瞿秋白年谱新编 周永祥 学林出版社 1992
- 瞿秋白年谱长编 姚守中等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 陈铁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瞿秋白思想研究 丁守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 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 韩斌生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 王明评传 周国全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
- 王明传 曹仲彬等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 王明年谱 周国全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 王洪文兴衰录 叶永烈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9
- 女皇梦——江青外传 朱仲丽 东方出版社 1988
- 陈独秀年谱 唐宝林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陈独秀传(上、下) 任建树、唐宝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陈独秀大传 任建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 曾乐山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 陈独秀思想研究 魏知信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陈伯达其人 叶永烈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0  
 张国焘其人 于吉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张春桥浮沉史 叶永烈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林彪传(上、下) 林清山 知识出版社 1988  
 林彪事件真相 于弓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8  
 姚氏父子 叶永烈 大连出版社 1988  
 康生外传 林青山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 (二)军事人物

- 王树声大将 芦笙 海燕出版社 1987  
 王维舟传 冰昆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4  
 左权传 王孝柏等 人民出版社 1990  
 抗日名将左权 姚仁隽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叶挺将军传 段雨生等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未授衔的元帅叶挺 施士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叶剑英传略 编写组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 薛冶生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叶剑英传 范硕等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刘伯承军事生涯 杨国宇等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中国元帅刘伯承 陈石平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刘伯承传 李曼村等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刘伯坚将军传 陆永久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刘亚楼将军传 杨成青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开国上将刘亚楼 钟兆云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关向应传略 穆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许光达大将 水工 海燕出版社 1987  
 肖劲光大将 张炜等 海燕出版社 1987  
 张云逸大将 罗永平等 海燕出版社 1987  
 张学思将军 刘永路等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张爱萍传 贺茂之 人民出版社 2000  
 和平将军张治中 莫志斌等 团结出版社 2000  
 陈毅传 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陈毅传 蒋洪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中国元帅陈毅 甘耀稷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 陈毅年谱 刘树发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5
- 陈赓大将 穆欣 新华出版社 1985
- 陈赓大将 左波 海燕出版社 1987
- 陈赓大将军 穆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周士第将军传 陈永阿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5
- 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 常建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杨靖宇 于济源 吉林出版社 1980
- 杨靖宇将军传 陈端云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罗荣桓元帅 刘汉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 罗荣桓传 解放军总政治部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 罗荣桓 黄瑶 昆仑出版社 1999
- 罗瑞卿大将 穆静等 海燕出版社 1987
-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 陶骝驹主编 群众出版社 1996
- 罗瑞卿传 黄瑶等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 贺龙传 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 贺龙年谱 李烈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6
- 中国元帅贺龙 水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 贺龙大传(上、中、下) 刘秉荣 同心出版社 1999
- 聂荣臻青少年时代 祁福管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 中国元帅聂荣臻 蔡仁照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 聂荣臻传 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 聂荣臻年谱(上、下) 周均伦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9
- 秦基伟将军 彭荆风 昆仑出版社 1996
- 彭德怀 于光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 彭德怀传 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 彭德怀评传 胡家模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我的父亲彭德怀 彭梅魁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 彭德怀壮烈人生丛书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
- 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 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1994
- 彭德怀年谱 王焰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98
- 在徐帅指挥下 编辑组 解放军出版社 1984
- 徐向前传 于永波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 徐海东将军传 张麟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 徐海东大将 张麟等 海燕出版社 1987  
 粟裕大将 郑乃斌等 海燕出版社 1987  
 粟裕传奇 赵一鸿 成都出版社 1995  
 粟裕大将军 侗枫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谭政大将 乔希章 海燕出版社 1987  
 一代元戎——大将谭政 乔希章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0  
 黄公略将军传 马继善 解放军出版社 1995

## (三) 思想文化人物

- 王实味全传 张钧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邓拓评传 王必胜 群众出版社 1986  
 两弹元勋邓稼先 葛康同 新华出版社 1992  
 田汉传 董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6  
 戏剧魂——田汉评传 刘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孙冶方传 邓加荣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  
 艾思奇传 杨苏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4  
 成仿吾传 编写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成仿吾传 余飘等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华岗传 向阳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李达传记 宋镜明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李达学术思想评传 丁晓强等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李锐其人 宋晓梦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吴阶平传 邓立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茅盾年谱 查国华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5  
 茅盾传 李标晶 团结出版社 1990  
 洗星海传 马可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杨献珍传 编写组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胡风传 马蹄疾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郭沫若年谱(上、下) 龚济民等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1983  
 郭沫若评传 孙党伯 人民出版社 1987  
 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谢保成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夏衍传 会林等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5  
 夏衍评传 陆荣椿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夏衍传 陈坚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 钱学森 祁淑英等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  
 曹禺传 田本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曾乐传 朱尔沛主编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8  
 翦伯赞传 张传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 王学典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聂耳评传 江毓和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7

## (四) 妇女人物

- 丁玲传 周良沛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  
 邓颖超光辉的一生 王月宗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邓颖超传 金凤 人民出版社 1993  
 向警予传 戴绪恭 人民出版社 1981  
 江竹筠传 卢光特等 重庆出版社 1982  
 许广平的一生 陈漱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冰心传 卓如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冰心评传 万近平等 重庆出版社 2001  
 宋庆龄年谱 尚明轩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宋庆龄传 吕明灼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宋庆龄传 尚明轩等 北京出版社 1990  
 宋庆龄全传 陈廷一 青岛出版社 1996  
 宋庆龄与二十世纪 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管会等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9  
 张志新传 张书坤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瑞草青青:张瑞芳传 姜金城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杨开慧 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1978  
 贺子珍的路 王行娟 作家出版社 1985  
 井冈杜鹃红——贺子珍风雨人生 王行娟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蔡畅传 苏平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0

## (五) 类 传

- 中共党史人物传 胡华等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等 1980—  
 革命烈士传 温济泽主编 人民出版社等 1985—1991  
 中共一大代表丛书 郑惠等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共和国领袖生活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邓力群等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 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上、下) 郭德宏等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 新中国大使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 共和国英雄丛书 汤更生主编 团结出版社 1998—
- 解放军将领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4—
- 解放军英雄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 解放军烈士传 编委会 长征出版社 1988—
- 中共军事人物传记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 十大将传记丛书 海燕出版社 1987—
- 中国元帅系列丛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 将帅风云录丛书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1996—
- 一代元戎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 父辈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晋阳学刊编辑部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文献杂志编辑部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编委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 重庆出版社 1998—
- 共和国的脊梁：“两弹一星”功勋谱 李迅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 二、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大事记(1921—2000)

## 凡 例

一、本大事记辑录的主要内容如下：

1. 重要的党史事件。
2. 党史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建立(省市级以上)。
3. 党史学术会议举行(省市级以上)。
4. 党史报刊创刊(省市级以上)。
5. 重要党史论著发表出版。
6. 党史专家、学者逝世。
7. 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相关内容酌收。

二、本大事记资料截止 2000 年 12 月。

三、“△”表示与上一条时间相同。

## 一九二〇年

5 月 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

△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

## 一九二一年

6 月 10 日 张太雷写成《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论述了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6 月 瞿秋白、李宗武写成《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9 月 1 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理论书籍，由李达主持。

## 一九二二年

1 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出版。

9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在上海创刊，蔡和森主编，亚东图书馆印行。

### 一九二三年

6月15日 《新青年》改为季刊,迁至广州出版。瞿秋白任主编,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刊物。

7月1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创刊。瞿秋白任主编。1924年2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

### 一九二四年

2月22日 陈公博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通过。

5月 中共三届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强调要设立党校,培养人才。

### 一九二五年

1月 中共四大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强调要设立党校。

6月4日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份报纸——《热血日报》在上海出版,由瞿秋白主编。1925年6月29日停刊。仅出版了24期。

10月 中共四届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开办普通党校和高级党校。在此前后各省区先后开办了党校。党校中开设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

年底 蔡和森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开始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大概至1926年4月底才作完这个党史报告。

### 一九二六年

9月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出版。

本年 恽代英写成《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并印行。

### 一九二七年

2月16日 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月 瞿秋白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4月11日 瞿秋白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交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出版,并写了序言。

9月22日至23日 蔡和森在中共顺直省委改组会议上作《党的机会主义史》报告。

10月24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在上海创刊。

### 一九二八年

11月20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共出126期,前23期是周报,后103期是3日报。1930年8月2日停刊。同月15日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1931年2月14日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同年3月9日改名《红旗周报》,恢复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 一九二九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党内秘密刊物《党的生活》创刊。

12月18日至1930年6月8日 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和中国劳动大学作《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报告。

### 一九三〇年

1月至2月1日 李立三作《党史报告》。

3月底 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脱稿。修改后,1931年7月出版。

6月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3章写成,原拟写30章,未能全部完成。

### 一九三一年

3月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旗周报》创刊,1934年3月1日终刊。共出64期,另有附刊13期。

12月11日 《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原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每周出版一期。1933年2月,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机关报。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

本年 蔡和森写成《中国革命史》。

### 一九三三年

3月13日 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第一任校长由任弼时担任。

4月9日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江西瑞金成立。

6月18日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江西分会成立。

### 一九三五年

1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11月25日 《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复刊。

### 一九三六年

1月27日 为纪念“一·二八”,瓦窑堡举行了阅兵式,中共中央领导出席了阅兵大会。

7月 美国记者斯诺到达陕北,对中共领导人及红军进行了考察、采访,历时三个多月。采访后写成的《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2月10日在上海出版。此书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本年 张闻天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完成。

### 一九三七年

4月24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办。1941年8月终刊。

4月 延安解放出版社成立。

△尼姆·威尔斯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后写成《续西行漫记》,1939年出版。

9月9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

12月 《群众》创刊。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发行的机关刊物，华岗任主编。

### 一九三八年

5月5日 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

5月25日至6月3日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演讲。

### 一九三九年

1月15日 八路军政治部编辑的《八路军军政杂志》月刊在延安创刊，刊载毛泽东所写发刊词。该刊为八路军总部的机关刊物。1942年3月终刊。

1月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机关报，兼营书刊出版。

10月4日 《共产党人》在延安创刊，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写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的三个基本问题。”

本年 叶蠡生著《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

### 一九四〇年

1月9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5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期、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9月20日 延安各界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

### 一九四一年

年初 张如心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最早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研究正式产生。1946年出版的张如心著《毛泽东思想与作风》等，是最早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著作之一。

3月 为纪念革命先烈刘志丹同志，陕甘宁边区政府拨专款修建志丹陵。

5月15日 《新中华报》停止出版。16日中共中央的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办。

7月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举行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林伯渠主席发表讲话。

7月 中共中央成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1日，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

10月1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等组成。

12月 《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成书，收入1928年7月



中共六大至 1941 年 11 月间各种文献 556 篇。

### 一九四二年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党校开学。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号召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3 月 30 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上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

10 月 《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编辑出版。

### 一九四三年

7 月 借纪念中共诞生 22 周年之机,刘少奇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一文。

8 月 16 日 周恩来写《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提纲。

本年 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做了题为《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

### 一九四四年

3 月 3 日至 4 日 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为全党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做《关于党的“六大”研究》的报告。

4 月 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所应采取的态度,并对前一阶段党史研究中的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代表中央作了结论。

9 月 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国内编印的第一部毛选,七大以后即进行修订增补,1947 年出版了增订版。

### 一九四五年

4 月 20 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 月 14 日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第二章第二节《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较早、较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理论问题。

12 月 9 日 延安各界青年二千余人举行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时报》在江苏淮阴创刊。

### 一九四六年

5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在河北邯郸创办,为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1949 年 8 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5 月 16 日 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

本年 解放社出版《奋斗二十年的中国共产党》。

### 一九四八年

11 月 18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各县组织专人收集、编纂革命烈士纪念册,建立烈士纪念馆。

### 一九四九年

2月7日 延安各界万人集会,庆祝平津解放暨纪念“二七”斗争26周年。

6月30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作《论人民民主专政》。

6月 杨弃著《领导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

7月 方且著《中国共产党史纲》。

11月15日 《新华月报》在北京创刊。

### 一九五〇年

3月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负责收集和保管革命历史档案和文物。

6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征集革命文物令》,强调要做好收集革命历史文物及档案文献的工作。

本年 韶山毛泽东故居开放。韶山纪念馆建于1964年,并逐步形成毛泽东生平和业绩展览的重要场所。

### 一九五一年

6月22日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6月30日 中共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亲临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

7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集党史资料的通知》,规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负责“收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并规定“编印党史资料”。

10月12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四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1960年9月出版发行。

### 一九五二年

本年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上海建成。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为一大会址纪念馆题写馆名。

### 一九五四年

2月 《历史研究》创刊。中国社科杂志社主办。

12月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出版。以后多次修订再版。

### 一九五五年

4月 中共中央设立中央档案馆筹备处。

12月27日 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 一九五六年

1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

本年 原中共代表团驻地,南京“梅园新村”辟为革命纪念馆,陈列有关文物和大量图片资料。

### 一九五七年

1月15日 《解放日报》、《学术月刊》等联合邀请上海学术文化界人士四十余人,座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6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7月31日 北京市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大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作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讲话。

本年 原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辟为“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 一九五八年

6月1日 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创刊。陈伯达任主编。

6月17日至19日 上海社联召开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一周年座谈会。有500余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60篇。

12月12日 河北党史编辑委员会成立,“文革”期间停止工作,1981年6月成立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2年10月改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

### 一九五九年

3月 黑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

5月4日 上海社联举行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会。有40余人参加。编辑出版了《五四运动论文集》。

9月28日至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在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各族人民的代表和来自世界83个国家的贵宾出席了大会。

本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成。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在井冈山中心茨坪建成。馆标为朱德题字。

### 一九六〇年

3月 安徽省革命斗争史资料小组成立。1979年成立安徽革命斗争史资料收集整理领导小组,1981年6月成立中共安徽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3月更名为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5月28日 上海历史学会举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35周年纪念会。

## 一九六一年

6月30日 庆祝中共成立4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刘少奇作了讲话。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光荣伟大的四十年》。

## 一九六四年

1月 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理事长俞未平。  
本年 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建成。

## 一九六六年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举行。5月16日通过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几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撤消“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

## 一九六九年

10月1日 首都40多万军民举行了庆祝大会和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

11月12日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11月16日 何干之逝世。何干之原名谭毓均,1906年4月10日生,广东台山县人。著有《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民主时期的资产阶级》等。

## 一九七一年

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文章《纪念中国共产五十周年》。

## 一九七六年

1月8日 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7月1日 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9月9日 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10月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至此“文化大革命”结束。

## 一九七七年

2月7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4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

5月24日 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并于9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6月 中共天津市委决定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东教学楼辟为纪念馆,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1月,叶剑英题写馆名。3月5日“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时代在津

革命活动纪念馆”正式开放。

本年《理论动态》创刊。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办。

### 一九七八年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一九七九年

1月 湖北省党史学会成立。会长郭布云。

2月15日至21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历史人物评价讨论会。

2月 天津市党史研究会成立。会长魏宏运。

3月5日 江苏淮安市“周恩来故居”修复,正式对外开放。

4月 《党史研究资料》(月刊)创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办的第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内部学术刊物,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

5月2日至9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64人。收到论文156篇。

5月 四川省社科院和陕西省社科院在四川巴中县城联合召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

△内蒙古自治区中共党史学会成立。理事长张荣森。

6月11日至16日 为了纪念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五十周年,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厦门大学历史系、上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在上杭县才溪公社,联合举行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代表140人。提交论文32篇。

7月 广东省历史学会对我国过渡时期的历史界限问题进行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成立。设中共党史、李大钊、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四个研究室。

△福建省党史研究会成立。会长明祖凡。

8月 《新闻研究资料》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至1990年7月出至第50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成立。

9月29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华国锋主持庆祝大会，叶剑英作了讲话。

9月 江西省党史学会成立。会长狄生。

10月1日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共党史陈列室在停展13年后，按照历史本来面目作了重要修改，重新展出。

10月25日 北京大学师生集会纪念李大钊诞辰90周年。

10月 《近代史研究》在北京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

11月15日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创刊。由北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编印，为内部刊物。

12月4日至18日 中共党史人物讨论会在广州召开。全国有100名代表参加。会议确定已编写好的中共党史人物传57篇中的10篇作为《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出版。

12月底 上海市历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举行了陈独秀问题的讨论会。

12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广州成立。会长何长工，副会长胡华、李新。

本年 以下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成立：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广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

### 一九八〇年

1月 广东历史学会组织部分党史教学工作者就彭湃的思想发展问题开展讨论。

△《人物》在北京创刊。人民出版社主办并出版。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创刊。1982年起国内发行。1988年起与《党史通讯》合并，改出《中共党史研究》。

△云南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刘蕃。

2月26日至28日 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举行了党史工作座谈会，研究编写福建省党史人物传记工作。

3月25日 北京史学会党史、现代史组举行党的“八大”问题讨论会。

3月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筹备会议在兰州召开。

△山西省党史学会成立。

△刘少奇故居开放。1983年邓小平为刘少奇故居陈列室题匾。

4月14日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在湛江地委党校举行南路地区党的历史问题座谈会。

4月14日至17日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

4月29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在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由胡耀邦、

彭真、粟裕、胡乔木、陆定一、李维汉、程子华、杨尚昆、王鹤寿、安子文、姚依林、冯文彬组成。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胡乔木任主任。

4月 江苏省革命斗争史编纂委员会成立。

5月7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由冯文彬任主任委员。以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县三级相应地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办事机构。

5月8日至12日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在陕西汉中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5月 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编而成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负责编辑出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著作，研究、编写这些领导人的生平传记、年谱、纪念文集等。负责编辑出版中共中央的文献资料等。

△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出版。

△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蔡康志。

△浙江地方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成立。1981年7月更名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2年7月改名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5月26日至6月1日 由华东师大、北京师大、东北师大、安徽大学、安徽师大、杭州大学、郑州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筹备，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6月初 江西现代史研究会在南昌县莲塘召开彭德怀在江西革命活动讨论会。

6月19日 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研究会在合肥举行专题讨论会，讨论陈独秀的早期革命活动，交流关于陈独秀的学术资料和有关情况。

6月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王学启。

7月1日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成立。

7月18日至26日 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351人，收到论文80多篇，专题资料、人物传略等20多篇。大会选举冯文彬为中共党史研究会会长。

7月 《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创办。后改名为《四川党史研究资料》、《四川党史月刊》。1991年起又改名《四川党史》。

8月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

△坐落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小平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9月10日至11日 上海市社联举行“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大型理论研讨会。

10月 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管文蔚。

△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徐乃杰。

10月初至11月初 中共中央党校在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召开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

11月7日至12日 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在安徽六安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重

点探讨了鄂豫皖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肃反三个问题。

11月17日至23日 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年会在福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80人。年会收到专题文章24篇。着重讨论了大革命时期的党史和党史人物。

11月 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会长杨第甫。

12月6日 首都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45周年和“一二·一”运动35周年。

12月28日 《周恩来选集》上卷(收入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在全国发行。以后,下卷(收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也于1984年11月出版。

12月 广西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会长黄耽。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本年 以下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成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江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青海省中共党史学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党史学会、天津市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研究会。

### 一九八一年

2月22日至26日 湖北省党史学会在汉口省委党校内召开了1980年学术年会,到会代表140余人,收到论文40余篇。

2月 《历史档案》(季刊)创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联合主办。

3月26日至28日 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会民主革命组在郑州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举行专题讨论会。

3月 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刘导生。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

4月 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会长何定华。

△福建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成立。

5月5日至10日 河南省中共党史学会在河南师大举行纪念中共诞生60周年学术讨论会。

5月21日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安徽芜湖举行年会,讨论和研究了“皖南事变”的发生和历史教训。

5月28日至30日 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在成都成立。会长陈文。

5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重庆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讨论党史人物传记编写规划。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成立。1983年9月更名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研究室。

6月11日至13日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和广东历史学会联合召开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会期间,正式成立了广东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陈遐瓚。

6月14日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1984年更名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6月27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6月 吉林省中共党建学会成立。理事长岳林。

7月1日 首都各界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庆祝中共成立 60 周年。

7月22日至23日 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宁夏历史学会在银川举办建党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

7月23日 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调查委员会成立,陈沂任主任。

8月1日至8日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大连召开。

8月10日至20日 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8月 湖南省中共党的建设学会成立。会长卢延楨。

9月7日 《安徽党史资料通讯》由安徽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创办,系内部刊物,月刊。1985年1月改名为《安徽党史通讯》。1988年改名为《安徽党史研究》,并改为双月刊,国内公开发行。1994年又更名为《党史纵览》。

9月7日至8日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浙江分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

9月15日至19日 由辽宁社科院、辽宁历史学会和辽宁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的,全国“九·一八”事变史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

9月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成立。

10月21日至25日 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在河南省信阳市举行年会。

10月 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会长盛华。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成立。

11月4日至10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学术讨论会在延安召开。

11月9日 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年会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江苏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 400 余人,大会收到论文 30 多篇、资料 20 多件。

11月20日至25日 江西省社联在瑞金召开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

12月1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江岚。

12月25日至28日 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 1981 年年会在汉口举行。

12月 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高志亭。

△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会长胡晓琴。

本年 《历史档案》(季刊)创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江西党史通讯》创刊。1988年改为《江西党史研究》，1990年起更名为《党史文苑》(月刊)，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以下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成立：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新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青海省工运研究会。

### 一九八二年

1月10日 《刘少奇选集》上卷(收入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在全国发行。以后下卷(收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于1985年12月出版。

1月 《湖南党史通讯》在长沙创刊。1987年改名为《湖南党史月刊》。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

△《福建党史资料通讯》在福州创刊，1985年1月改名为《福建党史通讯》，1988年1月《福建党史通讯》与《革命人物》合并为《福建党史月刊》。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2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编辑出版内部刊物《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资料》以刊载新征集到的党史重要资料为主，另外还转载和介绍国内，包括台港及国外各种书刊上发表的有价值的党史资料。

△《天津党史通讯》创刊，1989年1月更名为《党史资料与研究》，由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1997年3月又更名为《天津党史》，由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云南省中共党的建设学会成立。会长陈盛年。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正式出版。至1987年出齐，全书14册。

3月 湖南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会长谭双泉。

5月3日至7日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主办的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

5月27日至31日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和省党史学会在信阳举行地方党史学术讨论会。

7月 湖北省中共党的建设学会成立。会长杨青。

9月22日至30日 全国革命根据地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历史问题，收到各地送来有关各革命根据地历史方面的论文、专题报告140多篇。

10月25日 《徐特立研究》创刊。由湖南省教育学会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组、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主办。1990年起由湖南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与广州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合编。

10月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镇江举行年会。年会着重讨论了华中抗日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建设等问题。

12月8日 广东历史学会、广东中共党史研究会在暨南大学联合举行纪念广州起义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15篇学术论文。

本年 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四川省青年运动史研究会成立。

### 一九八三年

1月 湖北省总工会与湖北省党史学会在武汉举行纪念“二七”斗争60周年学术讨论会。

2月 《贵州党史通讯》创刊。原名为《贵州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2月更名为《贵州党史研究》。

3月 福建省中共党的建设学会成立。会长傅大文。

△李新领衔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长编》第一卷《伟大的开端》出版。至1997年12卷全部出齐。

6月27日 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60周年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广东和首都、河南等地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者和教学人员100多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48篇。

6月 贵州省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会长冯玉理。

7月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一版。

△《纵横》在北京创刊。初为季刊，1985年改为双月刊。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8月1日 《毛泽东思想研究》（季刊）创刊，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主办。

8月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

10月25日至29日 川滇黔边武装与党的建设史料协作会议在四川省宜宾市举行。

11月18日 为迎接毛泽东诞辰90周年，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经过调整和充实，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馆牌。

11月20日至24日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长沙举行学术讨论会。

11月 1981年分别成立的山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山西省委中共党史研究领导小组合并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2月14日 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成立，会长张承宗。

12月17日至20日 河南中共党史教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共党史教学讨论会在河南新乡举行。

12月19日至26日 全国党校党史、党的建设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

12月26日 毛泽东诞辰9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前往毛主席

纪念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在此前后,理论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讨论会、毛泽东军事思想讨论会、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以及党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讨论会。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设立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正式开放。

12月 甘肃省中共党史研究会成立。会长王秉祥。

本年 以下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成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共吉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沈阳市中共党史学会、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

△《军事历史》创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办,1987年起国内公开发行。

### 一九八四年

1月16日 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主办纪念中国国民党一大60周年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60多人与会,收到论文40余篇。

2月15日 《陈云文选》(1926—1949年)出版发行。同年7月15日《陈云文选》(1949年—1956年)在全国发行。

3月1日至4日 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召开了首届年会。出席会议的代表600余人,提交论文100余篇。

4月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成立。

5月5日至10日 江苏中国现代史学会主办的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镇江举行。

5月6日至10日 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安徽分会在金寨县召开皖西根据地创建和发展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7月25日至29日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6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来自各地党史研究、教学及出版工作者90多人,会议收到论文近50篇。

8月1日至4日 由南开大学主办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外专家学者有90多人,收到论文60余篇。

8月30日至9月3日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第六次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125位党史工作者和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10月1日 首都举行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50万军民参加庆祝活动。

10月6日至12日 由湖南总工会主办的湖南劳工史学术讨论会在大庸举行。

10月11日至16日 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乐亭县召开。

11月13日至18日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抗日根据地学术讨论会在江苏镇江举行。

11月22日至27日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汕头市委党史领导小组、广

东中共党史学会汕头分会在汕头市联合举办了周恩来在潮汕革命活动学术讨论会。

12月5日至10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

本年 《党史资料通讯》在北京创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月刊，内部发行。

本年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黑龙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云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长春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河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安徽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呼和浩特市党史党建学会、宁波市中共党史学会。

△《广东党史通讯》继承《党史资料通讯》出版。1990年3月起改名为《广东党史》，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双月刊。

### 一九八五年

1月1日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在全国发行。

1月13日至17日 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遵义召开。100多人与会，收到论文80多篇。

4月11日至16日 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川东暨重庆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

4月20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和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第三次学术讨论会。

4月22日至26日 安徽省在安庆召开第四次全省党史工作会议。

4月23日至25日 成都军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

4月 《党史文汇》(双月刊)在山西太原创刊。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5月7日至10日 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党史学会和党史人物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蔡和森思想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50多人与会，收到论文39篇。

5月27日至31日 上海历史研究所举办纪念五卅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

5月 浙江省党史学会在杭州举行学术讨论会，重点讨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党史问题。300余人与会。

6月18日 瞿秋白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6月20日至22日 由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历史学会联合发起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的60余名学者提交了反映河南抗战论文66篇。

6月20日至23日 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党史学会联合召开的留法勤工俭学史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

6月21日至22日 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历史学会和国际共

运史学会在西安联合举行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120 人出席会议,收到论文 80 多篇。

6 月 22 日至 26 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会等十一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瞿秋白就义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常州市举行,150 多人与会,入选论文 120 篇。

7 月 1 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举行小型学术讨论会,探讨抗日战争的有关问题。

7 月 7 日至 11 日 四川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210 人出席会议,提交论文 129 篇。

7 月 10 日至 16 日 河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阜平县召开。史学界 180 多名学者出席。提交论文、专著 130 多篇。

7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 山东省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泰安举行。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 安徽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滁县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 138 名,收到论文 88 篇。

8 月 12 日至 16 日 由华中师大与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联合举办纪念恽代英诞辰 90 周年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 50 多人,提供论文 38 篇。

8 月 19 日至 24 日 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研究会联合组织召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全国 600 多名学者出席,收到论文近 130 篇。

8 月 20 日至 23 日 江苏省纪念抗战胜利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130 余人与会,收到论文近 130 篇。

8 月 甘肃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会长燕斌。

△《民国档案》创刊。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办。季刊。

9 月 2 日至 3 日 广东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 40 周年学术讨论会。250 多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 104 篇。

9 月 21 日 民国史研究协作委员会主办的胡汉民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9 月下旬 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重庆举行。

10 月 14 日至 18 日 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学术讨论会在诏安县举行。125 名代表与会,提交论文、资料 61 篇。

11 月 2 日 上海社联举行“一国两制”问题学术讨论会。

11 月 17 日至 23 日 中国现代史学会在成都举行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11 月 23 日至 27 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 50 周年座谈会。

11 月 26 日至 29 日 江西省党史学会与华中师大举办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史学讨论会在宁都召开。40 余人与会,收到论文 40 多篇。

12 月 2 日至 6 日 昆明举行“一二·一”运动学术讨论。102 人与会。

12月4日 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高校中共党史课教学协会、共青团北京市委青运史研究室联合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学术讨论会。50多人与会，收到论文20多篇。

12月16日至22日 东北三省青运史协作工作首次年会在长春举行。

12月23日至28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和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在西安联合召开毛泽东思想学术讨论会。全国60多位学者和教师与会。

本年《地方革命史研究》创刊。1992年7月该刊更名为《党史天地》，由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河北省工人运动研究会、黑龙江省工人运动研究会、山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江苏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安徽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山东省统战理论研究会、河南省统一战线理论学会、湖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陕西省统战理论学会、甘肃省统战理论研究会、青海省统战理论研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战理论研究会、沈阳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福建省青年运动史研究会。

### 一九八六年

1月1日 全国唯一党史专业报纸——《党史信息报》正式创刊，由上海市党史学会和空军政治学院主编。

1月4日至6日 《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丛书编纂协调会议在北京召开。

1月 《河南党史研究》国内公开发行。继承1980年创办的《中共河南党史资料工作通讯》，1985年改名为《河南党史通讯》。1992年1月改名为《党史博览》(月刊)。

3月4日 西安事变研究会在西安成立。

3月5日至8日 由湖北省社联和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共同举办的董必武学术讨论会在湖北省红安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党史工作者44人，提交论文40篇。

3月27日至31日 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全国29个省、市、区130多位有关负责同志到会。

3月 《毛泽东思想研究通讯》(季刊)在长沙创刊。同年10月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成立，即为该会会刊。1989年1月起更名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

4月14日至19日 “黔东事变”史料研究会在贵州省施秉县召开。

5月6日至9日 首次汪伪政权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3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提交论文17篇。

5月10日至11日 北京地区高校党史研究生在北师大召开了学术交流会。

5月12日至17日 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主持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学术讨论会在巫山召开。收到论文35篇。

5月29日至31日 北京市党建研究会举行党风问题讨论会。

5月 《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季刊)在长沙创刊。由长沙工程兵学院毛泽东军事思

想研究会主办。

6月4日至7日 河南省革命根据地货币讨论会在信阳市召开。参加会议代表30余人。收到论文及资料27篇。

6月12日至13日 解放区广播史讨论会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

6月15日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陈云文选》第三卷(1956年至1985年)出版发行。

6月26日至27日 由湖北新四军研究会主持的,中原突围4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7月9日 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在广州举行纪念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60周年学术讨论会。

7月25日至8月6日 华东六省一市党史学会协作组、空军政治学院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国革命史教学研讨会。各地高校教师及理论工作者52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7月28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一批博士生导师。其中,党史学界新增五位博士生导师。他们是:中共中央党校马齐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专业),彦奇教授(中国民主党派史专业);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中共党史专业)和东北师范大学郑德荣教授(中共党史专业)。此前已经招生的博士生导师有: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中共党史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新研究员(中华民国史专业)。

8月18日至23日 “九一八”事变5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辽宁省金县召开。

8月 中央文献编委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16日至22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在安徽大学召开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9月26日至29日 河南省信阳市召开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收到论文25篇。

△江西省南昌市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120多人与会,收到论文80余篇。

10月中旬 全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成立。

10月16日 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经历过长征的140多位红军老战士和100多位长征历史研究工作参加了讨论会,会上交流了80多篇论文。

10月22日 首都各界人士和红军老战士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50周年。

10月22日至26日 由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等四个单位联合筹办的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在黎平县城召开。近60名代表与会,收到论文63篇。



10月24日至28日 山东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史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

10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两册)出版发行。

11月4日至5日 湖北省委党校举行邓子恢农业思想理论讨论会。

11月14日至17日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和湖北省党史学会在武昌举行纪念北伐战争胜利和武汉国民政府成立60周年学术讨论会。110余人与会,提交论文80余篇。

12月1日 首都各界人士五千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

12月7日至12日 首次朱德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南充市举行,全国史学界的15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

12月底 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市党史学会联合举办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城市工作学术讨论会。

本年 《中央档案馆丛刊》创刊,中央档案馆主办。

△《军事历史研究》创刊,空军政治学院主办。

△《湖南统一战线》创刊,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主办。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江西省党建学会、广西党的建设学会、哈尔滨市党建学会、广州市党建学会、湖南省工人运动研究会、江苏省工人运动研究会、广东省工人运动学会、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广东省统一战线研究会、广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贵州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天津市统战理论研究会、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成都市党史研究会。

### 一九八七年

3月20日至24日 由上海市档案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的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3月 《湖北党建通讯》创刊。湖北省党建学会主办。

4月3日至6日 中央苏区工运史编写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

4月15日 中央文献出版社成立。

4月23日至24日 《党史研究》编辑部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一次党史新探小型学术座谈会。

4月23日至26日 廖仲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中外学者88人,提交论文53篇。

4月24日 《红旗》杂志社、《学习与研究》杂志社、北京市社联主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5月20日至24日 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延安召开首次学术讨论会。与会160人。收到论文120多篇。

6月11日 上海社联举行首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与会80多人。

6月11日至15日 全国党校第六届哲学年会暨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在昆明举行。

6月22日至26日 中国抗日战争专题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收到论文70多篇。

6月20日至25日 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天津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平津抗战学术讨论会。

6月22日至23日 全国中共党史学会、《党史通讯》编辑部、《党史研究》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党史史学理论小型学术座谈会。

6月25日至27日 中国史学会和北京历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学术讨论会。全国十个省市76名代表与会,提交论文36篇。

6月25日至30日 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山东大学联合召开的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来自全国近5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三名日本历史学家作了学术报告。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

6月30日 上海举行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约50名学者与会。

7月4日 七七事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主办。

7月5日 广东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学术讨论会。

7月6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芦沟桥畔揭幕,王震、胡乔木等党政军领导和首都各界群众出席落成典礼,杨尚昆在典礼上讲话。

7月7日 首都集会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代表出席,胡绳在会上发表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史为鉴》。

7月20日至25日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和军事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共90人。收到80多篇论文。

7月26日至31日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七七抗战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青岛举行。各地代表129人出席会议,提交论文97篇。

7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首都集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赵紫阳主持大会,杨尚昆发表讲话。

8月1日 江西南昌市集会庆祝建军60周年,肖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大会上讲话。

△胡乔木在看望全国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学员时强调,记录党的历史应从实际出发。

8月3日至18日 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讲习会在大连举行。

8月7日至1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工运史首次研讨会，在吉林敦化举行。

8月21日至2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延安举行。与会代表132人，提交论文93篇。

9月5日至9日 辽宁大学张学良研究会主办张学良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行。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学会主办的纪念湘赣边秋收起义60周年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9月15日至18日 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昌举行。会议由江西省社联、省委党校等单位联合发起，与会代表10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

9月26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举行当前党史科研学术动态信息交流会。

10月22日至27日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理论与实践讨论会在江西九江举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

10月 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的倡导下，全国部分高校党史研究生举行了小型学术讨论会。

11月2日至5日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办、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学生运动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参加会议60余人。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

11月3日至7日 四川省召开第二次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座谈会。

11月4日至7日 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华东师大政教系、杭州大学政教系主办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11月14日 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会长为李佐长。

11月23日至30日 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党史研究会及汕头市委和汕头大学在汕头大学召开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100余名党史工作者与会，研讨建国后“前七年”党的历史问题。

11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出版，至1998年1月十三册出齐。

12月14日 胡华逝世。胡华原名胡家骅，1921年12月生，浙江奉化县人。著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中共党史人物传》等。

12月26日 上海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成立。

本年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西省工人运动研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人运动研究会、湖南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重庆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民国春秋》(双月刊)在南京创刊。

## 一九八八年

1月5日 上海社联举行党的十二大有关理论问题座谈会。

1月15日 《党的文献》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该刊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由《文献与研究》与《中央档案馆丛刊》合并而成。

1月25日 《中共党史研究》(双月刊)创刊。该刊由《党史研究》与《党史通讯》合并而成,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

1月 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双月刊——《江西党史研究》创刊,并公开发行。薄一波为该刊题写刊名。

2月 于1979年创刊的《党史资料与研究》改名为《党史教学与研究》(双月刊),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中共党史研究会主办。

3月5日至7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与会107人,收到论文85篇。

4月12日至14日 湖南省委党史征委会在长沙召开纪念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学术讨论会。

5月17日至21日 南方十五城市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协作会在沪召开。

5月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党史月刊——《党史博采》创刊。

5月30日 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7月1日《求是》(半月刊)杂志创刊,邓小平题写刊名。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在6月16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

6月下旬 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吉安地区党史学会及吉安县党史办联合在吉安市举行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史学讨论会。

6月28日至7月4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和东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在长春举行。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50多篇论文。

7月5日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抗日战争史首展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7月23日至27日 全国第二次《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史料丛书编纂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市召开。

7月25日至29日 全国第二次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7月26日至30日 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和东北师范大学在长春联合召开学术讨论会,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到会学者70余人,提交论文近50篇。

7月 《毛泽东思想论坛》(季刊)创刊。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和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

会主办。

△《中华儿女》创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8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发出通知，决定撤消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建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任主任。

8月21日至24日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在山西省太原市联合召开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

8月22日至28日 华北地区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9月21日至27日 军队院校在南京政治学院召开中国革命史教学研讨会。来自四十余所军队院校的5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

10月6日至8日 由浙江省党史学会、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省委党校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浙江地方党史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8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51篇。

10月18日至21日 南开大学主办的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60多位中外学者与会。

10月24日 淮海战役学术讨论会在徐州举行。

10月26日 《联共党史》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1月7日至9日 抗战时期国统区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重庆召开。

11月10日至15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39家科研、教学单位的76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论文约40篇。

11月14日至18日 国共两党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11月17日 纪念刘少奇90周年诞辰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琪主持座谈会。

11月24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作党史研究新动态学术报告。上海市300多位党史(革命史)教学、科研及党史征集的同志参加报告会。

11月25日至27日 为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共同举办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87人。收到80多篇论文。

11月28日至30日 首届全国党史专业研究生学术讨论会及导师经验交流会在杭州大学举行。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的80多名研究生及其导师出席会议。

12月1日至9日 全国党校第四届年会在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召开。中央党校、27所省市自治区党校及8所计划单列市党校56名代表出席会议。收到论文40多篇。

12月18日至22日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京举行。入选论文191篇。

12月29日 上海市党史学会举行刘少奇学术讨论会。会上交流了81篇论文。

12月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成立。

本年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学会、贵阳市中共党史学会、内蒙古自治区党的建设研究会、河南省党建学会、福建省工人运动研究会、长春市工运研究会、南京市工人运动研究会、天津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

△《云南统一战线》创刊。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和云南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主办。

△《江苏统战》创刊。江苏省委统战部和江苏统线理论研究会主办。

### 一九八九年

1月23日至25日 为纪念平津解放40周年，北京和天津的党史学会、研究会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

1月 由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主办的《中共党史通讯》(半月刊)创刊并公开发行。

△《瞿秋白研究》(年刊)创办。瞿秋白纪念馆主办。

2月10日 重庆市档案馆主办《档案史料与研究》(季刊)创刊。

3月2日至3日 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收到论文50篇。

3月25日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全市党史工作会议，江泽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出席并作讲话，要求充分认识党史工作的重要性，增强搞好党史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

3月 《党建研究》创刊。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主办。月刊。1991年起，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主办。

4月8日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4月21日至23日 由江苏省委党史工委、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江苏省党史学会和南京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渡江战役暨南京解放4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师大召开。110多名与会者向大会提交了71篇论文。

4月27日至29日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5月9日至10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座谈会在京召开。

5月13日至24日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在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历史研讨班。260多人参加研讨班。

5月15日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办、武汉市委党史办和湖北省党史学会、武汉市党史学会在汉口联合举行纪念武汉解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50多人，提交17篇论文。

5月26日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市总工会、市档案馆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上海人民迎解放——纪念上海解放40周年史料展览》在上海美术馆正式开展。

5月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出版第一版。

△《红岩春秋》创刊。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1991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

8月18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决定，原来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改为党中央主办。

9月20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举办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40年学术讨论会。

9月29日 首都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杨尚昆主持大会，江泽民发表讲话。

10月16日至18日 纪念瞿秋白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常州召开。入选论文41篇。

10月17日至20日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宛平举行。

10月22日 叶剑英元帅纪念馆在广东省梅县举行开馆典礼。杨尚昆题写馆名。

10月23日 江西省井冈山精神研究会在南昌成立。

10月28日 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

10月29日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纪念李大钊一百周年诞辰史料展览，为期一个月。

10月29日至11月1日 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代表近百人，外国学者6人。收到论文近百篇，入选论文67篇。

11月12日至17日 中国工运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湖北宜昌召开。

11月14日至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

11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宣部《党建》杂志日前召开纪念古田会议60周年会议座谈会。

11月27日至12月1日 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在宁波举行。

12月20日至23日 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建国4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105名党史工作者与会，提交论文101篇。

本年《辽宁统一战线》创刊。1991年起改名为《统战月刊》。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江苏省党的建设学会、海南省党的建设学会、安徽省鄂豫皖边区革命史研究会、山东省工人运动研究会、河南省工人运动研究会、贵州省工人运动研究会、昆明中共党史学会、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

### 一九九〇年

1月7日 皖南事变50周年纪念大会在安徽泾县召开。

1月9日至11日 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在瓮安县主持召开纪念猴场会议55周年学术讨论会。省内40余名党史工作者出席会议。收到论文29篇。

2月20日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双月刊)创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1996年12月20日出1996年第6期(总第42期)后停刊。

3月8日至13日 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3月 中国国民党史教学与研究座谈会召开。

4月10日 南通市中共党史学会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60周年学术研讨会,江苏省党史工作者70多人出席会议。收到论文29篇。

4月14日至16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南地区党史学术协作会在武汉召开。

4月21日 中共广州市委决定成立党史领导小组和党史研究室。

5月18日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京成立。大会推举彭真为研究会名誉会长,马文瑞当选为会长。

6月5日至10日 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市召开。

6月11日至15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与天津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第六次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4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论文30余篇。

6月12日 中国管理科学院在北京召开陈云同志论著研讨会。

6月12日至15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联合举办“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党史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280多篇。

6月15日至16日 广东中共党史学会与广东省总工会联合举行省港罢工65周年学术讨论会。

6月19日 上海市党史学会举行“鸦片战争与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

7月 《毛泽东早期文稿》出版。

7月30日至8月1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东北师大召开。到会120余人,收到论文191篇。

8月3日至8日 华北地区中国现代史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召开。

8月6日至10日 中国现代史学会东北地区分会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吉林召开。

8月16日至18日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在郑州召开三大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专题研讨会。

8月21日至24日 中共南方局党史学术讨论会在四川省成都召开。

8月24日至27日 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在北京共同举办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142篇,入选75篇。

8月 第一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

9月17日至20日 抗美援朝四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9月16日至19日 新四军历史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与会代表56人,收



到论文 34 篇。

10月20日至23日 首届全国党史报刊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

10月22日至24日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4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10月22日至26日 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江西省中国现代史学会举行第三届会员代表会议。

10月23日至29日 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延安精神理论研讨会分别在西安和延安举行。各地宣传、理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100余人与会。收到论文230余篇,入选论文60篇。

10月30日至11月2日 张澜生平与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南充举行。

10月 纪念华中抗日根据地学术会在江苏省盐城市召开。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南充召开“邓小平的思想学术讨论会”。

11月16日至17日 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学会举办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学术研讨会。

11月 “中国国民党性质”研讨会召开。

12月1日至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12月15日至17日 闽、浙、赣、湘、皖、苏、鲁、沪八省市第一次党史协作座谈会在安徽芜湖市举行。

本年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海南省中共党史学会、西宁市中共党史学会、青海省党建学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建学会。

《山东统一战线》创刊。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和山东统战理论研究会主办。

### 一九九一年

1月10日至12日 首届北京地区抗日斗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举行。

1月20日 《四川党史》(双月刊)出版改刊第一期。《四川党史》创刊于1980年7月,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原名《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2年1月更名为《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1月又更名为《四川党史月刊》。

1月23日至25日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1月29日 瞿秋白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常州市举行。

4月1日至2日 上海召开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作者和有关方面负责人250余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200余篇。

4月17日至19日 新四军历史事件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主办,在洛阳举行。来自全国九个省市的学者及新四军老战士80余人到会,共收到论文44篇。

4月23日至28日 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在京举行。

5月8日 由西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120人与会,收到论文150余篇。

5月18日至20日 中央统战部在桂林召开全国对资改造研讨会。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55人出席会议。

5月21日至24日 由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等十多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与会123人,收到论文60多篇。

5月30日至6月3日 由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党史研究室、党校和党史学会联合召开的京津沪党史界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收到论文近130篇。

6月25日 中共一大会址之一——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落成,邓小平题写馆名。

6月28日 新华社报道: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50卷。

6月 《毛泽东选集》1至4卷第二版出版。

△西柏坡精神研讨会在河北省举行。

6月27日至7月1日 全国党史部门工作交流会、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200人与会。180篇党史优秀论文获得中共党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证书。

7月1日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一万余人出席,江泽民发表长篇讲话。

8月1日至4日 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80余名中外学者与会,收到论文70篇。

8月13日至17日 东北地区部分城市第二次党史工作协作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8月26日 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

9月10日至14日 由全国领导科学学会、东北三省领导科学学会发起,全国毛泽东领导思想研讨会在沈阳市召开。80余人与会。应征论文达300余篇。

9月14日至18日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北京、辽宁、吉林、南京、广东等地分别举行各种座谈会、学术讨论会和举办展览等活动,出版有关“九一八”事变的专著。

9月17日至20日 “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收到论文80多篇。与会学者100余人。

9月18日 《抗日战争研究》在北京创刊。季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9月21日 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9月23日至27日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和遵义市委联合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在遵义市举行。100人与会。收到论文90多篇。

9月24日至27日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

论会在西安举行。166人与会。

10月8日 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10月11日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心成立。

10月15日 《党建研究内参》创刊。内部刊物。双月刊。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杂志社编。

10月21日至25日 由南京大学革命根据地研究所和政治学系举办的全国革命根据地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110人与会,提交论文130多篇,专著20余部。

10月24日至26日 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京大学等主办,全国第三届国共两党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有100余人参加,共收到论文90余篇。

10月29日至11月3日 京津沪三市第二次党史协作会议在天津举行,近20人与会。

11月5日至9日 由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联合举办的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

12月1日至3日 第二次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在四川仪陇举行。100人参加,收到论文70篇。

12月1日至4日 全国党史报刊会议在长沙市召开。中央机关和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39家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报刊社6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12月4日至5日 中共河南省党史工委在信阳召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史学术研讨会。42人与会。收到论文30篇。

12月11日 首都各界人士举行纪念西安事变55周年座谈会。

12月12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召开党史科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讨论会。

12月23日至25日 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委、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等主办,皖南事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泾县举行。100余人参加,收到论文67篇。

12月23日至27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毛泽东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70人与会,提交论文43篇。

12月26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学术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王洪为主任委员。

本年 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主办的《统战纵横》创刊。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河北省党的建设研究会、河北省青运史学会、内蒙古自治区工人运动史研究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南京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

## 一九九二年

1月5日 《中国统一战线》创刊。

1月6日 周恩来纪念馆在江苏淮安落成,邓小平题写馆名。

1月14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纪念“一·二八”抗战60周年。

1月 由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双月刊)创刊。

1月18日至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

3月5日 《上海党史研究》双月刊面世。其前身是1982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创办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上海党史》)。该刊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2001年1月又改刊为《上海党史与党建》(月刊)。

3月5日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举行“毛泽东与‘毛泽东热’”学术讨论会,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4月25日至26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哈尔滨召开全省地方党史、革命史编纂研讨会。

5月5日至6日 全国张太雷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常州市举行。近百人与会。收到论文36篇。

5月6日至7日 安徽省委党史委召开全省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工作研讨会。

5月6日至8日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区党史大事记编写工作研讨会。

5月13日 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在长春市委党校召开中共党史学术前沿问题座谈会。

6月9日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在杭州成立。

6月14日 首都知识界在京举行“改革开放、强国富民”学术研讨会,座谈邓小平南巡讲话。

6月18日 赤石暴动50周年纪念活动筹委会和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召开赤石暴动理论研讨会。

7月27日 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史工作协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7月28日至30日 七七事变5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8月3日至7日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会等联合发起全国首次“解放战争与东北”学术讨论会在锦州市召开,近90人与会。收到论文70多篇。

8月7日至8日 由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共同主持召开的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集安召开。

8月12日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纪念

“八一三”抗战 55 周年学术研讨会。100 余人与会。

9 月 19 日至 20 日 河北省委组织部在保定新城县举行全省组织史资料续编工作会议。

9 月 26 日至 29 日 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

9 月 28 日 胡乔木逝世。胡乔木 1912 年 6 月 1 日生，江苏盐城县人。著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是新中国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导者。

10 月 9 日至 10 日 第四次哈尔滨党史研讨会暨哈尔滨党史研究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哈尔滨召开。

10 月 15 日 华东地区暨全国城市党刊工作座谈会在沪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 20 家党刊的代表交流了各自办刊经验。

10 月 20 日至 24 日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七次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80 余人与会。

11 月 17 日至 20 日 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上海八省市党史工作协作会议在宁波市举行。

12 月 4 日 刘伯承诞辰 100 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2 月 8 日至 1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150 余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成立大会。

本年 以下学术团体成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北京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广东省叶剑英研究会。

△《统一战线纵横》创刊。1998 年改为《炎黄情》。

### 一九九三年

1 月 4 日至 7 日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 月 26 日 纪念周恩来诞辰 95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绍兴市举行。100 人与会。收到论文 58 篇。

3 月 5 日至 9 日 中共江苏省委、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在南京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 95 周年学术讨论会。300 多人与会。收到论文 54 篇。

4 月 8 日至 11 日 由山东大学、山东社联等单位联合在枣庄市召开台儿庄大战 55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中外专家、学者 140 余人。收到论文 120 余篇。

6 月 2 日至 5 日 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召开。

7 月 8 日 全国第三次朱德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7 月 13 日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市党史工作会议。会议就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编纂和专题研究工作提出了具体设想和工作要求。

7 月 25 日至 31 日 全国邓小平教育思想研讨会在山东烟台举行。

8 月 24 日至 26 日 第三届全国党史报刊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来自中央和地方

的33家党史报刊负责人和编辑出席会议。

9月21日至25日 第三次京津沪党史工作协作会议在沪举行。

9月23日至24日 海南省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在海口召开。

9月24日至28日 华东地区第四次党史工作协作会议在山东烟台举行。

9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大学举行。50人与会。

10月20日至22日 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海峡两岸7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

10月25日 纪念刘少奇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10月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党史学会、上海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共同筹备的“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已经出版的两本文选,在以后出第二版时分别改称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10月29日至11月2日 第八次南方城市党史工作协作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来自南方24个城市党史工作部门6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

11月18日至22日 第五届国共关系史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11月25日至26日 “中华民国史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师范大学等十六个单位发起召开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全国毛泽东思想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

12月23日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召开了1993年年会。

12月26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在京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首都各界万余人出席大会。

12月26日至30日 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

12月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出版,至1999年6月第八卷出齐。

### 一九九四年

1月4日至6日 首都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研讨会召开。

1月15日 《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主办。

4月23日 首都举行《任弼时传》和《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诞辰90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发表讲话。

4月30日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双月刊)创刊,该刊前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主办。

5月6日至9日 中国近现代史科学学会第一届二次理事会暨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在承德举行。50人与会。

5月10日 《北京党史研究》在京召开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座谈会。

5月15日至19日 全国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170人与会。收到论文近170篇。

5月 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主办的《叶剑英研究》创刊。季刊。

6月14日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4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6月25日 《档案与史学》创刊。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双月刊。

6月30日 由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共同发起“近代中国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6月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成立。会长金炳华。

7月6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在市社科院礼堂召开邓小平理论研讨会。约30人与会。收到论文20余篇。

7月14日至16日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大举行。50余人与会。收到论文70余篇。

8月5日至7日 全国第二届解放战争与东北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70余人与会。收到论文110篇。

8月23日至26日 由全国医学院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学会等召开的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遵义市举行。

9月8日 胡锦涛在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上强调，要重视研究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

9月14日至18日 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

9月27日 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在沈阳召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讨会。50人与会。

9月28日 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是各级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

10月5日至10日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等举办的第三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江津市召开。

10月19日至22日 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社科院等八个单位共同发起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达百人。征集论文613篇，入选100篇。

10月20日至23日 华北地区保定军校暨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在保定举行。

10月21日 由安徽省委党史委等联合举办的安徽省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

在合肥召开。收到论文 60 余篇。

10 月下旬 第六届海峡两岸关系和国共关系史暨第二届中国国民党史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10 月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出版第二版,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二版,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1 月 22 日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充分发挥其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作用。

11 月 由中共湖北省委党史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在武昌召开。收到论文 50 篇。

12 月 14 日 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等联合在京召开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河北大学和保定军校纪念馆筹建处等联合发起的保定军校暨抗日战争学术讨论会在保定举行。42 人与会,提交论文 34 篇。

12 月 18 日至 20 日 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 一九九五年

1 月 6 日至 8 日 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研讨会在广东省韶关市举行。

1 月 6 日、10 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委员会”和“社会主义时期地方党史专业研究委员会”分别成立。

1 月 10 日 《广西党史》(双月刊)由《广西党史研究通讯》改刊出版。该刊创刊于 1981 年,由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1 月 10 日至 12 日 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八个单位在贵阳联合召开纪念遵义会议 60 周年理论研讨会。80 余人与会。收到论文 81 篇。

1 月 17 日 北京举行纪念遵义会议 60 周年座谈会。胡锦涛发表讲话。

1 月 18 日 国史学科建设座谈会在京举行。

1 月 22 日至 24 日 宋庆龄爱国主义思想研讨会在沪举行。

2 月 10 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双月刊)创刊,由北京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北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北京市社联主办。

3 月 1 日 纪念邓演达诞辰 100 周年讨论会在京举行。

3 月 31 日 《世界共运研究》(季刊)创刊,由聊城师院和世界共运研究所主办。

4 月 5 日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正式开放。邓小平为龙华烈士陵园题写了园名。

5 月 10 日至 11 日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合举办学术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部分抗战史学者参加。

5 月 15 日 《党建论坛》创刊。由山东省党的建设研究会主办。



5月30日至6月3日 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料问题学术讨论会在黄山召开。79人与会,收到论文48篇。

6月6日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6月16日 纪念黄浦军校建校7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6月18日至19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江苏省委共同发起的瞿秋白就义6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入选论文42篇。

6月22日 中共中央党校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6月29日 《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讨会在京召开。

7月4日至7日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等四家单位在石家庄市联合举办河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74篇。

7月5日 中国史学会五届二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史学会理事与会。

7月11日至14日 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在苏州大学召开了“抗战时期人物”学术讨论会。40多人与会,收到论文44篇。会后出版论文集《抗战人物论》。

7月18日至20日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陕西省委党校和延安地委协办的全国党校系统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共“七大”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延安举行。160余人与会。收到论文162篇。

7月24日至26日 第四届全国党史报刊研讨会在大连举行,全国38家党史报刊负责人与会。

8月6日至8日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上饶地委党史办、弋阳县委党史办在弋阳县联合举办方志敏殉难60周年学术研讨会。

8月11日至12日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6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上海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当年淞沪抗战的主战场宝山召开。近百名学者与会。收到论文190篇。8月14日至15日 北京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丰台举行。与会60余人。

8月15日至17日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70余名中外学者与会。收到论文70余篇。

8月16日至19日 由河北省中共党史学会、河北省社科院、石家庄市社科联、石家庄市中共党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市召开。中日学者100人与会,入选论文61篇。

8月22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抗日战争史研究座谈会。

8月22日至24日 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宋庆龄与中国抗日战争学术

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8月30日 《张闻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暨纪念张闻天诞辰9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8月30日至9月3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的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104篇论文入选。

9月3日 首都各界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李鹏主持会议,江泽民发表讲话。

9月14日至15日 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宣传部、区委党史研究室、广西社科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广西抗战文化研讨会在桂林举行,7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76篇,著作4本。

10月11日至13日 为纪念张闻天诞辰95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在上海浦东新区联合召开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100多人与会。

11月5日 邹韬奋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

11月10日至12日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员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

12月26日 湖南省韶山市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2周年大会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开园典礼。

### 一九九六年

1月22日 国史学会工作汇报会举行。

3月1日 首都举行《董必武》画册出版暨纪念董必武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3月21日 首都举行纪念贺龙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4月15日 首都举行《林伯渠文集》出版暨林伯渠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

4月15日至18日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北京召开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60人与会,入选论文52篇。

4月17日至20日 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革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即“刘少奇在华中”学术讨论会在湖南省宁乡县刘少奇纪念馆召开。

8月1日 为期4天的全国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在大连举行。研讨跨世纪发展战略与精神文明建设。

8月5日至7日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三次党史工作协作会议在新疆召开。全国十四个少数民族省区的40多名党史工作者与会。会议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历史发展》丛书的编纂工作进行了讨论。

8月13日 中国抗日战争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筹委会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举行纪念淞沪抗战59周年座谈会。

8月14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1周年,由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讨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举行。30余人与会,收到论文12篇。

8月20日 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80人与会。

9月4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卷出版座谈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9月10日 中央军委在京举行纪念叶挺诞辰100周年座谈会。16日,“叶挺将军纪念馆”在江西省上饶市落成,并开始接待参观者。

9月20日 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召开座谈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暨《红军长征史》、《红军长征纪实》出版。

9月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吉林省社科院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纪念‘九一八’事变65周年 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举行。30余人与会。

10月22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江泽民发表讲话。

10月22日至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与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在京联合召开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学术讨论会。

10月29日至11月2日 刘少奇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省滁州市举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

11月14日 江西省社科院科研处、当代江西研究所在南昌举行纪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学术讨论会。

12月7日至10日 全国政协文史委等联合举办的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西北大学举行。

12月10日 朱德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年 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和南昌陆军学院在南昌联合召开“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学术讨论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联合举办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60多篇。

### 一九九七年

1月5日 《中共党史通讯》改刊为大型文史双月刊——《百年潮》。该刊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

1月19日 在周恩来故乡江苏淮安市桃花垠,举行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奠基仪式。

1月21日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月19日 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4月16日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社联、市委党校等联合举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收到论文 200 多篇。

4月21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与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社科联联合在深圳举办九七香港回归学术研讨会。8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65篇。

4月 河北省举行纪念李大钊牺牲70周年学术讨论会。

5月24日至27日 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等八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第四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来自全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27篇论文。

6月17日至20日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第八次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62人与会。收到论文45篇。

6月18日 刘少奇旧居维修、邻居恢复工程竣工。

6月21日 李先念纪念馆在他的故乡湖北省红安县开馆。

7月6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和全国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研究现状及展望”学术研讨会。

7月7日 首都各界和全国各地纪念七七事变60周年。

7月10日 上海市社联、市党史学会、空军政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联合召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学术讨论会。80余人与会。

7月22日 南昌起义7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南昌举行。

7月23日 平津战役纪念馆建成开馆仪式在天津举行。

7月25日 新华社报道:纪念建军70周年暨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新时期军队建设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

7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大会。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

8月1日 江西省和南昌市党政军集会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八一”南昌起义70周年。

8月16日 李大钊纪念馆落成开馆仪式在其故乡河北省乐亭县举行。

8月 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举行。

△上海举行抗日战争爆发暨淞沪抗战60周年学术讨论会。60余人与会。收到论文近30篇。

9月2日 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京举行多媒体只读光盘《邓小平》演示座谈会。

9月12日至18日 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0月8日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成立。

10月14日 南昌召开纪念新四军成立60周年大会。

10月25日至27日 来自华东六省一市党史教学研究工作者50余人集会上海同济

大学,举行中共党史学术研讨会。

10月27日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南京召开。

10月 江西召开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70周年学术研讨会。

11月18日至22日 南方城市党史工作协作会第十二次会议在桂林举行。

12月2日 新华社报道:《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一书出版。

12月24日至25日 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九家单位在京联合召开了“改革:由来与起点”学术研讨会。

12月28日至30日 全国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建硕士学位点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29个硕士点的50余名研究生和近30名研究生导师与会。收到论文100余篇,入选53篇,并以《新视野》1997年增刊形式结集公开发表。

### 一九九八年

2月12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现代史)学会召开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学术讨论会。

2月17日至23日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七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入选论文89篇,特邀论文10篇。

2月20日 全国党建研究会在京举行座谈会,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

2月23日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

2月25日至26日 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会上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各级领导干部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

2月27日 北京邓小平思想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邓小平理论与进一步解放思想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月27日至3月2日 由天津市政府和南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180多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约150篇。

2月28日 天津市在新建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前广场,举行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落成开馆仪式。江泽民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3月3日 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社联等6家单位联合召开“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收到论文56篇。

3月23日至27日 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在重庆联合举办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讨会。100多人与会。

4月21日 北京举行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理论研讨会。

5月8日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

5月11日 上海社联召开“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理论研讨会。

5月14日 上海市科社学会、市委党校、空军政治学院联合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讨会。

5月26日 河北省各界在西柏坡集会,纪念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50周年。

6月9日 中共党史前沿与热点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6月9日至16日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暨人物传记写作经验交流会在南昌举行。

6月10日 张太雷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常州举行。

9月12日至13日 山西省举行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学术研讨会。

9月22日 全国高校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全国43所高校专家、学者100多位参加会议。

9月 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会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换届选举大会。

10月6日至9日 彭德怀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在湘潭举行。入选论文101篇。

10月7日至9日 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革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在江苏常熟沙家浜镇召开第六届年会。

10月22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笔致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要求用好党史这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并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10月27日至30日 以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为主题的98华东六省一市中共党史学术研讨会在安徽举行。35篇论文入选。

10月27日至29日 由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中共厦门市党史研究室和厦门市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研讨会在厦门召开。80多人与会。

10月28日 上海党史学会与台湾学者在上海社科院进行学术交流。

11月10日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地方党史研究会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11月12日至13日 湖南省刘少奇思想研讨会在长沙举行。50余人与会。

11月13日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和中共党史(现代史)学会联合举办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11月16日至20日 全国党史系统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上海举行。150余人与会。入选论文60余篇。

11月17日 中国档案学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分会召开1998年学术年会。

11月18日 湖南省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生平业绩重新布展开展仪式在湖南宁乡花明楼举行。

11月19日至23日 为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京联合举办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

11月20日 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6000多人与会。

11月20日 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联合在广州举办广东省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11月26日至28日 由中共党史学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等共同举办的刘少奇经济思想研讨会在天津举行。近百人与会。入选论文50篇。

12月2日 新华社报道: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和《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版。

12月12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与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行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学术讨论会。到会20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

12月13日 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成立。

12月16日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地方党史研究会召开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理论研讨会,40余人与会。入选论文22篇。

12月18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

12月21日 山东省党史系统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省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淄博召开。

12月25日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召开纪念毛泽东诞辰105周年研讨会暨1998年年会。

△《毛泽东》光盘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12月25日至29日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在长沙召开“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

### 一九九九年

1月15日 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召开64周年会议在遵义举行。

1月19日至21日 全国瞿秋白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常州举行。入选论文60篇。

1月29日 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

2月5日 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纪念“二七”革命斗争76周年大会暨“二七”烈士纪念碑迁建落成典礼。

3月5日 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1周年,周恩来民主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在江苏省淮

安举行。大会交流论文 52 篇。

3 月 25 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发扬五四精神,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和《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20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4 月 21 日 江苏纪念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宁召开。有 8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论文 80 多篇,入选 15 篇。

4 月 29 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七家单位在北京市委党校举行主题为“五四”与中国现代化的学术座谈会。

△由江泽民题写馆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在江苏泰州市开馆。

5 月 5 日至 8 日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学术讨论会在海口市召开。有 38 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论文 27 篇。

5 月 21 日 上海市档案馆举行《上海解放》(续篇)首发式暨纪念上海解放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5 月 28 日 上海中共一大大会址纪念馆扩建后正式对外开放。

5 月 26 日至 31 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河北省石家庄召开座谈会,座谈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解放战争时期)修订稿。

6 月 6 日至 8 日 张学良基金会、辽宁大学历史系、台安县人民政府联合在辽宁省台安县举办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

6 月 9 日至 11 日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联等七个单位联合主办的“建国五十周年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在东莞市举行。与会 150 人,收到论文 90 多篇。

6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党史师资班部分学员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有关同志座谈“党校党史课教学与党史研究”问题。

6 月 25 日 全国党建研究会在京举行纪念中共成立 78 周年暨表彰全国优秀党建读物座谈会。

6 月 28 日 纪念中共成立 78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

8 月 4 日至 7 日 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主办,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与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协办的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两岸学者 70 余人,提交论文 42 篇。

8 月 11 日至 14 日 由延安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组织承办的“延安时期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举行。

8 月 13 日至 16 日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联合中国现代史学会、山东省党校系统党史学会以及青岛市委党校在青岛市召开“五十年的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140 余人与会并提交了论文。



8月20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100周年。

8月26日 为迎接五十周年国庆，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与“新浪网”共同推出“辉煌五十年”专题网站。

8月 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龙江党史》从1999年第4期改名为《世纪桥》(双月刊)，该刊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国近现代史料研究会共同主办。

9月11日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召开“总结历史经验，颂扬辉煌成就——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学术讨论会。60多人与会。收到论文115篇。

9月12日 据新华社报道，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近日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月14日 江苏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庆祝建国50周年座谈会在南京举行。

9月15日 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省党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浙江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

9月18日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沈阳开馆。江泽民题写馆名。

9月19日 国家统计局组织编写的大型文献图书《新中国五十年》已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发行。

9月25日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创新之路》首发式暨庆祝建国50周年理论研讨会。

△吉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会庆祝建国50周年座谈会在长春召开。

9月28日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在顺义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艰辛的起步》出版座谈会。

本月 黑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市举行。近50人与会，收到论文20多篇。

10月1日 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

10月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广东举行中国革命史学术研讨会。70余人与会。收到论文60篇。

10月21日 天津市召开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10月27日 开国元勋诗词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北京师大中文系联合主办。

10月29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11月8日 新华社报道：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和中册已分别于1996年2月和1997年12月出版。

11月10日 豫皖苏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大会在安徽举行。

11月15日至18日 1999年华东六省一市中共党史学会年会在江西上饶举行。

11月23日 河南大学出版社与《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举行“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座谈会。

△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在济南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马石山突围战57周年。

11月24日至27日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接见会议代表，并发表“党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的讲话。曾庆红作了“科学总结党史，服务全党工作大局”的讲话。

11月25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时代与发展——'99邓小平理论研讨会”。近百人与会。提交论文30多篇。

△《中共党史研究》刊登马有智的文章《江泽民论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论述江泽民在多种场合和多次重要讲话中，号召全党全社会要认真学习 and 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

12月4日 上海党史学会召开1999年年会。

12月5日 河南省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郑州召开。

12月6日至9日 全国第五次陈独秀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12月7日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召开“迎接新的千年座谈会”。

12月9日 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军区政治部在福建龙岩市联合召开理论研讨会。纪念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发表70周年。

△昆明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大会在昆明举行。

12月10日 福建省古田会议70周年纪念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举行。

12月11日 广西集会纪念百色起义70周年。

12月12日 曾山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南昌举行。

12月14日 江苏省省辖市党史工办主任会议在南京举行。

12月17日 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聂荣臻同志诞辰100周年。江泽民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会在河南永城市召开。

12月23日 天津延安精神研究会、市卫生局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发表60周年。

12月26日至28日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省党史工作会议。16个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46个革命老区县委党史征研室主任等130多人与会。

## 二〇〇〇年

1月8日至10日 第四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暨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在京举行。

2月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5卷本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齐。此书第1卷1996年12月出版。

3月2日 上海举行纪念左联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

3月7日至9日 华东地区党史期刊评审会在南京召开。

4月21日至22日 华东六省一市党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安徽合肥召开。

4月26日 “反台独、促统一”研讨会在深圳举行。200多人与会。

4月26日至27日 刘少奇军事思想研讨会在湖南宁乡县召开。

5月17日至19日 全国直辖市党史工作协作会议在天津市召开。

5月22日 中共中央在京举行纪念李富春、蔡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6月5日至6日 福建省召开全省党史工作会议。

6月12日 新华社报道：《陈云手迹选》、《陈云年谱》和《缅怀陈云》出版发行。江泽民为《陈云手迹选》题写书名。

6月14日至16日 南方城市党史工作协作会第十五次会议在福州市举行。来自南方46个城市近150人与会。

6月20日 中组部、统战部和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的“邓小平新时期统战理论研讨班”开学仪式在京举行。

6月23日 山东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

6月26日至28日 “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40余人与会，入选论文31篇。

6月27日至29日 全国第四次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大学举行。

6月30日至7月2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浙江嘉兴联合举行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80余人与会，入选55篇论文。

△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汕头市委、潮阳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学术研讨会”和“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和红十一军成立70周年大会”同时在潮阳市举行。300人与会，入选论文45篇。

7月12日 《党史信息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荣誉奖。

7月14日 西北城市党史工作协作会第三次会议暨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来自西北五省区的党史界专家共商西部开发。

7月17日至20日 新疆召开地方党史编写工作研讨会。

8月3日至5日 由西北大学等单位主办的“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

西安举行。8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提交论文60多篇。

8月7日至12日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东方历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冷战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

8月10日至14日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主办的“中国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全国学术讨论会”在青海西宁市召开。79人与会,54篇论文入选。

8月15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学术成果交流会在南京举行。

8月24日至29日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2000年度全国第一期党史干部业务培训班在哈尔滨举行。

8月30日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张闻天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发表讲话。

8月31日 《粟裕传》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9月2日 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举行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座谈会。

9月6日至8日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五次党史工作协作会议在银川召开。

9月12日至14日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深圳、海南、厦门、珠海、汕头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联合举办的“经济特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深圳召开。

△张闻天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无锡举行。入选论文60篇。

10月20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召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历史回顾座谈会”。

10月21日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

10月25日 首都集会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江泽民发表讲话。

10月26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联合召开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学术座谈会。

10月27日至31日 第八届全国省会城市党校校长座谈会在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召开。

10月底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13卷19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至此,从1984年12月开始策划,1986年3月全面展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基本结束。中央、省、地、县四级共编纂出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3065部,总字数15亿余。其中省一级29部,地一级300多部,县一级2700多部。只有极少数县的组织史资料尚未出版。

10月 由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80周年座谈会在武昌召开。

11月5日 胡绳在上海逝世。胡绳,1918年1月11日生。江苏苏州人。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94年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85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兼任过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导者、组织者之一。著作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全书》、《胡绳诗存》等。主编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1月1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胡绳学术思想研讨会。150余人与会。

11月24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深切缅怀胡绳主任座谈会。

11月27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在京举行“追思胡绳同志学术业绩座谈会”。30多人与会。

11月28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宣部日前召开学习贯彻江泽民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提出,要把深入研究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崇高责任。

12月7日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在广州召开纪念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50周年学术讨论会。30多人与会。

12月11日至14日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德阳市委在四川省德阳市召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50余人与会。

12月25日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出版社在毛主席纪念堂联合举行《毛泽东文集》研究座谈会。

## 后 记

1988年我从华东师大史学研究所调到政教系(以后改为法政系,现改为法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开始由原来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教学,转向进行中共党史史学史的研究、教学。在教研室翟作君等教授的关注、帮助下,在党史学界张静如教授、王仲清教授、郭德宏教授、蒋伯英教授等专家的指导、支持下,发表了一些中共党史史学史及中共党史学理论方面研究的文章,出版了几本研究著作。之所以能小有收获,一是党史学界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视、扶持自身理论学科的建设。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的规划下,张静如教授开始挂帅组织中共党史史学史的研究,王仲清教授开始挂帅组织中共党史学概论的研究,他们的著作在90年代初相继出版。我的第一本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著作也在张静如教授的提携下出版。二是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它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来说是一个新学科,对于中共党史学科来说也是一个新学科。一个崭新的领域,只要肯努力钻研,是容易出成绩的;一块处女地,只要辛勤开垦、耕种,是能够大有收获的。三是主观上也有些有利条件,即我在研究生阶段是攻读史学史专业的,建立了一定的史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由中国史学史转向中共党史史学史,也算驾轻就熟,可以少走点弯路。四是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甘心丁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各种诱惑。有的人转向一些热门专业的研究、教学,到处讲课,赚钱多多,也劝我转,我不动心。有的人说研究党史应研究现实性强一点的课题,轰轰烈烈的形势下,还搞什么史学史。我说现实性强的课题要研究,学术性强的课题也要研究。就这样,十几年来,把中共党史史学史作为自己的事业坚持着、追求着。

十年前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由于仓促上马,请了进修教师、研究生帮忙,一直感到问题很多,总想重新写。加之十年来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有了较大进展,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令人惊喜,有责任进行总结,

于是2000年初,在完成了张静如、郭德宏教授托咐的《中国现代科学全书·历史学·中共党史》卷的写作后,便开始重写《中共党史学史》。

此次写作,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因为1999年下半年以来,胃病复发,一直不见好转。到2000年夏,由于胃口大减,体重下降了30斤,不得不花点时间跑医院。而教学工作仍很繁重,每周研究生、本科生的课总要上四五门,还带十个研究生。在最忙的时候,2000年6月至7月,又接待了日本访问学者村田忠禧教授。其间,我写的关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的部分,得到了村田教授的审阅、校正,并认为我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使我感到莫大欣慰。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师友也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写作,鞭策着我咬紧牙关,排除干扰,坚持写作。

此书的完成,并得以出版,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其中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党史研究简目》,是沈茶英、韦晓宏编写的,我作了一些补充。附录二《中国中共党史研究大事记》,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王建军在我的指导下编写的,我作了补充和修改。这两个附录,使本书的资料和信息量大大增加,当然挂一漏万之处一定不少,以后将进一步修订。第四章中《沙健孙等〈中国共产党通史〉》一节,是三年前毕业的研究生、现为上海政法党校讲师彭辉写的,我略作了修改。《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一节,韦晓宏写了初稿,我进行了改写。对于他们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及刘新田先生,较早关心了本书的写作,给予很多指导、帮助,并使此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重点图书选题”,极大地鼓舞了我。没有他们,本书的出版可能会延迟。

本书原有一章写世界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考虑到这部分可以另写专书,且张注洪等《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已经出版,可以参见,遂将此章删去了。

本书的资料疏漏、评论失当,在所难免。书的框架、重点分析研究书目的选择,亦为一己之私见,不知是否能得到学术界的首肯?企盼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利日后修订。赐教请寄上海华东师大法政学院,邮编:200062。

周一平

2001年3月12日